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



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200号

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

RIWEI TONGZHI XIA DE BEIJING JIAOQU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香河第二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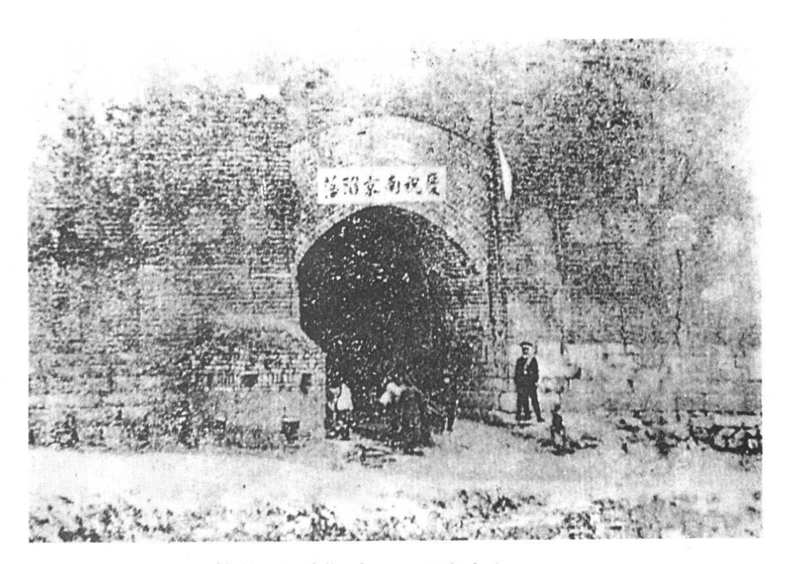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76000字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0-02665-4

K·269 定价：15.80元



日伪统治时期密云县城东门

（王技文　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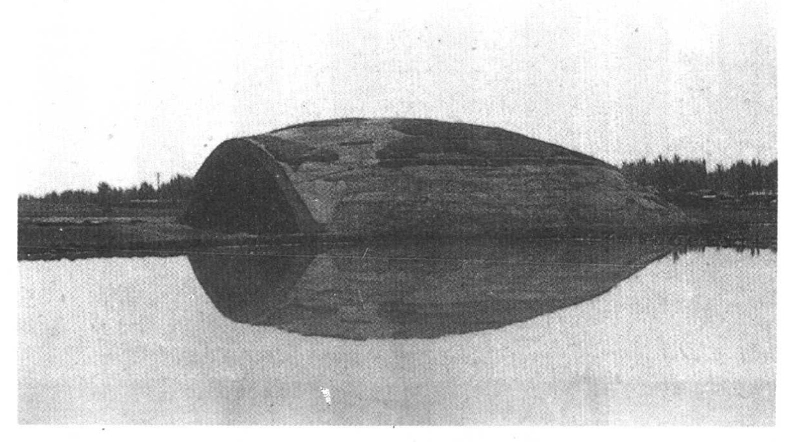


日伪统治时期古北口日本守备队兵营

（王技文　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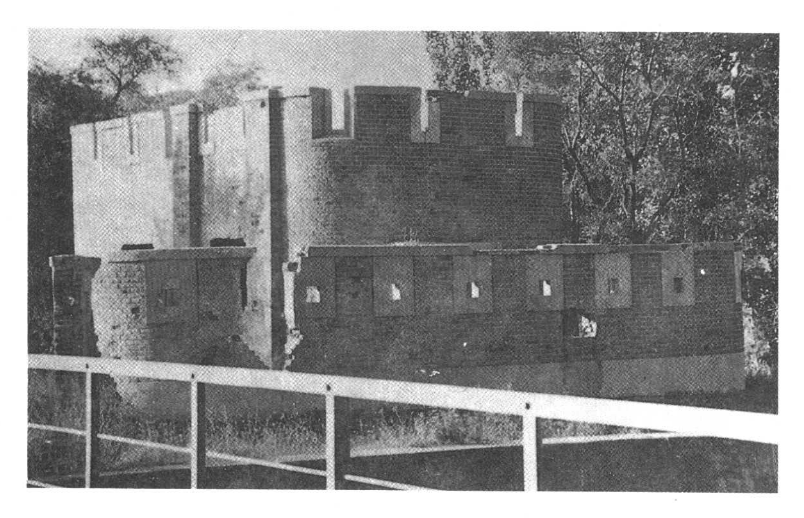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正门



位于大兴县金星乡团河路东侧的日军飞机窝，今尚存。

（李丙鑫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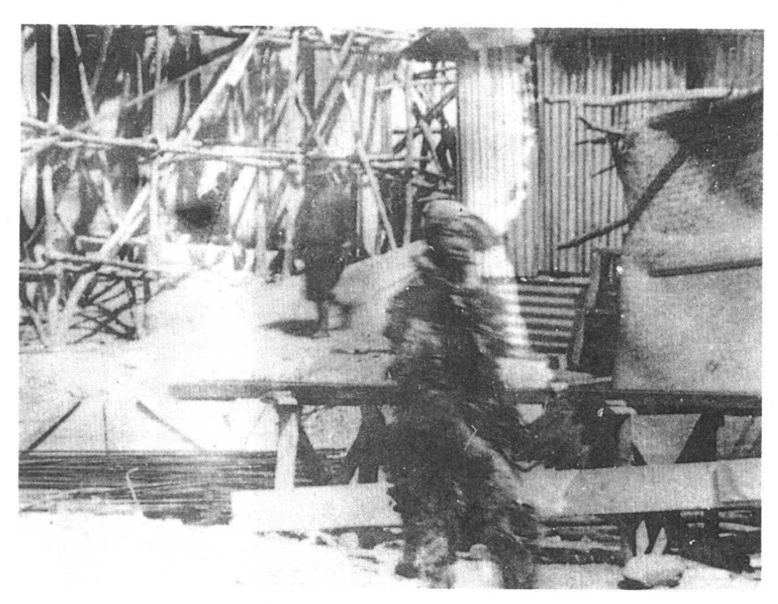
密云县沙河铁路大桥遗存之日本炮楼外景

（王技文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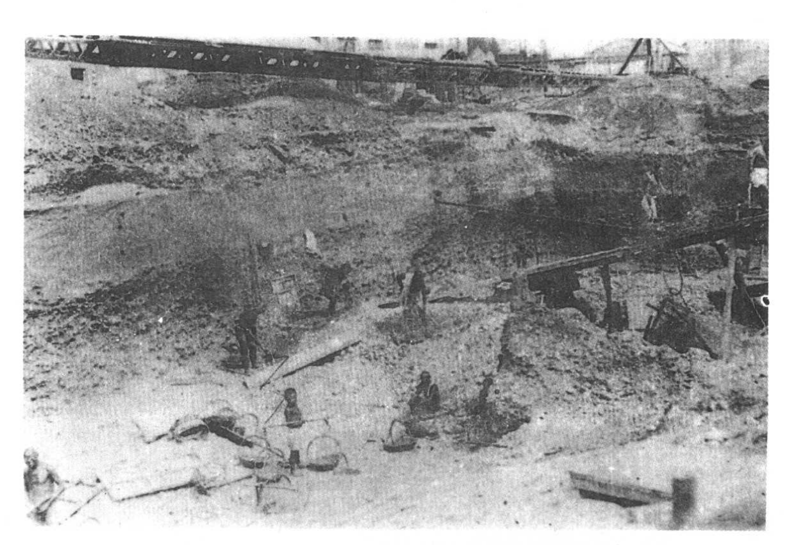


位于大兴县金星乡团河路东侧的日军碉堡，已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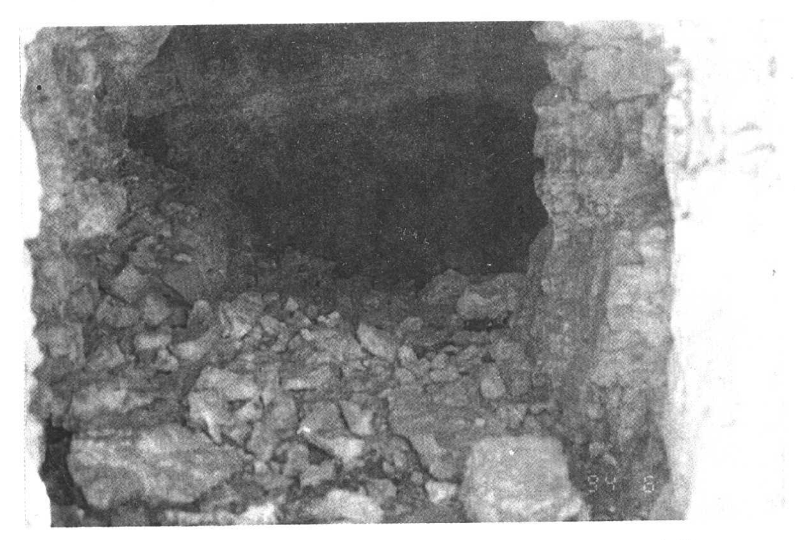
（李丙鑫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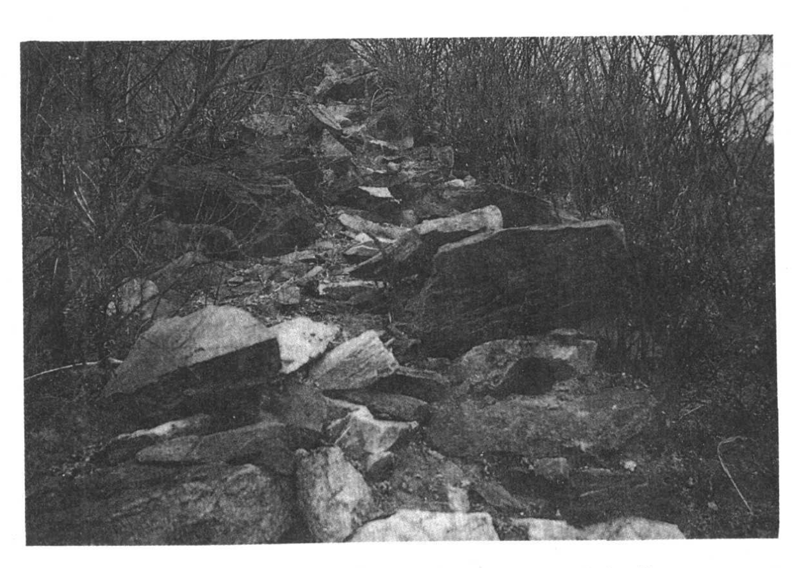
北平沦陷时期石景山炼厂的工人



北平沦陷时期工人挖掘石景山炼厂贮水池



《日寇掠夺昌平县石棉矿藏见闻》中的石棉矿洞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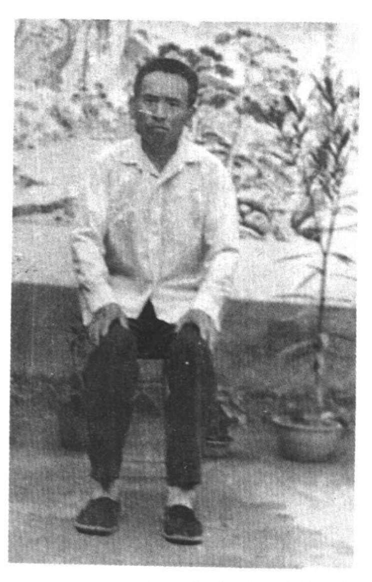
怀柔县前安岭村日伪时期“围子”的残存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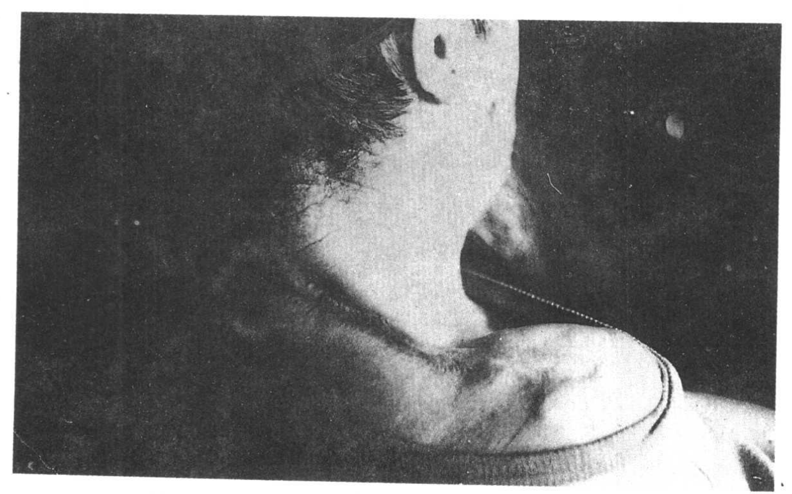
审判“王家山惨案”罪魁时证人合影



“王家山惨案”幸存者王淑兰



“王家山惨案”幸存者王文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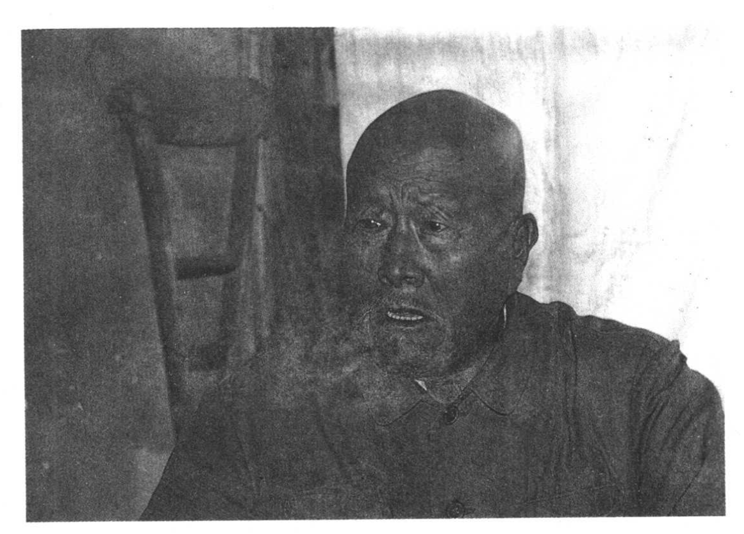


“黑豆峪惨案”中幸存者陈守义的伤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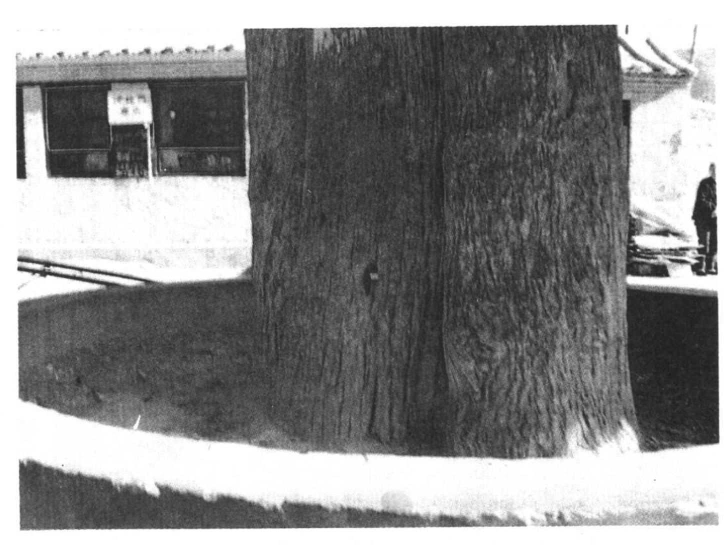
“李各庄惨案”幸存者王有才在讲述惨案经过

（王技文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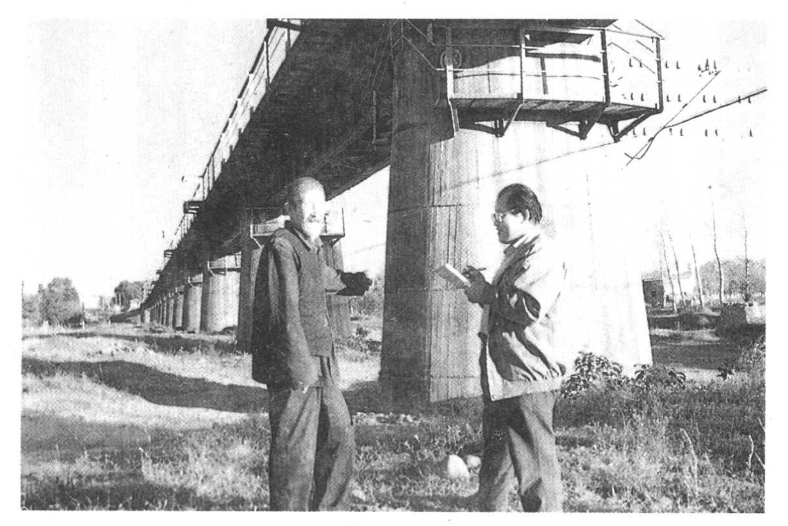


李树德先生讲述"黄村车站事件"前后经历

（李丙鑫 摄）



《虎口余生记》中日军在老槐树下杀人留下的弹痕



《在古北口修铁路》作者访问张政一老人时，老人手指铁路桥墩说："当年我修过这个桥墩。"



"潮河关惨案"目击者刁桂云、贾德、李军（自左至右）

（王技文 摄）

爱国情深　战斗不息（代序）

张大中

1987年，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时，约我写了一篇《苦难深重的岁月》，作为代序。今年，编辑出版《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以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是很有意义的。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主要是记述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城内实行残暴统治的罪行和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斗争。《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主要是记述日本侵略者在北平郊区实行残暴统治的罪行和郊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斗争。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可以使读者从城市和乡村两个侧面进一步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累累罪行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同时，也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了解抗日斗争的形势，以及北平城乡各阶层人民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和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郊区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同城市相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更为残酷，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假如说日本侵略者在城市还用“共存共荣”、“日中亲善”的油彩装扮起来，进行欺骗的话，那么在郊区它就更肆无忌惮地剥掉一切伪装，赤裸裸地露出了狼牙。当时，在北京现属郊区的范围内，形

成三种地区：(1) 平原地区基本上是敌占区，敌伪军重兵驻扎，道路如网，堡垒如林，设置了伪政权、伪警察所，实行保甲连坐，每人都发“居民证”(俗称“良民证”)，随时查户口，“清乡”搜查，乱抓“民夫”，强奸妇女（向乡村要“花姑娘”)，搜刮资财。人民处于敌人的恐怖统治之下，过着日夜惊恐不安、悲惨的生活。(2) 沿山地区是游击区，敌人为着割断我抗日根据地和城市之间的联系，对抗日根据地施行政治、经济封锁。从房山区（当时为河北省房山县）的镇江营、张坊，沿山往北到妙峰山下的北安河、白虎涧（当时为河北省昌平县）修造了封锁线，沿线挖掘二三丈深的封锁沟，沿沟修筑炮楼，炮楼之间可以“交叉射击”，山口通道架设铁丝网，敌伪军驻守，检查过往行人。因接近我抗日根据地，个别敌伪军警不敢单独行动，小队敌伪军日夜巡逻。延庆县当时划归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怀柔县、密云县长城以北地区划归伪满洲国。敌人在华北与伪满洲国交界处，从延庆县的白河堡往东到密云县的古北口一线，集家并村，制造了“无人区”，焚烧村庄，强迫居民迁移到敌人控制的据点，所谓“集团部落”，居民出入都要进行检查，对拒不迁移者一见就杀。封锁线、“无人区”实际是我八路军与敌伪军战斗的前哨，在它的纵深两侧，经常处于“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斗争的战争状态，敌人制造了许多次焚烧村庄、集体屠杀无辜百姓的惨案，人民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3) 山区是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现在的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县的西部山区，延庆县、怀柔县、密云县、平谷县的山区是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敌人为分割我抗日根据地、掠夺矿产资源，沿永定河、白河和几条山沟修筑了军事公路和碉堡，公路两侧是我抗日根据地，在这些地区战斗频繁，是游击根据地。山区抗日根据地驻有我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小股敌人不敢进入活动，只能集中相当大的兵力进行“扫荡”。因此，在“扫荡”时特别凶狠，实行杀光、烧光、抢光

的“三光政策”，敌伪军见人就杀，见村就烧，见粮食、牲畜，能抢的抢走，抢不走的就烧，赤裸裸地暴露了它们毫无人性的侵略者的兽行。

（二）武装斗争是抗日的主要形式。城市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相结合，配合向敌后挺进的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在距敌人军事、政治统治中心的北平城不足百里之处，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保持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使中国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敌人的后方，成为人民的中流砥柱。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8月，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即指示留在天津的河北省委，把工作中心和注意力转向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北方局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11月，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八路军一部挺进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围绕北平建立了平西、冀中、冀东、平北抗日根据地。大批平、津等城市的知识分子，到乡村中去和广大农民相结合，参加游击战。游击战的广泛开展，直逼北平城郊，一度攻克石景山发电厂、昌平城等地。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百花山下三坡地区正式成立，萧克任司令员，按照“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方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专署、县政府和乡村抗日政权，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开展抗日教育和动员工作，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建立了军民团结、干群团结，与敌占区天壤之别的独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生活。这是在敌后建立起来的新天地，人民为自己的胜利感到自豪。1940到1942年期间，敌人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军事进攻，频繁“扫荡”、“清剿”，我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处于最困难时期，我八路军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大小战斗。1942年开始，敌人兵源不足，增兵困难，9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时提出“到敌后之敌后”的号召，即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的地区去活动。随后，各地区、各县都建立起了

武工队，到敌占区进行游击，突破封锁线、填平封锁沟、打炮楼、拿据点，消灭敌伪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收复了广大地区，我抗日根据地重新发展扩大。1945年初，逐步开展了对敌人的反攻，克复了许多敌人的重要据点和县城。

1941年12月，我就读的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遵照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我随同北平城委书记周彬和黄云同志去平西抗日根据地。因她们没走过房山的交通线，于是在12月中旬，我先行到平西根据地联系和探路。我从北平前门乘长途汽车出发，经长辛店、良乡县城，到房山县的东长沟村（这里有敌人的据点），西行十几里到惠南庄周硕臣家（我秘密交通站），夜间周硕臣带我通过张坊附近的封锁沟，过沟到片上村，见到岗哨上的八路军战士。这位八路军战士第一声叫我“同志”时，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我亲身体会到踏上祖国自由的土地，重又恢复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和自尊时，无比感慨和兴奋的心情。休息片刻，我们继续前行，上午经十渡村到西庄，这里是中共房涞涿县委和房涞涿抗日县政府的驻地。县委书记赵然接待，并介绍根据地的情况。待周彬、黄云等九个同志到齐后，我们一起西南行，当日到达涞水县的赵各庄。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中共平西地委、平西专署等领导机关就驻在这一带的村庄。过了几天，晋察冀北方分局社会部驻平西的负责同志钟子云指示黄云和我返回平津，联系整理地下党组织，接回有被捕危险的同志。1942年1月初，我从赵各庄出发，经三坡、百花山，夜里先后通过斋堂沟、永定河封锁线，到达永定河北。这里是中共昌宛县委、县政府活动的地区，北方分局社会部设有工作站。沿途所见，各个村庄都被敌人放火焚烧过，房屋四壁都烧黑了。农民用树枝、荆条、山草搭上屋顶，以避风雪。我们一行同农民睡在一个炕上，吃一样的饭。吃的是玉米糌干饭、土豆、盐渍树叶。无法洗澡，几天身上就长了虱子，同志们戏称为“光荣虫”。农民生活是艰苦的，但对争取胜利很有信

心。和农民聊天，他们说：熬得过去，最终是要把日本鬼子打走的！这时，我深感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和农民是鱼水关系都不够了，简直是血肉相连。这种血肉相连，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永定河北地区是游击根据地，县区领导机关和我们的工作站，没有固定的驻地，依据敌情的变化，经常转移。我们站在山头上，有时就能看见敌人沿军事公路行进的运输队。战线犬牙交错，战斗频繁。我们继续前进，夜里通过白虎涧附近的封锁线，出山区进入妙峰山前的平原。这里是敌占区，但在许多乡村里都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抗日积极分子。村公所是两面政权，白天应付敌伪军，晚上配合我们的抗日工作。在这里我遇见了燕京大学的校友萧方，他是秘密交通站的负责人，活动在前后沙涧、七王坟、苏家坨、六里屯等村庄，白天掩蔽在农民家中，晚间活动。在他的帮助下，我换上城市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经过西北旺、大有庄、颐和园，又回到了北平城。我向北平城内的地下党的同志讲到这一个月的见闻，他们无不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事迹和爱国精神感到钦佩，受到鼓舞。我完成任务后，又在永定河北活动了三个月。这里的长期游击环境，农民也习以为常了。有些日子我们住在榆泥坑一带的一个山庄里，这里有一家农民养了一头驴、一头猪。每当有敌情时，农民牵着驴上山，猪也本能地跟着上山。敌情过去了，农民牵着驴下山回家，猪也跟回来。农民对这头猪有了感情，过春节都不肯杀。1942年4月初，接到电报，调我回晋察冀北方分局，我即出发，原途返回。刚过了斋堂沟，遇到敌人“扫荡”，便汇合到当时正在这个地区检查工作的平西地委宣传部长陆平率领的工作团，打了十几天游击，才到了平西地委的驻地。从此出发，通过紫荆关（这里有敌人的据点）封锁线，进入冀西根据地，这里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是晋察冀军区的大后方。走到易县的龙华镇，适逢赶集，赶集的农民有数百人，熙熙攘攘，相当热闹，买卖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也有从敌占区搞来

的火柴、食盐、毛巾、肥皂等日用杂货，还有不少饭摊。我在北平活动时，卖了我母亲给我的皮衣，这时兜里还剩了一些钱，就和同行的田营长、交通员一起吃了一顿猪肉包子、豆腐脑，大饱口福。然后经过完县、唐县、曲阳、灵寿，到了平山县老坟沟村。沿途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抗战标语、晋察冀边区的施政纲领，村口有黑板报和查路条（边区通行证）的儿童团员，白天农民忙于春耕生产，晚上上夜校，一片团结抗日的气氛。我在行进中，学唱抗战歌曲，情绪高昂，忘记了疲劳。老坟沟村是北方分局组织部和城市工作委员会的驻地。这时已是4月底了，接着我们参加了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举行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集会。为防敌人空袭，是在天黑以后举行的，在河滩上搭起舞台，点上汽灯，会议有领导同志的讲话，有文艺节目。当在夜空的河滩上放声唱起嘹亮的《在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时，我非常激动，几次落下了热泪。我也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年已六旬的母亲！我们一定要坚决抗战，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神圣的领土。

过了“五·一”节，主管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北方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刘仁同志和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刘慎之同志找张一峰和我谈话，派我们到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满城地区建立通往北平、天津的秘密交通线。我们当即出发，到了满城地区，见到中共满城县委书记石金奎，在他的帮助下，从石井村出山，通过封锁线，到了距保定市十几里路的蛮子营村。这一带乡村党的基础比较好，是中共满城县五区区委和五区抗日政府活动的地区，村里有党支部。我们通过党组织在蛮子营和邻近的大车村、辛庄，一直到靠近保定市只有四五里路的水碾头村的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交通员，建立了交通站。这里是敌占区，交通员都持有“居民证”，他们可以进城接送过往的地下工作人员，收发信件。从这时开始，一直到1945

年8月抗战胜利，我都在这个交通站工作。同时，每年学校寒暑假前后，我都化装去北平，有时也去天津，联系地下党的工作，传达指示，布置工作，了解情况。

作为历史的过来人，在四年的时间里，我多次来往于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和敌伪统治下的北平，亲身经历了“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的斗争，目睹和听说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以及它们给我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也亲眼看到了我国城乡人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英勇卓绝的战斗。许多我熟悉的同志，他们有从北平去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有一同工作的和掩护我们的农民、工人，在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许多农民弟兄，亲属被日本兵杀害，房屋被日本兵烧毁了，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忍受着内心的剧痛，顽强地进行着战斗。即使在敌占区，以至在敌人的据点里，也有众多的农民抗日积极分子，冒着全家的生命危险，掩护抗日工作人员，成为抗日的“地下堡垒”。总之，哪里有日本的侵略，那里就有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反抗侵略，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的民族。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凌辱。帝国主义的每一次侵略，都给我国人民造成了灾难。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烈火，1900年八国联军踏在北京马路上的铁蹄声，加深了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之情。帝国主义屡屡入侵，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之情也就沉积得愈加深厚。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肆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自然会遇到中国人民的誓死抵抗。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带领和团结人民，结成亿万人民的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抗日战争开始，国内外对中国抗战前途议论纷纷，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写了光辉的著作《论持久战》，指

出抗战是持久的，但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一英明、科学的论断。

现在，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断子绝孙，霸权主义者仍在横行，它们欺负我们，歧视我们，总想骑在我们的头上，让我们听从它们的指挥棒。我国人民清醒地看到这一切，正在埋头苦干，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独立、繁荣、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这是时代赋予我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爱国情深，战斗不息。

1994 年 12 月

目　　录

●血　证●

●苦　役●

●统　治●

●掠　夺●

●奴 化●

●毒 化●

●反 抗●



■ 血　证

密云县潮河关惨案

王敬魁

长城抗战，日军损失惨重。1933 年 4 月 14 日拂晓，驻密云县古北口长城一线的日本军队第八师团长西羲一，命令 100 多名日军闯进潮河关村，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报复。日军烧了村东头吴子衡家的房子，把部分老百姓集中到街头的四棵大槐树下，一个一个地用刺刀挑死。贾德明一家 5 口人，被杀死 4 口，他媳妇被日军杀死以后，10 个月的孩子满身血糊，趴在妈妈身上乱哭乱嚎，一个日军把孩子用刺刀挑起，恶狠狠地摔在地上。左英魁一家 4 口，在家的 3 口，刚走出家门，就被日军挑死。

没集中到大槐树下的也不能幸免。何国庆起早在菜园子里栽菜，日本兵照他后背猛刺一刀，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就死在血泊中了。李发一家 4 口人，日本鬼子在街上追上了他哥哥，一刺刀就扎死了。然后又把他父母亲捆在一起，拽到屋内，两个日本兵前后各一人喊着号，一块下手把老俩口挑了。当时李发只有十几岁，鬼子兵对他也不放过，在他身上扎了四刺刀，李发倒在父母尸体旁。日军又把三间房子泼上汽油点着火，狂笑着走了。李发苏醒过来后，忍着疼，从烧着的屋里往外爬。刚爬到外屋台阶，房子就烧落了架。这时候，天已大亮。村西头朱天福一家藏在白

薯窖里，日军进屋见没人，听见孩子的哭声，吼叫着让出来，全家 4 口人，出来一个，被刺死一个。

4 月 16 日，这支惨无人道的日军见到潮河关村残存的房子里还有炊烟，又来“扫茬儿”，把十几个人集合在一起，用手榴弹炸死 3 个 70 多岁的老太太。4 个年轻小伙子躲在赵振发家，日本兵在赵家扔了手榴弹，赵家 8 口人只剩下 3 人，其余都死了。李才家两口、魏廷杰家 4 口，都被日军刺死。李发看见日军就跑，日军随后就追，开枪把他的棉袄打了几个窟窿。李发跑到下甸子村东沟里，又遇上鬼子的飞机扔下的炸弹，掉在地上没炸，总算拣了一条命。李发的伤流了半年脓血，伤好后留下几个碗大的伤疤。

日军“扫茬儿”以后，幸存者逃到外地，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村里的尸体任饿狗撕啃。饿狗吃红了眼，见外村的活人也敢撕咬，当地人只好见狗就打。过了十多天，尸体臭味难闻，无人掩埋，中国军队 17 军 25 师派人请来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到这里埋葬了尸体。这一年，全村的土地荒芜，村庄内长了一人多高的蒿草。

这个仅有 80 户人家，400 来间房屋的小山村，在日寇一手制造的惨案中，有 83 口人被杀，360 多间房屋被烧，200 多头牲畜被烧死。

这是日寇进关后的第一起惨案。

【作者简介】 王敬魁，密云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

（密云县政协供稿）

在古北口修铁路

李善文

1936年以前，北平的火车向东只到通州（通县）。由通州到古北口的唯一一条大路，是清朝皇帝到热河离宫的那条3米左右宽的土御路。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之后，日寇垂涎我华北、吞并我中华的野心更加强烈。而通州到古北口的交通状况，又制约着日寇实现其战略意图。为此，日寇急急忙忙抓紧修筑“通古铁路”。

通古铁路由“满洲”铁路局负责。1936年8月开始勘测，9月便全线开工。1938年2月全线接通，4月1日通车。从此，北平的火车可直通到所谓“满洲国”界古北口了。这条铁路在密云境内共有五个站，除古北口火车站由锦州铁路局管辖外，其余下会、石匣、小营、密云四个站均由满铁北京铁道事务所管辖。

参加通古路修筑的日本商社有罔组、鹿岛组、大林组等。全线开工时，共征用中国劳工12，000余人，有当地农民，也有从东北各地抓来的。当地劳工由各乡（村）保长摊派，年龄21岁至25岁之间，男青年。每期15名至20名，每期10天。开始时由日本小龙公司付给每个劳工每日4至6角伙食费。伙房由各村自立，只管劳工吃饭，其它一概不管。好的伙食，劳工们可吃到小米、玉米面，但副食也只是白菜汤、萝卜汤，连咸菜都没有。劳工行李亦是自备，家庭宽裕些的能带条棉被，但大多数拿不出棉被。许

多村都是二三人伙盖一条棉被。劳工们干的主要活计是用荆条筐抬砂石料，每筐装200斤左右。当地劳工都是庄稼人，活计虽然繁重，能吃饱，又有定期轮换的指望，所以跟监工的日本人、高丽人发生冲突的不太多，也没产生过大的反抗行动。苦的是那些外地劳工，他们吃不饱，又没有轮换的指望。吃的主要是红薯。活计重，没有休息时间。动作稍慢，非骂即打，各工地不断发生抗议、罢工事件。为了抓紧工期，日寇对劳工采取高压手段，对领头闹事的民工，大多是半夜里秘密活埋。

在密云，我访到了两位当年修筑通古铁路的老人。一位是密云白河岸边李各庄村的张凤一，清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生，在沙河铁路大桥挖过桥墩。第二位是梁御臣，民国4年（1915年）农历四月生于河北丰宁旋家营子，原籍良乡，现住密云镇小南门村。梁父叫梁志邦，京戏艺人，艺名山翠。梁家全家唱戏，梁唱娃娃生，梁姐梁凤仙唱青衣。1930年，梁家在密云荆子峪落户。梁御臣念过私塾。21岁时即1936年随父唱戏，不能餬口，又返回荆子峪村种地。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被保长张永明派劳工到古北口为日本修铁路。下面是张、梁二位老人的回忆。

张凤一回忆说：当时我们全家5口人，种10亩薄沙地，生活很苦，平时靠给人打短工度日。铁路从李各庄村穿过，铁路桥修了三年。河套搭满了帐篷。第一次把桥修在现在铁路桥的下游约200米的地方。桥身不高，到雨季，桥好像浮在水面上。民国28年（1939年）发大水，桥被冲毁了。第二年（1940年）又重修时，选到现在的位置，从李各庄村东的山脚到沙河村西的山脚，比原桥高出四五丈。当时孩子们编顺口溜说："小日本瞎胡闹，来到中国修铁道。"

修铁路桥打桥桩时，先在河心竖起一根两丈长（6米）、一丈粗（3米）的水泥管，水泥管四周用砂袋把水圈开，人在管中挖砂石，管口上搭木板，装有辘轳，下面挖满一筐，上面的两人就把

筐绞上来。砂石加水，一筐足有100多斤。水还在淌洒，管下干活的人，就如同在水里泡着，又累又凉。绳子较劲儿，吱吱直响，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拉断，十分危险。在管下干活，这筐才绞起，又得装下筐，甭想抬头看看，躲一躲。我当时在从西往东数第13个桥墩下干活，是保长派的工。没干几天，我看太危险，趁上井换班时就逃走不干了。日本监工抓不到我也没办法。

梁御臣回忆：1936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保长张永明派我到古北口修铁路。那次要的是20到25岁男青年，共15人，与本区公所管辖的庄头峪、上峪、娄子峪、碱厂等五个村，共100余人，编成一个大队。荆子峪领队的是我姐丈张玉文（我姐迫于生计嫁给了富户张玉文）。行李自备。我村只有我及其他三几个人有条被子，其余十来个人都是空手，家里拿不出棉被。我们起早步行，天还没亮就动身了，走到太阳落山才到古北口，足有100里路。一路上，日本汽车乱窜。汽车门有的写“大钢组”，有的写“大华”，都是中国字。写“大华”字的车是从密云沙厂、二道沟拉金矿石的。汽车开得飞快，爆土狼烟，一路上我们总得给汽车让路。路边上，路中心，被撞死的毛驴和羊不断，撞死就撞死了，车连站都不站。车稀时，畜主还能拖出死牲口得点肉吃。有时一辆接一辆的车，牲口被轧成肉泥。那年月，日本汽车气势汹汹的，比在自己家还“仗义”，蛮不讲理。我们一路上提心吊胆，领队的直嘱咐我们：“小心，躲车！”“你比驴还经撞？小心跟羊似的，成了肉饼！”

我们走到古北口，住在离令公庙不远的一家德顺老店里。荆子峪的15个人挤在北上房一条大联炕上。我们村的伙房也安在店里。这天晚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小米饭。张玉文家有钱，带队也管出工，第二天他给大家报了到，给每人领只袖章，他就回家了。后来听说，我妻沙素珍见张玉文回家就急了，质问张为什么把我一人撂到古北口日本人手里。

第二天，我们吃完早饭，按要求把宽五寸、打着红印的白布袖章戴在左臂上，报了到，接着就干上活了。我村劳工能忆起名字的有张洪福、张起海、张玉润及沙德州等人。管我们的工头是个东北人，大高个子，东北口音很重。到工地以后，我们15个人就被分开了。有的和水泥，有的抬砂子，有的抬混料。我和张玉润一组，到潮河滩抬卵石，垒护坡坝（用铅丝编网，把卵石装在网里作护坝）。干活用的工具由小龙公司收发，小龙是日本人，我未见过。我们用的是荆条编的大筐，能装200多斤，筐系是铅丝的，抬杆是根杨木椽子。抬一个来回有2里来地，半天得抬十四五趟。每天摸黑起床，吃完饭到工地干上活，刚能看清人的模样。午饭有时回店里房所去吃，有时送到工地。晚上天不黑不收工。一天里，除了吃饭是休息时间，没有中歇，没有水喝，大小便都得偷着。

修古北口火车站分两个工地。我们修坝的是一个工地，另一个是修站台的工地。那里日本人、高丽人监工的多，来回巡视。工地上黑鸦鸦一片人，至少有千人以上。

我们每天出工必须戴袖章，既是劳工标志，也是通行标志；不戴袖章出入古北口城门非常困难。我们每天出工、收工，都见到许多过路行人因无袖标，或被吊在城门旁边药王庙的窗户上，或贴墙根站着，或跪在城门两边。

古北口街上，日本宪兵、“满洲”警察、中国警察、海关、税局、警备队、保安队，这拨来，那拨走，有的还拉着狼狗，监视着劳工。劳工们就跟牲口一样闷头干活；整个工地，除了监工吆五喝六有些人声以外，其余就都是工料撞碰发出的声音了。

在我们之前，农历九月，保长张永明派过一期，20人到大石岭至穆家峪修路基。我们这期已是第二期了。原说是10天换班，可我们干了半个月也没换。我们15人中，张玉文带班，他走后也没人管。我父亲唱戏不能养家，饥病交加，头年腊月故去。我父

亲周年将到，我在古北口很着急，晚上睡觉前，我跟大伙说，父亲头周年到了，跟大伙请个假，我得先回家了。因为我是当村姑老爷，都碍着面子，没人说行，也没人说不行，更没人去报告。到第二天，大伙还没起床，我就扛上行李卷回家了。我离开古北口时，火车站模样已经能看出来了。

干活时，我总想，再累也得挺着，10天工夫一咬牙就过去了，家里孩子、老婆还指望我吃饭，无论如何也得落个囫囵身子回家。干活时什么也不想，就想吃口咸菜，伙房每天只给菜汤，从家带的两个咸菜疙瘩，不到两天，就让大伙你一口他一口地啃完了。

比我们更苦的劳工是东北过来的那些人，一个个老长的头发，瘦得皮包骨。吃饭时只见他们每人就两根红薯，一桶盐水，连根菜叶都没有。逃跑的、罢工的不断出现，那些领头的，都被宪兵队活埋了。我妻沙素珍在家里听到的消息比我在古北口听到的还多，所以很后怕。为这事，跟姐丈张玉文的关系一直不融洽。

1941年以后，荆子峪因在火车线上，越来越不安宁。日寇经常到农村抓夫要青年。在农村识字人少，每次我都在应征之列，而且，因我唱过戏，世面见得多，跑得远，日本对我特别注意。我感到在村里混不下去，就全家迁到密云县城了。

张、梁二位老人现在都很健壮。张凤一解放前后一直务农。1993年10月19日我去访问老人时，老人正在场院看场。当我请老人到他当年修过的桥墩照个相时，老人还说，距离不远，可不能时间长了，场院不能离人。老人十分认真负责。梁御臣老人则有另番经历。解放后他一直当村干部，直到1964年“四清”时。后在村里承包菜田，收入颇丰。现因菜田被征用，老人在家颐养天年。谈起往事，老人说：“对日本人修铁路，当时并没想过什么，就是不愿当劳工，特别是给日本人当劳工，家里人怕出事，自己担心回不了家，可以说从老到幼、从街坊到亲戚，人人反对，但征到头上了，只能硬着头皮去。到七七事变之后，才慢慢看明白

了日本加紧修铁路是为了进攻中国。那时连夜施工，有的地方铁轨才铺上，火车就跟着过来了，车上不是日本兵就是坦克、大炮。到 1938 年，日本修铁路更加迫不及待了。在当时，甭说我还念过几年书，连目不识丁的庄稼人也看出了日本加紧侵略我们中国的野心！”

【作者简介】 李善文，密云县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

（密云县政协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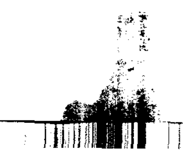
大井村日军仓库和“万人坑”

杨　斌

我住的大井村，是广安门外的一个小村。可人们都说这是块风水宝地，是九省御路，凡是外省市到北京城来的，以及从北京城里到外地去的，都得从这里经过。就是修了京汉铁路和京奉铁路之后，车马、骆驼也是头尾相接，昼夜不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丰台、大井一带沦为日伪统治区，日本军队强行围占了丰台以西、大井以南的大片村庄，其中程庄子、马茶馆、李庄子、周庄子、孙庄子、王庄子等12个村农民的房屋，100多顷耕地，全部被强行征用，动工兴建军用仓库。失去耕地的农民，只得流离四方，另谋出路。

修建这座华北最大的军用库区，是要大批劳工的，于是四面八方的谋生人群涌向这里。大小包工头各树一帜，有的带领上百人，有的带领十几个人，加上流离失所的农民，为修库区提供了劳工市场。有的挖掘沙石，有的贩运沙石，有的直接出卖劳力。大井村也在畸形发展，小小的村庄，因临近库区，先后出现27家小客店，说是客店，无非院里有几间破房，给劳工一个睡觉的地方，条件的恶劣，是可想而知的。住在小店的劳工劳动一天，回来还要自己生火做饭。大井村边有个“人市”，是历史上形成的劳工市场，在大井东头的皇亭内，每天都有上百的劳工在那里找活儿干。许多有农活专长的劳工，为了多挣点钱，也到“人市”上来揽活



干。想雇工的人在天亮以前赶到“人市”，买卖双方按照活茬儿要求，工资多少，都认可后，劳工即随雇主去干活儿。这个“人市”每天总要有很多劳工找不到活儿干，剩余的人就成了修仓库的廉价劳力。为日军当工头的汉奸，到“人市”上一招呼，谋生的人群就随之到库区干活儿。当时我们管这叫“打洋短儿”，一天的工资，甚至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

大井村西、村北有不少挖沙石留下来的废坑，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随着挖沙石的增加，沙石坑也在增大增多。在村北不到半里的地方，有一个方圆近 3 亩地的大坑，日久天长，这里就成了无主坟坑，埋的死尸多了，人们管它叫做“万人坑”。可这里真正埋死人最多的年份，是 1943 年，万人坑成了名符其实的万人坑。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推行“强化治安”，待到“第五次强化治安”时，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几乎被“征购”光了。春天到来，青黄不接，无以为生的农民，有的到张家口逃荒，不想背井离乡的农民把种子吃光了，再挖野菜，摘树叶……凡是能填肚子可吃的东西，都成了活命的宝物。市场上很难买到粮食，代替粮食的是“混合面”。昔日被当做饲料的高粱、豆饼、豆腐渣，成了人们最珍贵的食物。这时，到库区“打洋短儿”的劳工猛增，有本地人，也有四乡来的，为的是进到库区，在喂马的饲料中拣块豆饼吃，或者在马槽中抓几把马吃剩下的高粱充饥。

这些劳工从早到晚地干活，回到家食不饱腹，衣不裹身，饥寒交迫，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活命，他们想出许多对付日本监工的办法。例如，当工头监视不到的时候，就停工不干，我们都管它叫“磨洋工”；但稍一失神，还会遭到工头的毒打。后来，大家伙儿一串通，组织起来，专门找人看着监工的工头，工头一露面，就举起手里的家伙示意，大家就干活；等工头一走，还是照旧“磨洋工”。这样虽然少消耗些体力，但是饥饿仍没法解决，

偶然拣点豆饼，吃后肚胀；喝了生水，又泻肚，病倒死亡的现象开始发生。劳工死后，日寇就让其他劳工用排子车把尸体拉到“万人坑”草草掩埋。

这年春夏之交，瘟疫横行，没等麦穗发黄，许多在大井仓库“打洋短儿”的农民就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当时的老百姓最怕日军在谁家的院墙上撒上白灰面，一撒白灰，就是被认定是“瘟疫区”了。附近大瓦窑村一家姓刘的农民，一个星期之内三个孩子先后死去，做母亲的都吓傻了。在公路上，一个人好好的往前走，突然向前一栽，就再也爬不起来。这样死去的人，一天不知出现多少。最可怜的，是在库区里的劳工，一旦呻吟倒下，就被看成“霍乱”患者，不加任何治疗，就被拉到“万人坑”。住在小店的劳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不管是不是“霍乱”患者，只要病倒，准被扔进“万人坑”。

“万人坑”方圆近三亩，早已尸骨累累，成了难以数计的人们的坟丘，甚至无法再向地下刨坑。埋到这里的尸体，不用说棺材了，就是有块破席裹着就算不错。成群的野狗，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天堂”。刚刚拉到这里的尸体，就被野狗围上来，横拉竖扯撕碎，野狗争相抢食的情景，真使人胆寒。

如今，噩梦早已过去。当年的“万人坑”，今天已经被大井的农民建起了汽车修配厂。但是像我们这些70岁左右的老人，一想起这“万人坑”，就好像看到当时日军指使“乡丁”拉运死尸和野狗撕啃死尸的情景。但愿青年人不要忘记这段血泪史。

【作者简介】杨斌，原大井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　霖　邢锦堂整理

（丰台区政协供稿）

大兴县济德堂惨案

邢友廷　王观凤

1937年7月27日下午3时许，日本侵略军20师团在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指挥下，向驻守团河的29军某部发起进攻。为增援南苑急驰而来的29军132师，在赵登禹师长指挥下，与守军一起投入了保卫团河的战斗。激战至傍晚，守军向南苑撤退，日军占领团河。当时，团河驻有29军办的一个残疾人工厂，工人都是在战斗中负伤致残的29军士兵，共200多人。日军占领团河后，把这些残疾人都赶到团河行宫北门外，然后用机枪对人群进行扫射，200多人无一幸免，全被杀死。

天黑后，日军将抓来的18名青壮年农民押到济德堂[①]，为躲避日军而藏身这里的团河村青年农民于治久，也被堵在这里。日军将抓来的18个人关进一间封堵得很严的屋子后，就逼着于治久给他们做饭吃，大米饭蒸了一锅又一锅。

当时正是伏天，关在屋子里的18个人，被日军强逼着坐在滚烫的热炕上，更加闷热得喘不过气来。

28日清晨，吃饱睡足的日本侵略军，将于治久和那18个人带到一起，逼着他们解下裤腰带，然后，用这些裤腰带将他们一个

① 济德堂是清末北京城九门提督江朝宗为照管在海子里的土地而建的一处庄子，位于团河行宫北约1公里处。

个捆起来，每个人有一名日军押着，出了济德堂南大门。来到一块瓜地边，日军让他们面朝北，排成东西一行，站在瓜地里。每个人的对面，站着一个持枪日本兵，枪上上着明晃晃的刺刀。站在于治久对面的是一个日本军官，他抽出雪亮的指挥刀，狂喊了一声，日本兵端起枪向站在面前的农民身上刺去；日军官也抡起指挥刀，从于治久头部左上方砍下来。19个人都倒在了地上。

天黑后，于治久慢慢苏醒过来。用了很大力气，才看清左肩部被砍了一道大口子，有三指多深，肉往外翻着。再一看周围，那18个人一个个肚破肠流，全都死了。他咬着牙，用一件单衣连塞带缠地裹住伤口，爬进济德堂院里，在牲口棚找到半缸碴子凉水，喝够后，歇了很长时间，挣扎着站起来，一步一个血印地走出了济德堂。找到妈妈后，在妈妈的细心照料下，一年半后，他的伤口才慢慢愈合起来。从此，于治久落下了终身残疾。

【作者简介】邢友廷、王观凤，《大兴县志》办公室干部。

（大兴县政协供稿）

昌平县西山惨案

李长富　王宏士　李志江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板垣征四郎部沿平绥铁路向西北推进，8月初日军进犯至南口，受到了南口国民党守军汤恩伯第十三军的英勇狙击。日军先后调遣铃木第十一混成旅团、酒井第一混成旅、川岸第二十师团及板垣第五师团，总兵力7万余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掩护下，对南口守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我爱国官兵凭借居庸天险和高昂的战斗士气，一次次打退了日军攻势，至8月中旬日军仍久攻不下，使其"三日内攻下南口"的计划被打乱。在正面受阻的情况下，日军采取了迂回战术，分兵一部，由昌平西峰山进入西山，经溜石港、马刨泉、禾子涧、镇边城、横岭、沙城绕至南口中国守军背后进行攻击，企图使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日军在实施迂回作战计划中，对沿途百姓实行了"三光"政策，制造了昌平西山惨案，对昌平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8月18日，日军进入居住着150多户人家的溜石港村，以找回丢失的枪支为借口，开始对百姓进行血腥屠杀。村子里顷刻间枪声不断，火光冲天，大人喊，小孩哭。

村民刘万丰一家7口被日军残杀。日军进村时，刘万丰的媳妇和嫂子搀扶婆母，拉扯着4个幼小的孩子向村外逃去，刚走到村东头，就被日军发现，将7人赶至村东头山梁一棵杏树下全部

杀害。刘母死时 70 多岁，最小的孩子 6 岁。刘万丰的媳妇死得很惨，被枪杀后，日军还将其乳房割掉。村民王福臣被日军抓住，吊在井旁的杏树上，扒光了衣裳，用刀一刀一刀地活活地剐死。有两位外村双目失明的老人住在溜石港村女儿家，也未逃脱厄运，双双惨死在日军刺刀之下。日军进村后第二天，躲藏在山里的王永喜想回家看看。当他快走到村子时，被日军发现，日军把他当作枪靶子，打死在田地里。这一天，日军在溜石港村共屠杀无辜百姓 37 人，烧毁房屋 440 多间。

8 月 19 日，日军从溜石港向西开进了马刨泉村和老峪沟村。在马刨泉窑皮子上边的一个地方，日军抓到了张景宽、田明香、刘士全和张进瑞，将 4 个人用绳子捆在一起，带到一个叫海棠树坑子的地方，用刺刀一个个扎死。60 多岁的老人刘万江，来不及逃走，藏在了自家佛龛供桌下，被日军发现挑死。田珠山一家，在日军进村前，躲到一个山沟里，带的粮食吃光了，晚上想回家弄些吃的，当他们走到村边地里时被日军抓住，用战刀活活砍死。贾志通和他的儿子贾长春死在一起；刘大栓板、刘二栓板兄弟二人一起遭日军杀害。日军在马刨泉村共杀害百姓 43 人，其中年龄最大的 70 多岁，最小的 20 岁。日军临出村时还放火烧毁了数十间民房，抢走了牲畜几十头。日军走后，村子已经不像样子，全村哭声震天，惨不忍睹。

日军血洗马刨泉的同时，在老峪沟村同样进行着野蛮的杀人行径，共屠杀百姓 16 人。8 月 20 日，日军进入禾子涧村，共残杀当地群众 13 人。仅 3 天时间，日军在 4 个村就残害无辜百姓 109 人，烧毁房屋 500 多间。

【作者简介】 李长富、王宏士，昌平县委党史办公室干部。李志江，昌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干部。

（昌平县政协供稿）

老峪沟血泪

陈宝厚　李树全　崔宝山

老峪沟村地处深山，位于昌平县城西北50公里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兵一部向西北推进，8月19日，日军攻到老峪沟村对百姓进行了血腥屠杀。

日军进村时，大部分百姓都已逃到山里躲藏起来，一部分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人惨遭日军杀害。村民王进海在放牲口的途中被日军抓住，两个日本兵用绳子将其倒背着双手捆绑起来，凶狠地举起铁镐猛砸他的头部，王当场倒在血泊之中，他们还不甘心，又向其背后猛砸一镐，然后狂笑而去。过了很长时间，王进海渐渐苏醒过来，感到头部背部剧烈疼痛，他咬着牙挪到地阶旁，蹭断了绳子，用手摸摸头部，满手都是鲜血，脑后凹进一个坑，鲜血还在往外流。他担心家中也发生意外，强忍剧痛，跌跌撞撞地偷偷逃回自己家，走进院子时，听到屋里有动静，他悄悄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大吃一惊，只见屋里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都是被挑死的，炕上地下到处是血，屋里散发着血腥气味。其中一人还没有最后断气，正断断续续地喘着气。这个人是外村人，到本地来做活，还没有来得及逃走便被日军抓住，捅了一刺刀。王进海连连唤了几声，那人慢慢睁开双眼，一看是王进海，便说："人都死了，你父亲也被挑死了，可能被日本兵抬到了后院，一会儿他们还会来抬人，你赶快逃走吧……我死后，请您给我们家捎

个信儿……”王进海含泪离开了自己家，逃进了深山。日军走后，他回到家，只见被害人的尸体包括自己的父亲已被日军扔进了地窖，大小 7 口人，其中 6 人是被挑死的，有韩坦、崔德瑞等；有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杨万长）是被开枪打死的，日军进村时他躲到了王家的柴垛后面，由于年老咳嗽不止，被日军发现开枪打死。看到父亲惨死，王进海失声痛哭。院子里有位妇女抱着婴儿也已哭得悲痛欲绝，原来日军进村时，她抱着婴儿躲到了王家屋后一个土洞里，用荆条挡住洞口，由于婴儿啼哭被日军发现，一个日本兵举枪便向洞中打了一排子弹，婴儿当场被打死在母亲怀中，其母侥幸没被打中，才免遭杀害。日军走后，这位妇女抱着孩子走出土洞放声大哭。王家院遇害百姓大小共 8 口人。

与此同时，崔姓两家 7 口人也惨遭杀身之祸。有崔德安、崔德力、崔仓头、崔良头、崔黑头、崔久头、崔群头。有的被害在家中，有的被杀在田地里。崔德安被日军用战刀砍掉了头，当天正赶上天降大雨，他的头和尸体被洪水冲走了很远。8 月 20 日，日军又将一个名叫陈宝环的人无辜杀害。这样，8 月 19 日、20 日两天，日军在老峪沟村共屠杀无辜百姓 16 人。

日军不仅残害村中百姓，还两次纵火焚烧百姓房屋。第一次是 1938 年 3 月 20 日，一队日本兵突然闯进村中，不问青红皂白，挨家挨户放火烧房，顷刻间，村中浓烟滚滚，大火冲天，烧毁房屋 300 多间。第二次是 1940 年春天，日军又放火烧毁百姓房屋 200 多间，东台（地名）、沟里头（地名）两处百姓房屋及财产被烧的片瓦不留。日军的暴行使百姓无家可归，受尽了痛苦。

【作者简介】陈宝厚、李树全、崔宝山，昌平县老峪沟乡老峪沟村村民。

李志江整理

（昌平县政协供稿）

回忆日军的杀人罪行

梁建勋

时隔50多年了，但耳闻目睹侵华日军屠杀昌平县无辜群众的悲惨场面，就像魔影在我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开始向华北大举进犯，沿平绥铁路向南口、张家口等地进攻。我当时在昌平师范读书，因战乱学校被迫停课，我回到了马池口家中。马池口村是平张之间骡马运输物资必经之地，大道从村南村东穿过村中心向北延伸。我家在村东南，住宅墙外有一小溪，从北向南再向西流出本村。由于战乱，白天百姓不敢到田间劳动，夜里不敢到屋里睡觉，只能在院内或墙角处躲避意外不测事件的发生。7月中旬一天的夜晚，天上下着蒙蒙小雨，日军在清河与中国29军交战，日寇飞机到处狂轰滥炸，人人惶恐不安。我村村公所在村子中心一个庙里办公，平张大道从庙前经过，当时村公所雇用了本村村民蒯增和麻王（姓王，因脸上有麻子）二人值班，以便为我军带路、供水等。不料这天夜里恰逢日军沿平绥铁路向北进犯，途经村公所，遂将值班二人带到村外小溪东边的庄稼地，强行跪倒，一个日本兵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惨无人道地向蒯增胸膛戳去，刺刀穿胸而过，鲜血从胸膛喷射而出，蒯增当场惨死。麻王也同样遭日寇枪挑，但是刺刀刺偏，从左腹穿入，未伤及内脏和大血管，肠子却流出体

外。日寇唯恐二人不死，又从背后射击，因雨夜天黑，麻王又幸免中弹，待日寇走后，他强忍剧痛从地上爬起，手捧流出体外的肠子走向小溪，用水洗了洗沾满泥土的肠子，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然后双手堵住伤口，跌跌撞撞往家走，最后100多米他是爬回家的，地上留下了一条血淋淋的印迹。第二天天明蒯增家人在庄稼地里找到了蒯增的尸体。由于日军随时都可能由此经过，家人为避免再遭日军伤害，匆忙备棺入殓，含泪掩埋了他的尸体，村民及亲朋好友也不敢前去吊祭送葬，只有各自在家默默挥泪哀悼与死者告别，百姓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1944年初冬的一个上午，我骑车出诊到我县东八里，刚走到东门外东岳庙（现一中地址）时，忽听附近传来枪声，忙下车举目四望，发现回民墓地北边土山底下正有数人向土山上逃跑，后面日军疯狂向这些无辜群众开枪射击，只见逃跑的人一个个中弹倒下，无一幸免，土山上下到处是惨死的尸体，到处是血迹，其情景惨不忍睹。后来听说这些人是被日寇认为携带倒卖蒙疆票而被追杀的。

日军在我县烧杀掠抢，无恶不做，其罪行还有许多，我仅回忆了发生在我身边和我亲眼看到的两件事。日寇滥杀无辜，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痛苦，日本侵华虽然已过去50余年了，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段血的历史，警惕和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复活，维护世界和平。

【作者简介】 梁建勋，1920年生，昌平马池口乡马池口村人，现住昌平镇。曾任昌平镇医院院长，政协昌平县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现已退休。

（昌平县政协供稿）

房山区坨里惨案

赵润东

1937年8月20日，侵华日军调集大批部队疯狂向京郊进袭，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所不为。驻守在卢沟桥以南的中央军无力抵抗日军凶猛强大的军事火力，且战且退，很快撤至良乡、房山地区。侵华日军穷追不舍，步步进逼，在坨里村制造了一起惨案。

坨里村地处房山城西北部，这里东南是平原，西北为山区，四通八达，为京郊交通要冲。当中央军撤至口子山时，侵华日军已进入村东，他们先占领水池子西坡头，然后插上膏药旗，接着又在坡的高岗处插上一面，在阳坡顶上插一面，随后在南坡、胡家坡小屋上边各插一面。在四周插好膏药旗以后，开始朝村里猛烈开火。伏在口子山上的中央军朝对面日军砰砰打了两枪。随后，日军马上又是一阵密集的炮火。夹在两岸当中的老百姓听到枪声不知所措，都携妻带女顺着大街小巷潮水般地朝西南方向逃跑。当时正赶上雨季，阴雨连绵，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逃难的人群中孩子哭大人叫，一片混乱。人们顾不上河深水急，一窝蜂似地朝河对岸涌去。由于水流湍急，有的人刚刚下水就被汹涌的洪水冲倒，一转弯就沉入水底冲走了，没有冲走的人拚命朝对岸爬。

日本兵占领制高点后，立即向村中进犯。一进村就杀死3个村民，其中有林万友的父亲、刘殿永的父亲和王昆。8月20日这

天，年近50岁的王昆从坨里高线[1]下班回来，不知道村中发生了什么事。他穿一身灰布衣服，在街上正碰上入侵的日本兵，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把他押到陈家院中，王昆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刺刀挑死。一同被挑死的还有口子村的穆墨艳。村民宋国山的妻子听到枪声慌忙朝大街逃跑，日本兵紧追不放，然后从背后开了一枪，宋妻当场死亡。日本兵打死宋妻还觉得不过瘾，又照着旁边的碾砣开了一枪，子弹把碾砣打了一个大坑。碾砣至今还保存着。村民郑兰生被日本兵捉住，被迫为日本背手榴弹，郑兰生累得浑身无力，后来实在背不动了。日本兵见他没用了，便把他枪杀。刘景义的妻子在慌乱中跑出家门，日本兵追上去将她杀死。刘景义见了急得不顾一切冲上去，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马上将他围住，使他动弹不得，刘急得直叫“老总”，紧紧攥住一个日本兵的刺刀不放。这个日本兵使劲一拧，刘景义的一个手指就断了。村民王振生的父亲王田被日本兵捉住后让他当夫子，逼他给日本兵烧火做饭。王田不甘作亡国奴，趁机逃跑，结果被日军抓回。日本兵把他押到大庙里，牢牢捆上，轮番毒打。日本兵认为王田是中央军的“密探”，此次逃跑是去报信，因此，毒打后仍不出气，又照着他的臂膀砍两刀，卸下一只胳膊，用这只胳膊狠狠打他。王田被打得死去活来，加上失去一只臂膀的疼痛，最后再也支撑不住，日本兵朝他又打了一枪，王田死去，当时年仅43岁。据王振生回忆，8月20日早上没吃饭，他和母亲、妹妹及两个弟弟一块逃走，父亲没来得及和他们一起走，就被敌人抓去了。王振生母子先来到南观沟，又跑到英水一带。几个月的小弟弟有病没法医治，不久就夭折了。听说日本到了黄花岭，母子们又逃到南窖躲

---

① 坨里高线最早为法国修建，当时为掠夺中国地下矿藏，修筑铁路至坨里火车站，然后建高线将磁家务的煤运出装火车。日本人入侵后占领高线，并派20余人驻守，继续掠夺此地矿藏。

藏。直到 9 月 24 日战火稍稍稳定一些才回来。当他寻找到父亲的下落时，见到的只有父亲生前穿过的衣服，一双圆口鞋和一堆白骨，其情景惨不忍睹。

在这次惨案中，宋傻子一家人全部被杀害，秦二掌柜的一家十几口人死于日本刀下。另一些逃荒的百姓逃到房山城北的羊头岗村。其中秦连州一家 8 口人及一部分逃荒者躲在村东头一口白薯窖里，由于井下藏了几十口人，声音嘈杂，孩子哭闹，被追赶的日本兵发现。日军命令井里人上来，没人上来，日军就投下一颗毒气弹（百姓称“熏炮”），井下几十口无辜百姓全部丧生。被日本兵杀害的还有秦玉荣、张六爷、大林春、耿大个子、翟大猪、刘江的父亲、老陆等。在日军进犯的日子里，短短几天，坨里村就有 128 人惨遭杀害。事情发生后，坨里村人烟稀少，一片狼藉，侵华日军在坨里惨案中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

【作者简介】赵润东，房山区政协文教办公室干部。

（房山区政协供稿）

太和庄的劫难

赵润东

1937年9月，日寇占领了房良地区。房山人民奋起反抗，地方武装纷纷组织起来。当时，一路（称华北抗日同盟军，老乡们称之为“老便”）司令周文龙率领3000余人活动在长沟、窦店一带。其部下朱龙带领全队人员驻扎在太和庄天主教堂里。他们骚扰日军，捉拿日本探子，在教堂审讯。日寇气急败坏，向当地人民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1937年12月23日拂晓，天上的繁星还未退尽，日本鬼子全副武装突然从太和庄村东北的砖窑沟偷袭过来。大约四五点钟，村东北忽然响起枪声。村中几百名百姓从熟睡中惊醒，吓得不知所措。这时，日本鬼子已从村东北角跑进来。他们见人就杀，见草垛、房子就放火。孙秀一家14口没来得及逃跑，全被堵在家中。无奈，只得扒墙往外跳。结果，跳过一个被日本鬼子挑死一个，共被挑死7人。孙士元的奶奶、父亲、叔叔等一家人也拚命往外跑。日本鬼子看见孙奎，端着刺刀就冲了过来。老太太看见日本鬼子要刺杀自己的儿子，冲上去，使尽全身力气，双手把刺刀紧紧攥住。日本鬼子使劲一拽，老太太的手指立刻就断了。这个鬼子追上去，照准孙奎的后心就是两刺刀，孙奎扑倒在地，惨死在血泊中。

日本鬼子来到于福家，于福年迈的母亲说：“我们都是好人，



别打死我们。”日本鬼子见老太太跑不动，就示意让她出去。老太太吓得哆里哆嗦，背着小闺女往外跑。没跑多远，日本鬼子就朝她打了两枪。老太太背上的孩子被子弹击中，当即死去。王以寿见鬼子杀人放火，吓得钻进于永家的草垛里躲藏起来，结果被日本鬼子活活烧死。

一时间，太和庄浓烟四起，枪声一片。群众扶老携幼，没头没脑地顺大道往西逃。日本鬼子追上的用刺刀挑死，追不上的就开枪射击。有些跑得快的刚刚来到沿村沟，被早已架好的机枪扫射击中。整个一条沟，死难者横七竖八倒了一片。尸体有趴着的、仰着的、蜷着的，有当时未死挣扎呻吟的。有的大人被打死，婴儿还活着。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姜家女婴哇哇哭着，在死人堆里爬，其景令人惨不忍睹。

从拂晓至正午，日本鬼子整整“扫荡”半天。在这次劫难中，全村有 78 人惨遭杀害，有数十间房屋和许多柴垛、草垛被放火烧光。人们将永远记住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房山区政协供稿）

哭声惊天地　血染米粮屯

张梦孚　杨祥永

距卢沟桥10多公里，有一个偏僻荒凉的小村，村名叫米粮屯。日伪时期，是河北省良乡县的一个小村落。解放后，50年代后期，划归北京市丰台区。

50年前，在这个小小的村落里，曾发生过一起特大惨案。为了了解惨案真相，我们于1987年到米粮屯村进行了访问。

接待我们的是老大队长赵风山，今年69岁，是惨案的目睹者。他说："日本鬼子刚来的时候，俺们村只有50多户人家，男女老少总共300多口人，都是勤劳、朴实、老实巴交的农家。卢沟桥事变后，残暴的日本鬼子向着俺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农家举起了屠刀。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阴历十月十三，一次就杀害了俺们村的男女老少83口人，最多的一家死了8口。被害者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只有7岁。50多户人家，受害者37户。米粮屯在这场劫难中，还被烧毁了37间民房。在惨案的当天，那真是哭声遍野，火烟冲天，尸体纵横，鸡犬悲鸣，一片凄凉景象。"

我们还访问了两位当年的直接受害的幸存者。

马殿亭，现年63岁，虽已满头染霜，但仍身体健壮，嗓门儿宏亮，对50年前的受害情况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说：

"阴历十月十三，天还没亮，我和往常一样，起了个早儿，背着粪筐去拾粪。猛一抬头，就瞧见一大队穿黄军装的人从贺兆云

村的山坡上压下来，我一瞧事儿不好，赶紧奔家去报信。

“跑到家，一进屋就对俺爹说：‘爹！穿黄衣裳的来啦！’俺爹说：‘没事儿，咱穷人家，他能怎么着你呀！’可话音刚落，东边就开枪喽！噼哩啪啦 一通儿乱响，把人都吓懵了，有跑的，有钻的，有哭的，有喊的，谁也不知道怎么好，奔哪 儿的都有。我刚进屋，就进来个日本鬼子，端着刺刀，黑不说白不说，‘吭吭’，照着俺爹的后脊梁骨就是两刺刀，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俺爹躺在炕沿下就死啦！俺妈、俺六奶奶在炕上跪着跟日本人求饶，那哪顶事儿啊！鬼子照着俺妈、俺六奶奶又是几刺刀，肠子肚子流了一炕，躺倒就死啦！俺弟弟才 5 岁，吓得没敢动窝儿就歪倒在炕上，才保住了一条小命儿。当时俺妈死的时候才 40 来岁，还怀着身孕，一刺刀就死了两口儿。扎完了俺妈、俺六奶奶，这个日本鬼子就像吃人的恶狼一样，瞪着两只眼睛，嘴里叽哩哇啦 地喊着，扭回头就冲着我的肩膀子扎了三刀，因为当时我长得矮小，没有捅在胸口上，没有伤着内脏，才拣了这条命。”他边说边揭开上衣，让我们看了看他的三块伤疤。然后接着说：“这一个屋里，就死了 3 口人。等消停了会儿，我到俺爷爷家一瞧，更惨！我的爷爷、奶奶、老婶儿，还有俺老爷爷，都让日本人给扎死啦！光俺一家就死了 8 口儿。剩下我和 5 岁的弟弟，实在没法活啦，就投奔了俺姥姥舅舅家，稍大了点儿，就给人家去放猪放牛，当了小做活儿的。直到解放后才过上好日子。”

另一位幸存者马殿甲，现年 75 岁。虽有点儿驼背，但还硬朗健壮。见到他时，老人正用手推车往地里送粪。在村边井台上，马殿甲老人对 50 年前受害的经过回忆说：

“日本人来的那天，我在院里眼瞅着那些鬼子兵从贺兆云村的东坡后头爬上来啦。左一起儿，右一起儿，足足有那么五六起儿。来到了我们村头，枪就打起来喽。枪一响，我可就没敢出屋。就听那枪啊，‘哒哒’地跟下雹子一样，来回那个打呀，不一会，

'呜啦'一下子，就进来好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刺冲着我乱比画，瞪着两只狗眼，嘴里边'呜哩哇啦'地也不知道说的什么。这时候，就听当街有中国人说话：'走哇走哇！往西往西！'他们就出去啦。我在门口儿瞧着。一瞧，西边，'呜啦'一下鬼子兵人就多喽，足足有100多人。扛着枪的、端着刺刀的就进街啦，一进街，就对村里人杀巴开喽！你听吧，哭的、喊的、钻的、藏的，受了伤喊救命的，挨了刀扎枪打的，那个惨劲儿，就甭提啦！

"后来一听，我妈、我嫂子直哭，我赶紧到家里瞅瞅去吧。到家一瞅，我那三哥呀身上扎得就没好地方啦。我也哭起来啦。后来，把我三哥抬到屋里，我妈、我嫂子搅了碗豆面往我三哥身上就糊，那哪顶事儿啊，肠子肚子都流出来啦！俺妈、俺嫂子，俺们3人跺着脚地哭哇。正哭的时候，一瞅西北角上放火喽！烧的全是住家的房子，火越烧越大，火烧声、枪声，'噼哩啪啦'响成一片。

"跟我一堆儿的那小伙子叫德明，他回家一瞅，跑回来大嗓门儿就哭起来喽！他说：'可了不得喽！俺弟弟小二也让日本人给扎死喽！咱可怎么着啊？'我说：'怎么着啊！咱死就死在一堆儿吧！'这时候儿，我妈哭着喊着也跑出来啦，一出门儿就说：'赶紧逃命吧，别顾死的，先顾活的哟。'听俺妈这么一说，俺们俩撒腿就跑，一跑到村边上，日本人瞧着俺们俩就开枪喽，连机关枪带大枪一齐打呀。我一瞧事不好，就说：'德明，快趴下，跑不了啦！'正说着，就听'梆郎'一声枪响，德明就扔在那儿啦。我也不知怎么啦，好像有人拽我似的，就趴下啦。那枪啊，'噼啪啪'地往我身上乱打。等不打啦，我一摸，身上那土啊足有一寸多厚，就好像把我埋上一样。这时候，我妈跑过来，一边哭，一边喊：'宝贝儿唉，宝贝儿唉。'哭着跑到我跟前啦。我说：'妈！妈！别哭，我没死。'我妈瞪大了眼睛一愣：'什么，你没死？我眼瞅着你倒在这儿啦！'我说我没死，没打着我。我妈这才松了口气，瞅瞅我脑

袋，摸摸我脖子，还浑身上下摸了一遍。这一摸不要紧，连哭带骂地又哭起来喽：‘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呀！没招你、没惹你，你们怎么这么狠哪。瞧瞧，把俺宝贝儿的棉袄都打烂喽。’我脱下棉袄一瞅，数了数，打了24个窟窿眼儿。多悬哪，差点要了命。后来我觉得我的右胳膊火烧火燎疼不叽的，挽起袖子一瞅，挨了一枪。”老人说着，捋起袖子，让我们看了看他在50年前留下的那块伤疤。

马殿甲、马殿亭二位老人的悲惨遭遇，是日本鬼子残害我们中国人的活见证，日本鬼子在我们中国国土上烧杀抢掳、灭绝人性的罪行，是我们中华儿女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问：“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到这来呢？”

老大队长赵风山老人接着说：“那些日本鬼子是从长辛店坐火车到良乡，又从良乡步行来的。七七事变后，我们这一带有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在活动（后来部分武装队伍被八路军收编），日本鬼子便闻讯而来残暴镇压。”

这就是日本鬼子在米粮屯大屠杀惨案的经过。

【作者简介】 张梦孚，河北省定州市人，先后在丰台从事过文化馆、图书馆工作。　杨祥永，河北省秦皇岛人，丰台区政协副秘书长。

（丰台区政协供稿）

房山区二站惨案

张玉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鬼子便疯狂地向南入侵，在房山地区就血洗了数十个村庄，屠杀了上千名百姓，其中的二站惨案就是一例。

1937年9月15日，房山地区二站村民被国民党军动员出来到村南挖战壕，以阻止日军南侵。但日军在飞机疯狂轰炸的掩护下，侵入了二站村。挖壕的百姓四处躲藏，很多人跑进村北的天主教堂里避难。

教堂前后有两层大院，都挤满了人。妇女孩子躲在屋里，男人都挤在院里。9月16日夜，日军进了村，当时没敢进教堂。天亮之后，荷枪实弹的鬼子才进去查明情况。

9月17日下午，鬼子让村公所的人到教堂通知所有的男劳力都出去。100多名男劳力（10岁以上的）都被赶到二站村西大沟里，四周有日军骑兵队围着，高坎上还支着机关枪。他们让所有的人都脱下衣服检查身体，发现头上有草帽印儿就说是军帽印儿，肩上有担子压的印儿就说是扛大枪扛的，脚腕有腿带印儿的说是绑裹腿绑的。总之，说他们都是八路军或是国民党29军。检查完毕，就开始杀人。每两个端刺刀的鬼子赶着三个老百姓到西边的谷地里。走出不远，人们还在不知不觉中，鬼子就铆足了劲，从后边一个箭步蹿上去，用刺刀扎进他们的后心。好端端的汉子，横



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有的胸口或脊背上咕嘟咕嘟地冒鲜血，有的嗷嗷地叫。就这样一拨拨被赶去杀掉，直到天黑还剩下十来个，他们一齐被赶上地坎儿。当两个鬼子从前边动手时，一个18岁叫张润生的小伙子就势躺在死人堆里，一动不动装死。鬼子杀完了查看还有活着的没有，发现张润生身上没有血，便向他刺了三刀，一刀穿透了左臂，那两刀刺在右肋骨缝儿和右胸上部。因他穿着10多斤重的棉袄，才没扎到要害处。

他在死人堆里躺了多半夜。鬼子直到快天亮了才撤。他慢慢爬到教堂后面想要点吃的，听到两声枪响没敢往里爬。后来才知道，鬼子要强奸妇女，传教士阻拦，鬼子就开枪打死了他，还把尸体钉在十字架上。

9月19日，在乡亲的帮助下，张润生回到了家（夏村）。几天后人们去收尸时，尸体已难辨认，只凭服饰辨认亲眷。死难者大部分被就地掩埋了。

这次惨案共杀死110多人。张润生是这次惨案中唯一的幸存者。

【作者简介】张玉泉，房山区政协文教办公室主任。

（房山区政协供稿）

日军屠杀抗日战俘的罪行

关续文

1938年5、6月间，占领北平地区的日军将在卢沟桥等战场上俘获的我29军和冀东保安队等官兵900余名，送往北平西苑“集训”后，押赴张家口地区围剿我一支抗日爱国军黑马队，但战俘有抵抗情绪，遂改押送到石景山制铁所（今首都钢铁公司）充当劳工，修筑制铁所周围的铁蒺藜网。爱国俘军为反抗敌人残酷的奴役、压迫与非人的生活待遇，在一天晚上准备发动暴动，未果，消息走漏出去。

翌日下午3时，一班日军将俘军押解到石景山南麓的永定河畔，一个日军排长咆哮着，命令900名俘军围成圆圈，他站在中心进行“甄审”，他认为哪个人有反抗气质，便视为暴动者揪出队列。一个、两个、三个……最后竟揪出16名。日本兵如临大敌，用铁丝、绳索强行捆绑，把战俘推推搡搡押到永定河滩岸，开枪屠杀。

爱国俘军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义凛然。其中有四五个人挣脱绑缚，想泅水逃走，亦应枪声倒下，鲜血染红了河水。躲在草丛里的华工姚士奎等人目睹了这一暴行，无不切齿痛恨，他们是日军这一暴行的见证人。

【作者简介】关续文，石景山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

（石景山区政协供稿）

日军火烧大铺头村

王观凤　邢友廷

大兴县在1939年以前的版图上有个大铺头村，它位于黄村东11公里处的凤河南岸，北距大红门1.5公里。该村村民在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奉诏为发展凤河两岸的农牧业，从山西移民而来。建村500多年来，祖祖辈辈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但是，到了1939年春天，日军一把火，把大铺头村变为一片残垣瓦砾，从此，大铺头村在大兴县的版图上消失了。

1939年4月8日拂晓前，特设北平宪兵队总部为进一步落实"打破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共产党组织，才是华北治安肃正的根本"措施，队长赤藤庄次中佐命一个宪兵队的伍长，带着三个日本兵、两个伪警察和翻译车桂焕，乘车来到大铺头村收缴民间枪支。他们把汽车停在村口，留下司机看车，日军伍长带着其他人闯进了李世明的家，将李世明的哥哥李世清和侄子李文德捆了起来，用枪逼着李世明交出枪支。

北辛屯村早起拣粪的杨七看到大铺头村口停着一辆上边打着膏药旗的日本汽车，估计出事儿了，就回村告诉了张怀臣。张怀臣马上招呼了十几个有枪的人，来到大铺头村口，抓着司机，问清情况后，开枪将司机打死。然后，迅速将李世明家包围起来。

正在盘查追缴枪支的日军听到枪声，三个日本兵先跳墙逃走了。日军伍长上了西厢房，企图顽抗。一看来的人多，跳下房想

跑，被一枪打死在房后。翻译车桂焕破门而逃，也被击毙。两个伪警察没有跑，也没有掏枪抵抗之意，又是中国人，张怀臣等人就把他们放了。

李世明、张怀臣来到村口汽车旁，因谁都不会开车，留着也没用，就搬来棒秸放在汽车下，用枪打着油箱，把汽车烧了。村里人估计，日本鬼子肯定来报复，村民们纷纷扶老携幼，四处投亲靠友，躲避起来。

果不出所料，5 月 27 日，几百名日伪军和拉着棒秸的五辆汽车来到大铺头村。日伪军迅速把村子包围起来，四周架起了机枪。打了一阵枪，日军发现村里没有任何动静，就进村挨户搜查。人没搜出一个，但把能拿走的东西抢了个净光。尔后，便挨门挨户放起火来，一直折腾到下午 1 点多钟，日本鬼子见家家房顶上都起火冒烟，方才离去。

邻村的乡亲们见日本鬼子走了，纷纷赶来救火，但已经来不及了。全村 30 来户人家，100 多间房子被烧毁。全村人无家可归，只得投亲靠友，暂且栖身。

后来，这 30 来户人家陆续搬到南大红门等村定居。大铺头村只剩下一片灰烬和瓦砾。直到进入 80 年代后，这里才被开垦为农田。

（大兴县政协供稿）

日军火烧一溜连营

邢友廷　王观凤

1939年5月，在大兴县东部的一溜连营地区，爆发了一场日军收缴民间枪支与群众反抗收枪的斗争。日军所过之处，村村冒浓烟，遍地是死尸，其状惨不忍睹。

所谓一溜连营，就是人们在形容北京城南军事力量时常说的“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中的“七十二连营”。“七十二连营”实际是明朝永乐皇帝建都北京后，为充实京师，移山东山西百姓于大兴县凤河两岸后而建起的村庄。移民全部以祖籍地名为村名，以村为营，如石州营、霍州营等，营营毗连，犹如一村。

1937年10月18日，伪大兴县公署成立后，伪县长李希增强令凡有30亩地的农户买枪一支，不足30亩地的，几户合买一支。为买枪，群众耗去了大量资财。1939年初，为适应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作战和“强化治安”的需要，又强令收缴民间枪支，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情绪。河津营村的梁希庆和张奎元，联络了一溜连营中20几个村的负责人，决定成立上路“联庄会”，武装反抗日伪军收枪。

5月25日（农历四月初七），驻通县马驹桥据点的日伪军，在西田阳村抓了十几个家里有枪的人，带至青云店，把十几个人杀害在马家井，尸体抛入井内，以示对拒绝缴枪的人的惩罚。5月26日晨7时许，汇聚在青云店的驻南苑、黄村、马驹桥、万庄、廊

坊等地的600余名日伪军，分采育方向、解州营方向、大回城方向三路，乘20多辆汽车，从青云店出发，开始对一溜连营地区实行武装收缴枪支，但遭到上路“联庄会”的武装抵抗。后“联庄会”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溃败。

一路上，日伪军遇村便烧，见人就杀，所过村庄无不火光冲天，尸体狼藉。下面是17个村被害情况的不完全统计：

霍州营，被烧房屋36间；沙堆营，被烧房屋108间、庙2座，被杀2人；垡上营，被烧房屋110间、庙2座，被杀11人；赵县营，被烧房屋3间，被杀12人；留民营，被烧房屋200间，被杀4人；窦营，被烧房屋30间，被杀1人；白庙，被烧房屋8间，被杀1人；北蒲州营，被烧房屋120间，被杀13人；靳七营，被烧房屋18间，被杀1人；长子营，被烧房屋30间，被杀8人；河津营，被杀7人；上黎城，被杀4人；沁水营，被烧房屋11间，被杀3人；潞城营，被烧房屋16间，被杀2人；宁家湾，被烧房屋60间，被杀2人；永合庄，被烧房屋59间；车固营，被烧房屋10间，被杀2人。合计，被烧房屋816间、庙4座，被杀73人，抢走、烧毁财物甚巨。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荒谋生。

（大兴县政协供稿）

日寇在门头沟区烧毁民房的罪行

何建忠

日寇于1937年向我门头沟区进犯，并在斋堂、黄塔、田庄、下苇甸等地建立了据点。为了“强化治安”，日寇采取“移民并村”政策，强迫群众搬到据点附近去住。一些群众舍不得离开家园，不肯搬走，日军就烧毁他们的房屋。仅斋堂地区前后被烧房七八次，东斋堂300户人家的1200间房屋全部烧毁；西斋堂240户人家，被烧房屋1000余间；大村也被烧毁房屋七八百间。

1938年，在南口驻防的日军小队长小松在去水头讨伐途中遭大村根据地人民武装伏击，被抓走四五名日本兵。日军为了报复，从1938年到1940年先后七次到大村地区焚烧房屋。在大村、杨村、方良、马套、山神庙等村共烧毁民房2330间。大村只剩下2个四合院，杨村只剩下10间房屋，马套剩下2间，方良剩下2间。

为了切断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自1939年开始，日寇还在离下苇甸8里远的上苇甸地区进行大肆烧杀。该村200户人家，先后12次被烧，近千间民房被烧毁。一开始，日军烧房前还通知百姓搬走东西，到后来不再通知，见房就烧。敌人走后，老百姓又重新盖房；日寇下次来了又烧。有的人家连盖3次，被日寇烧了3次。到后来，群众只得躲到山上，搭起草铺居住。日寇见村里没房可烧了，就烧山上的草铺。

日寇不但烧房，而且还野蛮地残杀无辜百姓。农民高玉兰的

母亲，见自家的房子着火了，想往出跑，被鬼子推了回去；她又跑，又被推了回去。后来，鬼子把她推进灶坑里烧死了。

李元芳和卢玉田的母亲躲到山上的草铺里，天亮时被日本兵发现了。日本兵把她们堵在草铺里，用枪打死。

郭秀见自家着火了，想去扑救，也被日本兵推进火堆里烧死。

张炼春的母亲在房屋着火后，跑到院里，被日本兵发现，往她身上压了两捆干柴，点着烧死。

就这样，上苇甸村被打死、烧死的百姓共有 21 人之多。

到了 1942 年，上苇甸附近几个村子几乎空无一人，满街长着高高的蒿草。一天拂晓，日寇行军到山脚下，听见附近有鸡叫声，发现了那个最偏僻的小山村——炭厂村。鬼子们立即进村，把房屋全部烧光。

全上苇甸乡的 9 个自然村，400 户人家，除建沟和烧坡沟两个村子的两间民房未被烧毁外，其余全部被烧，总计近 2000 间。

据查，日寇侵犯我区期间，原宛平县的 185 个村庄中有 142 个村子程度不同地被焚烧过。

【作者简介】何建忠，原门头沟区文史办公室副主任。

（门头沟区政协供稿）

云居寺被毁经过

赵润东

云居寺位于房山西南30余里的白带山麓，它依山势建造，坐西向东，原有五层院落六进殿宇，呈台梯式逐步升高，南北有两塔对峙，器宇轩昂。这里风景秀丽，是隋唐以来的佛教圣地。

1938年冬，平西抗日游击队独立二营一中队在南尚洛乡水头村驻防，队员们经常出没于这一带，但一直无暇观赏这里的风光古刹。阴历8月14这天，队员金茂、陈树等20余人早起动身去游云居寺。路程很近，他们转眼便来到了云居寺。

这时，“嗡嗡嗡”，天空一阵乱响。随后日本轰炸机出现在云居寺的上空。敌机盘旋了3圈以后，投下了重型炸弹。“轰隆隆”，地上浓烟顿起，残枝碎石四处飞扬。起初有3架敌机，接着是6架，后来增到9架。它们轮番疯狂地轰炸。殿内殿外，浓烟弥漫，炸弹声响，震耳欲聋。正在云居寺中的游击队员，被困在殿堂之中。突然，一颗大炸弹从屋顶砸下来直插地上。队员们一看，赶忙躲进里屋，但炸弹没响，大家庆幸免遭身亡。

这时再看云居寺四周的山坡上，一声炸响一片尘烟。牲口羊群满山乱跑。敌机穷追不舍，疯了似地用机关枪扫射。就这样，敌机整整轰炸了半天时间。

在驻地的中队长王焕文同志心情始终都十分紧张，唯恐队员们发生不测。他一会儿出来望望，一会儿急着要去寻找。当时联

系中断，情况十分危急。后来队员们一个个回来了，他们熏得黑头垢面，只露出两只闪亮的眼睛，连人是谁都难以辨认。中队长集合队伍查点人数，结果一人不缺。

傍晚时分，中队长带着队伍查看现场，只见老百姓正往回扛死羊。据统计，炸死40余只羊，一个老百姓脚后跟被炸伤，他所放的毛驴被炸掉一只耳朵。云居寺六进殿宇被炸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坡上百年苍松翠柏，枝枝杈杈铺满一地，一个个炸弹炸出的深坑足有两间房子大小。寺中还有一个和尚被炸身亡……

日寇为何轰炸云居寺呢？后来了解，是因奸细报告云居寺内有老便（一支自发的抗日武装组织）、八路军。日寇于是派侦察机侦察。当时，云居寺周围的山坡上，天天有老百姓打柴、放牧。打柴的肩扛扁担，扁担磨得锃亮。扁担一头拴着绳套，走起路来一闪一闪的，远处一看，好像扛着大枪；而那山坡上的牧群，有黑色的，有白色的，黑白相间，从空中俯看也好像人群一般。因此，日寇轰炸机对准目标进行了疯狂的轰炸。

云居寺被炸之后，独立二营一中队为防日寇追击，当夜转移到涿县东城坊村。

（房山区政协供稿）

从洋狗队里死里逃生

赵润东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灭绝政策，除了烧杀淫掠，还想尽一切办法，对中国人民进行残害。1938年，日本侵略军在长辛店建立了一所骇人听闻的驯养洋狗基地，专门用来咬吃中国人。这支驯狗队的头子叫加藤，狗队的番号叫“加藤部队”。洋狗由驯狗技师吉田和一批日本兵驯养。每天驯狗时，让一名日本鬼子身穿帆布衣，手、脚、脸各部位带好防护具，看上去就像穿便衣的八路军或普通老百姓，用他当靶子做试验，让洋狗追咬；或者事先在院内摆上扎好的草人，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在草人身上、肚子上、脸上等部位贴上肉，驯狗的日本鬼子放开绳索，洋狗便张开血盆大口，窜上去连咬带扯。日本鬼子捉住中国人就送到狗队，活活让狗吃掉，这些狗都吃红了眼，只要见到中国老百姓，上去又抓又咬，直到把人咬死啃光骨头为止，其情景让人惨不忍睹。

当时，京郊房山区坨里一带驻扎着20多个日本鬼子。为大量掠夺中国煤炭资源，他们把铁路修到坨里，设置高线，大批原煤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本土。1940年夏天，阴雨连绵，常有山洪暴发。为了防止洪水冲毁铁路，日本鬼子勒令附近村民出苦力，在铁路沿线码好沙包做拦洪坝，之后又设岗看守。

当地村民非常痛恨日军的罪恶统治，趁鬼子不备纷纷前来，倒

掉沙土拿走麻袋，这使得日军十分恼火。一天，坨里村3个儿童（其中谢德12岁，刘景玉、范成贞14岁）也去倒麻袋。因身单力薄搬运困难，每人只倒了一条麻袋，事后有人告发，日军就命令村里的地方（村公所爪牙）去抓3个孩子。地方抓到3人用绳子捆起来，带到娘娘庙（当时村公所）看管起来。然后报告坨里高线警务段，警务段段长康某马上带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赶来，将3个孩子押到警务段，没过10分钟，日军头目完山出来，用皮鞭狠狠地抽打，打得谢德3人嗷嗷哭叫，疼得在地上打滚。毒打之后，又把3人紧紧捆绑起来，背上插一个木牌，上写"军用品盗人"，押着游街示众。游完大街又是一顿毒打，直到太阳落山才把3人关进一所小黑屋里，等待发落。

第二天早8点，警务段派人把3人押送长辛店"加藤部队"。这个驯狗基地位于长辛店铁路工厂的西部，有8个大院，狗队占据的院子西侧还有一大片空地。基地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架着电网，日本鬼子全副武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在空地的北部有上千间狗房。狗房高1米多，全是卧砖垒墙，水泥地面。一条洋狗住一间，由一个日本鬼子看管训练。平时，这里有三四百条洋狗，最多时可达千条，这些狗十分凶狠，让人看了毛骨悚然。

谢德等3人先被带到一所房里。一个翻译官审讯，一个日本人记录。问："你偷什么了？"12岁的谢德早给吓坏了，回答说："偷麻袋。""偷几条？""偷一条。"翻译官又问刘景玉、范成贞，2人都说没偷，结果又遭到一顿毒打。打完后重审一遍，然后3个人被塞进一个空的狗房里。这期间，他们3人挤在一起，动弹都困难，每天只能吃些洋狗吃剩下的食物。看着一排排狗房里的恶狗，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死是活。这样一囚就是7天，7天后才分开，一人一间狗房。

后来传出音信，说村里作担保可放人。当时村长表示不作担保。日本鬼子看3个孩子瘦得皮包骨，喂洋狗不值得，就命令老

百姓挖好土坑，准备活埋3个孩子。晚上10点钟行刑前，3个孩子的家长闻讯赶来，竭力求饶、阻拦，但无济于事。这时，正在给日本人做饭的同村刘景和知道后赶忙出来讲情。结果讲情不成反遭一顿毒打。眼看3个孩子就要被活埋了，刘景和急得不顾身体伤痛，跪在地上边爬边求饶，大声呼喊："黄会长（维持会长），黄会长，快救救人啊！"那个姓黄的会长听到呼声，赶来寻问怎么回事。刘景和声嘶力竭地说："黄会长，我3个兄弟要给活埋了，快救命啊！"黄会长见状，问清情况后对完山说："我担保。"完山说："黄会长保可以，刘保不行！"完山又把3个孩子训斥一顿，每人罚2斗老玉米（刘景和替3人垫上），才放人。

谢德等3人从洋狗队里可谓死里逃生。他们在狗房子里被囚期间，目睹了日本人驯狗情景。日本鬼子横行霸道，让狗随便咬人吃人，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惨死在洋狗口里。他们犯下的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不忘。

本材料根据谢德、刘志、安国良、王振生等人口述整理。谢德，现年66岁，坨里村委会委员。刘志，67岁，村民。安国良，82岁，原村党支部书记。王振生，75岁，村民。

（房山区政协供稿）

日本鬼子在东斋堂的罪行

何建忠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数次疯狂“扫荡”。当时门头沟斋堂镇正处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农会、儿童团，和敌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日寇为了镇压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于1940年10月7日在斋堂建立了据点。并以斋堂为中心在杜家庄、清水、沿河城、清白口等地也先后建立了据点。斋堂据点的日本鬼子还以汉奸、特务为骨干组建了警备队、伪指导班。在建据点时，鬼子将据点附近的房子全部烧光，致使300多户群众无家可归。据点周围拉上铁丝网，里边住有日本鬼子的一个中队，队长叫赖野，有两个翻译官，铁丝网外边住有警备队和指导班。大多数警备队和指导班的伪职人员都不能随便进入铁丝网，更不用说老百姓了。

敌人还在据点内将王文常家原有的地窖扩大加工成了一个有3间房子大小的地下监狱（老百姓叫它万人坑）。伪指导班有个日本特务叫何端，中国话说得很好，他经常穿着老百姓的服装到处收集我方情报和抓捕村干部。据一些老人回忆，在据点内被杀害的我抗日干部、群众就有100多人。下面仅举几例说明日本鬼子的残暴。

1941年7月的一天，斋堂据点的日本鬼子在汉奸李兴仁的带

领下包围了距斋堂8里地的灵岳寺村。由于情况突变，村干部来不及转移。在汉奸的指认下，敌人抓捕了村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任刘永华、村自卫队长李国玉等村干部。经过审问，将刘永华、李国玉押到了斋堂据点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八路军和县区干部的去处。刘永华、李国玉什么也不说，敌人就给他们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电椅，每天都进行拷打、审问，连续进行了7天，将刘永华、李国玉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鬼子看实在得不到什么，就将奄奄一息的李国玉全身的血抽干后肢解了尸体，用锅煮后喂了洋狗。刘永华被日本鬼子绑在树上，胸前捆一块铁板，然后放出几条洋狗去撕咬他的四肢，他的四肢被咬得只剩白骨，但因伤不到胸部，3天后有人看到刘永华还在微弱地呼吸着。

1943年夏季的一天，敌人在西斋堂抓住了地下党员杜春振、杜春里和群众史文会，将3人带回据点。第二天天不亮就拉到斋堂河滩用刺刀挑死。这年的冬天，西斋堂的村干部、党员史文雨被敌人抓住，带到据点要他说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他就是不说。日本鬼子将他全身衣服扒光，头朝下吊起来，又是灌水，又是往身上浇冷水，并施以严刑，待他奄奄一息时扔进了“万人坑”。白虎头村的党员、区干部宋广仁被敌人抓去后，在据点内将头砍下，放入大锅中煮熟挂在东胡林村口的核桃树上示众好几天。火村现任村长、老党员李万丰的父亲李景彬被抓进据点后，遭受棒打、灌凉水等毒刑，当天就被折磨死了。模范队队员李景有被抓后，敌人将他捆绑牢固，放在地雷上，炸得他血肉横飞。区粮秣助理刘功被抓住后，敌人让他供出区干部情况，他破口大骂敌人，鬼子放出狼狗去咬，他又用脚踢，鬼子恼羞成怒，把他四肢捆牢，再让数条洋狗去咬，直咬得他血肉模糊、白骨暴露而死。一次，日军的电话线被游击队割断，鬼子将据点周围几个村子里看护电线的老百姓7人都用刺刀挑死在河滩里。

日本鬼子在斋堂，从建据点到1945年投降的5年间残杀斋堂

人民的罪行，一些老人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恨之入骨，斋堂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充满着民族仇恨的一页。

（门头沟区政协供稿）

日寇在洙水村的暴行

曹文林

洙水村属平谷县韩庄乡。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多次到该村作恶，欠下笔笔血债。

1941 年 1 月 21 日清晨，天还未大亮，胡庄据点的日军纠集郭家屯的日军及警备队，在日军中队长金森的带领下悄悄包围了距胡庄仅 3 里的洙水村，封锁了所有的路口。日伪军进村后，便挨家挨户地砸门、抓人。天大亮时，一百多群众被鬼子兵用刺刀威逼着集合到村中大庙的院子里。院子的四周站满了持枪的日本兵。金森先强迫村民们脱光衣服，然后通过翻译逼问村子里谁是八路军的办事员，谁是民兵队长，说了就可以回家，不说就统统冻死在这里。数九寒冬，刺骨的寒风卷着残雪呼啸着，抽打着赤身裸体的人们。但任凭鬼子汉奸怎样叫骂，就是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于是，金森又叫人从井里挑来冷水，朝着人群一桶一桶地泼下去，边泼边吼："说！说！"冰冷的水顺着人们的身子往下流，寒风一吹，刀割般地难受……一个小时后，老人们渐渐支撑不住而倒下。看着乡亲们忍受非人的折磨并面临死亡的威胁，青年民兵高振芳、周坦再也按捺不住了。为了解救乡亲们，他们挺身而出，对敌人说："我们知道谁是八路军的办事员。"日本翻译官奸笑着走过来说："知道就好，快说出来。""得让乡亲们都穿上衣裳再告诉你！"他们两人坚定地回答。金森一心想知道谁是八路军的办事员，便

马上答应了这一要求。人们都穿好衣服，又将冻僵了的几位老人抬回了家。大庙前只剩下高振芳和周坦两人了。鬼子兵端着刺刀都围了过来。金森更加急不可耐。高振芳、周坦见乡亲们都已经走远了，便对敌人说："八路军、游击队天天来，可我们一个也不认识；村里谁是办事员，我们更不清楚，也不知道谁是民兵队长。"金森气得暴跳如雷，鬼子兵一拥而上，将高振芳、周坦挑死了。

1942 年 7 月 21 日清晨，驻胡庄据点的日本鬼子带着警备队到洙水村来"清乡"。他们将抓来的几十个老乡圈到一起，逼问八路军的物资放在什么地方，老乡们谁也不说。日本鬼子气急败坏地从中拉出曹跃廷、曹振芳、曹文显、曹全 4 个人，用刺刀对准他们的胸膛，大声吼叫："快说，八路军的物资藏在什么地方?"曹跃廷等 4 人直挺挺地站在那儿，连嘴角都不动一下。敌人见问不出什么，便抄起棍棒朝 4 人乱打，又将 4 人面朝天绑在板凳上，用布蒙上脸往嘴里灌凉水、压杠子，整得死去活来。但这 4 个人谁也没吐一个字。最后，鬼子把他们全部枪杀了。

1942 年秋后的一天，胡庄据点的日军又气势汹汹地到洙水抓人、抢东西。群众由于提前得到了消息，大部分都躲藏起来。敌人扑了空，只抓住了在据点里给日本人做饭的曹文艺，并用枪托狠狠地砸他。曹文艺平时忍气吞声地侍候日本人，挨了不少的打骂，受了不少屈辱，一时间，旧仇新恨一起涌上心头。他猛地扑向鬼子兵，想要夺枪，被鬼子兵用刺刀穿透了前胸，当场毙命。

一次，胡庄的鬼子兵将在地里干活的曹立无缘无故地用刺刀挑死。还有一次，日本鬼子抓住了正在家里剃头的王太，连推带打地带出了村，后来也用刺刀挑死了。村民王春林曾给我方的办事员王启捎过一封信，不知怎么走露了风声，被敌人抓走，带到胡庄杀害了。

1943 年的一天，胡庄据点的日本鬼子又到洙水"清乡"，将村民曹奎、曹明、曹焕青 3 人抓住，又强令几个老乡就地挖了 3 个

坑。坑挖好后，鬼子兵将曹奎、曹明、曹焕青分别推进坑里，又用刺刀逼着人们往里填土。3个人就这样被活埋了。敌人走后，乡亲们冒死扒出了他们，幸亏抢救及时，3个人才活过来。

日寇在洙水村所犯罪行，几天几夜说不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给我们造成的苦难。

【作者简介】 曹文林，平谷县韩庄乡洙水村人，1941年前后曾在村里当民兵。

(平谷县政协供稿)

日寇血洗孟思郎峪

张桂新

1941年夏，日本侵略者妄图把新开创的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变成他们的“治安区”，驻密云石匣镇的日军铃木大队朱狩中队在长城线上古堡西驼古村建立了据点，给丰滦密县政府七区和十一区抗日活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创建丰滦密地区的八路军晋察冀步兵第十团决定消灭这股敌人。9月23日十团团长王亢率队在驼古梁山一举歼灭了出扰之敌，击毙朱狩中队长以下官兵56人，活捉1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只有几名日军漏网逃走。其中一名漏网之敌藏到朱家峪村东山，被朱家峪和孟思郎峪两村百姓发现。两村百姓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早已恨得咬牙切齿，因此自发地手持镐把、铁锹、锄杠等家什上山围歼。漏网之敌拚命突围，开枪打死一名百姓后夺路逃回了据点。不久，敌人便组织兵力再次对这个地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十团主力歼灭朱狩中队后，即转入龙赤联合县作战。敌人找不到十团，便把仇恨发泄在百姓身上，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孟思郎峪惨案。

孟思郎峪位于密云县西北部山区，是个小山村。不足20天，先后两次遭“讨伐”。10月30日，敌人来“扫荡”，抓走村民彭大真、文海江、文海山、文士荣4人。只有彭大真中途逃跑幸存，其他3人和罗圈厂、石湖根等村30名百姓一起，被押至下营惨遭杀害。不久，敌人纠集了下营、石佛、白马关和西驼古4个据点的

兵力，洗劫了朱家峪和孟思郎峪。朱家峪村百姓发现敌情后，迅速逃离了村庄。敌人扑空后即放火烧毁了全村所有的房屋。孟思郎峪村年轻力壮的男人大部分逃进山里。王春荣一家 11 口跑出 1 里多地后被鬼子拦住，只有两人趁混乱之机逃生，其余 9 人被驱赶着回村。鬼子踢开百姓家的栅门，挨家挨户进行搜查。那些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老人、妇女和小孩子，在敌人明晃晃的刺刀逼迫下，哭着喊着离开了家。

敌人把抓到的 36 名老人、妇女和小孩围拢在一个场里，四周架起机关枪，一队鬼子端着刺刀，唯恐有人逃跑。敌翻译官对大人们逐个审问，要老百姓供出八路军的去向。这里的百姓恨透了侵略者，曾多次配合十团骚扰敌人据点和伏击来“扫荡”的敌人，军民之间感情深厚。尽管敌人一遍又一遍地威逼、殴打，人们个个怒目而视，没有一个人出来答话，只有那些孩子们被吓得死命地哭喊着，拉着妈妈要回家。大人们紧紧抱住自己的孩子，有的一家人心贴心地搂抱在一起，抗击着敌人的审问。敌人恼羞成怒，用机枪对手无寸铁的百姓下了毒手。枪声响过之后，36 名百姓全部倒在血泊之中。敌人为销毁罪证，又抱来柴草放火焚尸，连中弹后幸存的活人也不放过。没有人性的鬼子狞笑着，看着死人的尸体在熊熊的烈火中抽搐，活人在死尸堆中拚命挣扎而狂笑取乐。

傍晚，敌人血腥屠杀、焚尸之后回了据点。

深夜，小山村仍然黑烟缭绕，火光冲天。逃进山里的百姓跑回村来扑火救人。在一片废墟上寻找着各自的家人，场院里悲惨的情景令人发指。36 具尸骨横七竖八躺了一片，一股股血腥味、烧死人肉味恶心扑鼻。有的尸体上血肉尚未燃尽，身下柴火正旺，不时地发出嗞嗞地响声，令人撕心裂肺，目不忍睹；有的尸体已被烧焦，遗骨蜷缩成一团；有的肢体分离，身首难对；有的依稀可见是夫妻俩、母子俩，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至死不分离。遇难者被烧得面目难认，人们只能从尸骨的腋窝处或着地处尚存的一

小片衣服辨认亲人的忠骨。失去亲人的百姓无不悲痛欲绝，大家互相安慰着、关照着度过了悲愤交加的难眠之夜。他们把这血海深仇深深地埋在心里，发誓迟早要和鬼子清算这笔血债。

小小的孟思郎峪，全村 71 间房屋全部化为灰烬。全村 10 户人家有 9 户遭血洗，只有 1 户逃生幸免。彭大荣全家 7 口人，老伴、儿媳和两个孙子一块被杀害，好端端的家庭只剩下父子 3 条光棍儿，是遇难户中幸存人数最多的一家。彭大香、彭大魁、彭光品等 4 户，每家只剩下两口人。王春荣一家祖孙三代共计 11 口，有 9 人同时丧生。文海陆兄弟两家共 8 口人，哥俩虽然脱险了，可是六旬老母和嫂子、侄子、闺女等 6 人惨遭杀害。文士清老两口年逾六旬，唯一的儿子文海山，几天前被鬼子杀害在下营，老俩悲痛至极，精神失常，痛不欲生；在乡亲们的关怀下情绪刚刚稳定，杀子之仇尚未报，这对老夫妻即被杀害。文海江和文海山一起被害在下营，抛下叔父、老婆和 4 个女儿，这 6 口刚出村就被敌人抓住，无一幸免。文士英老两口也被害。文氏这一支从此绝门断后。36 名遇害者中有 11 名儿童，最小的是彭大荣的孙子，年仅两岁。

然而，孟思郎峪百姓没有屈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在“无人区”积极生产，支援前线。瓦房被烧了盖草房，草房被烧了搭窝棚，窝棚再烧了住山洞，一直不屈不挠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作者简介】张桂新，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干部。

（密云县政协供稿）

日本鬼子的医院　中国民工的地狱

王绍才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我国山西大同的煤炭，于1939年开始修建大同至塘沽的铁路，简称“同塘线”。他们连拉带骗地从山东、河北等地拉来几万名工人，由门头沟三家店至沙城沿永定河畔分段动工。

在工地上，日本鬼子建立了一个“北京建设事务所雁翅建设诊疗所”。诊疗所在一个大院内，有四排房，第一排房是勤杂工宿舍和厕所、浴室；第二排房是日本式的，内有候诊室、诊疗室、药房、手术室和日本人住的男女宿舍；第三排房是仓库；第四排房是中国人病房，有病床50张。西面的一个跨院是日本人病房，有10张病床；东西的跨院有七八间房，属传染病病房，也有10张病床。

我是1941年冬天到这个医院当勤杂工的，当时医院有日本人正副院长各一人（不知叫什么），还有庶务副院长一人叫高田，一个日本大夫叫山崎，三个女护士分别叫金泽、合田和谷口。后来又来了两个中国大夫，一个姓王，一个姓张。勤杂工除了我还有两个，一个叫李茂林，一个叫董文。

医院星期一至星期六早晨8点开始门诊。该医院名义上为工人治病，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实际上民工是很难在此就诊的，主要就诊人员是满铁兵。一次，一个工头带来30多个工人来看病，

这些病人面黄肌瘦，有气无力，衣服破破烂烂，日本大夫看了五六个病人就烦了，不知他们叽咕了一些什么，就叫勤杂工李茂林数人数，给每人 9 包粉面药，日本大夫说："统统地一样。"就这样把 30 多人轰出来了。

最惨的是那些在施工中受伤的工人，因是工伤，医院不得不给治疗。但是一般经过手术不久即死去，能活下来的很少。

1943 年秋的一天下午，由秦峪工地送来了 5 个重伤号，他们被安排在候诊室，有两个伤号头部受伤，满脸血污；一个伤号砸断了脚；一个伤号肩膀砸了几个大口子；一个伤号右臂和右腿都砸断了，鲜血淋淋。那两个头部受伤的工人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停止了呼吸。那个右臂和右腿被砸断的工人抬进手术室，院长只让看护找来竹篾子把腿上的骨头对好夹上，再上点药水就用绷带绑上了，然后指挥人把他抬上手术台，用皮带把他绑住。院长不给打麻药，就用手术刀在他伤臂上一剜，骨头就露了出来，再下去就是锯骨头。院长年纪大，眼睛不好，斜着身子锯，锯来锯去也锯不断，疼得小伙子怪叫，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流。这时，院长不怨自己技术不精，还骂"八嘎"。好半天手术才做完，小伙子被抬进病房时已是脸色苍白，眼也睁不开了。

接着抬进那个脑袋被砸坏的工人，他的脑袋已耷拉下来，鬼子院长一看，只简单地将伤口缝合处理了一下，直到缝完病人也没吭一声，第二天早晨就死去了。就这样，五个伤号，当天在候诊室死了一个，第二天清晨死了一个，那个被截去胳臂的五天之后死去，只剩下两个人，一个锯掉左脚，一个肩部被砸成几个大口子。

医院就是鬼门关，只要进去没有还。锯掉脚的那个工人叫刘贵，他住院一段时间以后，本来伤势有好转，伤口大部已愈合，可是医院在这时给换了一种红药水的药捻子，又不经常换药，致使伤口又恶化了。一天，院长带护士到病房巡诊，护士一打开药布

就喊："真讨厌！"她用镊子夹着棉花蘸着红药水往上抹，完了向院长咕哝了几句，院长过去又用镊子捅了捅，然后点了点头，女看护金泽对刘贵说："你的腿又坏了，还得锯一截！"刘贵一听，边哭边说："院长行行好吧，再锯还不把我锯死呀！凑合着您给上点药让我出院吧。"金泽两眼一瞪骂道："八嘎牙路！不锯死了死了的有！"刘贵也急了："死了也不锯！"许多陪床的人都围过来，侍候刘贵的工人李长春说："他现在身体还没缓过来，再锯还不要他的命！"院长听了似乎明白了他的话，骂道："八嘎！"顺手一个耳光，打得李长春直往后退。病人和陪床的都很气愤，有的说："我们是治病来的，不是送命来的。"有的说："不治了，死了认命。"还有的说："这里哪是医院，是拿我们工人的命闹着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停。鬼子院长和护士虽然听不懂，也知大家说的不是好话，就连骂"八嘎，八嘎"。别的病人的药也不给换了，转身回了宿舍。院长、护士走后，有人主张让刘贵到北京，可是刘贵哪有这么多的钱，全屋人也没一个有钱的。坚持不锯吧，又怕烂死，回家吧，家在山东，相隔几千里路，一点路费也没有。第二天，还是按院长的意见把刘贵又抬上了手术台，等抬回来的时候刘贵已是奄奄一息，当天晚上就死了。李长春含着眼泪找了一领席把他抬到北山埋了。

病号中有一个姓贾的小伙子，是沿河城人，他的伤是满铁兵用枪打的，说是枪走火了。入院时日本大夫说一个星期就能出院，开始给他上的是一种黄药捻子，伤口见好，十多天后改用红色药捻子，伤口又很快化脓肿大，再加上隔几天才换一次药，伤口就腐烂了。有一天，日本女护士金泽给他换药，用镊子往外一夹药捻子，随着药捻子带出几个二分多长的蛆来，她赶紧躲到一边，让勤杂工往外夹蛆，最后又匆匆忙忙上了点药，用纱布一绑就走了。过了四五天，小贾伤势加重，眼已睁不开，勤杂工李茂林赶紧跑到看护宿舍对金泽说："六号那个病人要死了，你看怎么办？"金

泽漫不经心地说："什么？死了，拉出去！"李茂林请她抢救一下，金泽说："抢救的不要、不要。"就这样，到了晚上小贾就停止了呼吸，被抬出去埋了。

1943年春天，一个姓李的在媳妇的陪同下来住院，病人发烧吃不下东西，症状像瘟疫。住了五六天病势加重，医院的大夫、护士只简单地给些药吃，也不到他跟前去，怕被传染上疾病，结果病人仅住了一个星期就死了。

1942年春季闹天花，医院打着出去搞防疫的幌子从外边带回来三个病人，住在传染病房。第三天下午，鬼子让勤杂工劈了几根枕木，又叫来几个警务兵，然后把一个30多岁正在出天花的人活活烧死，另两个人在勤杂工的帮助下趁夜深人静时逃出了医院。

1942年夏天，两个工人扶来一个20多岁左脚扭伤的工人，鬼子院长一看，连摸都没摸一下就决定将左脚锯掉，第二天上午动手术。等那位工人住进病房后，我偷偷地告诉他："你的脚到外面找正骨大夫一揉就好，何必锯掉呢，赶快想办法逃出去吧，院长的诊断不能改，到明天上午一动手术就麻烦了。"到了晚上，我设法帮助他逃出了医院。

从医院往外抬死尸，按理说都是病重不治而死，没什么奇怪的。然而，从这所医院抬出去的死者，大部分是能治不给治，能治好故意治死的。并且这些人一般都是伤病见好后一换药就转重，最后不治而死。这完全是拿中国民工进行医疗试验。日本鬼子杀害中国人的手段是多方面的，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日本帝国主义"雁翅医院"的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也忘不了。

【作者简介】王绍才，70岁，门头沟区三家店村人，1941年冬至1943年在雁翅建设诊疗所当勤杂工。1949年以后分别在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和城子中学担任语文教员。1987年退休。

（门头沟区政协供稿）

延庆县西羊坊惨案

颜 青

西羊坊村位于延庆县城北山脚下，有126户人。日军侵华时期，日军、汉奸、特务在西羊坊一带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恨之入骨。

1941年10月6日，共产党的游击队摸下伪军的一个岗楼，消灭伪军30多人。日伪军气急败坏，进行报复。11月4日，侵略军纠集伪蒙疆骑兵三大队、特务队、伪政府人员和警察一、二、三中队等约800人，以“清剿”中共地下党、游击队为名，连夜偷偷摸到西羊坊，包围了全村。

次日凌晨，进村挨家挨户搜查，把村里所有的男女老少400多人赶到村南的大场上，分为三排，又从中挑出27名青壮年，其中李永来看势不妙，悄悄逃走。日军官挥着东洋刀嗷嗷吼叫，要人们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游击队员。村民没有一人吭声。日军官暴跳如雷，他下令烧房，全村立刻火焰四起，成了一片火海。不久房子大部落架、倒塌。近中午，敌人把26名青壮年用绳子绑着双臂，连成一串押往县城。途中有一名青年逃跑，到县日伪政府大场上又跑掉一人，其余24人被敌人关进延庆监狱。在狱里的9天内，敌人对他们逐个拷打审问，逼问八路军、游击队的情况。他们一字不说，敌人就用棍棒打，香烧，开水烫，通条烙，把他们折磨得遍体鳞伤。11月13日，敌人把两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留

在监狱继续关押，将其余22人押到康庄刑场上，个个反绑在木桩上，周围是铁丝网，架起机枪打“人头靶”，10名青年惨遭杀害。接着敌人放进10多条洋狗，狗冲上去就撕咬活着的12名青年，敌人围在四周取乐。不一会儿，惨叫声连成一片，有的被咬开胸膛，有的被撕掉脸上的肉，其惨景使人目不忍睹。这次惨案，22名百姓无辜牺牲。敌人烧毁房屋490多间、粮食约860石、猪约50头、鸡约450只，抢走大牲畜无数。农具、木材、家具、衣服等生产、生活用具全都成了灰烬，整个西羊坊区成了一片焦土。人们有家不能归，除4人留在村里，其他人有的投靠亲友，有的四处流浪，有的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流落他乡。全村共卖地300多亩。有5户绝了后。直到1942年春天，部分群众才陆续回来种地，而另一部分乡亲至今音信全无。

（延庆县政协供稿）

郭天福一家人的惨死

关续文

日军侵占北平之后，为奴役华人，掠夺我国铁矿资源，由日人直接经营了石景山制铁所。制铁所的工人工资低得可怜。1941年秋天的时候，一个壮劳力的日工资买不到2斤玉米面（后为杂合面），出现了卖儿卖女、劝妇改嫁等现象。

从顺义县被日本工头招募来的郭天福与妻、子3口之家到制铁所做工。老郭由于吃不饱，又过度的连勤劳累，精神恍惚，在卸矿石车时被启动的车轮轧去了双脚。日本工头拒绝给他医治。在崔振林等华工的强烈要求下，医院才勉强作了包扎，第二天便推出医院了事。老郭回家后的第二天死去。家庭失去生计，儿子饿死。天福媳妇又怀孕将娩。在这种沉重打击下，她疯了，逢人便说："我可怎么办呢！"并于次日清晨攀上了百米高的烟囱……

上班的华工们见此情况，都驻足惊愕围观。崔振林向大家介绍了老郭的不幸，揭露日军侵华的残暴。人们仰面看着这位无辜的妇女，不禁潸然泪下。

在抗日的干柴烈火下，郭天福家的悲惨遭遇，引发出制铁所内的一系列怠工与罢工，人们以此来反抗日军的残暴统治。

（石景山区政协供稿）



鱼子山惨案

胡尔森

鱼子山村距平谷县城10公里，坐落在一个曲折、狭长的山谷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这里制造了几起惨案。

1941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初一），驻峨嵋山、胡庄、平谷的日军包围了鱼子山，宣布划为无人区，不准老百姓居住，从此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烧、杀、抢。

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四）深夜，峨嵋山、胡庄据点的200多名日军，由汉奸翻译领路，偷偷向鱼子山扑来。天麻麻亮，日军进了村，老百姓还在睡觉。枪响，老百姓才惊醒，慌忙往山上跑。大伙刚跑到坡根，架在路墩上的机枪朝慌乱的人群横扫起来，当场有60多人丧生，没有倒下的，有的冒着枪林弹雨冲了出去，有的退回村里，又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不到30岁的周克勤，就被一日本兵用刺刀活活挑死。

12月11日天刚亮，峨嵋山、胡庄据点日军又包围鱼子山，将来不及撤离的30多老百姓逮到巨昆山家的门口，把10来个男的带进院子，先是拷打，继而在靠砬根的猪圈里点燃了棒子秸，把王德等4人扔进火里，活活烧死。其余20多人，用绳子绑成一串，带到峨嵋山据点，对他们严刑拷打。几天后村中百姓将他们赎回。

1942年2月13日下午，北土门据点的30多名日军又进村搜捕，在西山沟抓到巨友和王振铎，带到河滩上，用脚踢，用皮带

抽，逼问老百姓的去向，二人拒不回答，日军用刀砍死了巨友，又朝王振铎脖子上砍去，将其砍成重伤。

2月14日（腊月二十九）晚上，鱼子山的房子已全部烧光。临时搭的窝棚里，慢慢聚来一家家的男女老少。群众心想，头一天鬼子刚来骚扰过，要过年了，他们不会出来了。哪知道驻平谷、峨嵋山、胡庄的五六百日军就在大年初一（2月15日）的早晨又包围了鱼子山。有30多名老人、小孩来不及跑出去，都落到日军手里。他们把郭福珍的母亲、大伯，尹朝元的老伴，尉春元的老伴等7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推进菜窖里，往里头塞了一大堆干柴，点火烧了起来，就这样7个老人活活地被烧死。剩下的大人小孩，被带到坎沿上，用刀砍、刺刀挑，都惨遭毒手。

从1938年到1942年仅4年，日军就烧了鱼子山2000多间房屋，全村成为一片瓦砾，就连瓦砾也被拉到山外修了炮楼。鱼子山村共有180多人被杀害，有10户被杀绝，有72个年轻妇女成了寡妇。

【作者简介】 胡尔森，中共平谷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

（平谷县政协供稿）

凉水灌和开水浇

单振明

1942年9月21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二，我们后辛房村村公所摊派凑钱，买了很多月饼和苹果，准备第二天派人给驻在大兴县礼贤镇的日军送去“慰劳”他们。不料，日军十二日这天就来了，借口我们对皇军“不忠”，质问我们：为什么快到八月节了，你们还不上供送礼？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把全村男女老少都集中在一个大场院里，用大枪和刺刀逼着我们跪在地上，谁也不许抬头，稍有违拗者，不论大人小孩，不是打嘴巴，就是用皮靴踢，要不就用刺刀在脸上划来抹去，吓得人们都提心吊胆的，不敢吭气。

我和哥哥单振丰年轻力壮，又在前边，互相歪头递了个眼色，不料被日军发现了，把我俩揪出来，硬说我们哥儿俩都私通八路，就把我和哥哥各绑在一条大板凳上，再把板凳立起来，让我们头朝下，脚朝天，鼻子眼儿向上，把嘴用湿毛巾堵上，日军提着一壶凉水就往我们鼻孔里灌，只要一吸气，水就必然进到嗓子眼儿里去，这样一壶挨一壶地灌，灌了一个多小时，肚子鼓鼓的，好像扣了一个大瓦罐，撑得非常难受。

日军把绳子解开，让我们仰面朝天躺在地上。4名日军，站在我的四角，各自拽住我的手和脚，他们一喊号，同时用力，把我拽起，高过他们的肩膀，再猛然松手，让我整个身子实实砸在地

上，摔得我头破腰疼，尤其是那满肚子水，“哗啦”一下子好像把肚子都涨破流了出来。这还不算，他们还站在我的肚子上，用皮靴使劲踩。我尽力憋住气，鼓着肚子硬挺着，但水还是顺着鼻孔和肛门往外流，滋味难忍。

折腾完了我，又折腾我哥哥，弄得我们死去活来，我们咬牙切齿，恨在心里，但又无可奈何，这就是当了亡国奴的滋味。

这还不算，更可恨的是一名日军提出一壶滚烫的开水，照我脸上就浇，顿时，我满脸燎泡，脱了一层皮，两只眼睛都封住睁不开了。

另一名日军抄起一根劈柴棍子照我哥哥的额头打去，我哥哥被打得头破血流，眼睛都瞎了，当时就晕了过去。

从此，我们哥俩都落下了严重的残疾。

【作者简介】 单振明，北京市大兴县后辛房村村民。整理者史柳坡，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讲师。

史柳坡整理

（大兴县政协供稿）

安固大屠杀

吴郁周

1942年秋天，日军在平谷施行第五次“强化治安”活动，强迫各村建立“剿共自卫团”。离夏各庄据点只有3里地的安固村，对敌斗争十分坚决，“剿共自卫团”之事一拖再拖，夏各庄据点守备队几次催要报表，都被敷衍过去。日本守备队长丸山大为恼火，于8月18日清早，带领日伪军300多人，包围了安固庄，将没有跑脱的男女老少赶到一家大院，逼问谁给八路军干事，见无人作声，就拽出几个人，当场用枪托打、皮鞭抽，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抓走40多名青壮年男子，带到夏各庄据点。40多人挤在一间又臊又臭又热的小牛圈里，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大小便不让出来，整整被困了一天一夜。几个挨打受伤的已经昏倒，大部分人支撑不住，互相挤压着倒卧在地。第三天，一个姓薛的参谋说：“如果你们答应不给八路办事，赶快把‘剿共自卫团’名单报上来，就马上放你们。”

同时被抓的村干部熊万成、何荣、吴廷岐等，商量后决定答应条件，鬼子当天把人全部放回。抗日村干部只是应付敌人，在报表上胡乱填写二十几个人名，交了上去，团长由保长何成贵担任。以后的一个月，平安无事。

不料，9月20日下午，平谷日军守备队队长丙田，伪县长兼

平谷县警备队大队长廉约吾带领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安固村，喝令保长召集“剿共自卫团”全体团员开会，长官训话。保长兼团长何成贵战战兢兢，找了足有小半天，才找来仇守义、张振生、贾瑞付、张连锁 4 个人，张连锁才 19 岁，是个拐腿残疾青年，其他团员都是假名或已去世的，根本无从查找。在小学校门外的大槐树下，日军队长丙田和伪县长坐在长板凳上，对照名单查点，见只有 5 人，雷霆大发，气势汹汹审讯何成贵等人。何成贵等人谁也没嗞声，沉默足有 10 分钟。丙田突然大吼一声，抽出洋刀，指着 5 个人咕噜几句，上来 5 个日军，将 5 人五花大绑，又把张连锁架到西边土坎下的槐树上，把右腿捆在树身上，离地约有 1 丈高，另一条腿拴上大绳。伪县长逼迫伪军拉拴着左腿的大绳。伪军不忍下手，丙田狂吼一声向伪军抡起洋刀，人群大乱，被抓来的老乡哭喊着跪下请求饶命。丙田朝人群开了一枪，乡亲们停止哭叫，只听张连锁一声惨叫，血淋淋的左腿被拉出 1 丈多远。丙田并未消气，又向张连锁头部打了两枪。另外 4 个人被扯到西坎上高粱茬地，随着啪啪几声枪响，4 个无辜的乡亲也被杀害了。

【作者简介】 吴郁周，1932 年在平谷北屯教书，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82 年离休。

（平谷县政协供稿）



密云县的六寡妇村

曹友林

六寡妇村是北京市密云县上甸子、下甸子、涌泉庄、香水峪、北香峪、南香峪这六个村的别名，它记录着日本侵略者抓捕残害密云人民的滔天罪行。1941 年 8 月 31 日，因探知上甸子、下甸子、涌泉庄有抗日组织活动，驻密云县古北口的日本宪兵队突然包围了这三个村，将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共 178 人全部抓走，押至古北口。当晚，经本地特务辨认，从中挑出 50 名所谓“良民”，交保释放。然后，对余下的 128 人逐个严刑审讯，木杠打，烙铁烙，灌煤油、辣椒水，一连 7 天 7 夜，村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9 月 7 日，日本宪兵将被抓村民押上火车送往承德监狱。在承德监狱，这些村民又遭严刑审问，然后被判刑。下甸子村民梁青山、梁文成、梁文贵，上甸子村民梁万恩、刘汉忠等 7 人被以所谓“国事罪”处以死刑，被拉到承德水泉沟“万人坑”砍了头。其余村民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20 年、15 年、10 年、7 年不等，分押在伪满洲国的各个监狱，其中以押在沈阳监狱的最多。他们在监狱里作苦工，遭虐待，受尽各种非人折磨，到日本投降时，只有 14 人生还，其余均惨死在监狱中。1941 年 10 月 25 日，因同样原因，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又包围了香水峪、南香峪、北香峪三个村，抓走全部青壮年男性村民共 163 人，押到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在对

被抓村民逐个刑讯后，从中挑出 95 人送往承德监狱判刑。其中 4 人因所谓“国事罪”被处以死刑，在承德水泉沟“万人坑”被杀，其余均被判处 12 年以上刑期，分押在各监狱。日本投降后只有 7 人生还，其中香水峪被抓走的 52 人仅回来 2 人，南、北香峪被抓的 43 人仅生还 5 人。古北口日本宪兵队的两次大抓捕，给这六个村带来了空前灾难，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家庭从此断了后，绝大多数妇女成为寡妇，六个村因此被称为“寡妇村”。

【作者简介】 曹友林，密云县党史办公室主任。

（密云县政协供稿）

王家山惨案

李青山　姬　江　董梦知

1956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市开庭，开始对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有滔天罪行的8名日本战犯进行庄严的审判。

法庭调查开始后，平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宛平县“王家山惨案”遇难者的亲属王文明等人出庭作证。他们愤怒地控诉了站在被告席上的日寇原第一三七师团第三七五联队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于1942年12月12日策划的一次集体烧杀我老弱妇孺群众42人的滔天罪行。在铁的事实面前，船木健次郎对被指控的罪行供认不讳。声泪俱下的控诉，使得听众席上千余群众义愤填膺，泣不成声。

1940年秋季，日寇对平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大举“扫荡”之后，在平西公路沿线村庄，建立了以斋堂为中心的大批据点。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平西党政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暂时撤离斋堂地区，向西部山区转移，在“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战斗口号鼓舞下，在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里继续与日寇进行着殊死斗争。

王家山村是斋堂东北部的一个仅40多户人家的山村。1938年春八路军挺进平西不久，这里即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到1942

年，这个100多口人的小村已发展党员11人，武装民兵十余人，还有8人参军，2人参加根据地的政权工作。由于这里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八路军、游击队和我党政机关经常来这里活动。这个坚强的抗日堡垒村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从1941年初至1942年冬，斋堂据点的敌人曾多次派出奸细刺探我方在王家山一带的活动情况，密谋策划并两次袭击王家山村，烧死我抗日群众1名，将村中大部分房屋和群众在山上搭的草棚烧毁。同时，敌人还用“并村”阴谋胁迫群众向斋堂据点迁移，以图切断我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面对敌人的种种阴谋和残忍的罪行，王家山人民没有屈服，全村没有一个人迁到斋堂。并且，敌人刚刚撤走，民兵就在党支部书记王天忠的带领下深夜下山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民兵王久英没有鞋穿，他光着脚上山下山几十里，一步也没有落下。

面对王家山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敌寇如坐针毡。敌酋船木健次郎匆忙从门头沟赶赴斋堂，与斋堂据点的鬼子小队长赖野、伪“新民指导班”汉奸宋福增一起密谋，设下了扑灭王家山抗日斗争烈火的毒计。

1942年12月12日，晨光未露，朔风袭人，王家山一片寂静。突然，村东南方向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敌酋船木从斋堂、军响等据点调集的30多名鬼子和60多名伪军在赖野、宋福增的带领下，分两路在深夜里扑向王家山，将村子包围住。当时在村子东南方向山上担任警戒任务的民兵小队长王文枝发现敌人后，立即鸣枪报警。

枪声划破了王家山寂静的夜空。一早去井台挑水的群众张巨银听到枪声后，立即报告了党支部书记王天忠，王天忠迅速带领党员、民兵组织群众从村子东南山沟向外突围。但是由于寡不敌众，48名老弱妇孺不幸落入敌手。

敌人把群众赶到了村前的小空地上，四外架起了机枪，逼问

八路军、党员、干部的下落。鬼子小队长赖野抽出指挥刀，恶狠狠地狂叫：“‘毛猴子’（指八路军）哪里去了？”

没有人回答。

“割电线的是谁？”敌人一步步地向群众逼近，闪着寒光的刺刀对着人们的胸口。但是，乡亲们没有一个退缩。

“粮食藏在哪儿？”汉奸宋福增吼叫着，得到的仍是充满仇恨的目光。

汉奸宋福增看着愤怒的人群，咬牙切齿地对赖野说道：“这些穷鬼骨头都让共产党染红了，统统要不得的！”赖野凶狠的眼光在人群中来回扫着，龇牙冷笑一声，下令把群众押回村，全部关进王文凤家临街的两间小南屋里，小屋挤得满满的。宋福增用勺子舀起屋中炉火上滚开的玉米楂子粥，又一次吼叫着：“你们说不说？”

还是没人说话。

他一边把玉米楂子粥向人们泼着，一边大声威胁着：“再不说就统统烧死你们了！”

孩子们被烫得发出了凄惨的哭喊声，而大人始终没有一个人开口。

赖野一挥手，日寇和汉奸从屋里退出去，把门关严并用铁丝紧紧拧住。接着，灭绝人性的敌人把一团团点燃的干草从窗口扔进屋里，小屋里顿时浓烟弥漫，火苗乱窜，人们呼喊着把烧着的干草从窗口扔出去，又被敌人从外边扔进来。有几个人把铺在炕上的毡子掀下来，蘸着地上大瓮里的水用力扑打着。水很快用尽了，毡子越烧越小。人们呼喊着冲向窗口，有人奋力翻上窗台想从窗口跳出去，又被鬼子用刺刀挑了回来。屋子里传出孩子们嘶哑痛苦的哭声，大人愤怒的叫骂声，人们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尽量把身体向墙壁靠着。不一会儿，门窗烧着了，屋顶起火了，小屋被熊熊的火焰吞没了。

弥漫的火焰中，青年妇女王淑兰突然看到临街的小窗口透进一丝光亮，她下意识地丢掉手中刚刚满月的小儿子，拚力抓住窗口，一下子跳了下去。在她跳出窗口的一刹那，她突然感到有四只小手在她的腿上滑脱了，她想起来了，那是她两个心爱的儿女！一个8岁，一个7岁。她跳出来了，摔倒在大街上。但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却留在了火焰中！她发疯似地哭喊着又向小屋的后墙扑过去。一个站岗的伪军同情地把她拉到一边去了，接着，青年妇女贾永兰把一个浑身是火的孤儿和自己的儿子王文茂从小窗口递下来，被站岗的伪军接住救起，自己也跳了出来。妇女李二凤和一个12岁的男孩子也跳出来了……

这6个人浑身是火，衣服早被烧光了，头发烧没了，满脸、满手都是泡。那个12岁的男孩儿皮肤都烧焦了，一天以后痛苦地死去。其余5人在富有正义感的伪军的帮助下，得以幸存下来。他们是惨案的亲身受害者，是日本侵略者残酷暴行的目击者，是历史的见证人。

烈火很快吞噬了整个小屋。屋中绝望的呼救声，痛苦、凄惨的哭喊声越来越微弱。一个钟头以后，屋顶落架了。42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遇难的群众中除1名70多岁的老头和1名16岁的男青年外，13名妇女中有几个人还怀有身孕，27名儿童最大的13岁，最小的刚刚过了满月！在这场惨案中有一家被烧死6口人，17户人家从此绝根断代。罪恶的火焰烧了整整半个月。很多年后，在残留的断壁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遇难者在死亡之前痛苦挣扎时留下的印记！

王家山惨案震惊了整个平西。王家山人民英勇悲壮的斗争事迹大大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晋察冀日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惨案发生后不久，当地群众用血和泪的真情编写出了反映这次惨案的民歌——“王家山小调”，它很快传遍了平西抗日根据地。消息传到宛平，正在开会的中共宛平县委委员全

体起立，向王家山死难同胞致哀。会议决定，县委、县政府立即派人前往王家山慰问。根据地的军民召开了誓师大会，决心象王家山人民那样，誓死抗日，为王家山遇难的骨肉同胞报仇雪恨！

历史是无情的。制造王家山惨案的罪犯终于未能逃脱历史的严正惩罚！1945年我八路军在解放平西的一次战斗中，将在平西、宛平一带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赖野击毙；策划制造王家山惨案的敌酋船木健次郎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我生俘；民族败类宋福增在抗战胜利后潜伏在北京城内，全国解放以后，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铁杆汉奸终于被我捉拿归案，在斋堂交人民公审后枪决！

50多年过去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王家山村已建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山村。但是，人民并未忘记过去！每年“双十二惨案”纪念日，王家山村的人们及附近村庄的群众来到王家山惨案纪念碑下，追悼遇难者的亡灵，寄托对他们的哀思。

【作者简介】 李青山、姬江，原门头沟区文化局副局长；董梦知，原区文化馆副馆长。

（门头沟区政协供稿）

黑豆峪惨案

王 静

1943年1月6日（农历腊月11日）凌晨，阴云密布，北风怒吼。日寇调动黄松峪、胡庄、郭家屯、峨嵋山和平谷据点的日军、警备队约计500余人，偷偷扑向平谷县黑豆峪村。狡猾的敌人在村子东、西、北三面的山头支起机枪，村南大小路口重兵封锁，把黑豆峪村围个风雨不透。

东山尖发白，敌军分兵数路，蹑手蹑脚摸进村内，挨门挨户砸门、抓人。乡亲们毫无准备，无一人逃脱，男女老幼800多人，被驱赶到地主王印春家门外大场上。敌人将群众分成三拨，分别逼问拷打。300多老弱男子被围在大场，一个个被剥光衣服，敌人弄来大桶凉水，往冻得发抖的老人身上泼。时值三九，冰天雪地，气温零下十几度，只一会工夫，老人们就冻得浑身青紫，好些人当场昏死过去。没有倒下的，连惊带冻，缩成一团。日军在旁边点燃一堆堆干柴，一边烤火，一边继续往中国人身上泼凉水取乐。

折腾够了，开始审问。他们先揪出一个叫狄宝龙的老汉，逼问谁家给八路军干事，八路军的物资藏在哪儿。狄宝龙耳聋，任敌人怎么喊也听不见。日军给他一顿耳光，搡倒在地，又拽出陈国文。陈国文40多岁，几辈子扛长活，大儿子是村报国会主任，兄弟是八路军，真正的军属、抗日堡垒户。日军用猪毛绳蘸水抽，劈柴打，枪托子砸，打得他浑身淌血，又用绳子勒住他脖子，逼问八路军物资在哪儿。陈国文昏死过去好几次，但他怒视魔王，一

声不吭，表现出一个真正中国人的英雄气概。最后被日军用小褂蒙住双眼，朝胸腹部连刺 7 刀，英勇殉难。接着，周保林（党员）、王三头、陈宝山、陈俊义又被拽出人群，严刑拷打。陈俊义被打昏了头，招供说："家里有子弹。"日军信以为真，跟到他家翻腾半天，一无所获。日军恼羞成怒，一刺刀削掉他的鼻子。之后，日军将 4 人挑杀，扔进王家菜窖。周保林没被挑死，带伤窜出菜窖，跑出十几步远，被开枪打死。残暴的日军点燃柴草，把 4 个人烧成焦炭。

与此同时，100 多青年男子被关进巩志华家的院子。大门口日军持枪把守，房顶支着机枪，敌人挨个拷打，谭炳和、谭炳珍、赵文奇、大狗、张吉头、孙石头、王文魁、陈守义被当场挑死，扔进萝卜窖。其中陈守义气管没砍断，脑袋耷拉下来，等敌人走后，被家人从窖里抬出，还有一口气。老人至今还健在，后脖梗上留下一道两寸多长的刀痕。21 岁的贺再芹趁日军不备，突然窜出墙头，跑到胡同口，最后被抓住，一个日军按住他的头，另一日军用三股叉卡住他脖子，两个日军拽住他的腿往回拖，山道石头把他的脸搓得血肉模糊。最后日军将他挑死。

被关在另一地方的青年妇女也没逃脱敌人的魔爪。毫无人性的日军，把一个年轻媳妇和一个闺女衣服剥光，四肢叉开捆在大板凳上，用枪逼着本村几个青年男子当众轮奸，日军在一旁狞笑。第二天，那位被糟蹋的年仅 18 岁的姑娘饮恨含辱上吊自尽。

这一天，日军整整折腾到日头平西，才撤回据点。15 名乡亲被杀害，100 多人受重伤，300 多名老人全部冻伤。杀死鸡猪无数。烧人烤鸡的糊焦味、血腥味，弥漫了整个村庄。黑豆峪村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作者简介】王静，平谷县委政法委干部。

（平谷县政协供稿）

李各庄惨案始末

李善文

1943年3月5日（正月二十九日），在侵华日军驻密云柿本部队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据点小队长山本的一手策划下，发生了我7名无辜村民惨遭屠杀的李各庄惨案。笔者自1987年开始，深入到李各庄，以召开座谈会、调查、采访等多种方式，搞清了这桩惨案的前后经过。现将调查材料整理如下（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被调查者的原意，本文采用了第一人称）。

王有才（幸存者，李各庄村民，曾被山本抓到据点里关押）：我今年63岁了。日军小队长山本到李各庄抓人那年，我12岁。可以说我是死里逃生。

那是民国32年（1943年）正月前后的事。山本因怀疑卸甲山村暗藏八路军，命令李各庄“棍团”（即民团）全体青壮年到卸甲山砍掉全村树木，拆掉各户院墙。村民们敢怒不敢言。

正月二十九日，人们白天干了一整天重活，都乏了，夜间就由棍团的老少团替岗。这天夜里在村北山口站岗的有12岁的田蔓头、13岁的唐二黑以及张元、张金（张元是老年班长，本不该他的班，因王守山祖父王兆臣当班，夜间冷，王兆臣没有棉衣，张元好心眼替了岗，张金是替自己9岁的儿子张凤增站岗）；在村东站岗的是我和张凤祥；王金福和傻柱儿是“青年游动哨”；另外还有司万山、王少仪等，一共16个人。

这天夜间，八路军武工队从北山口进了村，抓走了李各庄棍团团长和伪保长。武工队进村时，先看住在村北放哨的田蔓头、唐二黑、张元、张金、王金福、傻柱儿（后两人查哨刚好查到村北）等，抓人任务完成后又放了他们。

第二天，二月初一，太阳刚冒红，山本带着日军和警备队气势汹汹地进了村。全村老少，从 8 岁到 65 岁共 400 余口，全部集中到村南头王家坟后边的空地中。四周架起机关枪，周围是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和警备队。事先挖了 3 个土坑，山本指着土坑恶狠狠地对村民说了几句日本话。李翻译解释说："谁暗通八路，快交出来。不然，把你们全都活埋！"一直围到太阳快落山，没一个人出来说话。最可怜的是那些不懂事的吃奶的孩子们，他们渴着、饿着、冻着。妈妈们用奶头堵住他们的小嘴，不敢叫孩子们哭一声。山本发疯了，他给了日军和警备队后撤、机枪手准备射击的手势之后，从人群中拉出一个叫孙孝廉的，凶恶地吼道："一个不说，一个的活埋，统统的不说，统统的死啦！"眼看孙孝廉就要没命，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就要开始。就在这危急的关头，只听人群中一声高喊："放了孙孝廉，八路军进村我知道！"人们惊呆了，一看，是韩进学大步挺胸走出了人群。

韩进学 40 上下年纪，平日热心公益，为人忠厚仗义，主持公道，村里的人们都敬重他。如今，他一声高喊，全村人的心都震颤了，妇女们不自主地流下了眼泪。山本阴冷地笑着问："你的私通八路？"韩进学不慌不忙地回答："不是。"山本又问："八路的来，为什么不报告？"韩进学也笑了一笑，回答说："太君，我是想报告，可是还没容我报，八路抓了人就跑了。"山本一时无话可问，便让棍团每人打韩进学一木棒。并且下令，不打的和不用力打不准归队，不准回家。山本的险恶用心，人们心里都清楚，不让回家的，最后就免不了一死。韩进学当然比大家看得更清楚。他十分冷静、沉着，对乡亲作个揖，说道："乡亲们，别光心痛我一

个人，这些吃奶的孩子多可怜啊！把木棒举起来，使劲打吧，明天就是二月二了，我多吃你们两张煎饼都有了。舍不得打我，咱们谁也甭想吃煎饼。”乡亲们在韩进学面前，热泪横流，不得不举起木棒……

尽管人们加着十二分小心，只往腿和臀部打，300多木棒打下去，即使是木头人，也会散架的，不到100棒，韩进学就倒下了。山本下令埋了韩进学。

山本怀疑当夜站岗的人里有人私通八路，就把我们16人全部抓回据点。我妈一直追着我，出村以后，我哭着告诉妈："给我留点煎饼！"

大辛庄据点只有一间牢房，里边原来还押着人，牢里挤不下，敌人只把在村北站岗的张元他们6个人押在牢里，我们散押在二门外院里边。被抓的人中，司万山、王少仪家里富裕，送了礼，陆续被放了。张凤祥当夜疏通，押5天也放了。

押在牢里的6个人罪受大了。牢里人多，挤不下，都站着。不给水、不给饭，连尿都接着喝了。我们在院里散押的，也不好受，也是不给饭不给水，夜间还冷。唯一自由的是可以在地上躺着、坐着。

李宽（见证人，大辛庄村民，当时在日军大辛庄据点当做饭的博役）：牢房原来的窗户都拆掉了，用椽子竖钉着，门上窗口横钉木棍。除了李各庄的6个人，先押在里边的，我知道的有西大桥的魏老，燕落寨村王瑞复，已经60岁，还有十里铺村的罗连义、龚瑞福、罗慎言，河漕村的李本文，靳各寨一个姓刘的，辛相庄一个姓周的；大辛庄的张坤原是给据点伙房挑水的，因给牢里一个亲戚送个玉米面饼子，也押在里边，一共是30多人。

押在牢里的人有什么罪？中国人是亡国奴，任日本侵略者折腾罢了。都是中国人，怎忍心看着自己同胞渴着、饿着、冻着，我们3个做饭的，警备队站岗的，甚至给日本当翻译的李克勤，都

背着日本人，设法帮助这些受难的骨肉兄弟。

张坤押起来后，我乘日军出发的机会，跑到他家报信。张坤家里还不知道。我顺手扯下他家门帘，兜上几个刚揭锅的玉米面饼子就跑，送给张坤。

李各庄的司万山体弱怕冷，听他说家里有皮袄。我出不去，取不来，就托人从李各庄把皮袄取来，经李克勤，转给了司万山。

押在牢里的人，喝不着水，吃不上饭，我们3个做饭的，想尽各种办法往牢里送水送吃的。警备队都是中国人，日本人一来，站岗的就咳嗽暗示，我们赶紧低头做活。没日本人时，我们就往牢里扔花生、扔萝卜。切萝卜时故意留大根子，当垃圾扔在牢门口。有一次，日本人不在，我从锅里捞了一脸盆半生不熟的萝卜丝，还有剩锅巴，从门上窗口送进牢房。窗口木栏是横钉的，刚好能送进脸盆去。做饭的米汤，几乎天天能送进去。但里边人多，送进的东西又少，总比没有强点就是了。我们虽然千方百计瞒着日本人，但还是被发现了。

山本亲自过堂审问李各庄的张元、张金、王金福、傻柱儿、田蔓头和唐二黑。他命令在墙上靠了4把木梯，木梯下放4口能盛5担水的大水缸。张元等4个大人被倒吊在梯子穿上，就像滑车，可以提起，可以放下。水缸里装半缸水，放下时，人头淹在水中。先用木棒打，打一阵之后放绳，淹一阵子提上来，空出水后再打、再淹。第一天，张元的肋骨和胳膊就被打断了。这几个人肺都呛坏了，鼻子、口不断喷血。

田蔓头、唐二黑两个孩子被仰面捆在凳子上，嘴上盖条毛巾，从毛巾上往嘴里灌水。据说是为了好灌，用毛巾遮着，喷水时也溅不着灌水的人。把肚子灌圆了，先是用手推肚子；然后穿着牛皮靴的日本鬼子就站在他们肚子上乱踩，水从口中往外喷，水柱把毛巾顶起1尺多高。另外还有4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有的对着脑袋，有的对着胸口，有的对着肚子，摆出随时刺杀的架势。那

天早上我做饭时，把一个大萝卜顺手扔进牢房。田蔓头正好站在牢门口，接到后就吃了。结果他在受刑灌水时，从嘴里喷出了萝卜渣子，日本人追问萝卜来源。我怕连累那俩做饭的，便求警备队中队长陈庭相编了个假话，说是洗萝卜时掉在地上一个，滚到牢门口，田蔓头拣到以后偷着吃了。给警备队做饭的赵永庄、给日本人做饭的王安也都帮助说是他们亲眼见的。晚上，我又回家设法买了 20 斤鸡蛋，给李克勤送了礼。山本原说要打我 40 大棍，有李克勤说情，就没打。

二月初六那天，山本召集河西 32 个村庄百姓开大会，就在郭家大院西墙外，把唐二黑、田蔓头、张元、张金、赵金福和张二元（傻柱儿）6 人枪毙了。警备队执行，枪子都没打正，唐二黑还没有中弹。实际上，这 6 个人是活埋的。埋完后，天就黑了。我父亲扛着锹出去三四次，想救活他们。日本兵一直不撤岗，谁也没救成。

张凤增（见证人，遇难者张金之子，李各庄村民）：我父亲他们被山本杀死后，就埋在郭家墙西。父亲死时，我 9 岁，母亲张永荣才 27 岁，正怀着孕，妹妹张凤春是父亲死后 6 个月生的。父亲死后，母亲一直守着我们兄妹俩，靠给人缝缝补补，总算活了过来。当时我虽然年岁小，但父亲他们被抓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直到现在，王有才被抓走时，哭着让他妈给“留煎饼”的场面，一合眼就出现在眼前。

王有才：张元他们被杀后，我们不在村北站岗的随后就释放了。从正月二十九晚上，直到二月初六天黑，我只喝过几回米汤，吃过一个萝卜根和几个带皮的花生。刚听说让我回家，“呼”的一下子眼前就是一片漆黑。醒来时，已经骑在驴身上了。我才 13 岁，想妈，叫不出声，连抬眼皮的劲都没有了。后来我才知道，提前释放的王少仪身体也很弱，山本召集大会，又不得不来，毛驴是他的。到家后，我躺在炕上，昏昏迷迷。想说话，张不开嘴；想

哭，流不出眼泪。我妈借点小米，第一天熬米汤，第二天熬稀粥，一勺勺喂我。四五天以后，我才能站起来。到了农历三月，春草发芽，该种地了，可是粮食种子都给我吃了，实在没法混了，我父亲用柳条筐挑起我和我哥，逃荒到热河的围场去了。直到农历九月，围场太冷，我们爷仨才又返回李各庄。

李宽：送萝卜的事虽说搪塞过去了，可我一直提心吊胆。山本生性多疑，又十分凶恶。杀个中国人，就像踩死只蚂蚁。我在新民会做饭的一年多时间，眼看着许多骨肉同胞，一个个惨死在山本手中，对日本侵略者我满腔仇恨。慢慢的我悟出一个道理，八路军打日本，日本恨八路军又怕八路军，只有投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打跑日本侵略者。所以，1944 年春天过后，我离开新民会，参加了八路军，在十三军分区三连当了八路军战士。

补充一句话，李各庄的棍团团长和伪保长被武工队抓走不久，就放回来了。经过共产党教育，这二人觉悟了。其中一个后来还参加了地下抗日工作。

王有才：日本侵略中国，残杀无辜百姓，连孩子也不放过，这笔血债，李各庄人牢记心头。全国解放后，翻身的农民演戏庆贺。孙孝廉和他的堂弟孙孝先把李各庄惨案编成一段快板书，开头两句是："田蔓头、唐二黑，十几岁的孩子认得谁……"才提个头，台下就哭成了一片。

（密云县政协供稿）

延庆县大柏老惨案

颜 青

1940年8月初，伪警察让延庆县大柏老村村长姚金玉说出村内有无八路军。姚一口否认。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50多名日本特务、伪警察摸到大柏老村公所。村公所设在一个庙里，八路军游击队员郭耻正巧回村执行任务，住在庙里，被敌人抓住，并被搜出手枪。敌人将郭耻绑上，悄悄抓走押入延庆监狱。

9月17日，日特100多人于上午10点左右向大柏老村围来。敌人将姚金玉和副村长唐富治绑上，接着到村公所把炊事员冯贵生也绑上，一同押到古城围子。几天后又押进延庆监狱。在监狱里他们被敌人用八号铁丝绑着双手，受尽日本警务官毛利的审问和各种刑罚，但没有一个人招供。后敌人又抓走10人。

10月17日，从延庆警察署开出一辆汽车，拉着郭耻、姚金玉等13名无辜被捕的人开到大柏老村南场上，押到事先挖好的坑沿旁，在村东崖子上架着机枪，南场上跪满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向拿着洋刀的敌人求情。敌人说："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可现在已经晚了。"说着就挥起洋刀向被捕者砍去。砍掉一个头，用凉水冲一下，再砍一个又冲一下。就这样，13名无辜乡亲一一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敌人妄图以此吓倒中国人民，扑灭抗日火焰，但却激起他们

的抗日怒火。大柏老村的许多人在惨案后寻找游击队，参加八路军，决心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延庆县政协供稿）

挖壕纪实

李云峰

1942年春，日本侵略者在平谷推行残暴的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妄图扑灭这里的抗日烈火。为了对平谷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日寇强迫成千上万的民工去挖“防共壕”(又叫治安沟)。这种壕沟宽3丈，深2丈。平谷北山一线有两条：一条东起上宅，西至峪口，长60里；一条由胡店向北至华山，长20里。平谷南山的壕沟从稻地村到崛山头，一直延伸至蓟县附近。凡壕沟经过的大村子都设有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每2里修一个炮楼。挖壕修炮楼给平谷老百姓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我是平谷县乐政务乡杨家会村人，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5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那浸透着血泪的件件往事。

非人的虐待

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日寇在平谷县的平原地区推行了保甲制度，强迫群众领取“良民证”，进行户口登记。1942年春，伪大编乡按所辖各村的户口册子摊派挖壕沟的民工，每村户口册子上16～70岁的男人的人数，就是该村应派出的民工数，少一个也不行。我们村当时属放光大编乡，正处北山壕沟的沿线，自然逃脱不了厄运。各村的民工数派下来后，村里再按地亩摊派，地主家可以出钱雇人去顶工，因而，苦役全都落在了穷人头上。那年我

才 13 岁，因为家里穷，又没有劳动力，只得硬着头皮去充当民工了。

我们挖壕沟的地段，就在离我们村不远的西古村北的双山前。工地上有日本鬼子巡逻，有汉奸伪军监工，他们只要看见谁不顺眼，轻则打骂，重则要你的命。那时，民工被鬼子用刺刀挑死的，用火活活烧死的，被活埋的比比皆是。由于挖壕沟是不许派小孩去的，我们这些孩子工就得格外当心。我每天去出工，都戴着一个大草帽，混在大人们中间。遇到鬼子或伪军，就翘着脚走路，生怕他们发现我是个孩子而被拽出去挨打。不料一天中午，我们正在沟边吃干粮，一个叫"胡大个儿"的伪军拿着一根约 4 尺多长的棍子走过来，挨个地用那棍子量我们，凡不够棍子高的小孩们都被他赶到沟南边。这个流氓强迫我们脱光了衣服，又用小细麻绳一头系着我们的小便，另一头拴在沟边的旗杆上。我们被正午的日头暴晒着，动弹不得，又急又羞又恼，而伪军们却在一旁一边吃着保甲长们送来的大米饭、炖猪肉，一边拿我们取乐。吃饱喝足了后，他们找树荫凉睡觉去了。还有一次，几个日本鬼子把我们一群小孩集合起来，拽到双山前的一个叫"王八坑"的水坑边，不由分说，脱光我们的衣服就把我们往水坑里扔，说是要拿我们喂王八。那王八坑形如盆底，黑如深潭。鬼子兵两个抬一个地把我们都扔进去后，又手执柳条围在坑边，只要我们往坑边上爬，他们就狠命地抽打。我们在水里吃尽了苦头，鬼子兵在上边哈哈大笑……

老汉的遭遇

一天早晨，几个鬼子兵和伪军在壕沟南边的道口上遇着后罗庄村一个挑担子卖豆腐脑的老汉。他们把老汉叫到壕沟边，便如狼似虎地去抢豆腐脑喝。喝光后，抬起砂锅喊着号子把它抛得老高，"啪嚓"一声，砂锅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然后他们把盛调料

的各种罐子砸掉，把扁担、挑子踩烂。这还不算，他们硬说老汉是“八路军的探子”，将他痛打一顿，绑在柳树上。这伙强盗们把老汉足足折腾了一上午，然后大摇大摆地找河边树荫凉快去了。民工们见老汉实在可怜，偷偷解开绳子，把他放跑了。

李启的惨死

两丈深的壕沟，人工挖起来决不是容易的事。挖到一定深度后，壕沟底的土要由几个人一层一层地往上倒，才能最后堆到壕沟外边。这天下午，我们村南的一段壕沟已经挖到近两丈深了。民工们正在由沟底向上倒土的时候，由东边过来一伙日本鬼子和伪军。他们见着人就用皮带抽，硬说民工们在“磨洋工”。这皮带头上是一个大铜环，抽在背上立刻就起一个大紫疙瘩，抽在脑袋上就头破血流。民工们怕吃眼前亏，都给鬼子伪军们作揖磕头。只见一个日本鬼子兵挥起皮带骂道：“八格牙噜！”直向站在沟沿上的李启头上打去。李启冷不防用手一挡，身子一歪，脚下没蹬住，掉下沟去了。正好沟底放着一把镐，直立的镐把不偏不倚地插进了李启的肛门，一直戳向他的五脏六腑。只听见一声揪心的惨叫，李启倒在沟底动弹不得。鬼子兵不但见死不救，还搬起大土坷垃往李启身上砸。为了救自己的弟兄，民工们都跪下了。鬼子兵又把民工们打了一顿，才向西扬长而去。乡亲们立刻下到壕沟底，七手八脚地把镐把从李启的身体里拽出来，连血带屎流了一大堆……李启在被乡亲们抬回村的半路上就咽了气。可怜他才 24 岁。

饥病的折磨

那年月，由于男劳力被迫去挖壕沟，庄稼没人管，地都荒得不成样子，草长得比麦子还高。收割的时候，麦子和草都分不清了，一个好劳力半天拔的麦子[illegible]够盛两筐的，根本打不到什么

粮食。谷子、高粱、豆子全被荒草淹没，叫虫子吃得只剩下根光杆。青黄不接时，家家都靠野菜度日。挖壕沟的民工中午是一律不准回家吃饭的，家里做一些野菜干粮，用布包好，写上姓名，送到村公所，由村公所派人用牲口驮到工地去。送早了，不让吃，干粮就在太阳下暴晒着；等到叫你吃的时候，饭早就馊了。饥饿难当的民工们硬把馊饭吃下去，再喝些凉水，不是拉肚子，就是闹浮肿病。挺好的青年小伙子，染上了病，说死就死。那时，平谷县流传着一首反映挖壕民工苦难的民谣：

正月里是新年，亲人朋友不团圆，
鬼子又把据点安，安到峨嵋山。
二月里杏花开，户口簿子发下来，
一甲一保全记上，家家挂门牌。
三月里是清明，家家户户上坟茔，
鬼子修路罪不轻，硬把坟来平。
四月里青草厚，鬼子强迫去挖沟，
不管青年和老头，一个不许留。
五月里树叶圆，挖沟挖了三丈宽，
挖得沟里出泉水，人在水里边。
六月里太阳热，挖沟百姓不得活。
一天打死七八个，鬼子笑呵呵。
七月里连雨天，挖沟挖了有半年，
各村小米早吃干，都把树叶餐。
八月里是大秋，地里庄稼没人收，
舍了庄稼去挖沟，不去就砍头。
九月里把沟挖，半年多来没回家，
妻子讨饭送给他，心酸如刀扎。
十月里更难熬，搜索清乡无处逃，
上宅以西到峪口，二里一炮楼。

十一月里雪花飘，鬼子前来把房烧，
冻得老婆孩子嚎，山洞里边逃。
十二月里盼望着，主力部队来到了，
他与鬼子拼刺刀，鬼子命难逃。

残暴的勒索

牛马般劳累一天的民工每晚收工时还要过一道鬼门关，就是集合清点各村的人数。如果人数不够，这一关就难过。

我曾清楚地记得那年旧历八月十四，我在乐政务村南挖壕沟。晚上收工前，来了一队鬼子和伪军，鬼子还牵着一条大狼狗。他们站在沟沿上，叫各村的民工们都在壕沟南边集合，按村排队，保甲长站在队前，由伪军清点各村民工数，再将人数报给翻译官，由翻译官报告给鬼子军官。那鬼子军官听完报告后，大叫："各村的人数的都不够！每村出来一个人，站到前边，枪毙的有！"民工一听，吓得头也不敢抬，全场鸦雀无声，谁也不愿站到前边去。鬼子军官急了，命令伪军到各队里拽，连打带踢，总算从各村都拉出了一个人站到队伍前边。鬼子放出狼狗，叫狗去咬中间队列前的那个民工。狗疯狂地扑了上去，那民工想用胳膊挡，被狼狗一口咬住了胳膊，就听见"妈呀"一声惨叫，狼狗从那民工的胳膊上连衣袖撕下一条子肉，鲜血流了一地……刹时间，民工们都向鬼子求情，保长们也赶忙向翻译官衣袋里塞钱，求他向鬼子军官说情。翻译官在鬼子军官耳边嘟哝了一阵子，就叫民工们俩人一对儿，相向而立，互相打嘴巴。谁不使劲打，就拽出去叫狼狗咬。一时间，人群里发出了一阵阵耳光声和凄惨的喊叫声，鬼子伪军们则在一旁瞧乐呵。打了好一阵子才叫停下来。伪大编乡长武少模说："各村听着，每缺一个人罚十块钱，都要赶快交来！"带工的保长们连连点头答应下来，鬼子这才放了人。

许多老年人吓得连路都走不动了，靠乡亲们互相搀扶着摸黑

回了村。到了家里，谁还吃得下饭。

精神的奴役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除了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外，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对中国人民实行精神奴役。在平谷县，日寇强令各小学学日语，到处张贴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等标语，施尽了各种手段。那年初冬，我在西杏园村挖壕沟。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家家都断了粮。挖壕沟的民工早晨只能喝碗野菜粥，中午啃几口白薯面菜饽饽，加上超强的体力劳动和日伪军的打骂折磨，一个个骨瘦如柴，晚上收工时走路都打晃。一天晚上收工后，忽然来了一队日本鬼子和伪军，硬要把我们赶到放光村据点去集合。累饿得东倒西歪的民工们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可谁也不敢不去，硬强着迈起双脚往前挪。走慢了，伪军们不是用枪托杵，就是用脚踢。好容易走到了放光乡公所院外的空场，四外都围满了持枪的鬼子和伪军。我们在空场上排队坐下，只见南边的两根杆子上挂起一块白布，不一会，空场的坎下又发出一阵轰响。民工们不知要出什么事，以为鬼子要进行大屠杀。人群混乱了。这时，一个日本翻译官说要放电影。那时啥叫电影，庄稼人哪会知道。大家不相信鬼子会干什么好事。不一会儿，只见白布上出了人影，会动还会说话，全是耀武扬威的日本鬼子。原来，他们放映的是宣传日本“皇军”如何“英勇善战”、“打遍亚洲无敌手”的纪录片，主片叫《新加坡陷落》。强盗们想要用这些无耻的侵略记录，征服中国人民的精神。然而我们看过这些东西之后，联想起自己所受的苦难，只能更增加对侵略者的仇恨。

恶魔的报应

在我们杨家会村南的小山上，有两个专门掌管民工们上下工

的鬼子兵。他们每天早晨由放光据点里出来，抬着一个警报器。民工们上工、休息、吃饭、收工全要听警报器响。这两个畜生除了摇警报器没别的事可干，就千方百计地祸害周围老百姓。大白天，他们脱个精光在小山上胡闹，要不然就闯到我们村南的农户去作恶。不论进到谁家，遇到妇女就堵在屋里强奸，遇到男人就说是逃避挖壕沟的，不由分说毒打一顿，搞得村里人不敢下地干活儿，妇女们都往脸上涂锅底烟子，装成蓬头黑面破衣烂衫的鬼样子，以防遭到凌辱。每天中午由杨家会村公所派人给这两个畜生送饭，顿顿必须是大米白面、鸡鸭鱼肉，外加烟酒。有一天，派刘印堂老汉挑着担子去送饭，担子一头是白米饭，一头是炖鸡。到了山头上，两个畜生一看有饭有鸡没有香烟，便大叫大嚷："烟的干活，烟的干活！"刘老汉听不懂，以为是鸡肉太淡，要加盐，便连连点头称是，立刻跑回村公所，找到一碗咸盐送上山来。两个畜生一看拿来的是盐，一声"八格牙噜！"便把刘老汉摁倒在地，野蛮地撬开他的嘴，把一碗盐全都硬塞进嘴里去了，并强迫刘老汉全都咽到肚里，齁得刘老汉得了哮喘病，到死都咳嗽不止。

人民群众对这两个鬼子兵恨之入骨。当时抗日政府已在各村秘密建立起了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地方党领导和村干部们商定了除掉这两个恶棍的办法。先派两个民兵查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制订了可靠的擒拿方案。选一个阴雨天，民兵们傍晚悄悄地埋伏在事先选择好的一片密集的高粱地里，高粱地中间，是这两个日本鬼子晚上回放光据点必经的小路。由于这里地势低洼，下雨后一片泥泞，便把一根糊上泥的绳子横在小路上，两头由躲在高粱地里的民兵们拽着。天气渐黑，那两个家伙怕下雨，收工后背起警报器扛上枪就下山往回跑。埋伏在地里的民兵们听到一阵高粱叶子响，知道是狗畜生来了，拽绳子的民兵憋足了劲。只听见"啪嚓"一声，那两个家伙同时被绳子绊倒。说时迟，那时快，埋伏的民兵们一齐扑上去，七手八脚把这两个狗东西捆了

个结结实实，用破布堵上嘴押回村，绑在刘玉枝家门外的枣树上了。

村里的群众听说南山上作恶多端的那两个日本鬼子被民兵活捉了，男女老少蜂拥而来。有拿着棍棒的，有带着家伙的，妇女们还攥着纳鞋底用的锥子，非要拿这两个狗东西报仇雪恨不可！可抗日政府有政策，不准老百姓宰了他们，好几个民兵使劲地拦住急红了眼的乡亲们，一再解释说要交给抗日政府处理，可群众哪里答应啊！那些被他们毒打过的男人，被他们残害过的老人，被他们糟蹋过的姑娘媳妇，那一个个受尽了屈辱和苦难的心灵，面对近在咫尺的恶魔，他们能平静吗？妇女们拚命地挤上去，冷不丁就扎上一锥子，以解心头之恨。民兵们不让我们打，我就带着儿童团员们去捅马蜂窝，把窝里的马蜂儿拿来往两个鬼子的嘴里塞。我一面塞一面喊着："我叫你们再往印堂老爷爷嘴里塞咸盐，这回也叫你们尝尝马蜂儿的滋味！"乡亲们齐声叫好，还有人喊："往狗东西嘴里塞泡狗屎！"

当夜，民兵们就把这两个畜生押往北山抗日政府。

刻骨的仇恨

放光据点失踪了两个鬼子兵后，使日军兽性大发。第二天平谷城里的日伪军疯狂"扫荡"了杨家会村和井峪村。村干部早有准备，叫群众躲到山里去了。鬼子围村后抓不到人，就在村里乱折腾。他们找到藏粮食的洞，就把好粮食抢走，剩下的"粮食"就往里倒上大粪；见着鸡就抓，杀死后装在口袋里背走；见到猪就宰，把肉剔下来，扔下猪皮和骨头……有一户农家养了30多箱蜜蜂，鬼子为了吃蜂蜜，用火把蜂全烧死，把蜂桶砸烂。就这样从早到晚，村子里鸡飞狗跳，到处是哭喊声和叫骂声。一场浩劫之后，鬼子又抓住了杨家会的村干部刘福星，把他带到放光据点，进行残酷的拷打后，用刺刀挑死在炮楼北边的地里，暴尸示众。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家乡的法西斯暴行，数也数不清。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作者简介】李云峰，1930年生人，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平谷县邮政局离休干部。

（平谷县政协供稿）

杀人魔王山本及其罪行

李善文

1943年前后，现北京市密云县白河西地区包括西田各庄镇、十里铺镇及密云镇沿白河西岸的西大桥、季庄、大小唐庄、李各庄以及划归怀柔的驸马庄、宰相庄、梨园庄等共32个村庄，统归侵华日军驻密云的柿本部队在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据点山本小队长管辖。这一地区驻日军约30人，一个警备队约120人，新民会工作人员30余人。新民会设在大辛庄郭正中家，郭家在日军侵占密云时举家逃离，18间房空着，全部为日伪所用。

小队长山本心黑手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在密云河西地区制造过多起血案，犯下了滔天罪行。只李各庄惨案，即杀死7名中国人（其中有3名是孩子）。当年目睹这一惨案的中国人，至今没齿难忘（有关李各庄惨案的详情，另有专文记述）。

为“强化治安”，山本命令白河西32个村庄，全部成立起民团。男子8至65岁全部编入。每人自备木棍为枪，百姓称为“棍团”。18岁至45岁称青壮年团，夜间出勤站岗；其余为老少团，白天站岗。棍团成立以后，用站岗的人当活电话，以岗哨之间说话互相都能听到为距离，以大辛庄据点为中心，与各村相通。山本下令，哪个岗位断了消息，查出后一律枪毙。山本有时还用假消息作传递试探。其实，当时百姓都明白，八路军真的出现了，没人传消息，反倒是山本出发的消息不断传送。

山本还命令各村中心设铁钟，听到钟声，不论男女，必须跑步到指定地点集合，棍团必须携带木棍。集合地点由保甲长临时通知，有时在本村，有时在外村。迟到的、身上没跑出汗水的，轻则挨打挨罚，重则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如果迟到的人多，则解散回家，听钟声再集合。民国 31 年腊月（1942 年 1 月），西大桥、燕落寨两村同时在燕落寨大庙水坑前集合。两村相距 8 里，西大桥迟到的男女一半以上。大庙前水坑结了冰，山本令两村 300 余口男女脱光衣服，趴在冰上。后在靳各寨本村集合，因距离短，跑出汗水的人不多，山本下令搞第二次集合；又嫌动作慢，罚全体村民趴在地上，手和脚撑地，胸、腹不准沾土，一个多小时以后，人们坚持不住，山本便命令日兵用木棒打。人身上棉衣被打得尘土飞扬，远远看去像刮大风一样。

这场恶作剧只因怕尘土呛人，才不得不停止，但山本怒气不消。恰好一个青年因病没出来集合，被从家中搜出，也没拿木棍。山本骑在驴上问青年："八路在哪里？"青年答："不知道。"山本又说："你的八路送信？"青年刚答："我有病……"山本就给身边日兵一个手势，那日兵还没容那青年把话说完，冷不防抡起木棒，青年的头立即被打碎，血和脑浆四溅，流了一地。

河西的百姓都怕山本抓劳工。大辛庄的于佐躲劳工，逃出家门。山本不但下令封了于佐家门，还把于佐之妻娥子抓起来。娥子被关在牢房里，山本亲自拷打，逼她交人。3 天后，山本没有抓到于佐，就把娥子枪毙了。

河漕村李本文出门走亲戚，恰在全村搞集合那天回家。日本兵抓住他后，说他"通共产党"，押在牢房，也不审问，一天就灌 32 壶凉水，一壶水少说也有 3 斤，百八十斤凉水灌进肚里，然后推肚子，水从口中往外喷，有一二尺高，没过几天他就不行了。

西田各庄的马久启，是卖绿豆芽儿菜的，必然得串村叫卖。山本疑为"共产党暗探"，命令棍团将他用乱棍打死。

以上记述的只是山本在白河西地区所犯滔天罪行中的几件事，已足证这个杀人魔王的凶暴残忍。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历史，我们应当永远不忘。

附记：

本文承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老人李宽提供资料。李宽，73岁，1942年曾被本村甲长派到伪新民会当博役，山本下乡“讨伐”，命李为之赶脚（牵毛驴），山本在白河西地区犯下的许多罪行，都为李宽亲眼所见。

（密云县政协供稿）

侵华日军1945年春节大“扫荡”

高绍宝

1945年2月，八路军冀东十四分区主力十三团、十六团和三通顺联合县党政机关及县支队驻在顺义县东部的北起焦庄户、龙湾屯，南到驻马庄一带的十几个村庄内，和当地群众一起过春节，欢庆一年来抗日斗争的胜利。这时，叛变投敌、当上伪保安司令的原十四专署武装部长单德贵，将情报提供给敌人。于是驻京东地区的顺义、密云、怀柔、平谷、三河、通县等地的伪日军近万人，乘着汽车、带着轻重武器，采取长途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于2月12日（农历腊月三十日），从四面八方向驻马庄一带杀来，对附近几个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扫荡”。

十三团、十六团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敌人没有找到八路军主力，就尾随县支队穷追不舍，在赵家峪附近的庞山腰把娃娃连的23个小战士包围起来。这些十四五岁的娃娃弹尽粮绝，失去了抵抗能力。疯狂的日军端着刺刀冲向这些娃娃，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有的娃娃尸体被刺刀扎得血肉模糊；有的还未被扎死，就浇上汽油点燃。

“扫荡”王庄子的日伪军把老百姓赶到一起，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然后把抓到的一个八路军战士倒剪双手，吊在旁边的大槐树上，逼着他说出谁是八路军，谁是老百姓。战士不说，敌人就抡起木棒，朝他头上打去，打得他鲜血直流。残忍的敌人还不放过，

又用枪托猛砸他的胸脯，后来又连拖带拽地拉走了。16 岁的八路军战士刘宝印没来得及转移，躲到杨维发家的柴垛里，被日军发现，乱枪射死。在村里，数十名日军围住一个八路军战士，你一刀他一刀活活把这个战士扎死。在村西北的坟地里，十几名“满洲军”士兵包围了一名八路军侦察员，匪徒一阵排枪，将其杀害。光在王庄，日伪军就杀害了 8 名被围或被捕的八路军战士。

日伪军来到驻马庄在村里折腾了一天，傍晚找到了地道口。先往地道里扔手榴弹，狂轰滥炸一阵后，又点着柴禾用扇车往里扇烟。地道里仍没动静，凶残的敌人竟往地道里施放毒瓦斯，将来不及转移的群众熏得咳嗽气喘，头晕呕吐。杨翠一、杨凤起、李士杰等人受不住了，就冒死爬出来。杨山往外爬时，四肢无力，一头栽在屎尿坑里。区干部李文元、民兵小队长杨久续、15 岁的杨宝祥、16 岁的李永发，被毒气熏得七窍出血，惨死在地道里。来不及逃走的青年妇女，大部分被敌人奸污。灭绝人性的日伪军把杨来顺的妻子轮奸以后，狂笑取乐。她悲愤交加，含恨自杀。

这次“扫荡”，日伪军在驻马庄待了三天两宿，走时还带走了被折磨半死的区干部张宝三，拉走了 80 多头驴，抢走十几大车粮食、衣物。一时带不走的锅碗瓢盆，统统砸烂摔碎，房子浇上汽油，放火烧毁。他们临走前还在老百姓家的水缸里撒尿，面箱里拉屎，粮囤里掺沙土石子。驻马庄村民无不切齿痛恨。

【作者简介】 高绍宝，顺义县党史办公室干部。

（顺义县政协供稿）

怀柔县龙潭惨案

张义文

1941年至1945年春，侵华日军将怀柔县长城内外的大片山区定为“无人区”，称之为“无住禁作地带”，强迫这一地区的人民远离家园，如若不从或偷偷返回，就一律杀害。百姓们被赶出家园后，生活更加困苦，吃、穿、住一无所有，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为了生活下去，有些人就偷偷返回老家。不敢回家，就在山沟里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用蒿草、树枝搭窝棚栖身。日军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动用兵力搜山。1945年3月27日，天刚放亮，日军、伪满军、伪警察上百人就从大地村出发摸进了山沟。他们见窝棚就进，进去先抢东西再抓人，出了窝棚就放火。他们从鸭子峪、大八地、交界河北沟、下五道河西沟等处，抓了无辜百姓24名，其中有老人、不满周岁的婴儿和身怀六甲的妇女。敌人把群众赶到龙潭沟口，用机枪一阵猛扫，见群众都倒下了，敌人就在日本小队长的带领下往回走。没走多远，他们听见有小孩的哭声，又折回来，照孩子的头上就是一枪，接着又给其他群众补了几枪，才扬长而去。被抓的24名群众中的14名就这样被杀害了。惨案之后，龙潭沟一带真正成了“无人区”。

【作者简介】 张义文，原怀柔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

（怀柔县政协供稿）

日本侵略者对妇女的暴行

李善文

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上了华北的大好河山。为了实现其吞并中国、连通欧亚的战略意图，日军把我华北视为战略后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敌后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斗争。1942年以后，穷途末路的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在一些地区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并在从山海关到古北口长城沿线30里范围内，实行集家并村，划“无驻地带”（即“无人区”）。从密云的半城子到怀柔的渤海所，从密云的白莲峪到河北省滦平县的于营子各长120里的范围内，都被划为“无人区”。到日军投降，不到3年时间，“无人区”内被杀害的群众达431人，被捕1111人，妇女占很大比重。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中国农村妇女的负担最为沉重，受到的污辱最多最深。1944年密云县金巨村妇女和男人同样被征去挖大沟、修公路；收秋时村里干活的几乎全部是妇女，天扬起雪花，秸秆还在地里。敌人搞集家并村（被中国百姓称为“人圈”），专为中国妇女定了两条：一是“跑人圈”，规定年轻妇女每天早晨到“人圈”外跑一圈后才能回家；二是“跑山”，每周一次，青壮年妇女都集中到山下，听令跑步上山，途中还鸣枪恫吓。在密云，敌人为百姓立了十条“守则”，什么“见皇军不准逃跑”，“不准泄

漏军事秘密”等等内容。不论男女进县城，在城门口卫兵逐人检查，要求背诵十条守则，背不下来，贴墙根罚跪。乡间妇女一般不敢进城。日本侵略者还对中国妇女施加种种暴行，手段之残忍，无可复加。仅从当年《晋察冀日报》记者现场采访报道的材料中统计，敌人侮辱、杀害中国妇女的手段就达百种以上。有拿活人当靶子、在活人身上练刺杀、石头砸、活埋、肢解、剥皮、剜心、开脑、灌水、毒气熏、铡刀铡、石碾压、火烤、火烧、火烙、开水浇、锯拉、喂狗、腰斩、装在口袋里然后摔、强奸、剖腹、男女同牢、捕捉后运走为妓等等。此外还有所谓“西瓜趟”等种种花样：把百姓不分男女集合到一起，扒光衣服，令其趴在地上，几个小时不准挪动，不整齐不行，肚和胸着地不行，违反者即遭毒打。

归纳起来，日寇对我妇女所施暴行，可分三种类型：

一、屠杀

1941年8月13日，日军在高就村搜出一些妇女，一位卧病在床、走不动路的老年妇女，被敌人用刺刀穿透胸部，惨死在炕上；另有3人稍能行动，但身体极其虚弱，敌人在街中心将她们剖腹，把五脏挂在树上；其余之人毒打后又被扔到没膝深的猪圈里。

在密云县孟思郎峪惨案中，日军杀害我老弱妇女27人，并将尸体全部焚毁。在古北口，敌人从河北的丰宁县掠来一姓车的妇女为姘头，其日本妻子到来的消息传来后，公然在河西大桥上将车姓妇女枪杀。

二、侮辱与奸污

1941年1月，日军在平西“扫荡”中，据第1、2、3区统计，被奸污妇女竟达4274人。1942年夏，日军在密云县新城子附近“讨伐”时，从高粱地中捕获我7名妇女，当场扒光她们的衣服，

供士兵自由取乐。奸后几个月不能起床。河南村一名 10 岁女孩，在被日军轮奸中死去。敌人对产妇也不放过，在古北口外的快活峪村，一个刚分娩的产妇，在敌人强迫其到泉水洗身时逃跑，敌人穷追不舍，该妇女于途中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采取种种手段侮辱中国妇女，如强迫父奸女，子奸母、用擀面杖擀孕妇腹中婴儿等等事件屡屡发生。

三、掠走中国妇女

被日伪掠走的中国妇女，有的送到妓院，有的送到日军中充当“慰安妇”。只有少数在日本军官家里当女佣。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敌人已感到末日来临。为稳定伪军情绪，公开允许伪军到各村奸淫妇女。本文因专题揭露日本侵略者，伪军罪行未计其内。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中华儿女永远也忘不了母亲们、姊妹们所遭受的奇耻大辱！

（密云县政协供稿）

一个照像师的回忆

郝式利

1937年我从平谷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了平谷简易师范。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已伸向冀东。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8年正月，简师被迫离散，我辍学回家，在父亲开的“太和照像馆”里工作，帮助父亲挑起了生活重担。

这年7月19夜，八路军攻打平谷城，使平谷城获得了第一次解放，成立了以姜时哲为县长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秋毫无犯，百姓拥戴，救亡活动蓬勃发展。可是仅一个月，“满洲队”、“蒙古队”攻破平谷城，人民又遭劫难。平谷各界救国会领导干部被抓捕。我的老师、平谷初小教员刘印侯愤恨不平，穿了民国的“操衣”去和敌人讲理，被带到邦均镇杀害。张焕午、路清远、贾子明、董得新、安文波、张会文等人均英勇殉国。日本鬼子“满洲队”在平谷城里胡作非为。小小的平谷城被日伪占了个严严实实。我家的东院驻的是“警防队”，后来又驻日军山炮连，城东庵庙驻的是警备队，城隍庙西驻的是日军守备队，忠厚栈“八屋”驻的是1418特务机关，城隍庙东是伪警察局，现招待所是伪县政府……我们这些商家在敌人的刺刀下过活，真难！特务汉奸为虎作伥，随意敲诈勒索，商家敢怒不敢言。夜里，这些狗东西常来敲门，张口就是要酒钱、“白面儿”钱，要赌票，哪个少

给了也不行，要不然给你安个“私通八路”的罪名，就叫你倾家荡产，性命难保。汉奸翻译王仁良要照像，我因为活儿忙，没有随叫随到，被他打骂一顿，还说我是“照像发财”。王仁良当了警备大队长后，又来了个金翻译，一肚子坏水。这家伙爱玩照像机，拍了片往这儿一扔，白冲白洗，从不给钱。唉！都是中国人，这些家伙真缺了八辈子德，丧尽天良！

我们这平谷城里唯一的一家小照像馆，还得伺候日本人。

一是给日本人照像。日本人占了中国，耀武扬威。他们站岗要照像，排队要照像，军事演习要照像，开会也要照像。日军守备队长岛田还要我扛上外拍机，随他到平谷城墙上，他骑着大洋马左照、右照，折腾了半天。大约是1944年下半年，十几个日本鬼子在北寺一带被我八路军打死，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北门外火化，我又被叫去照像，一具具死尸一丝不挂地摞在那里。一个死鬼子官见了阎王爷还要摆出副“武士道”的臭架子，他被安放在柴堆上，正襟危坐，双手持刀，脖子上裹着白毛巾，还渗着污血。这家伙八成是叫八路军砍掉了狗头，脑袋是现安在上边的。日本鬼子“叽哩咕噜”地念了一阵“丧经”之后，点着干柴，黑烟腾腾。那情景，倒很像是送瘟神。

二是给日本人洗照片。这是最可怕的事。日本鬼子带有小型照像机，他们在中国的罪恶活动——烧、杀、淫、掠，都不知羞愧地拍摄下来，以宣扬他们的“赫赫战功”。驻平谷日本鬼子的这些照片全经我洗。那一张张照片从显影盘里夹出来，都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我至今还记得日本鬼子“扫荡”山东庄的一张照片：一个受尽凌辱的妇女被吊起来，剥去了裤子，几个鬼子兵正用刺刀捅她的下身。鬼子山炮连长斋藤有一架自动过片的小型摄影机，这家伙拍的片子最多。大约是1939～1940年间，日本人抓了安固的何禄等8个人在平谷城外砍头，斋滕用快速连续摄影拍下了从抽刀、劈杀、血柱冲天、人头落地的全过程。洗这种照片，真叫人

毛骨悚然！而洗片时，鬼子就在我身后持刀监视，更叫人胆战心寒。每一张底片，每一张照片，包括洗坏了的，他们都统统拿走，片纸不留，足见他们是做贼心虚。

第三是被迫为日本人的法西斯统治服务。日本人为了推行“强化治安”，强迫中国人领取“良民证”和“居住证”，两证都要贴照片。这差事便摊到了我的头上。由于乡间有八路军和民兵活动，敌人害怕，便把老百姓一拨拨地集中到平谷城里照像，一次好几百人。我们忙得喘不过气来，伪警察所还从中盘剥。有一次，日本人要我随他们去黄松峪，说是拍“居住证”的像片。到了那儿，他们叫我支起照像机，然后集合了老百姓，从中抓了杨振州、王利田等7个人，又说不照了。原来，他们说照像是假，抓人是真。

唉，日伪统治下的苦，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1944年下半年，我们的照像馆实在开不下去了，只好关张，一家人在饥饿中挣扎着。

【作者简介】郝式利，1921年出生在平谷县城关镇平街村，17岁起从事照像业。1980年从平谷县马坊供销社退休。

（平谷县政协供稿）

日本侵华的罪证——飞机窝

伍玉堂

在南苑以南，路旁耕地间，现在还散落着五六个小土山状的飞机窝。村童常爬上爬下做“登山”之嬉戏。过往人多是不屑一顾的，间或有陌生者过路则回首以望，也不解其故。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日本侵华战争时留下的飞机窝。

日本侵略者自七七事变以后鲸吞了北平。南苑是北平的南大门，为京畿重要军事基地。日本在以“空中优势”狂轰滥炸进行占领之后，便是巩固“建设”它了。1938年、1939年日寇不断加强它在平津华北的陆军、空军兵力，从1941年开始，在加强南苑军事阵地力量的同时，又在其外围10里之周，增建了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飞机窝，以加强空军实力。

这些飞机窝，约2里地左右即有一个，全部钢筋水泥建筑。其外形如同切去1/4的蘑菇伞覆于地面。小的高约4米，长约24米，宽20米，外壳厚30厘米左右，每个占地约1500平方米。大的高约7米，长45米，宽40米，占地约1800平方米。这些飞机窝上面覆以30多厘米厚的黄土，并种植杂草，以防暴露目标。顶上中间有圆“通气孔”，上修可容一个哨兵的木质结构岗楼，哨兵可四处瞭望，并备有电话。附近有半地上、半地下的水泥小碉堡，约有一小间房子大小，以备存放汽油等物。在各飞机窝之间，筑有石子砂砾跑道，可以起飞降落。

当时修筑这机窝、碉堡，并非日本人投资，而完全是用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的财产血汗堆砌起来的。日寇占领北平后，进行血腥统治，在北平城内强征苛敛，让工商界出资雇工，大商家出5人、10人不等，小商家出3人，再大的工厂、商业就更多了。实际并非让工商业人员自己去构筑工事，而是用从他们身上苛敛来的钱，到农村雇用廉价劳力，或强行摊派农民服劳役。修筑飞机窝时，民工先用土篮挑土，堆成蘑菇状小土山，整平压光，再用水泥去构筑。筑成后，再用土篮一担担地把土从窝内挑出来，就成了飞机窝了。可见当时工程之艰苦。至于日本鬼子在监工时打骂虐待中国民工的事，则更是司空见惯，数不胜数。现在南苑和金星、西红门一带70岁以上的人，对这段历史，都记忆犹新。金星乡小白楼的王连巨，大白楼的曾献同、王珍富都曾服过劳工，挑过土。

现在尚存的飞机窝，红星西红门四队耕地内有一个，金星乡寿保庄沿团河路以东村南、村北各一个，旧宫乡的集贤村东有两个，南苑西南冯玉祥的昭忠祠以南、大白楼以北各有一个。其周围的碉堡有的已拆除，有的还在。这些机窝和碉堡，在国民党执政时也曾使用过，解放以后就废弃了，有的当地农民垒墙加门，改当仓库。近几年来，除极少数利用外，多闲置无用了。但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恶的见证，它们还在静静地提示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段不能忘的历史。

【作者简介】伍玉堂，南苑附近老住户。

王新明整理

（大兴县政协供稿）

■苦　役

我在东北当劳工

李向荣

我今年71岁，是平谷县山东庄乡大北关村人。回想起50多年前我给日本人当劳工时受的苦，遭的罪，我至死也忘不了！唉，那时的苦，我真不知是咋熬过来的。

那是1935年的事。那时我家里很穷，5口之家，只有2亩兔子都不拉屎的山坡薄地，一年到头，糠菜都不能餬口。当时，我在家里是挡硬的人，所以，从16岁就给人家扛活打短工。这年开春，我给平谷一人家弹棉花，干完活后就被辞退了。正在我家揭不开锅的时候，听说招人到天津修飞机场，只要一报名，就先给10元钱，还说路上的开销一切全不用自己花。我们村一下子就有17个人报了名，岳各庄村报名的也有18个。记得是农历三月初七那天，一个人领着我们在平谷城里转悠了半天，由于心里没底，当时我村就跑回去13个人，只剩下郭士录、李柱、郝永朱和我了，加上岳各庄的，我们共22人一起上了路。坐车到三河后，又多了几十人，再到北平，从北平一直坐火车到了天津，在天津集合的共有500多号人。我们由一个中国管事的人领着住进了河北大街客栈。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一下停留了7天。这7天里，500多号人，跑的跑，走的走，还剩下200多。当时我心里也没底，可一

想到家里缺粮断烟火的难劲儿，一心盼望着能到外边挣几个钱捎回家，所以没有跑。到了7天头上，管事的人雇了一个火轮，又从天津给我们买好了干粮。干粮是棒子面的锅饼，用麻袋装着。一看这整麻袋的干粮，我们全傻眼了。这肯定不是在天津修飞机场，不定要把我们送到多远的地方去呢。可想跑也跑不了，管事的人像轰羊一样把我们轰上了火轮，坐了两天两夜，火轮到了营口，停留了两天两夜，再坐上火车，又过两天后，也就是从家走后的第12天头上，我们就到了吉林省通化县七道沟。

这里有一座刚刚开采的露天铁矿，全是荒山秃岭，阴森可怕，离附近的火车线只有25里路，当时已有不少劳工了，有的修道，有的盖房。我们同村4个人正好编在一个班修道，后来又上山挖坡。监工的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我们必须像牛一样低头干，稍一抬头直腰，就被乱棍抽打。吃的是发霉的棒子面窝头，一天三顿，不是苦就是涩。起初说一天给8角钱的满洲票，扣3角伙食费，后来又说一天给1块2，还是扣3角，但始终谁也没摸着钱。住的是临时搭的马架大窝棚，一个窝棚里住120号人，没有床，就在潮湿的地下铺上茅草，裹上自己带的小薄被。我们互相挤成人堆，蜷成个人球，还是冻得直打牙。一直到了秋后，才发了一套破棉衣，布是树皮纤维织的，絮的是飞花，薄的透亮。早上天一麻亮，就吹哨子吃饭，碗放不消停就往工地上轰，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

由于水土不服，吃的是发霉的饭，我们这帮人都闹病了。我当时鼻口流血，止不住，流得我头发迷眼发黑。19岁的郝永朱也病了，他直哭，说再也回不了家了。我当时22岁，还能挺住。最惨的是李柱，他40多岁，水土不服，直拉肚子，人瘦得直不起腰，脸黄得可怕，话都没劲说了。他嘱咐我们如果他死了，一定要把他的骨头捎回家，他当时哭都哭不出眼泪来。才到7月中旬，他就死了，只剩一副皮包骨。我们3个人东拼西凑找来破板子，给

他钉了一个薄棺材，总算把他埋了。那年月真是惨啊，天天都死人，病死的、摔死的、压死的、砸死的。没有同乡、熟人的，死了就往野地里一拽，任凭狼、狗吃，一天到晚乌鸦成群地叫，叫得人发毛。我想，照这样一个个往外抬，不愁几个月，我们几个不全得死在这吗？不行，得活着回去！于是我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一大车，好不容易找来了药，我们几个吃了，这才保住了命。后来，郭士录悄悄动员我说："咱们逃吧！"但我一想起家中老小等着我的钱糊口，就劝他说："再忍一忍吧，年底兴许发钱了，手里有钱再走。"可郭士录实在忍受不了，一天夜里，他拖着大病未好的身子，悄悄地逃走了，也不知是饿死，是病死，还是野兽给吃了，至今下落不明。我们4个人只剩下我和郝永朱了。我们俩一天天地盼，一天天地熬，总算盼到了年底发钱了，可七刨八扣，还得给工头"上供"，整整8个月的时间，才领到30元钱。年关到了，中国工头告诉我们可以回家看看。当时我也想家，但我更想多挣点钱养家，就叫郝永朱给家捎去了20元钱。这年年底岳各庄的18个人也都回去了，以后，他们再也没回来。就这样，平谷县同去的22个人就剩下了我自己。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火车道修好，工房也盖好了，我们搬进了新房。但新房墙上夏天潮得往下直流水，冬天墙上冻冰。我被调到卷扬机旁干活去了。跟机器干活，只要日本人不在，我们就磨洋工，叫机器干转；日本监工的来了，我们就干。我们这个组叫龙昌组，经理是玉田县常楼庄人，这个人还不错，挺护乡亲们的。日本人看工头、经理有时和劳工一心，他们可气坏了，变着法整治中国人。他们上工地时，手里拿一个一米长的小棍，一头安上一个鸡蛋大的铁榔头，整天在工地转悠，看哪个工人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榔头，有的人竟被活活打死，他们则哈哈大笑。穷哥们眼看中国人挨外国人打，那个气呀真不打一处来。有一次，在一个坑道里，一个日本监工手拿电筒，满坑道转悠，正好碰见一

个小伙子在打风钻，这个日本监工从后边上去就是一榔头，小伙子立刻被打得鲜血四溅。他扔下风钻，抄起坑道中的一根木棍就奔日本监工扑去了。监工一看工人红眼了，当时又没有其他日本人在场，他害怕了，转身就跑。小伙子紧追不放。坑道里坑坑洼洼，积满了水，铁轨纵横，日本监工吓得皮鞋都跑丢了。这个组的工人决心不干了，商议着如何干掉这个日本工头。第二天那个日本监工却手提着点心“赔礼”来了。工人一看苗头不对，定是日本人笑里藏刀，于是几天后，这个组的劳工全部跑了。从那以后，日本人整治中国人可就变了手法。他们怕工人罢工或逃跑，没有工人干活他们赚不了钱，就采取软刀子杀人的办法，更加狠毒地吸工人的血。

日本人之间也相互扒皮，他们人人有定额，大官管小官；再向中国工人下指标，完不成任务不许下班，不给饭吃。中国监工也喝我们的血，他们从日本人那里按一人一天2块2毛领工钱，可一天只给我们8毛钱。一车车的矿石，一车车的钱都被日本人拉走了，可劳工的死活他们不闻不问。在机器旁干活，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劳保用品，随时可能发生危险。1936年秋后；我们组玉田县常楼庄一个姓蒋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看轱辘马，不想轱辘拔销了，越滚越快，把小伙子摔出几丈远，摔得脑浆四溅，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了，好端端的一个小伙子成了一摊肉泥。别人给他收尸时，都实在不敢瞅。这年隆冬季节，我们组的一个劳工肋骨摔折了，我送他到30里开外的日本医院去看病。我们坐的是敞篷汽车。那天冷得出奇，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汽车开的又快，道又坑洼不平，时间不长，受伤的劳工就不哼声了。到了医院，我也被冻僵了，经别人拉我，才会站起来。我好容易把受伤的劳工背了下来，连捶带叫，他才有了点气。我扶他进了医院。一个女护士让我们把鞋脱了。但我们的手早被冻僵了，鞋带都解不开，好容易用嘴的热气把手哈软解开鞋带，光脚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草

草给看了病。在医院里，我们看到一个50多岁的武清县的老头，被轱辘马把腿压折，截肢3次，5尺多高的汉子，只剩2尺多长了，最后惨死在日本的医院里。还有一个老头，因有病日本人不给治，活活病死了。离医院半里地有一个埋人沟，横七竖八的躺着死人，缺胳膊短腿的，脑袋裹着药布的，破腹流肠的，实在是没法瞅。从那以后，我夜里时常梦见这些死人，有时吓得出一身冷汗。

谁想，厄运真轮到我头上：腊月里一天，我正上班，轱辘马的钢丝断了，一下就奔我胸前抽来，我躲闪不及，拦腰抽了一下，当时我就疼死过去了。别人把我救活，只见胸前一道紫沟，胸软骨骨折，直到现在，这块骨头尖还支着呢！这下我真害怕啦。为了活命，1937年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我就偷偷地逃了出来。

从1935年三月初七到1937年十二月二十四将近3年的时间，我差点没把命搭上，才挣了100元“满洲票”，可总算活着回了家。

这段经历已过去50多年了，可至今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后怕。那几年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我永辈子忘不了给日本当劳工的悲惨遭遇呀！

【作者简介】李向荣，平谷县山东庄乡大北关村人。

孙郁珍整理

（平谷县政协供稿）

虎口余生记

刘北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在昌平县立乡村师范学校读书。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骨肉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的屠杀。

1939年旧历年底，冀热察区党委调我和陆地同志（女）到区党委办的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由城工部组织部长葛琛同志分配我回敌占区做交通工作。

这时，由于敌人几次“强化治安”，环境逐渐恶化。为了顺利开展工作，我以当小学教师为掩护。半夜以后，才能到妙峰山下事先规定好的地点和从根据地来的交通员接关系。

1942年农历正月初一，天刚一亮，日本侵略军和宪兵就把我们居住的村子包围了。接着有人一边在街上敲着锣，一边走着喊：“各家各户的人都快到大路口集合，皇军来了，谁不去，谁是坏人。”我听到这喊声，赶快把几本没有送出的书塞进炕洞里。当我来到大路口时，只见心怀恐惧的村民正陆续走来。有一个村民因害怕日寇，想逃跑。日寇发现后，立刻把他抓回来，用大木棒没头没脑地毒打，随后又把他拉到村北头的一棵老槐树下枪毙了。时至今日已有50年了，这棵老槐树的树干上还留有圆圆的弹痕，记录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村民来齐后，翻译开始从人群中叫人。被

叫出的人站在一边，其中有村长、保长、甲长、乡丁和两位教师，我也是其中之一，连同从各家搜出来的人共约 20 多人。我们被推到村外，用大卡车拉到南口火车站日寇宪兵队。这里有两间不足 5 平方米的牢房，里面早已装满了从各地抓来的无辜同胞。宪兵把我们分押进两个牢房里，大家挤在一起，日夜只能站立着。审讯时，被审讯的人都要脱光衣服惨遭毒打、警犬咬、坐水牢种种酷刑。幸亏被捕群众一致说两位教师都是好人，因此，我们两位教师没有被审讯。

每到深夜，日本宪兵便从牢房中往外叫人。拉到宪兵队的后门外砍头，每夜都有许多野狗在等着吃人。

我们 20 多人被囚禁了 20 多天，其中有 1 人是我党财粮干部被折磨致死。其他人因给翻译一笔巨款而被释放回家，但因人受折磨，回家后不久，大都也死了。

我被释放后，继续和党接上关系，更加强了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警惕性也更有所提高。然而，不幸还是临到我的头上。1942 年 4 月上旬的一个早晨，南口车站日本宪兵突然把我工作的学校包围，校门口架上了机枪。这时，我正在办公室看党的文件，突然一个陌生人掀开门帘，他看见我在屋里，又放下门帘。这时，我发现有情况，就急忙向门外跑，一个挎枪的日本兵把我拦住。我赶快回到办公室，把文件和有关书籍塞进炕洞里。这时，几个日本宪兵闯进办公室，日本翻译说："你被捕了。"当时给我带上手铐，带到村外早已等着的大卡车上，把我拉到南口火车站日本宪兵队。在车上我断定这次肯定会遭屠杀，我决心以我的个人生命捍卫党的利益。审讯时，任凭敌寇怎么毒打，我始终丝毫未泄露党的秘密。敌寇随后又把我押送到北平沙滩日本宪兵总队。到此以后我才知道，我是因叛徒出卖被捕的。

在北平日本宪兵总队约 1 个多月后，敌寇又把我送到日本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监狱。

1942年8月的一个早晨，日本宪兵把我们同案被捕的政治犯30多人集中到一个类似法庭的大厅里，宣布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谓“罪行”和刑期。我的刑期是3年，最后把我们押送到北平北新桥炮局胡同陆军监狱，钉上几斤重的脚镣，关进中国式的牢房。

1943年农历八月中旬，日寇从这座监狱里提出我和其他约124名青壮年准备押送到日本国做劳工。我们除脚上原有的镣外，又给加上手铐，用绳子捆在一起。随后被押送到塘沽海边上的一座用木板钉的潮湿的木屋子里。敌人给我们卸掉手铐、脚镣并松了绑，然后给我们换上一身单薄的劳工服，每人给一条破棉花织的毯子，把我们像猪一样圈在屋子里。屋外有电网和手拿棍棒的看守人站岗。每天给两顿半熟的玉米面饼子和一碗小鱼汤。在这里等了几天后，又把我们押上一艘从塘沽往日本运煤的轮船，日夜闷坐在不见天日的船舱中。在海上走了近一周，才到了日本下关海港。

在下关下船后，我们又被押运到福岛县境内的一个工地。我们干的活是为熊谷株式会社承修水电站备料和运料，悲惨的劳工生活从此开始了。劳工住的是用木板钉的一排排木屋子，屋子里各有两层矮矮的床铺。每人每天给8两次白面掺稻糠蒸的馒头，分早、中、晚3顿吃，没有菜，只好采野菜吃。随着这里的气候逐渐变冷，我们那身单薄的劳工服挡不住寒冷的侵袭。为了防寒，有的劳工把发的用破棉花织的毯子围在身上，有的把装水泥的纸袋捡起来围在身上。没有鞋就捡起草绳缠绕在脚上当鞋穿。每天从早到晚做着扛木头、背水泥、筛沙子、运石子等超体力的劳动。日本监工看见谁稍怠慢便用木棒乱打。有一次几个劳工饿极了，偷偷到工地附近的日本农家讨一点吃的。监工发现后，把这几个人绑在树干上，用棍子狠狠毒打，最后又把他们关到野外的空房子里活活饿死了。

在福岛县工地劳动了3个多月后，又把我们调到长野县的今

柯事务所工地劳动，仍然是为修水电站备料运料。不久，又来了约一百八九十从中国河北省抓来的劳工，大都是农民，他们被编成一个中队和我们一起劳动。我们由于来的时间长，营养不足，除4人外，都患了夜盲症。每天晚上日本警察点名时，都要由4个视力好的人帮助排好队点名报数。长期营养不足，劳动过度，不能洗澡和换衣服，华工们除患夜盲症外还患肠炎、伤寒病，长了满身的疥疮，无医无药，三天两头死人。每死一位难友，我们心中都非常难过，但看管我们的日本监工却说："中国人大大的，死了死了的没关系！"人死了，便装进一个小木匣，由身体较好的劳工抬到火葬场去烧。为了照顾患病的难友，每天出工前，我们先给病号打桶凉水放在他的床前，以便渴时能喝到水。晚上收工回来时，我们从山上采些野葡萄秧给病号当水果吃，开开口味。

有时，我们还同被俘英美军在一起劳动，但不准互相谈话。因此，和他们见面时，只相互间眨巴眨巴眼睛以表示互相同情。

1945年初，日寇又调我们去北海道置户水银矿山事务所劳动，途中死了两个劳工。押送我们的日本人不准将死人送下车船，我们只好一直和死人在一起。

北海道置户水银矿山在一座大森林里，这里的生活就更惨了，连掺稻糠的馒头也吃不着了，而改为每顿2两用土豆面蒸的窝窝头。每天从日出到日落都被迫去挖水银矿土。劳工们陷入极度的失望中。

为鼓舞难友不要丧失回祖国的信心，我们暗暗对他们说，德国希特勒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就完蛋了，我们就可以回国。我们还暗中商量，如果英美联军在日本登陆，我们便去警察所夺枪，组织暴动，配合英美联军作战。我们从捡到的日本报纸上看到，美军已在台湾登陆。

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宣传和打算被在劳工中的汉奸特务报告给日本监工和警察了。1945年7月末的一天晚饭后，日本宪兵

和警察闯进劳工营，.按着汉奸特务提供的黑名单抓走了十几个劳工，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日寇从我国冀中抗日根据地捕去的县区党政干部，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晚我们就被狠狠地毒打一顿，之后捆送到野外的一间民房里。次日一清早警察用大卡车把我们拉到北海道海岸附近的宪兵队。在这里每天只给一顿饭吃，审讯时，不问青红皂白只是轮流挨打，最后决定将我们处死。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投降了，我们又被送回劳工营。战争结束后，我们才恢复了自由，结束了两年多悲惨的劳工生活，回到祖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并继续为党工作。

【作者简介】刘北海，昌平县流村乡人，教师。1991年病逝。

（昌平县政协供稿）

苦难的岁月

董汝民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摧残。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镇压更为猖獗。为了解决侵略战争造成的兵源困乏以及国内劳力不足，摆脱经济困境，他们在中国到处抓壮丁、劳工。有的押送到我国东北煤窑，多数送往日本，从事非人的劳动。我不幸被抓到日本北海道下芦别，在死亡线上挣扎了2年多。

抓 劳 工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实行“铁壁合围”，反复“清剿”，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大“扫荡”时，我是亲身经历者。当时绝大多数群众，舍弃家园，带着全家妻儿老小流浪在外。有的在寒冷的野外挖个大坑住在里面。“扫荡”过后，人们刚刚从野外搬回家中，伪政府就开始抓劳工。

我是河北省清苑县史家桥村人。7月的一天早晨，我村汉奸伪联保主任王展武、伪保长郭温等人以派夫役为名，将我和姜兴齐、李富、宋合等4人送到石家桥大编乡伪政府。而后，日伪军把我们这批人像押送俘虏似地送到保定城隍庙街清苑县伪政府特务队的东院集中点。

那里没有宿舍，光溜溜的大敞院，到了晚上大家像牛群似地拥挤在一起。院子周围岗哨林立，不许家人探望、送饭，完全与外界隔绝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听到了消息，被抓的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夫役，而是要送往日本当劳工。人们非常惊恐，一些人在墙角处相互依靠着小声呻吟，后来痛哭，继而绝望和愤怒。在那炎热的伏天里，人们横七竖八地躺着，吃不下饭，只是大口大口的喝凉水。当时大家都在想如何逃命。

3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180余人被押到保定西大街。大家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个个双手搭在前边人的肩上。周围全是日本兵和伪保安队，日本兵端着上有刺刀的三八大盖枪，嘴里不停地嚎叫着："快快的！快快的走！"伪军手拿四棱大木棒，也学着日本兵的声音叫喊着："快快的走！"还挥着大棒说："找他妈的洋揍！"一声声的吼叫和枪托、木棒"啪嗒啪嗒"的声音，以及劳工们的"妈呀、妈呀"的惨叫声混在一起。大街上的行人见鬼子兵张牙舞爪、穷凶极恶，个个惊恐万状，急忙躲进了店铺和幽深的小巷里。

这天下午，保定火车站的西站台上静得很，没有亲人，没有欢笑，只有仇恨和满腔怒火。我们被枪托和木棒送进了车厢。车轮转动了，火车出了站台，只听"咕嗵咕嗵"的响声，原来有人跳车。火车速度加快了，劳工们也急了。先后有十余人从车窗跳下去，对跳车的劳工，日本兵开始用步枪瞄射，劳工们还是继续不要命地往下跳，只听有个日本军官"哇呀"叫了一声，接着步枪机枪一齐疯狂地扫射。即使这样，还有人继续跳车。在我们身边有个姓崔的小伙子，他在跳车的同时大喊着："乡亲们！咱们下世再见吧！"随着叫喊声，他钻出了车窗。由于没有经验，又过于紧张，他的一只脚挂在了窗口，带得风呜呜作响，叫人发瘆。这个人被活活摔死了。车厢里的劳工一阵混乱。见人们都红了眼，鬼子队长下了命令："死啦死啦的没关系！"伪军扬起木棒见人就打，

鬼子兵端着带刺刀的三八大盖枪大声嚎叫，人们都被打得趴在地板上，后来又被迫倒背手趴着。敌人这样还不放心，又把我们一个个塞进座位底下，稍一动弹，不是挨枪托，就是挨木棒。这一趴就是八九个小时。第二天天亮才知道到了天津大沽口劳工集中营转运站。那年，我才 18 岁。

大沽口集中营

到了大沽口火车站，在车厢里趴了一夜的劳工们，没有吃饭，也没有水喝。下火车时，不用说走路，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鬼子兵和狗汉奸手里的棍棒像雨点般地打在劳工的身上。劳工们趔趔趄趄地被驱赶着走进了一个大敞棚。人们歪倒在地，默默地喘着粗气，只听到苍蝇嗡嗡的叫声。劳工们面如黄纸，一个个眼泡红肿着，布满了血丝。

我们在敞棚里喘息未定，鬼子兵、伪军又如狼似虎地冲了进来，让我们把衣服脱得一干二净，把仅有的一点点钱物通通搜走，赤身去另一个棚子里换衣服。日伪军用大木棒点着数，我们都一瘸一拐地小跑着，心想：一切都完了。我们都换上了青一色黑色囚服。

大沽口劳工转运站建在一块茫茫大海滩上，由于海洋性气候的影响，经常雾气沼沼。这里没有鸡啼，没有乡村的炊烟，只有无数日伪军的岗哨像幽魂一样在海滩上来回游荡。集中营关押的数千名劳工，隔几天就运往日本一批。

为了防止劳工逃跑，日寇一是让我们换上青一色的囚服，二是实行饥饿政策，每人每天只发给 4 个发了霉的杂合面蒸饼子，一块老咸菜，下午供一次从江里挑来的咸水喝。人们见到水，蜂拥而上，由于人多拥挤，多数人喝不到水。在那七八月的天气里，太阳一露面火辣辣地烤人，隐入云层，闷得蒸人，只有下雨天好受些。我们这些庄稼人，头一次尝到挨渴的滋味，所以也不管苍蝇、

蛆虫，还是沉渣漂浮，见到水用手拨拉拨拉就捧着喝。由于饥饿，加上喝脏水，不少人患了肠炎、痢疾等症，处处可见躺着的活人。到了晚上蚊虫嗡嗡叫汇成了一个声，让人无法入睡。那时只要见到病人身上爬满苍蝇，日伪军不管是死是活，抬起来就走，扔进大河里喂鱼。我亲眼看见，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平均每天都有二三十个劳工顺水东流，葬身鱼腹。

我也是差一点喂鱼的。我们到集中营的时候，由于七八天的折磨、摧残，我又抢不到水喝，渴得要命。一天下午，姜兴齐抢水时有意把衣服沾湿，回来拧给我一口水喝。我嗓子眼冒火，嘴唇干裂，头晕眼黑，心想：没水喝，比没有饭吃厉害得多，这样，怎么能活下去呢？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去河边找水。白天岗哨林立不能去，耐心等到天黑吧。好不容易等到了天黑，我跟老乡姜兴齐、宋合商量，去河边找水。他俩同情地说："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但我们也听说，常有人去河边找水喝，被乱枪打死，太危险。"我擦着干涩的眼睛，嘶哑着嗓子哭泣着，用手拉他俩的双臂，晃荡着身躯央求说："我快要渴死了，你们就这样看着我死吗？"他们看我这十几岁的孩子实在可怜，沉默了一会儿，姜兴齐轻轻地说："我比你大几岁，论乡亲我是你大哥，你有了难处，我能不管吗？况且咱们出门在外，谁是亲人？"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俩发誓说："咱们虽说不是亲兄弟，但我们比亲兄弟都亲哪，我们死也死在一起！"最后决定冒险找水。

集中营外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日伪军岗哨。我们偷偷钻出了工棚，在草地里步行一段后，又贴在地上爬，肚皮都磨破了，爬到半路上，我突然觉得头轰的一下就不省人事了。他俩见我不动了，围在我身边小声叫着："小董！醒醒。"待我苏醒之后，又继续爬。到河边了，看了看左右没有动静，我用捡到的半个钢盔，一连喝了三半下，当时觉得心里很痛快，真解渴，本想往回带些水，以备再用，可惜没有家什。我们轮换着喝完水，在返回的路上，肚

子胀得可受不了啦。待我们爬到距工棚不远的地方，就再也爬不动了。老宋、老姜好不容易把我架回了工棚。我肚子胀得像鼓，疼痛难忍，他们给我揉肚子、抠嘴，想办法使我呕吐、泄肚，但都无济于事。我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时已经是深夜了，肚子突然咕咕地叫起来，随后就是泄肚不止。我不愿打扰别人，自己爬出了工棚，在泥浆里半卧着，不能动弹。后来乡亲们醒来见我还没有回工棚，老姜就带人找到我，把我抬回工棚，但我还是渴得难熬，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宋合忽然想了个好主意，把地上挖了个小坑，把坑里的脏水过滤一下，给我泡饼子吃。当时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流食”了。就这样，在乡亲们的精心照料下，我一连躺了五六天，病情有了好转，能站起来了，熬过了喂鱼的这一关。

海上冤魂

8月的一天上午，听大家议论着，我们这批人要送日本了，说重病号一个也不要，怕给他们找麻烦。我在工棚旮旯躺卧着，暗暗地想着：刚刚熬过喂鱼关，要是留在这茫茫的海滩，甭说我这个病号，好人也得饿死病死。大家都担心我怎么办，苦苦地想着办法。

上轮船那天，我心里没有底，强打精神迈着沉重的步子。几位乡亲把我夹在中间，我缩着头，生怕被查出来。随着乱哄哄的人流，我也被裹上了轮船的甲板。一声长笛，轮船开动了，劳工们望着渐渐远去的国土，生离死别的家乡，一个个低下了头，自言自语地磨叨着：我的家乡啊！祖国啊！我的母亲，虽然离开了您，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当时，有不少的人都哭了。

我们从大沽口劳工集中营转运站到日本下关的3天里，每人每天只发给两茶碗爆玉米花、一块咸菜，渴了喝凉水。吃完了爆米花，就啃咸菜。有病的人在呻吟，无病的人也饿得哼哼，分不

清那个是病号。因此，轮船中常常死人，每死一个人都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和恐惧。我亲眼看到前后有4名劳工病号被捆在装有沙石的麻袋上，扔进了大海。使我记忆最深的有一个姓刘的大个子，30岁左右，是一个穷苦的工人，他那消瘦的方脸上，长着浓眉大眼，后来才知道他是在保定大街上排队买混合面时被抓的劳工。原来他身体很粗壮，在大沽口因缺食少水，染上了肠炎。上轮船的第2天，他终于躺倒了。当乡亲们围着看他的时候，他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我还能活吗？救救我吧，我家上有72岁的老娘，下有妻儿老小，我的儿子刚3岁啊！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养活啊……"船上的日本人都躲得远远的，也不给他药吃，反而强迫人们把大刘从船舱抬上甲板。可怜的大刘还在不断呻吟着，嘴里还在叨叨着什么，日本人就让把装有沙石的麻袋捆绑在大刘的背上，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里。劳工们耳闻目睹这一幕幕的惨剧，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我更是惊恐万状，提心吊胆，心里总是在想：说不定下一个扔进大海的就是我了！我越想越难过，就像做梦似的。

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们在轮船上度过了3天3夜，到达了日本国的下关，转火车途经东京、涵馆等地到达了北海道的下芦别。河北、河南两地劳工共800多人，住在一个大山洼里。从此，我们又向地狱迈进了一步。

劳工们每天只给半斤橡子面吃，说是面，实际还不如猪饲料，日本工头还千方百计克扣。亲日派大队长马德山讲："大日本帝国太君说了，我们是劳工，苦劳的干活。我们是给日本国干活来了，日中亲善，大日本打了几年仗，粮食缺少。一天给我们半斤粮食，日本国民也不多，我们应该够吃。"真是一副典型的奴才相，令人憎恶。

我国的山里人过去把橡子当作猪饲料。我们吃的这类橡子面，虽然加上了玉米面，但还是苦得发涩，多数人吃下后胃痛、泻肚，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还是维持生命的唯一希望，所以人们吃饭的时候，总是吃得慢一点。大家给橡子面饽饽起了个绰号——“洋点心”。

严酷的环境，苦涩的橡子面，使病号急剧增加。我的肠炎病越来越重了，连那点“洋点心”也吃不下去了。日本工头把我们8个重病号判了死刑关进一个偏僻的小房子里，进行所谓的隔离治疗。我们个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没有一个能站起来走路的。

一天早晨，工友吴小春突然搂住我的大腿声音微弱地对我说：“我的亲兄弟呀！日本鬼子可把咱们给治苦了，这是成心不让咱们活下去呀！日本帝国主义拿我们不当人看待。我今年刚刚20岁……”他上气不接下气越说声音越小，全身还哆哆嗦嗦的，我看着非常难过。他闭着双眼，无力地叫着：“娘！您养我一场，我没有报答您什么，我见不到您啦……”他的嘴角动了动，闭上了眼睛。我们活着的7个人，不由得紧围在一起。我紧紧抱住小春的头，瞪着我那干瘪的眼睛，使尽全身的力气叫着：“小春啊！小春——你再睁开眼睛看看你的老乡吧！”可是他已经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对敌人的仇恨，永远离开了人世。仅仅七八天的时间里，其他的6位工友也陆续死去。他们的尸体装入白白的木箱，送入下芦别火化场。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

我在那空荡荡的恐怖的小屋里，爬来爬去，整天胡想，想来想去又睡着了。有一次睡梦中梦见自己死了，醒来后，惊出一身冷汗，才知道自己在做梦，看了看屋子里没有任何人，周围也没有任何动静。只觉得两耳呜呜作响，不自觉地摸摸胳膊，皮包着骨头；摸摸肚皮，瘦瘦的，饿的前心贴着后心；摸摸大腿，又瘦又长。为了熬过那漫长的昼夜，我想着家乡的亲人，也极力追忆着往事：曾记得13岁那年，娘外出讨饭，讨来稀的自己吃，省下

干粮给我吃。那一小块一小块的各样干粮，回忆着它的香味，也怀念着我慈祥的母亲。我又想起了给地主扛长活时，一顿饭吃16个窝头，吃饱了饭劲头可大啦，双手搬碌碡，那时人们叫我大力士。想来想去，好像自己又有了劲似的，不由得爬了几下，但也没爬起来。我长叹了一口气：咳！普天下再也没有比我苦的人了。我给自己打着问号，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

我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我们老乡宋合给劳工做饭，吃饭随便些，他宁可多喝稀汤，把节省下来的干粮，偷偷地送给我吃。他还经常叮嘱我，要活下去，以后会有好日子过。听了他的话，我很受启发，觉得自己还年轻，挺得住。有时腹痛、头疼、渴饿交加，也不悲观，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

索命的严冬

北海道的下芦别，位于日本的西北部山区。夏秋时节经常阴雨连绵，雾气沼沼不见天日，人们穿的衣服每天都水淋淋的。最可怕最难熬的就是那朔风刺骨的严冬。进入10月份了，劳工们御寒的还是那两套再生布单衣，脚上穿的露大脚趾的胶鞋（大家都叫它“丫巴鞋”），一顶挂电池灯的单帽，两条旧棉毯。这就是劳工们的全部家当了。住地在距煤窑20多里的山沟里，工时每天长达十五六小时。劳工们饥不择食，特别是在夏季里，什么野葱、野蒜、野果、山葡萄叶等，只要能入口的东西，抓起来就吃。

煤窑里水滴滴嗒嗒往下流，衣服湿了没有替换，一出窑口立刻结成冰甲，矿灯帽下面是两块棉毯片护耳，冻结后，就像两把扇子，风一吹，呱嗒呱嗒地作响，扇得两耳生疼。两条棉毯成了宝物，它既是被褥，又是全身的衣服。两脚两腿全缠的是烂布条和草绳、草袋子片，行动带风，走在山间小路上嘎吱嘎吱乱响。难熬的十几个小时过后，人们又困又累又饿，浑身散了架似的，还要走20多里坎坷不平的山路。山高，坡陡，路滑，一不小心，滚

下悬崖陡坡，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若不相互救助，只有冻饿而死。

上下班途经的7座山坡，最让人望而生畏，其中1处“望鬼台”，3处“独木桥”。“望鬼台”位于山间羊肠小道儿上的制高点，坡陡八九十度，涧深100余米。我知道，这个地方先后有两人被摔死，60余人被摔伤，上下班时，谁先到“望鬼台”，都要胆战心惊。“独木桥”就是把四五厘米的木板，纵连在一起架在深沟上的简易桥，夏天还可以走，一到冬天，就比较难了。桥上结冰，水沟积雪往往有四五米深，人若掉下去，就会砸成一个雪井，如果无力爬上沟沿，只能坐以待毙。

1944年底的一天，我下夜班，从煤窑走出洞口，冻得我瑟瑟发抖，没有搭上下山的工友，害怕一人下山不保险，我又跑回了窑洞，想在窑洞里暖和会儿，天亮搭伴再走。谁知刚进去不久，就被日本工头连打带骂地轰了出来。当时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寒风刺骨，无处躲藏。我踱来踱去，无可奈何，只好下山。这时天还没有亮，我找到两根木棍，又在脚下缠了些草绳，吃了两口白雪，稍微镇静了一下，提起木棍就下山了。我上山就爬，下山就滑，在“望鬼台”幸而脱险，而在“独木桥”却又险些丧生。在独木桥前，我两眼一阵阵发黑，两腿发软；脚上的草绳冻成了冰碴子，更使我发怵。我不大自然地弯下腰，长叹一口气，趴在“独木桥”上，一手拨雪，一手按住木板，哆哆嗦嗦地往前爬，20多米长的桥，足足爬了十几分种，眼看就要到对面沟沿了，南山坡突然轰地一声，积雪塌方了，铺天盖地的雪团落在我不远的地方，惊恐中我身体失去了平衡，一打晃掉进了深沟。

雪是白白的，松软的，从几十米高掉下去，砸出一个七八尺深的坑，幸而没有受伤。这时我想起老人们说的，无论遇到多冷的天气和恶劣的环境，只要身体不停的活动就有救儿。因此，我就用木棍不停地扒拉雪块，踩在脚下，我刨啊刨啊，总算坑口变

大了，天地开阔了。可是，全身一点儿劲也没有了。这时，我朦朦胧胧地听到远处有嚓嚓地脚步声。熟悉的河北、河南口音越走越近。顿时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我用了最大的劲喊了一声："老乡们！来救救我吧！我是177号。"第一个答话的是一位河南劳工，随后何老头、史雨子等七八名劳工迅速过来，绕道来到我的身边，把我拖上深沟。他们有的解下御寒的草袋片，有的把披着的破棉毯给我裹上，轮流着拉呀抬呀，把我运回了住地。由于工友们的百般体贴照料，几小时后，我得救了。现在回想起来，假如没有遇到工友，没有劳工们的阶级深情，说不定我早就死了。全国解放后，当我们集在一起回首往事时，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苦，流不尽的泪。

劳工的血泪仇

1944年12月份，在下芦别劳工大院发生了一起迫害劳工的骇人听闻事件。一天早上，老乡姜兴齐在上工时，把发给他的午饭——两个橡子面馒头零着吃了，到下班时已经是一天没有吃东西，完工后勉强走回住地，饿得他上气不接下气了，正想出去找点吃的，见到伙房刚下屉的馒头，伸手抓起两个，几口就吞食下去了。此事被日本工头"大洋马"知道了，他连夜把全体劳工召集到劳工大院，站在墙根雪地里，七八个日本人把老姜拉到院中，把他的衣服扒光，强迫他跪在2尺多深的雪地上。"大洋马"狞笑着审问："你的米吸（吃）大大的顶好？"姜兴齐牙咬得咯咯直响，哆哆嗦嗦地手指着肚子说："我…我…我饿呀。"后来见到他的嘴直动，却说不出话来。劳工们目睹同伴受尽侮辱，都感到无比愤怒和难过。几百名劳工不谋而合地用嘶哑的声音为其求情："饶了179号吧！"见老姜不能说话了，"大洋马"令一个日本工头手持树条狠狠地抽打他，逼老姜在院子里跑着转圈，其他的日本人用铁锹往他身上扬雪取乐，院内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的狂笑。开始老姜

身上冒着热气，跑着跑着，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看了这惨不忍睹的场景，年岁大的劳工小声议论着："他们真没有人性！"狠心的豺狼们，见老姜已经休克了，让人把老姜抬到浴池暖和，待他苏醒后，又弄回雪地驱赶，扬雪取乐，连续折磨两次。最后，他再也爬不起来了。后来经过大家的照料，才活下来，但从此得了严重的关节炎病，有时连身都不能翻。在我们的护理下，他后来能架拐走了。就在姜兴齐能扔下拐杖走路的时候，汉奸大队长马德山（外号马二阎王），按照"大洋马"的旨意，硬逼他下煤窑干活，马二阎王说："太君说了，你不是好人，是小偷的干活，不下窑不给饭吃。"无耐，他只好拄上单拐，一瘸一拐地上山了。他每天早去晚归，累得死去活来，非常可怜。在他下井干活的第7天，煤窑突然塌方，工友们随跑随喊："塌方了！快跑！"腿脚灵便的都躲开了，姜兴齐也听得清清楚楚，但他无力迅速躲开，下半身压在了一块岩石下，砸成粉碎性骨折，医务所只简单包扎一下，给了点止疼药片，让人把他抬回了住地，放到了一个偏僻小屋里了事。除当炊事员的老乡宋合按规定一天送顿饭外，再也没有人管他。

老姜被砸伤以后，疼痛难忍，不能动弹，每天躺在屋里爹呀妈呀地哭叫，只有我们几个老乡，每天下工后去看他，给他端水，送饭，清理床铺，给他翻身，背去上厕所。他每天见到我们的时候，都大哭不止。泪水哭干了，谁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含着眼泪，也不敢当着他的面哭出声来。他咬着牙，声音嘶哑地断断续续地说："我的一切都完了，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我有国不能靠，有家不能回，我总想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报我一箭之仇，现在连拚命的力量也没有了，我这次算完了，给我找把刀子，快点叫我死了吧！"大家知道他不行了，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耐心地劝说他，给他聊家常，开导他："你虽然一条腿坏了，可你是个手巧的人，回家后还可以干点坐着的活，千万

不要走绝路。”谈到他的妻子儿女，特别讲到他儿子姜国玺，大家说，说不定咱们家乡的共产党八路军已经胜利了，也许你儿子姜国玺已经当了八路军的首长了。待日本投降后，我们回到祖国，你家的孙子也会叫爷爷了。咱们套上你家的小驴车，去保定痛痛快快地逛它几天。可是，精神治疗，只能起到暂时作用，是治不了病的。他的伤腿一天比一天严重，伤口流着紫红的脓水，纱布已变成了一块紫黑的铁板。他抱着自己的大腿，咧着大嘴叫着："你们快叫我死了吧！死了就不受罪了，我的亲人啊！"

我们多次去找汉奸马大队长，要求给予治疗，他答应请示日本工头。日本工头也知道老姜是已经"判了死刑"的人了，一直置之不理。没有医药，没有护理，没有营养，老姜的伤口一天天恶化，疼痛难忍，不时出现昏迷。

一天，我下班后去看他，一进门就觉得和往常不同。老姜死死盯住我，后来他突然拉住我的手无力地对我说："你哥哥我不行了，你若能回国的话，替我告诉我的儿子和所有的中国人，叫他们忠于共产党，参加八路军，团结起来，狠狠地打日本鬼子那狗娘养的，宁死不当亡国奴啊！"我俩悲愤交加，哭做一团。突然，一只大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严厉地说："177号，不能叫老姜太难过了，他身体顶不住啊！要多安慰他。"待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李老头和史雨子等人。李老头看到我俩泪人似的，他也老泪纵横了，后来也止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并大骂道："狗娘养的小日本鬼子，我们劳工不如煤窑上拉斗车的牛马。我们一天也没有吃过饱饭啊！他妈的，干活不给饭吃，工伤不给治疗，还有一点人性吗？"后来李老头把我叫到外边小声说："老姜是不行了，我们还要活着。咱们一天不上班也不行。"这天，我们很晚才离去。

第二天上午，在劳工的一再要求下，日本工头才答应把老姜送下芦别一家医疗部门。临去前，老姜已经奄奄一息。据抬送老姜的劳工们说：我们往外抬他的时候，他的腿已经烂了，脓血流

了一地，臭气熏人。一路上也未听到他喊叫，我们把他直接抬到医院里的手术台上。名曰截肢，实为屠杀。姜兴齐很快就入了火化场。当我们下班回来，打听老姜消息的时候，竟是见到一个白花花的木板骨灰盒。我大哭一场，久久难离。姜兴齐死得太惨了。每当我回忆起死去的劳工，总是不由得一阵阵心酸，一串串热泪。

愤怒的烈火

我们每天在窑里干活十几小时，不是打眼、放炮，就是推斗子车、下顶木，累得死去活来。即使这样，日本人还嫌从我们身上榨得血汗不够。为了严格控制劳工，每三五人一班，必有一个日本工头监工。这些监工一不顺心，不是拳打脚踢，就是镐把钢钎痛打，劳工们整天吓得哆哆嗦嗦的，不敢抬头直腰。每当从煤窑里出来，都是抱着膀，弯着腰，个个跟木桩子一样，只有眼珠转动和双腿移动时，才使人感到是一个活人。

一天，我下工后，在路边拔野菜吃，被那“大洋马”看见了。他见我吞食野菜，就瞪着双眼问道：“米吸（吃）米吸的有！”我想：你们不给饭吃，吃点野菜充饥，我也没偷没摸，还有什么不对的？于是我没有好气地絮叨着：“你们有大米白面吃，我愿吃这些东西。”他虽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从表情上也能看出我掩饰不住的怒火。他那马脸拉得很长，咬着牙，把我摔倒，抡起手中的木棍，没头没脑地打了我一通。一面打一面“依里哇啦”地吼叫着，打得我鼻青脸肿。

我有肠炎病始终没有痊愈，时好时坏，同时又染上了疥疮。一天，肠炎病又发作了，一夜吐泻不止，全身无力。请假也不准，就这样一歪一斜地上工了，恰巧这天又赶上日本工头“四眼活阎王”（通称“小眼镜”）带班，他叫大家扛木板子，我一听就傻眼了。我走向木板堆，摸摸那厚厚的木板，块块都死沉死沉的。工友们怕挨打很快扛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呆呆地发愁，找

人帮忙吧，早已没人了，我强打精神，使尽全力，好不容易扛起一块。“小眼镜”早就盯上了我，我踉踉跄跄地走着，他嫌我走得太慢，一面狂叫，一面不时地用硬木棍打着我的右肩，打我的身上，还打我的脑袋。这时我无限的怒火涌上心头，但又尽力忍耐着。我想：若不叫我活下去，你也甭想活，等机会你我一块去见阎王爷。我下了决心，等待时机。好不容易接近“望鬼台”了，他的木棍还在不停地打在我的头上，这时我咬紧牙关，憋足了劲儿，猛一晃身，将木板向“小眼镜”砸去。很遗憾，他一躲躲过去，木板滑到坡下，我就势闭眼抱头滚下七八十米的陡坡。

当我昏昏沉沉往下滚的瞬间，隐隐约约地听到工友们在喊：“老乡啊，可不能这么死啊，这么死太冤枉了！”后来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苏醒后，山沟里没有一个人，只有呼呼的山风和皑皑的白雪。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听到脚步声音。老乡大李富带着工友绕山来搭救我，边找边大声喊着：“177号！你在哪里？”我虽然听到了喊声，但无力答话。他们踏着1尺多深的积雪，吵吵嚷嚷地四处寻找，当小魏（此人是180号，保定城里人）发现我后，立即把我抱在怀里。我睁眼一看，周围积雪溶化了不少，衣服全湿了。大家来到我跟前，问长问短，我只是无力地点着头。

工友们轮流背我，前边背着，后边搭着我的脚。他们亲切地问我：“摔坏了没有，好点了吗？”尽管有的面孔很陌生，但那一双双深情的眼睛，使我深深体会到还是中国人好，还是骨肉同胞亲。

工友们绕过弯曲的小路，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我背回工地。这时“小眼镜”又回来了，他举着木棍把工友们打散，嘴还不停地“哇啦哇啦”地怪叫，我迷迷糊糊地见他走近我，接着就觉得热乎乎的鲜血流到我脸上，眼一阵发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醒来后，工友们把我搀到住地。“小眼镜”已告诉了“大洋马”，晚上

不给饭吃，只让喝两碗米汤。我头部和全身满是伤痕，不能上班了。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多残酷，只要能活下去，我决不死去。为了活下去，我到处找野菜、瓜皮，还吃臭沟里的菜叶、鱼头等物，夜里还摸到日本库房里去吃干大米、咸菜、生倭瓜。有天晚上，我打开木门，进入日本库房，黑乎乎没有摸到别的吃的，只找到一个老倭瓜，我搬到外边，狼吞虎咽地全吃了。我整天爬呀转呀，到处找食物吃。工友们吃饭时还把仅有的那点口粮紧出些给我吃。我记忆较深的一次是向朝鲜的劳工要过米饭吃，数量虽少，但比金子还重要啊。日本工头想把我饿死、折磨死，但是我有顽强的毅力，坚强的信念，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我要活着回到我可爱的祖国，返回家乡和家人团聚，重见光明。

历 史 的 见 证

在2年多当劳工的苦难岁月里，80%的人都染有肠炎、疥疮病。此外，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累累的伤疤。我身上最明显的伤痕就有十几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国人民的罪证。下芦别的严寒冬季，劳工们的腿上脚上，都缠着烂纸片、草袋子片等，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一歪一斜，好像一群残废了的老头。

冬天，我们的手脚经常冻得失去知觉，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围在一起烤堆火，只觉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无奈只得不停地原地踏步。有人把脚伸入火堆，当时不觉热，恢复知觉后，疼得人们含着眼泪跳着脚蹦，又把腿伸向雪堆里。所以，劳工身上的冻伤、烧伤不断出现。日本工头经常打人打得死去活来。工地不断发生工伤、死人事故。每个劳工的身上，都有各种不同的伤疤。

在下芦别有3个国家的劳工。美国的劳工，最少有2000余人，劳动时由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看押；朝鲜的劳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管理较松的劳工，劳动比较随便；一种管理得较严，和中国的

劳工相似，劳动时由日本工头监督，跟中国劳工不一样的地方是：一到夏天，可以赤身露体，大多数人前后胸和胳膊均有刺字或龙马图像符号，个别的还有刺在头面部上。

中国劳工连牛马都不如，连叫个名字的权利都没有，在2年多的生活中，人们只知道我是177号，很少人知道我的名字。在下芦别死难的100多人中，饮恨长眠的中国人多数不知道名字，更不知道他们的家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史，是永远也抹杀不了的。

中国人民的胜利

难忘的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8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中国劳工居住在偏僻的山沟里，消息闭塞，我们每天还在下窑干活。一天，我们发现日本带班的工头明显减少了，特别是过去打骂劳工最厉害的“小眼镜”一类的日本工头儿几天不见了，留下来的工头也不像过去那么神气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们还蒙在鼓里。有个劳工问那人称“老笃”的日本小工头，他只是伸出大拇指，不好意思地说：“希那（中国）的大大的”，后又伸出小拇指说：“尼宏（日本）的小小的，你的太君的。”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全大队，大家分析，可能是日本投降了。

一天，工头们突然逃之夭夭，一个也不见了。大家还和往常一样干活，中午休息时，在工地相互串通议论、猜测着。下午基本没有干活，很早就下班了。回到住地一看，劳工总管“大洋马”也不见了。从此，大家也不去劳动了，聚集在劳工大院里，仨一群、俩一伙地谈论着国家大事。有的在地上躺卧着，有的架着双拐，也敢到大院里来转了，有的扶着木板墙走动着，有的哼着曲。大院里乱哄哄的，大家就像刚出笼的小鸟，表现出那种初见天日的喜悦，真是解放了！这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入睡，还有的

一夜未眠。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有部分劳工起床。他们敲着饭盒，敲着铁桶，奏起胜利的乐曲，唱起胜利的凯歌。后来大家找到炊事班孙田，让他把日本人禁止我们吃的食物都拿出来，来一次胜利会餐。班长栾明勤喊道："我们每人倒一碗米汤，以汤当酒，以面片当菜，为了庆祝我们的自由和祖国的胜利干杯！"当时的场面热闹极了。这天天气特别明朗，是几年来没有过的。大家吃完早饭，又聚集在大院里。大概是10点左右，从外地来了几个中国人，他们操着山东口音，向劳工队部走去。不少劳工也随后跟了过去，他们通报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胜利的消息。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掌声雷动。劳工们的脸上个个浮现出了笑容。大家蹦呀、跳呀，我们河北的劳工，还情不自尽地唱起了歌曲。

大家高兴之余，尽情地谈论我们还在异国他乡，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而且，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吃的、穿的，摘掉紧箍咒，保住生命，达到回国的目的。这样，大家自然想到的是选出带头人。有个工友提出一个姓王的胖子，另一个人说，这个人行，他当过八路军，可能是共产党员，大家越议越欢，人越集越多，群众自发起来了，七嘴八舌地嚷嚷着。后来议题转向了大队长马德山，控诉他亲日派的罪行和打骂劳工的问题。一个小伙子转身把马德山拉到大院，劳工们你一言我一语控诉和揭发他的罪行，他像一只落水狗向大家作揖求饶，连连认罪。

后来选出王胖子为劳工队的头头，大家把王胖子请来。他也提出几个助手，大家都表示同意。接着就派人出去串联，了解情况，知道美国的劳工很快回国了。中朝劳工还没有人理睬，我们吃的仍然是橡子面，生活在苦难之中。两国劳工不谋而合地组织起来，每天在矿办事机关门口要求解决吃、穿、住的问题。日本矿工头头看形势不好，有的隐蔽了，几天不露面。劳工们在第二"安全坑"办公机关门口整天吵吵嚷嚷，有不少日本人在那看热闹。

第四天发生了一场震动下芦别的几千人的异国人的武斗流血事件，死伤十余人。

由于受到非人待遇，中国劳工前后死伤2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我们这些劳工，为日本凿了两座煤窑，生产出来的煤堆积如山。但是，每月发给我们的日本纸币总共不过3元钱。

回到久别的祖国

经过劳工们的艰苦斗争，我们从一个大山凹子里，搬到了下芦别的一座两层小楼里，粗糙的饭食能吃饱了，但劳工们还是穿着破烂不堪的劳工服，严寒地区单衣是难以过冬的。又经过多次交涉，才把日本兵穿过的旧军服和部分便服发给了我们，这才使大家觉得好一些。之后，我们在日本又呆了一段时间。

1945年12月下旬的一天，得到回国的通知。胖子队长讲："我们跟日本政府提出的工资问题和赔偿经济损失等问题，没有答复我们的要求，问题没有解决，不能再等了，保留我们的意见，咱们还是先回国，今后的事由国家交涉处理。"最后又讲了回家路上注意事项等，就散会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夜没睡觉，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苦，还谈了很多回国后的设想。聊着聊着，大家突然想起死去的工友们，我们均去寻找死去老乡的骨灰盒。当我找到姜兴齐骨灰盒时，想到的是他死去的惨相，我把骨灰盒抱在怀里，不由得想起，我那可爱的老乡啊，如今你落到如此地步，回国后，我怎么向娘俩交代呀！当我把它恭恭敬敬地抱回宿舍时，这已经是第三个骨灰盒了。

第二天下午约1点多钟，劳工们带着干粮和破旧行李，离开了北海道下芦别这块鬼地，登上了开往涵馆的列车。

我们穿过了日本的涵馆、东京、下关、九州、神户、大竹等地到达日本南部的一个海码头。在这3天的旅程中，亲眼见到了

日本国战败的残景，大家在火车上纷纷议论着这场战争，谈论着我们骨肉同胞的遭遇。

我们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劳工们心情更加喜悦和激动，大家都很少休息，不是看海景，就是交谈。一路上互相庆幸，相互交谈回家后的志愿。我想：一定立志走革命道路，不能再当亡国奴。我抱着姜兴齐的骨灰盒，绕过了日本海、太平洋、朝鲜海等海域，漂泊了7天7夜，到达了我们可爱的祖国大沽口，当我走下轮船时，见到什么都新鲜，都可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们从大沽口坐上去天津的火车，听传达，到天津后，每人发给"法币"1000元（当时只能买面粉两袋），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计。谁知，我们踏上国土，高兴的嘴还没有合上，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发动内战，劳工们刚下火车，国民党就开始抓兵。我想，几年来，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处，洋罪也受够了，还没有回家看看，就抓我们去当炮灰！我的决心已定，决不去当国民党兵拿枪打八路军！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我怎么办？我突然想起身上的疥疮，使劲把手上、身上抓破，顿时鲜血滴滴嗒嗒地流。两个国民党军官，从老远见了我，用手指着我说："这小子还行，是个兵料。"接着两个兵上来拉我，我低声说："我不够条件，满身都是疥疮，手上甭说，你们都见到了，疥疮都连了裆了。在日本国几年都没有干活，走不了路。"又上来两个背冲锋枪的，好像是班长，拉着我走，我使劲趴在地上，前边两人拖着我走，后边两人用枪托戳我大腿和屁股，我咬着牙，就是不起来。看到我真像病人，当官的说："不要他了，兵料还有，滚蛋！"

我偷眼见到把史景友拉了出来，见到他们集合跑步进兵营了，才从地上慢慢地爬。待到四周没有国民党军队了，我背起行李，手提姜兴齐的骨灰盒，跑出来雇了一辆人力车，到天津北站坐上了开往保定的火车。我总算逃过了抓兵的这一关。

1946年初的一天下午，我下了火车，步行40余里，回到了久

别的家乡，所见到的一切都觉得亲切。到了家门口，我像小孩似地大喊了一声："娘！"她老人家头发也白了许多，面颊增添了无数的皱纹。我扑了过去："娘，您受苦了。"娘瞪着昏花的眼睛，直楞楞地望着我，半晌才说出话来："我不是做梦吧？""娘！真是我。"她擦了擦眼说："你走后，我听说到了保定装上了闷子车，日本人怕中国人逃跑，都给闷死了。你真的还活着？"她哽咽着。"娘！见到我应该高兴，您干吗哭啊！我真的还活着呀！"她说："你走后，我多次做梦，说是你回来了，可醒来，却是做梦。娘想你都想疯了，我见外边来人就打听你！"娘又摸了摸我的头，见了我腿上9岁时玻璃扎的伤疤，这才放心了。

【作者简介】 董汝民，房山区公安分局离休干部。

（房山区政协供稿）

三年劳工生活

朱　荣

我今年 82 岁，是北京市房山区北良各庄村人。我永远也忘不了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那一段苦难经历。

1942 年，我们这一带为敌占区，西边的共产党、八路军常到这里搞抗日宣传活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败小日本，穷人得解放。早已受尽日伪反动派欺压的老百姓，听说打小日本、解放穷人都非常高兴，愿意接受共产党的主张。

这年农历九月三十日下午，邻村南良的傅宝玉通知我和朱玉喜、朱永连、田友生和南良村的李克仁、傅宝亭、傅宝瑞、王二环等人到他家去开会。傍晚，我们背着背筐，各奔东西，绕道聚到了傅宝玉家。一个叫宋广宽的八路军干部，给我们开了个十几分钟的会就散了。

不料，这事被李克仁报告给土匪头子王殿臣的秘书宋昆山，说我们是八路军的人，并说我是八路军的“九县专员”。当夜，我们全都被抓，带到了长沟“四分所”的日伪据点。

第二天十月初一，时值初冬，寒风刺骨，伪军把我们押到涿州大衙，交给了日本宪兵队。当天晚上我被提审。一个鬼子坐在大堂上，“叽哩呱啦”不知说些什么，翻译官说：“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军九县专员。”我说：“不是，是商人。”那时我在涿州“文兴斋”糕点铺卖点心。翻译说：“不整你，你不说！”他们立刻对

我动了刑，把我仰绑在老虎凳上，往我的嘴、鼻子、眼里灌辣椒水，我一下就昏了。等我醒来，他们又问我是不是八路“九县专员”。我一口咬定是商人，我说：“你们就是整死我，也是商人。”说真的我还没那么高的觉悟，八路军也根本不会委任我什么专员。看我不认，他们又接着灌辣椒水、泼凉水，就这样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一次醒过来时，翻译官对我说，有一个太君说认识你，看你卖过点心。我说：“认识我更好。”就这样才让我下了堂。

没想到，28天后，我和别的“犯人”一起被房山伪保安队队长张得祥的部下邢汉章提走，提至房山城后，被送到了“北平日本劳工协会”。在押送途中，警察把实话告诉了我们，说到了劳工协会就很难回来。

我们被抓的几个人中，傅宝瑞因年纪大了，田友生在伪军里有亲戚，他们在涿州就被放了。朱永连被亲戚用二亩地赎回去了。剩下的都押到了劳工协会。当时我们在一起的还有高庄的两个、石窝两个、石门两个、辛庄3个和下营的5个人。

到了劳工协会，悲惨的命运也就开始了。

日本人怕劳工逃跑，用绳子把我们拴成串，用汽车运到了天津塘沽，然后交给了一个叫三岛的日本兵，准备运往日本。

在塘沽，我们候船又等了28天。这里准备运往日本的劳工可多了，全国各地的都有，成天往这送。一到这里，我们的衣服就被扒光了，换上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那上面的虱子都带尾巴。

住在简易板房里，每条木板上只能盘腿坐下4个人，底下2尺深就是水，没黑天白日地坐在那里，每人每天只发给个小窝头、两瓣蒜，根本不让你活动。若稍有反抗，便会招来更加残酷的虐待。每天在这里被折腾死的不计其数，成车成车地往出拉，有的还带着气就被扔进“万人坑”。

上船这天，很多人站不起来，迈不开步。我们乘的是一艘日本火轮船，整整半个月才到日本。途中海上的情景惨不忍睹。劳

工们由于晕船，呕吐不止，恨不能连苦胆都吐出来。每天都死人，若死在中国的地界内，就被随手抛进大海。进入朝鲜南部，死了就码在了船舱里。

到了日本，我们经过长崎，在门司下关港下了船。在门司休整了一天，澡池里放上药水让我们洗澡。衣服交给日本人消毒，拿回来一抖落，虱子全掉了，这天吃了一顿饱饭。随后，坐上火车经东京倒车到了青森，晚上 8 点又上了轮船，到第二天早晨 8 点到了日本北海道，后来又到扎幌市的北美贝下车，走 3 里地后，才到目的地南美贝劳工拘留所。

这个劳工拘留所里的劳工都是中国人。他们中有来自上海等地的大学生、各地商人、老百姓、新四军战士等，有上千人。这里的劳工分北京队和塘沽队，我们属塘沽队。

拘留所附近都是煤矿，我们的任务就是到一个大炭矿（烟煤）装煤。这个矿每班能容 1 万人干活。每天先步行 3 里到电灯房领灯，后坐 70 里地的电瓶车到保安系下车排队领工具，工头按号领人（因为每个劳工都编上了号）。

由于住地潮湿，每人身上都起了疥疮，刺痒钻心，冒血，只能用澡堂里的水狠狠地浇，浇了结嘎巴，结了还浇。那时，我身上长满了疥疮，在胸前拘起了一个大脓疮，差点丧了命。

劳工们干的是苦力，每天 10 个钟头为一班，10 天为一个礼拜，第 9 天还要把第 10 天的活干出来。可劳工们每天吃的是什么？早饭是一个杂合面小窝头就着凉水；再带上一个，算是午饭。饿不到中午，就把兜里的那个吃了。等到中午开饭时，工头挨个检查，发现谁兜里装的是块石头，就揍一顿。后来谁也不敢提前吃了。晚上更是难熬，一人一小木碗稀菜汤。

工头对劳工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拿中国人根本不当人。有时正干着活，当头就是一棒，血顺着头额往下淌，人死了不如一条狗。

1945年8月，小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劳工们终于挺直腰杆，扬眉吐气。日本政府给我们食品、衣物，让我们好好休养等待回国。

1945年12月，当了3年苦难劳工的我，死里逃生，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作者简介】 朱荣，房山区长沟镇北良各庄村农民。

傅雅竹整理

（房山区政协供稿）

日寇在古北口抓劳工

胡春才

日寇统治期间的1943年春季，伪密云县政府命令警察局古北口分局协同伪保长在古北口抓走20多名劳工。

他们的办法主要是欺骗。说是上石景山修飞机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美机轰炸，飞机、火车头都修了高大的洞，停机、停车时不露天），出官工，挣钱多，几个月就回来，还给2斗米安家。可一抓到警察分局就铐起来了。

那年清明节前后，我、傻柱子和王起富等20多人被捆上，送到伪密云县保安队，和全县被抓来的400多人一起（两人一根绳子捆起来）装上铁路闷罐车，到塘沽北炮台。由于美机轰炸，没有船，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又被装上闷罐车到青岛，后被装上了往日本载运钨矿石的7艘货船，人就坐在或卧在钨矿石上。

河东北门坡下的王起富，家里有个傻女人，两个儿子年岁也小。他被抓后，惦记家里没法生活，非常想念家人，自己身体也不强，加上风摇船颠，一连几天吃不下东西，被折磨得不像人样，最后死在船上，日本人把他的尸体装进麻袋，坠上矿石，扔进黄海。像这样被扔进大海的每天都有。

7艘船在航行中被美国飞机和潜艇炸沉了4艘，其余3艘于旧历五月初五，中国的端阳节那天到了釜山。下了船，劳工们都被换上了国民党的旧军装，当作战俘被运到四国岛的一个铜矿。铜

矿的周围是电网，有持枪的日本兵严密看守。

铜矿的劳工有苏联人、朝鲜人和我们，都是“战俘”。

铜矿伴生铅汞，毒性很大，劳工们每天下井 12 小时以上。出井住的是潮湿的地面，吃的是橡子面馒头和发霉的挂面，每顿 4 两。喝的是矿上那黄色的泉水。

劳工们最容易得的病是身上起红点、溃烂、流黄汤，也没人管治疗，不久就死去。有的还未死，就被日本人架出去放在柴堆上烧了。劳工有病，被认为怠工便惨遭毒打，被打死的也不是少数。

1945 年旧历七月初七，日本投降，劳工们自由了。我们被联合国的船运回天津。

回来时，古北口的 20 多人，只剩下我、李青元和傻柱子 3 个人。

【作者简介】 胡春才，69 岁，古北口镇人。解放后在古北口务农。

白天整理

（密云县政协供稿）

我被抓到日本做劳工

马 麟

身陷囹圄

我是通州镇人。1943年夏季，通县伪警察局的警察闯入我家来抓我父亲，我父亲不在家，就把我抓住了。他们把我押到警察局，和当天抓来的其他人关在一起。第二天送到了司空分署街新民会院内看管。这里被押的共有200多人。在新民会里，看守把我们每个人的胳膊用绳子绑起来，不准互相说话。不久，我们在日伪警察的严密监押下，被送到了通县南门外火车站。

在通县南门外火车站上了火车。车上军警对我们管得特别严，让我们互相监视，并规定，邻座连保，不得随便乱动，发现他人异常的行迹马上报告，不然则受处罚。途中有的人冒险跳车跑了，邻座的人都遭受了毒打。

火车到了塘沽后，我们在军警的监视下被带到了车站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内已经住有200多人，听他们的口音，哪个地方的人都有。在集中营的3个月里，每天两顿饭，每顿只给一个棒子面掺糠的小窝头和一碗很稀的白水煮菜汤，连半饱都不够，饥饿难忍。房内人多，大小便都要在屋内的桶中，夜间必须先报告经看守允许才能大小便，否则就要遭到毒打。有的等不及，又怕受处罚，只能把屎尿屙到裤子里或床上。时值三

伏天气炎热，屋内臭气熏天，苍蝇成群。有了病，不给治，有些重病人还没断气，就被看守用草席一卷给埋了。有的人不堪虐待冒险逃生，不是被电网电死，就是遭到看守枪杀。这种集中营，实际上是人间地狱。

受尽磨难

在中秋节前两天，日本财阀熊谷组来押解中国劳工。我们在集中营里活下来500来人，被分成两队，指定鲁德森（通县人）为第一队负责人，齐伯诚（山东人，会说日本话）为第二队负责人。我们被押上了一艘日本来的货船，坐在阴暗潮湿的货舱里。海上风大浪高，大多数人晕船，又吐又饿，患病的很多，身体支持不住死了的，就被扔到海里。

船在海上航行了7天到达了日本下关岛码头。我们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下冒雨下了船，随后，来到市中心一个空场里。这时我们又冷又饿，疲惫不堪，他们给了我们点儿饭吃，就把我们带到了火车站，押上了火车。两天之后火车到了静冈县，又让我们冒雨换乘了汽车。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在日本富大郡的一个村子里停下来。

我们下车后，被带到一个大木板房内，每个人给了一碗面汤喝。押送我们的警察说不走了，让我们马上睡觉，两人一张床。床上只有一片草席，我们只好相互挤着睡。工夫不大，外面风雨交加，发生了海啸，潮水涌进了我们的房中。我们不明白情况，极为恐慌。看押我们的警察提着围灯叫喊着让我们往山坡上跑。当我们爬到山坡上的大房子里时，才觉得衣服湿了，鞋也丢了。大部分人脚都扎伤了。天亮后，风雨小了，我们又回到原处，见到我们夜间睡过觉的房子四周木板和房内床板被冲得到处都是，只有没倒的房子框架淹没在泥水之中。日本财阀熊谷组派来了土木工人在原房基上又重新建起了木板房。这里离海边不到半里，日

本人在我们住地四周架起了铁丝网，持枪警察四处设岗，看管甚严。

到了富大郡的第二天，日本人就发给我们锹、镐和小推车等工具，在日本监工的指挥下干起了修筑飞机场的苦活。为了防止海潮淹没飞机场，他们让我们在海边修筑防潮堤，后来又让我们修飞机跑道和机窝。推沙搬石，人力推轧路机等等，每天都得干十二三个小时以上。累病了不让休息，干慢了，不是遭到监工的拳打脚踢，就是用棒子打，有的工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每天两顿饭，吃的是粗粮黑面红薯干，每顿饭不是两个小黑馒头，就是两个小窝头，一碗酱油汤。年岁大的、身体弱的受不了这种折磨，常有连病带饿死去的。他们把死去的劳工往海滩一扔，一烧了之。

在修完富大郡机场后，他们把我们一块来的劳工分成了两部分，鲁德森的一部分听说到歧宁县开山去了；我们这部分到了富士山附近修垫飞机场。在这里受的折磨比在富大郡时还重。

生还家园

富士山附近的机场修完后，又把我们押到了日本新野县中山街做土工活。到那里时间不长，听说要停工了，监工对我们也不像从前那样严了。有的劳工夜间偷着出去探听，得知美国用原子弹炸了广岛和长崎，日本人请求投降。我们劳工队随即组织了示威游行，把白被里撕成布条，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抗日胜利万岁”、“清发工资”等标语。游行了三四天，日本人也不管了。此后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善。1945 年 12 月底我们乘坐美国军舰到达了塘沽，回到了祖国怀抱。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被押到日本做苦工的 500 多人，先后死了百余人。其中我县死的人记得名字的有徐八、姚少武、董文志、陆松伶等，生还的有鲁德森、萧德厚、张明、郭志、王光甫等，其他的就记不清了。以上就是我去日本做劳工的悲惨遭遇，

也是日本侵略者奴役我国人民血的罪证。

【作者简介】马麟，原通县清洁队工人，已故。

王文宝整理

（通县政协供稿）

劳 工 恨

王景生

死里得生当劳工

1942年，我被鬼子从村里抓去，在伪警备队受训1个月后，派到峨嵋山警备队三分队当内勤。半年后的一天，我瞅准机会，开了小差，逃到通县我姐姐家里躲起来。快到年关了，我想咋也没事了，就偷偷回到家里。谁知刚到家不久，警备队大队长就带着几个人闯进家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抓走，带到平谷城里的警备队大队部关了3天，强迫我继续给他们干。那时日本鬼子正在推行“强化治安”，四处“扫荡”，到处抓人，平谷的监狱都盛不下了。一天，警备队长派我和张文林（东高村人）、李凤仪（齐各庄人）把刚抓来的21名“犯人”押到三河县看守所，并负责看管他们。看守所里戒备森严，每个牢房都上了3道锁。被关押的人要想跑是不可能的。谁知偏偏就在我们这儿出了事。

那天是1943年旧历七月初八，大约晚上8点多钟，张文林去洗澡，我也出去了，只剩下李凤仪一个人看守牢房。这时，被关的人中有一个说要解手。李凤仪信以为真，刚给他把门打开，不料那21个人一齐向李扑来，七手八脚把他捆上，他连喊都没喊出声来，就被扔进牢房里上了锁。这21条好汉抄起了我们的3支步枪、6颗手榴弹和300多发子弹冲出了看守所，到三河县城西门又

下了两个门岗的枪，连夜投奔了八路军。

这件事使敌人非常恼火，警备队长大发雷霆，当夜将我们3个人捆绑入狱。我想，这回一定完了，落一个“私通八路”、放走“犯人”的罪名，日本鬼子还能轻饶我们？果然，八月初九那天早上，我们3个人被五花大绑，还挂着脚镣，由鬼子兵押着在三河城里“游街示众”，并准备执行枪决。谁知命里注定不该我们死，游完街后敌人接到上方命令，要把我们送到日本去做劳工，继续给他们卖命。

当天下午，我们被戴上手铐，装上汽车，押送到通县司空分署衔。被送到那儿的好几百人，个个衣衫褴褛，愁眉不展。夜里10点左右，我们又每两个铐一副手铐，装上闷罐车被拉到北京农民银行处，再去前门火车站。被押到这儿的人更多了，黑压压的一片，鬼子兵用刺刀逼着我们上了火车，第二天下午5点多钟到了塘沽。

惨绝人寰大屠杀

塘沽紧挨着海河，地势十分险要。日本鬼子怕我们逃跑，把我们这一列车人分别锁在6个大房子里，周围设置了4道电网，鬼子、伪军日夜巡逻。晚上睡觉前还要我们把衣服脱光，由他们锁起来，每人发一小块盖头盖不了脚的破毯子过夜。眼看就要被当作牛马般地运到异国他乡做苦工，不少弟兄在想着如何逃出去。

一天夜里，天上乌云密布，不一会儿，一阵雷鸣电闪，狂风卷着暴雨呼啸而来。6号房里的几百弟兄趁着风大雨急，打死两名看守，冲了出去。刹时间，枪声大作，警笛长鸣，所有的电网都通了电，逃出房门的弟兄们在倾盆大雨中赤身裸体地扑在电网上，一片片地倒下；中了枪弹的弟兄惨叫着，雨水冲着血水在地下流淌。我们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这时，日本鬼子端着刺刀，把我们1、2、3、4、5号房里的

人全部驱赶出来，叫我们赤条条地跪在地上。雨还在下着，我们冻得浑身发抖。只见日本鬼子把还活着但没逃出去的弟兄抓回来，捆绑在电网的立杆上，一个鬼子军官手提东洋刀，突然一声嚎叫，残忍的屠杀开始了。只见血柱冲天，刹时尸横遍地，惨不忍睹。这些身无片衣、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就这样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事后，鬼子又逼着我们把同胞的尸体投入海河。我们用发抖的手，拖着那一具具还冒着热气的尸体，眼泪直往肚里咽。

猪狗不如劳工苦

九月初九，我们被装上去日本的货轮，从塘沽起航。在轮船上，日本兵发给我们每人一袋饼干和一个小萝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吃一块饼干；渴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咬一口萝卜。坐了7天7夜的轮船，于九月十六日到达日本下关。我们被轰赶下船，脱去衣服洗澡消毒，再换上日本人为我们准备的绿色“麻袋服”，全是一个号，个子高的人穿在身上又短又瘦，个子小的人穿起来又肥又大。鞋也换了。然后把我们分成几拨，我们这拨有570人，又坐上火车，经过两天的时间来到富士山下的富士郡田子普村。日本人在这里修飞机场，这里便是我们第一个做苦工的地点。

这里的气候条件恶劣，天气变化无常。山顶上长年白雪皑皑，山脚下一年四季阴雨绵绵。已是秋寒季节，我们这几百口人住在一座破庙里，房屋四壁透风，顶上漏雨，地下非常潮湿。屋里也没有床，胡乱铺些杂草，夜里就睡在上面。身上盖的是一条又薄又小的破被子。夜里冷得实在受不了了，大伙就挤在一堆，用身体来取暖。

每天天不亮，日本人就把我们赶出去干活儿。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枪就是棍子，大声喝斥着，见谁的动作慢了点，上去就打。大工头熊谷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家伙，他只要见谁不顺眼，不是拳打脚踢，就是一顿棍棒，有时竟把人活活打死才罢休。修飞机场的

活很重，成天镐头刨，铁锹铲，从早到晚要干十几个小时，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还要时刻提防着挨打。我们吃的是用豆饼和稻糠蒸的馍，一人两个，过不了三四两重，此外还有一点用芋头煮的稀汤。由于长期吃糠，好多人拉不出屎来，大便的时候，就互相用树枝或手指往外抠。

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吃糠都吃不饱，好多人体力不支，走起路来一步三晃，更不用说干那重的活儿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伙上工的时候，每人都在裤带上别一根铁丝，半路上只要见到蚱蜢、青蛙、蛇、老鼠等，都扑上去逮起来，穿在铁丝上，得空的时候，找几根柴禾点火燎一下，生吞活剥地就往嘴里填。东西咽下去了，嘴上还挂着血迹和鼠毛。若是瞅准了树上的叶子或是山下的野果子，不管能吃不能吃，只要工头没看见，上去捋一把就塞进嘴里。有时没注意叫工头看见了，不但东西没吃着，还准得被打个半死。

非人的生活，思念家乡亲人的痛苦，把许多硬棒棒的小伙子折磨得不像人样了。很多人一病不起。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得病。一旦得了病，就被隔离开来，关到一个特别的房子里，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每顿饭只给一小碗面汤，不病死也得饿死。因此，进了病号房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和我一同去的李凤仪那年才 30 岁，身体本来很壮实。到日本才 3 个月，就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后来得了肠炎，成天拉稀，实在干不了活儿了，就被日本人送进了“病号房”。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对我说：“我怕是不行了，咱们是一块来的，我再也回不了家乡了。我死后，只求你能把我的骨灰带回家乡去！”不久，他就含恨去世了。他的死使我非常悲痛！我不顾一切地要回了他的骨灰，藏在身边。我发誓，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把他的骨灰带回家乡去。

我们修飞机场修了一年多，来时发的一套麻袋服已经是破了缝，缝了破，实在没法缝了就以大改小，改来改去，最后只能勉

强遮住下半身了。鞋也早都穿飞了，只剩下一片鞋底子。我们就在鞋底上拴根细绳，套在大脚趾上。由于长期不理发，我们一个个头发又长又脏，蓬头垢面，满脸胡茬，不男不女，活像阳间鬼！

1944年初冬，飞机场修完了，我们又被送到日本岐阜县高山市挖战备洞。那里的气候更加恶劣，路上的积雪有1米多厚，气温低到零下二三十度。我们被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战，说话全不利索了。就是拚命地干活儿，也驱赶不了寒冷。开山洞是很苦的活计。我们被分成6个人一组，每组一天要打6个炮眼，放炮以后，还得把崩下的碎石推出洞外，不干完活就不准出洞，更不给饭吃。轰轰的炮声，震得我们头昏眼花。硝烟和石末，呛得人透不过气来。稍有怠慢，还要遭工头的毒打。有时，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真想拚他个鱼死网破，出口恶气，了此残生。但每到此时，我们又想起了家乡，想起了父母、妻儿，为了亲人，我们说什么也要活下去！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这一拨劳工饿死、病死加上被鬼子和工头打死的有100多。到日本投降前夕，只剩下400多人了。

一把骨灰千般恨

1945年8月15日11点55分，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我们这些流过血泪的劳工，终于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的喜讯！大家甩下手里的工具，奔走相告，像孩子般地又蹦又跳。有的人喊，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有的人举着双拳，发疯似地冲出洞口，仰天长啸，泪如泉涌。刹时间，饥饿、寒冷、伤口的剧痛全都忘了！

在这无比欣喜的时刻，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工棚里，取出我收藏了一年的李凤仪的骨灰。从田子普到高山，我一直用性命保护着它。我双手捧起那已是轻飘飘的骨灰，声泪俱下地喊出了一句话："兄弟，我苦命的好兄弟，咱们回家吧！"

1946年1月2日，我带着李凤仪的骨灰盒坐了7天7夜的火

轮，踏上了塘沽港，踏上了那流淌过无数同胞鲜血的祖国土地。我回到了家乡，了却了我的同伴生前的唯一愿望。

50年过去了，那许许多多的往事却仿佛是发生在昨天。那血、那泪、那白骨总使我难以平静。我们中国人不应当忘记这些事。我们要奋发图强，不再受人欺辱。

【作者简介】王景生，1924年生于平谷县太平街村。1946年回国后在家务农。1993年病逝。

（平谷县政协供稿）

我参加了秋田劳工暴动

岳克勤

誓死不投降

我是平谷县马昌营乡东双营村人，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我参加了八路军，在县里第六区区小队当班长。1944 年春天，我班在平谷北边的杏园村执行保护县长李光汉的任务时，与日军遭遇。我们一班 9 个人，实在抵不住敌人的火力，王顺林同志光荣牺牲，还有一个刚参军还没换军装的年轻战士随老百姓突了围。剩下我们 7 个人，子弹打光了，被敌人俘虏，其中有几位同志挂了彩。我们被敌人押到峪口、张镇，再转到马坊。一位受重伤的战友（马昌营人，姓宋）不几天就死了。在马坊，我们被关押了一个月的时间，又有两名外地的同志和我们关在一起。我们 8 个人结拜成兄弟，我排行老三。我们发誓：宁可死，不投降。因为我是班长，敌人一连提审我几次，他们用皮带、枪托打我，我什么也不说。我的那些兄弟们也都是好样的。敌人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他们把我们押到三河，让叛徒单德贵来向我们劝降。这家伙恬不知耻地说："八路军这碗饭不太好吃了"，要我们"心眼放活点"，"在哪儿随哪儿"。为了收买我们，敌人还真下了番苦心，给我们一人两床被子，全是缎子面的，一摸都粘手；给我们好吃好喝，酒肉相待；三河县伪县长还请我们看变戏法的。可我们就

是不买他们的账。敌人恼火了，说我们是“铁杆八路”，要“统统杀掉”。一天，敌人在三河西关外枪毙两个蓟县的同志，拉我们几个去陪绑。我们都是从枪子底下钻过来的，还怕他们这一套！末了，敌人又拿我们游街“示众”。他们的花招全使尽了，就把我们押到通县，又经北平解往西苑的俘虏营。

被骗当劳工

在西苑，我们弟兄们被分散编组，给日本鬼子干杂役。有的弟兄被敌人折磨成重病，死去活来。我们在那里熬了一个多月，大约到了七八月份，我和老五傅士禄（疙瘩头村人）、老六李德彬（果各庄人）被挑出来押上火车，说是要送往南京，谁知一下子拉到了青岛严加囚禁，没过几天就被装上轮船。我们这才知道是把我们送往日本当劳工。

我们漂洋过海，在日本的下关港上岸，又坐了两天的火车来到一个矿山。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是日本秋田县秋田郡的铜矿。我们就是被送到铜矿来做苦工的。我们这一批大约 300 多人，大都是八路军、中央军的战俘，后来又来过两批，共七八百人，大都是山东的老百姓。我们这个劳工集中营叫做“中山寮”。劳工被分成大队、中队，由日本寮长监工掌管。

劳工的苦就别提了。我们每天干着很重的活，只能吃上两顿发酸的黑馒头，还不给吃饱。我们不但要忍受连畜牲都不如的生活，还要忍受日本监工的打骂摧残。有一个日本监工，长得活像一头猪。他的半个屁股在侵华战争中被炸掉了，因此对我们中国人更加狠毒，动不动就拿劳工撒气，我们管他叫“黑猪”。还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军的军需，在大队里管总务。这家伙为虎作伥。他克扣劳工的口粮讨日本人的好，还到外面嫖女人，是个民族败类。繁重的劳动，非人的生活，加上思念家乡亲人，许多人被折磨死了。每当我们含泪抬出一具具被残害致死的同伴的尸体，怒火就

在我胸中燃烧。到日本投降时，仅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这1000多劳工也就剩下一半了。

暴动杀仇敌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敌人的奴役了。转眼已到第二年春天，我和湖北籍的两个共产党员暗中商议，这样下去，早晚也得叫日本人折磨死，倒不如豁出命去，拚一个够本，拚两个赚一个！我们开始酝酿暴动的事。这时日寇在各个战场上节节不利，对我们劳工看管也更严，不准几个人在一起交谈。我们还是在秘密地串连着，并寻找下手的时机。

一天，大家都在推矿车，一个湖南籍的士兵不知怎么得罪了监工，几个恶狼似的监工围上去，用木棒打得他浑身是血，没几天，他就含恨死去了。劳工们被激怒了。我们见时机成熟，便组织了11个可靠的人，准备杀死监工，然后逃跑。我们组织得很严密，连我的两个弟兄都不知道。

那天夜里很黑。过了半夜，我们11个人偷偷出了工棚，每人身后藏了一根镐把，悄悄摸向日本寮长和监工住的房子。我是打头的，刚要靠近房门口的岗哨，那站岗的就大声咋呼起来，问我干什么去？我镇静地说，要去解手。说话间，我已逼近到他的跟前，突然抡起镐把，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这家伙连哼都没哼一声就瘫倒在地上，随后上来的几个人马上把他拖到了路边。

一不做，二不休。我们直奔日本人住的房子，我一脚踢开了门，大家一拥而入，正在熟睡的4个日本人猛然被惊醒，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其中3个人就被我们打死了，只有那个寮长拣了一条命。他靠窗子睡，见势不妙，爬起来撞碎玻璃跳窗逃跑了。那个叫“黑猪”的日本鬼子被我一镐把打了个脑浆迸裂，一个兄弟上前又是狠狠地一棒，“黑猪”的脑袋成了个烂西瓜，污秽的血水和脑浆溅了我一眼，我的眼睛顿时模糊了。可当时哪顾得



了这些？我们又去找那个坏了良心的“军需”。那家伙和一个中国大夫住在药房，大夫睡在外屋，他睡在里屋。在那位大夫的配合下，我们把他从热被窝里掏了出来，用一把宰牛的尖刀结果了他的狗命。这时，我才感觉到眼睛钻心地疼，什么也看不清了。弟兄们打来清水，为我冲洗了之后，才勉强能够睁开眼。从那以后，我的眼就坏了，最后几乎失明。

壮举垂青史

茫茫黑夜，血溅魔窟，暴动旗开得胜！我们分头唤醒所有的劳工弟兄，告诉他们：日本人已经被我们杀了，共产党派人接我们来了，我们要去铁路上扒火车，奔下关，坐轮船，回祖国！

刚刚醒来的人们，怎么也不相信我们的话。当他们看到日本人的死尸时，才恍然大悟。一个个高兴得把被子都撕成了碎片。各自抄起一件家什，随我向铁路的方向冲去。可是，由于路生，又辨不清方向，到天亮时分我们也没有找到铁路的影子。这时，那个逃跑的寮长已经调来了大批日军，我们最后被围在一座土山上。日本人封锁了所有的路口。

几百弟兄被困在山上，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有些人主张拚，有些人主张放下武器回去，认为拚只能是一死，不拚也许还有出路，要争取活着回国去。

最后，我们全部被敌人抓了回去。

连天阴雨。我们几百劳工弟兄被反绑着双手，在泥水里跪了3天3夜。在鬼子兵的刺刀和枪口下，3天3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加上寒冷和疾病的折磨，有好几十人再也没能站起来。我们被轮番带去审讯，谁都是一言不发。日本人白费劲，最后，只得把我们全部关押起来。

暴动虽然被残酷镇压了，但是我们的壮举威震敌胆，威震日本四岛。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决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我

虽然在暴动中失去双眼，但是我为许许多多含恨九泉的无辜同胞弟兄报了仇，出了口恶气！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但对恶人决不能宽容。

日本投降后，我们终于胜利地回到了祖国。

【作者简介】 岳克勤，平谷县马昌营乡东双营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抓到日本当劳工回来后一直在家务农，1987年病故。

祝金华整理

（平谷县政协供稿）

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前后

崔德本

我是平谷县城关乡赵各庄村农民。50年前，我被抓到日本国当了1年零6个月的劳工。那一年多，哪是人过的日子！要不是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鬼子，我就得被糟蹋在日本。

南彩被抓

1944年夏季的一天，黄松峪的李德山（我们在一起挖金时相识）找我去帮八路军从北平城里往黄松峪运送军需品。他那会儿负责给八路军十四分区当采买。和我一块给八路军运货的还有西双营的陈宏，周村的王镇鳌，鲁各庄的张云、刘长祥、张希福，陈良屯村的金可佳。

每次运货之前，李德山先独自进城去采买东西。我们随后推车上路，早上出发抄小道走，后晌到北平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小市口西路北“东三义”老店碰头。夜里我们装好车就休息，李德山又去疏通关系，第二天早上，再由他把我们送出城去。出了城还比较太平，一过顺义形势就紧张了，鬼子伪军对过往行人车辆的检查越来越严，到了南彩就得往北扎进山里，走龙湾屯、白山子、峪口这条线直到黄松峪。头两次运货还算顺利，第三次可就出事了。

那是阴历七月二十八，我们赶到南彩时已是晌午了。推着满

车的货走了几十里路，又饥又渴，前面又要走山道，我们想歇歇脚，就在路边的饭摊处坐下了。这时，过来一个穿灰制服的“警备队”，围着车子转了个圈问：“车子是谁的？”我们忙站起来说：“我们的。”“装的啥东西？”“茶叶。”那小子伸手摸了摸上边的几包茶叶，又要往车子里边掏。我见这情形心想：要坏事。原来，为了遮人耳目，我们把军用品全装在下面，上面盖上十几斤茶叶。我忙过去，把他拉到一边，掏出300块钱说：“这点小意思您收下买包烟抽吧。”谁知那小子将钱收下后还不放过。这时又过来一个日本兵，到了车前，伸手就瞎翻。翻了一阵儿，冲我们一挥手：“八路的干活，开路开路的！”把我们带到警备队去了。到下午3点来钟，又把我们押送到警察署，半路上张希福趁敌人没注意钻了庄稼地。我们剩下的6个人在警察署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就过堂。王镇鳌头一个被提出去，时候不大，就听见皮鞭子的“啪啪”声和镇鳌“唉呀妈呀”的惨叫声。他回来时，全没个人样了，浑身上下血葫芦似的，小白褂成了破红布条子。我是最后一个过堂的。过完堂，关了20来天，又将我们押到守备队。在那过堂打得更厉害。但不论怎样挨打受审，我们都一口咬定是给人拉脚挣饭吃的，东西送到平谷街上，决不说是往黄松峪送。后来，敌人又把我们转到密云守备队，关了几天之后又解回顺义，押在警察署一分所。呆了三四天，我们被押解到北平劳工协会，从那儿经天津到了塘沽。在天津时又过了一次堂，说我们是给八路军干事的，不能留在中国，得去日本当劳工。

在塘沽，日本人对我们看管很严。他们手里提着一根四棱棍子，瞧谁不顺眼，上去就打。一天夜里查铺，从金可佳的衣裳里搜出20块钱，不由分说，四棱棍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我看了心里又气又怕，想着自己衣袋里也有110块钱，怎么办？藏哪也是躲不过的。我一着急便偷偷地将票子揉成小团往嘴里一塞，嚼巴嚼巴，一伸脖子咽到肚里去了。

劳工血泪

在塘沽关了七八天，就上日本的火轮了。在火轮上不捆也不绑我们了，一天两顿窝头，吃完了随便呆着。要说平生头一次坐轮船，头一回见大海，该觉得新鲜，可谁有那份心思！我想：这次到日本就别指望再回来了！爹妈呀，儿子不能孝敬你们啦！想着想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坐了7天8夜的火轮，来到了日本的下关港。接着又上火车，把我们拉到日本本州东北部的福岛县。日本人叫我们在这儿挖河。在日本人眼里，我们只是一群奴隶。他们只要你干活，不管你死活。我们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先说住吧。我们第三分队128口人挤在一个木板筒子房里，从东往西排，一班二班三班，接着是病号住的地方，最西头是厕所。那地方气候邪行，我们在那3个多月，没见几个好天。夏天屋里积了一地的水，床铺就在水皮儿上。住在这又湿又闷的屋子里，没有多久，人人都长了一身疥疮，流脓打水的。冬天大雪铺天盖地一连几天地下，屋里没有炉火，再加上从四面透风的木板缝里不断往屋里钻寒气，屋里冷得像冰窖。夜里唯一用来御寒的是一条盖头盖不了腿、盖脚盖不了胸的小被子。

再说穿。我们在塘沽上轮船之前每人发了一身青布裤褂，一双“补助牌”高腰胶鞋。后来又一人发一身桑树皮纤维织的黄衣裳。湿了没的换，冷了也没的添。夏天还好说，入了冬可就受罪了。为了不活活冻死，我们偷着把洋灰袋子裹在胳膊上、腿上、脚上，并用草绳捆牢，前后胸也捆上两大块，外面套上单衣，就这样熬了一冬。

在吃上，说是一天三顿饭，可那哪是饭呀？每顿给一罐白开水，半斤重的一个稻糠加黑面的馒头，表面麻麻扎扎，吃在嘴里又干又涩，嚼不烂咽不下，只得用水往下冲。我们吃这样的饭，干牛马样的活，两三个月下来，人人都瘦得皮包骨头。我的体重由

原来的130多斤，一下子降到83斤！成了一副骨头架子。

我们在福岛县干了仨多月，就转到日本的岐阜县。在这儿干的是杂活。好在天气暖和点了，外出干活时地里的野菜和树叶子不管有毒无毒，我们采下就装进口袋里，待吃饭时，放进开水一泡，也不管生熟，和着稻糠馒头吞下肚去。

我到岐阜县后，右边屁股蛋上生了个大疮，行走艰难，疼痛难忍。我知道得病意味着什么，就强支撑着干活，说来也怪，3个来月，在同伴的帮助照顾下，疮竟出乎意料地好了。后来我们又到岐阜县北面的长野县挖飞机窝。

牛马不如的生活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许多人都得了重病，糟蹋在日本国了。我们同船去的228个劳工，一年多后回来时只有139个人了，其他89个兄弟只带回了他们的骨灰。

胜 利 归 国

1945年8月份的一天，我们干活回来往住地走，二班的胡玉珍走过来，满脸带笑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日本国完蛋了！"我们分队长姓申，听了他的话，吓得脸都白了，冲着姓胡的说："你疯了？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让日本人听见，还要命不？"胡玉珍说："没错！刚才我见好几家日本人跪在地上哭。"这消息很快在劳工内部传开了，大家仨一群俩一伙地瞎呛呛。时候不大，申队长来了，他将我们集合到一块儿，扯着大嗓门说："今儿还真让胡玉珍说对了。中国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弟兄们，我们有回国的希望了！大伙儿活到今天不容易，一定要好好保养。"没等他说完，会场就热闹起来了，我们这个乐呀，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夜里，有说的、笑的、闹的，谁也不睡觉了。

第二天，也不干活了。申队长和日本人交涉后说："大家休息，等着回国。另外，从今天起，每人每天发5块钱生活费。"

呆着没事，有人建议："咱们解放了，还能天天吃稻糠馒头？"

“那咋办，又不给咱米和面？”“咱们砸他兔崽子仓库去！”大伙挺拥护，分头去联系人。当时在长野的中国劳工总共有500多人，听说砸日本人的仓库，很快就聚来了300多人，大家扛着锨镐直奔仓库。

仓库离我们很近，只有一个日本兵扛着枪在门口站岗。我们转到仓库侧面，用镐撬开木板，看看日本兵没反应，知道他不敢管我们。这下大家可来劲了，几百口子“呼啦”一下全冲了上去，拆开木板墙，拥进仓库。仓库里吃的穿的都有。劳工们有的扛米扛面，有的拿衣服抱布，足运了3趟，把满库房的东西都搬光了。

从日本投降到回国，我们呆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真难熬啊！因为我们一到日本就和家里断了音讯，那时虽说也想家，可都知道回去是不可能的，也就断了那份心思。这会儿，谁不想早点回家团聚！可没人接送，只有等。我们呆腻了就到本州各处闲逛，连日本的名古屋、京都那样有名的地方都去了。

日本也有好人，我们在布岱就遇上了一位。一天，我们来到布岱小镇买衣裳，店铺掌柜见了我们都关了门，大概是怕我们砸了他们的店铺。其实，我们这伙人哪儿也没奸没抢过。这时，忽听背后有人说：“你们要干什么？”听到中国话，我们以为是遇到了其他弟兄，可回头一看，是个日本人。他50岁上下，正对着我们笑呢。我们说明来意，他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卖衣服的店铺。后来，我们在布岱镇经常碰到他，很快我们就熟识了。他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我们还经常带上两瓶酒给他。他跟我们啥话都说。他的名字我忘了，只知道他在上海呆过8年，他的3个儿子都被征了兵，送到中国打仗。他说，日本打中国那是坏了良心，日本和中国应像亲兄弟一样。从那时我才知道，日本的人民对中国是友好的，他们是希望和平的。

阴历十月下旬，我们被送上了美国轮船。在轮船上，人们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想到祖国，想到家乡，恨不得插上双翅。真

是归心似箭！我们坐了5天的海轮在塘沽上岸又坐火车到了北平。我们几个同去的又回到了北平“东三义”老店。过了7天，我二哥赶着小毛驴把我接回家。一家人劫后重逢，那种场面就没法说了。

一晃50年过去了，和我一块去日本当劳工的其他几位兄弟都不在了。我常对晚辈们提起他们，告诉晚辈不要忘记过去中国人是咋挨人家欺负的，要立志图强，建设好我们自己的国家。

【作者简介】崔德本，1912年出生于平谷县城关乡赵各庄村。1945年回国后一直在家务农。

胡永连整理

（平谷县政协供稿）

诉不尽的劳工血泪仇

王世宗

我今年82岁了，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也在新社会享了几十年的福。我常给儿孙们和青少年诉说我在日本当劳工的那段苦难历史，让他们千万记住：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住京南大兴芦城，解放前属宛平县辛庄乡。1944年10月的一天（那年31岁），我正在村北地里刨花生，村保长打发人把我叫到村公所，装作很关心的样子问我："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困难，现在长辛店招工人，每天工钱1元5角，你去吗？"我不知道是计，也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回家一核计，就答应了。

第三天，我带着铺盖、干粮，还有几元准备买麦种的钱，到狼垡村集中。我们辛庄乡的有十几个人，都是青年农民，比如东芦城的赵九儒、北程各庄的王振山等。集中了百八十个人后，庞各庄警察所的警察带我们到了长辛店宛平县警察局，在门口站岗的是几个端着三八枪、上着明晃晃刺刀的日本兵，我们好像是被押解来的犯人，一个个都进了警察局。进去后发现周围都是高墙电网，出来进去的不是日本鬼子，就是警备队的人，腰里挎着洋刀、手枪，阴森恐怖，让人胆颤心惊。我们面面相觑，惶惑不安，谁也不知道将要把我们怎样处置。

几个警察挨个搜身，把我们浑身上下翻了个遍，把钱和随身带的东西、行李、干粮都没收了。稍有反抗或流露不满，不问青

红皂白，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并用刀、枪威胁。然后，把我们分别关进几个大屋子里，真像关进监狱一样。

以后又陆续押进几批人来，命运跟我们一样。过了两天两夜，警察局各大屋子都关满了人，约有400人。第三天，由日本兵和警察荷枪实弹地把我们押上了军用火车——闷罐子车，我们在车内人挨人地站着，挤得转不过身来，既没亮光，也不透风，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就这样把我们这批人拉到了塘沽。下了火车，我们被赶进一座临时“监狱”里，周围拉着铁丝网，到处有日本兵站岗、巡逻。铁丝网里边有12所大木板房子，每所大房子里都能容纳几百人、上千人。进了房子，中间是通道，两面通铺，头脚花插躺下，挤得翻身都费劲。进了房子就不许出去，大小便也在里边。到了晚上，强迫每人把衣服脱光，交鬼子统一保管。每人只发一条毯子，连铺带盖再遮身。每人一天三个窝头，也不知是什么面做的，又黑又散又发霉，得用双手捧着吃，真是连猪狗食都不如。

看管我们的人都满脸横肉，凶恶残忍。他们每人手提一根三棱木棍，像锄杠那样粗，五尺长，涂满黑漆，上写一个红字“劳”，我们叫它“吃人棍”。用它打人，打伤致残，甚至活活打死，他们的顶头上司从不过问。

这么多人拥挤在一起，又冻又饿，再强壮的小伙子也难免有个头疼脑热、感冒、拉肚子什么的。小病就得抗，抗过去了算你命大；抗不过去的，只要被看管人发现了，他硬说你装疯卖傻，轻则罚站、吹风、闻臭味、不管饭吃，重则一顿打，然后拖出去活埋。

有个小学教员，暗中串联，想联合起来，拚个你死我活，死里逃生。不料，被工头察觉了，叫来日军，当众把他活活打死了。

半个月后，我们被押上了运煤的货轮，在轮船里，先装好了煤，上边铺上席，让我们人挨人地坐着，跟装货一样漂洋过海了。

内地人大都没有坐过船，乍到海上，有人晕船，呕吐不止，连拉带尿都在船里；有人拉痢疾，上吐下泻，脸色蜡黄，已经没有人样儿了。但见工头来查舱，还得强装笑脸，不然，抬出去就扔大海里去了。在海上航行了十几天，就有几十个劳工尸沉海底。

我们被运到日本的北海道，在长盘煤矿编了班组，每人一个号码。我是 265 号。从此，265 号就代替了我的姓名。

我们这才知道，把我们从中国抓来，运到日本，原来是为他们下煤窑挖煤。后来听说是煤矿老板花钱把我们买来的，是和中国当地日伪组织勾结把我们骗来的，说是劳工，实为死囚。我和赵九儒、王振山 3 人一组，每天两班倒，一下窑就是 12 个小时，要挖煤四五十吨。都是手工操作，弯着腰，爬着，跪着，用镐刨，用锹铲，没有安全措施，没有劳动保护，鼻子里、耳朵里都灌满了煤末子，浑身上下都是黑的。磕磕碰碰，头破血流，手脚工伤那是常有的事，死活没人管。这是拿命换煤啊！

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每顿饭只发 1 个黑窝头，有 3 两重，硬得跟砖头似的，“黑不溜秋”的。早饭在窑上吃，午饭再发 1 个带下去，没有菜，也没有水，只能干啃。3 个窝头合成一顿都吃不饱，所以，每天都饿得两眼冒金星，肚皮贴着后脊梁。

北海道是寒带气候，从 9 月就开始下雪，一直到第二年 5 月才化完。我们每人只发一套夹衣，在窑下不觉冷，一上来就冻得打颤。我们住的房子很简陋，每人睡在一个木盒子里，下面垫些旧棉花套子或干草什么的。很多人有冻疮，有人还长了疥疮，人人身上都有虱子、跳蚤。那里的老鼠也很多，大的有 1 尺多长，常出来咬人。

有一次，我腿上长了个疮，没有药，也没人给治，每天还得下窑挖煤。结果烂了核桃大那么一块，老是流脓打水的，疼起来钻心，也只能强忍着。我怕它越烂越大，如果烂掉了一条腿，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咬着牙，挤出脓，用雪洗，用冰擦，用指

甲把脓塞儿抠出来，露出了血淋淋的鲜肉。过了几天，伤口长上了。

还有一次，我患了感冒，身上发烧，一点劲儿都没有，跟瘫了似的，我还硬挺着干活。没想到被工头发现了，给我一量体温，也不知多少度，他就命令我赶紧隔离。我们最怕进隔离室，十个进去，九个出不来。跟我一块隔离的，有个唐山人，是64号，说他患了鼠疫，抬出去就活埋了。我算命大，过了两天就退烧了。他们把我留在了隔离室，让我看管其他病人。都是祖国同胞，我尽量照顾他们。我们管这里的“大夫”叫白熊，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竟拿我们做实验。有时给病号打针，越打越厉害；有时也动手术，不是为了治病，而是在中国人身上练手艺。他们把一个病人麻醉后，开了膛，取出五脏，血淋淋地托着就走了。

熬到了8月，我已瘦得皮包骨头了。什么时候才能熬出个头呢？我们也有父母、妻子、儿女，想亲人，想家乡，想祖国。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偏偏受东洋小日本的欺侮呢？我怎么也想不通。

有一天夜里，空中飞过6架飞机。我心想：这下子全完了，死在这里再也回不去了。我完全绝望了。因为过去几次，只要飞机来，就狂轰乱炸，日本人能钻洞躲起来，我们只有等着挨炸。出乎意料的是，这几架美国轰炸机盘旋了几圈后，一个炸弹也没投，飞走了就再没回来。我们心里都很纳闷儿。

没几天，我看见一日本人正在看《朝日新闻》报，因为我学过简单的日文，看见那张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说中国国民党政府要日本军队解除全副武装，准备由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接收。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联想到近来的一些变化，猜测一定是日本投降了。我把这一喜讯偷偷告诉了劳工兄弟们，他们个个心头都燃起了回归的希望。

这事不知道怎么让当地警察署知道了，把我叫了去审问。审



问我的警察叫小泽敏男。他问："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从报纸上看到的。"我说。

"谁给你的报纸？"他追问。

"我在山上拣的。"我怕连累那个给我看报的日本人。

"你懂日文？"他有点吃惊。

"我是农民，念过私塾。老师会日语，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字母和发音。"

很快就把我释放了。

看管我们100多名劳工的，是一个日本老头，60多岁了。他腰挎一把大刀，很凶，每天6点就逼着我们下窑。稍有怠慢，就拳打脚踢，动不动就挥舞他那口刀，在我们头上比划着："死了死了地。"我们都恨透了他。这天，我们都等到七、八点钟了，他才来，也没让我们去干活，把门一关，上了把大锁，然后，他就走了。

过了两三个小时，在另外一处煤窑干活的30多名劳工都跑来找我们，说日本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国了。我们把门砸开，冲了出去。之后乘上电车，来到城里，进了明和寮旅馆，派人在门口和楼上站岗放哨。有个叫小宝的青年，才18岁，他从楼上喊："日本警察和消防队来了。"我们一听，赶紧集合，抄起棍棒等当武器，就冲出旅馆大门，怕他们把我们包围了，到街上就与他们厮打起来。我们反正死里逃生，天不怕，地不怕，心也齐，把警察和消防队打得连连后退，他们往日那趾高气扬的派头也不知哪儿去了。我们越打士气越旺，好像长期憋闷的冤气一下子撒出来了，结果打死了一名警察和两名消防队员。庞各庄的劳工李天增始终冲在前边，他头部受了伤，流得满脸是血也全然不顾。后来，与我们打过交道的小泽敏男出面调解，我们才暂时不打了。他叫来大夫，给李天增等上药包扎，劝我们回旅馆。我们怕上当受骗，担心他们要花招。他当众担保："如果有人再伤害你们，你们先把

我处死。”

那时候的日本也非常悲惨，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大街上空空荡荡，残垣破壁，商店关门，经济萧条。青壮年男子都被拉去当炮灰了，看到的只有老幼残兵，要饭的人很多。日本人民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我和另一名劳工曾到一户普通日本人家里。他们老的老小的小，一位老人说她的儿子被拉去当兵，到了中国不久就被打死了，连骨头都没运回来。他们听了我们的遭遇后，也非常同情，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粒黄豆招待我们。

一直等到12月，我们才从左士堡上了船，回到了祖国。接着从塘沽乘火车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

我记得，宛平、大兴、通州三个县的劳工共388人，回国时，还剩203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带病回来的。在日本当劳工的一年时间里，病死、饿死，被打死、折磨死的就有185人。其中狼垡村的6名劳工，只有两个人活着回来。这劳工血泪仇，世世代代也不能忘啊！

【作者简介】王世宗，1913年生人。1949年后在家务农。

史柳坡整理

（大兴县政协供稿）

■ 统　治

日寇统治古北口十二年

关幼椿　蒲洪泽

1933年3月7日，古北口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片明媚春光，农民们正准备春耕播种，街市上的人们熙熙攘攘，表面上充满着和平景象。接近中午的时候，人们听到空中有隐隐的嗡嗡马达声，由远及近、由小而大，抬头一看，只见数架日机围着古北口上空飞行。忽然，丢下来第1枚炸弹，随着刺耳的轰鸣巨响，古北口大街南聚兴楼门前，卖菜的苏玉林、姚寿春当即受伤，菜摊也被炸烂。第2枚炸弹又响了，落在街心桥东民房上。房被炸毁，卖煎饼的奎林爷（满族）被埋在屋里，幸而屋顶被坍下的檩木支住，奎林爷身虽未死，耳却震聋。接着3枚、4枚……

古北口人民的战祸灾难开始了。

3月10日清晨，日寇飞机又在古北口上空轰炸。下午3时，敌步兵向古北口发动试探性的攻击。11日拂晓，在大炮的掩护下，大批敌步兵向古北口阵地发起总攻。守卫古北口的中国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2日，日军更增加重炮和飞机对古北口发动更大规模的轰炸攻击。中国军队虽然伤亡很重，仍然顽强地还击，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后来，联络中断，后援不继，前方部队各自为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古北口，转移到南天门阵地，古北

口完全被日军占领。

日本侵略者占领古北口以后，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并制造了潮河关惨案。下面即是日寇在古北口12年统治的简况。

由“非武装区”到“三家”统治的特殊殖民地

日本侵略者占领古北口之后，由伪满的滦平县政府设临时办事处加以统治。

这一年（1933年）的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塘沽协定》。协定的内容表明，当时的政府不仅默认了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而且承认，长城到冀东一带包括古北口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这些地方驻军队，只能派警察维持治安，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这里自由行动。根据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签订一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算是收回了古北口的行政权，派了30名警察来“维持”。同时，日军却在这里修建兵营，构筑炮楼，增兵添将，长期驻守下来，古北口就成为日军向华北地区进行侵略的重要基地。

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派军队增兵关内的同时，又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这年11月，指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正式成立了汉奸政权，包括古北口在内的广大冀东地区沦入敌手。而这时的古北口，又成为日本两个占领地区——东北与华北的走廊与纽带。

由于古北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华北汉奸政权、伪满政权及日本侵略者三家逐步设立了“一式三份”的各种统治机构。日人及那些被日寇奴役的朝鲜族人在此修路开矿。表面上看，古北口这个小小的地区，机关林立，交通商业都有了发展，实际上却走上了殖民地的道路，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之中。日本关东军在这里大肆修造兵营，设炮楼，强占了古北口地区大约五分之一的土地，数十户住户被驱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阎王殿一样的日本关东军古北口宪兵队，设在古北口大街中间偏南路西（原杜姓大院，今古北口供销合作社址）。该队由日人宪兵和少数华人宪兵组成，后来又附设宪兵队特务大队和一些特工人员，是专门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伪满古北口宪兵队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北头路东大楼，是日本宪兵队的爪牙，一只守门狗。

伪满"国境警察队"是伪满政府派驻这里守卫伪满"国境边界"的"边防"警察，由日、伪满、白俄等籍人组成，由日籍警官领队，是一支骑兵警察。队部设在古北口东关李、白两姓的大院内。他们在南天门以北有人家的地方，设岗哨一所，昼夜设人值班，盘查来往行商旅客。来往行人，不能随意出入，无身份证明及出入手续者，则以"偷越国境罪"论，或逮捕关押，或被送伪满充当劳役，严重者就被杀害。以后，这个警察队改编为"滦平县地方警察"，归"巴克什营警察署"所辖，在古北口北门外建立"警察分驻所"，守卫着伪满的"国境线"。

古北口日本警察署是日本直属机构，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北头路东，古北口火车站对过。

长城抗战[①]后，华北伪政权派驻了古北口"佐治局"，局长霍实，带数十名警察，"佐治局"设在古北口东横街东头路北。它是根据《塘沽协定》来此行使行政权代替伪满滦平县的临时办事处的。到1936年5月改为古北口警察第三分局，由密云县警察局管辖。

此外，还有古北口铁道警护队，驻在古北口火车站内，是属伪满警察机构，任务是专门负责承古铁路（承德到古北口）一段。而华北警务段古北口分驻所，设在古北口铁路隧洞外路东。

---

① 长城抗战指的是1933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5月下旬，中国军队相继放弃长城各口，长城抗战失败。

经济上的掠夺

随着武装占领而来的，就是经济上的掠夺。古北口这一特殊地区，又有它的特点。这首先就表现在“关税”上。古北口林立的海关中，有伪满洲国所属的“山海关税关古北口分关”，有“中国海关”，为华北伪政权所属的“津海关区古北口长城分卡”。因“中国海关”设置在古北口东大街石桥北路东，又称北海关。北海关设有武装缉私队，终日去山沟小径，武装缉私。遇有所谓偷税漏税或带有违限物资者，货主被打被关，货物没收，然后交承德伪满的法院法办。在路西与北海关相对的，还有“津海关北平办事处”，所属的海关，当地称为南海关。此外，还有“古北口税捐局”，设在古北口北门外，原征收局的旧址，归伪满承德税务监督署所管辖。

除捐税等之外，日伪政府还规定“烟酒专卖”，不允许私人经营。伪满设了“古北口专卖署”，专卖烟酒，并查禁私运私卖，设在古北口东横街路北，后撤至口外的巴克什营。

以上这些捐税关卡，一方面是为了控制物资，直接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所谓“大东亚圣战”服务，禁限物资，多数与战争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压榨。

再就是对土地和矿藏的掠夺。自从日寇入侵之后，日、伪的各种组织机构，纷纷来古北口，公开抢占土地，疯狂掠夺。

古北口的西沟桃园一带山区金矿丰富，日本侵略者早已垂涎三尺。于是便设立了“日本亚细亚金矿株式会社古北口金矿办事处”，大批日籍的技术人员携带家眷来到古北口。这个办事处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石桥北路东。并强租强占河西西大街仓库三条胡同冯家宅院为工人宿舍和家属住宅。招中国人作矿夫在桃园采金开矿。

古北口合作社，是汪伪华北政权所设立的，这里备有存粮仓

库，常有人看守。

此外，伪满还在这里设置了“满洲中央银行古北口出张所”，地址在伪满的税关内。

为侵略者服务的各种设施

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古北口人民难忘的一件事，就是铁路的修建。1936 年开始修建“通古”（通州—古北口）铁路。这个路又分为“通古”和“古承”（古北口—承德）两段。古北口西街直向西，横过铁路的地方，就是两段铁路的分界线。界线以北属于“满铁”的锦州铁路局管辖，界南为“华北铁路株式会社”的北平铁路局管辖。古北口车站，机关区、检车区、电汽区、工务区、货物处和“国际运输构内驻在所”，应有尽有。又因为是伪满“国境”地区，车站内还有伪满银行兑换所、“海关”检查处等。此外还建立了铁路员工宿舍，设在古北口北门坡西胡同的“南关寮”，是“满铁”的日籍职工宿舍；设在古北口大街石桥北路东的“铁路乘务员古北口宿泊所”，是西段铁路华人和乘务员（包括机车和列车员）在古北口交班休息的宿舍，由“满铁”管理。

为了修建铁路，老百姓的耕地被占，房屋被拆，劳动力被抓去修路。修路的劳动强度大，吃不饱，还不断遭受打骂。怠工、逃跑，则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

这段铁路于 1937 年 3 月建成，4 月 1 日全线通车。

铁路除去侵略者在军事上的作用之外，也有经济上的作用，又多了一条经济侵略的渠道。与铁路配套的机构，就是“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古北口营业所”，营业所设在古北口大街北头路东，火车站对过，是日本的商业资本经营的。日本的“国际运输株式会社”的营业面很广，日本全国各地，朝鲜各地，以及所有日寇侵占的中国各条铁路、各个车站，都设有它的营业点。它的主要业务是承包铁路沿线各站的物资运输、火车装卸、代客携取物品，代

客办理托运物资、代办海关纳税手续等等。

此外还有“阪田组汽车公司”的古北口汽车站，专跑京承公路，每日两地对开，古北口为中间站，为日人阪田经营。后被撤销，改由“奉山铁路汽车公司”继续营业运行。

为了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日伪还在古北口建立了邮电设施。邮政局有3处：中国邮局（在古北口西横街中间路南），伪满邮局（在古北口大街北头路西，是新建的）和日本军部邮便所（在古北口大街石桥南路西）。电报电话局有两处：伪满设的古北口“电报电话局”，在古北口大街北头路西，是新建的；“华北电话局”，设在上坡长盛店院内。

为了长期占领，日本侵略者除建立“邮政局”，还建了日朝两籍的“居留民会”（居留民即侨民），地址在河东大街石桥北路西。日本小学校，在古北口大街南头，师生都是日籍人，不收中国学生。

医疗方面除日本关东军军医院（在古北口河西东阁外路北）和伪满派来的“古北口检疫所”（在古北口北门里路东，主要管进入伪满洲国的防疫注射等）之外，还有日人伊部医生的“伊部医院”，朝鲜人姓金的“康德医院”和朝鲜人姓金的开的镶牙馆。

商业服务业方面，有日人开的照相馆“相川写真馆”，还有“东荣公司”，“南天门屋”（饭店兼妓院），“古北口饭店”（掌柜是日本人木下，专供日人食宿），“福岛洋行”，“大东公司”，“国境堂糕点铺”等。还有朝鲜籍人开的日本理发馆、冷餐馆。此外，有日本人经营的日本妓院大和妓院、福岛妓院，日本人经营而妓女为朝鲜人的松竹园妓院3所；有朝鲜人经营的金泉馆妓院、大黑屋妓院。另有一处不辨日本人还是朝鲜人开设的妓院。这些妓院，4所在河东，3所在河西。日伪开的“土膏店”是公开贩卖毒品鸦片的地方。

反动的思想统治和野蛮的文物掠夺

除去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掠夺之外，日本侵略者还进行反动的思想统治。

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石桥北路东的“满洲协和会”是“满洲帝国协和会”的分支，是专门进行反动宣传的机构。设在古北口河西东转角路西的新民会分会是“新民会”的直属单位，这是个专门向中国人民灌输“大东亚共荣”等军国主义思想和负责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组织，在进行反动宣传之外，还搜集各地抗日武装和人民抗日活动的情报给日伪机关。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石桥南路西的“华北劳工协会”也是又管抓劳工，又管反动宣传的机构。

自从日本占领古北口之后，这里的“密云县古北口第三小学校”(即河西小学) 也受他们的控制。为了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他们在学校里推行奴化教育，各年级都设日语课，由日籍教员讲课，极力灌输给青少年什么“日中提携”、“共存共荣”的奴化思想，腐蚀、奴化中国的下一代。

除了文化奴役外，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古北口长城的城砖。自古北口北门起向东大约 2 里到崔家地这一段长城城砖被日本侵略者拆走，城砖竟达三火车皮，至少在百吨以上。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的又一笔债。

重见光明

1945 年 8 月 24 日这天，古北口夜雨早晴，红日东升，空气新鲜，万丈光芒。上午 11 时左右，5 名苏蒙联军的军官，骑着栗红色的高头大马，雄壮威严地来到古北口，直奔日军兵营。时间不长，长城上的日本据点全都挂出白旗。不久，几百名苏蒙联军乘车来到古北口。他们登上山头，把日兵像赶绵羊似的集中到兵营

里的广场上。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野少将向苏联军官举行投降式，递交了用黄布书写的投降书和战刀。全体日军脱帽缴械，按照顺序跪在地上。

日本投降了！古北口在侵略者铁蹄下被蹂躏了整整12年，终于见了光明。

【作者简介】关纫椿，79岁，密云县古北口镇河西村人。解放前在古北口火车站负责国际运输工作，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蒲洪泽，67岁，古北口镇河东村人。从事教育工作。

（密云县政协供稿）

日伪统治时期昌延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延庆县党史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延庆处在伪满、伪蒙疆和伪华北三个不同政治军事统治的结合部。这三个伪政权虽然相互间也有矛盾，但因为都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主子，所以在镇压抗日人民方面是可以合作并互相协调的，其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方面也大同小异。

三个不同政治军事统治的结合部

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下，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9日出笼，溥仪任"执政"。1934年3月1日，日军又把溥仪扶上"满洲帝国"皇帝的宝座，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

延庆刘斌堡以东之四海、珍珠泉、小川、花盆等皆属伪满统治，归热河省丰宁县。县设县长，由中国人充任；日本人出任副县长独揽大权。县下直属大村，设村公所；村下设甲；甲下设牌。村、甲、牌长或由地痞流氓充任，或由地方绅士把持，或以土地多少，轮流担任。这些人有的依仗日伪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是日军的忠实走狗，民族的败类；有的被迫无奈，应付而矣；也有的不满日伪的统治，后来参加了抗日工作。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稍有不满，即遭逮捕、毒打、监禁、杀头。日伪

为加强其统治，在各大村镇设警察署，下设警察分所。东卯（现属赤城）、四海皆设有警察署，花盆、黄花城（现属怀柔）、大庄户（现大庄科）皆设有警察分所，有警长一人，警察二三十人。为推行其“固边政策”，在四海、永宁、大庄户、黄花城等地，驻伪满洲军镇守（永宁、大庄户是借伪蒙疆和伪华北的地盘），各据点皆有日本人充任指导官监督，并总揽大权，还有人数不等的特务为其效劳。1941 年，日军更加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修“围子”，设部落，强迫百姓拆毁住房，迁入“围子”居住，实行严密的军事管制，人民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8 月 25 日南口弃守，察南十县（包括延庆）沦入敌手。10 月 7 日伪察南自治政府成立（驻地宣化），于品卿充任伪主席。为了献媚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于品卿提出四项施政纲领：（一）日察如一；（二）铲除共党；（三）民族和协；（四）民生向上。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操纵下，1939 年 9 月 1 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和伪晋北自治政府合并成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驻地张家口），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出任傀儡主席，于品卿和夏恭（伪晋北自治政府的头子）为副主席。伪察南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延庆大部地区归察南政厅管辖。

伪蒙疆在延庆设县公署，由中国人充任县长，日本人任指导官，操纵实权。县公署设民政科、警务科、实业科、总务科。民政科下分行政、财务、教育、劳务等股。警务科下分警务、特务、司法三股，有警察 200 余人，特务数十人。县下设镇公所和联乡公所，有镇长、联乡长及书记多人。联乡公所内又分总务系和安全系，各系皆有主任、书记、管理、会计多人。联乡下为甲，甲有甲长。伪联乡长、镇长、甲长多为地方上层或地痞流氓（部分甲长也按地亩轮流担任）。他们依靠日军势力，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群众称他们为“托天雷”。日伪为加强其军事政治控制，在重

要村镇如柳沟、高山寺、古城、白草洼、西拨子、小庄科、下屯、佛峪口等地建筑炮楼碉堡，派驻日伪军及警察数十人驻守。康庄、西拨子、三堡还驻有铁路警察，皆有日本人监督。沿铁路两侧15里地区划为“爱路村”，严加控制，以防八路军深入村中进行抗日活动。又成立“灭共”司令部，谢玉辉、丁健壮曾出任司令，各村成立“灭共”支部，爪牙遍布各地，监视人民群众的言行，并且进行说降诱降，打击瓦解抗日组织。

日军占领平津后，首先在两地分别成立了地方治安“维持会”。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以汉奸王克敏为“委员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12月汉奸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并于1940年3月于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即取消，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以保证日军在华北地区的特殊地位，即是通常所说的伪华北，原昌平“后七村”及大庄科、东三岔、松树沟一带皆归其管辖。

伪华北在昌平设县，县下设区，区下设乡，乡下设保，保下有甲。乡、保、甲长大部是地方绅士或流氓。各区有警察分局或派出所，除统辖当地居民外，皆有“讨伐”任务。

三个伪政权的统治系统，包括军、政、警、宪、特，是逐步建立和加强起来，并互相密切配合的。在各地均实行保甲制，采取十户连坐法，“一人犯法，十家连坐”。同时建立户口登记、指纹鉴定，发放身份证（即良民证）。出门如忘记携带良民证，轻则罚款、毒打，重则以“匪”论罪，逮捕下狱。在日伪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已经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如同在地狱一般，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

残酷的经济掠夺和剥削

延庆地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延庆川虽是主要产粮区，亩产也只在8斗上下（以每斗17.5斤计，为140斤），主要产玉米、

谷子、高粱、豆类等杂粮；小麦、稻谷等细粮只有微量生产。山地多产干鲜果品，以杏干、杏仁为大宗。此外还有梨、沙果、海棠、山楂、栗子等，约占当地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土地、果树大都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广大贫苦农民只有少量薄沙地，或根本没有地，所以，租种土地的佃户极多。永宁城韩玉龙家只有30几口人，却拥有土地50多顷，占有永宁半个城的财产，人们称之为“韩半城”。他家雇长工十几个，短工40多个，出租土地4000余亩，而且兼营商业，在各地有买卖13处。延庆城关白庙地主施甫一家20来口人，占有良田4顷多，超过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还不算他在外村的土地。租率一般都在70%以上。若遇荒年，即使颗粒不收，地租也不得少交。高利贷剥削也十分严重。据1942年昌延县委调查，债户占总农户的60%以上，月利率以三分或二分半为最多，高的可达五分。日伪统治时期，由于各种负担加重，部分富农、中农下降为中农、贫农，而有权有势的地主富农，又将一部分负担转嫁给贫苦农民，因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贫困。

日伪普遍实行封锁政策，不仅军需品，就是粮食和日用品也要经过他们的“组合”（伪蒙疆）和“合作社”（伪华北），并建立关卡，各据点都有截留权，只有经过贿赂才能通行。因此，走私商人增加，走私商品高价出售，不买不行。伪蒙疆政府虽发过购盐证，但每证只可购盐半斤，根本无济于事，还得从走私商贩手中购买，又多剥一层皮。伪满实行的所谓“配给”政策，更是坑人骗人。他们规定粮食、日用品如布匹、食盐、火柴等都要分配供给，或用钱买，或用粮食换，但大部都落入保甲长及大户手中，到普通百姓手里已所剩无几。更可恨者，是要到大镇驮运，沿途伪军敲诈勒索，无法忍受，只好不去。1941年春，群众到四海领“配给”，等了好几天，每户才分给四两盐①、半尺布，群众敢怒不

① 旧制四两合公制125克。

敢言。

日伪的苛捐杂税繁多，犹如一条毒蛇紧紧缠在人民身上，摆脱不得。伪满有户口捐、地捐、身份证费、照相费等，户口捐有平均每户 10 元的。伪蒙疆则有地亩捐（一般每亩 10 元上下，多者达 20 元）、田赋捐（从民国 19 年要起）、户口捐、人口捐、房捐、屠宰税、斗税、营业税、禁烟特别税、“灭共”费、水灾款等等，名目繁多。这些所谓的正式捐税，实际只占农民总负担的六分之一。乡公所职员的薪俸、办公费、支应费都堆在农民头上，要占总负担的六分之二。此外，军需费、人情费、招待费、临时费以及莫名其妙的诈取勒索，像无底洞一样，三天两头摊派，也填不满日伪人员的腰包。这种费用则要占总负担的六分之三。这还不算，敌伪人员为捞钱肥己，随便给百姓扣上一顶“通匪”的帽子抓走，这一家就要四处求人说情保释，往往弄得倾家荡产。村中为求得平安无事，上自伪县长，下至任何一个小汉奸，都要好好应付，婚丧节日要送厚礼，一不小心就会大祸临头。

劳役负担也很沉重，敌人修公路、筑碉堡、修炮楼、挖封锁沟，都要各村出夫。伪警、政、宪、特人员送信、打柴、挑水、烧饭、扫地以至家务劳动，都要贫民百姓为其效劳。

在日伪的统治下，如此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流落他乡，逃荒要饭的很多。还有一些人则被逼为匪，啸聚山头，数十人、百余人、数百人者有十多股。这些土匪或拦路抢劫，或进村抢掠，或“绑票”诈财，搅得地方不得安宁，人人恐慌，也是一层无法忍受的负担。

总之，在日伪的奴役下，社会经济濒于崩溃，贫苦农民日无饱食，衣不蔽体，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只能在死亡线上苦命挣扎。

反动的奴化教育

延庆的文化历来是很落后的，旧中国没有中学，只有一乡村

简易师范，约四五十名学生，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员，延庆、永宁、康庄三镇有完全小学，各有二三百学生，大的村庄也有少数低年级小学，学生人数都不多。

日军占领延庆之后，除在政治上严加统治，经济上残酷掠夺外，十分重视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到处宣扬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日察如一”、“日满一体”、“民族和协”、“铲除共党”、“民生向上”，咒骂共产党八路军是“青面獠牙的魔鬼”、“杀人放火的强盗”。通过各种渠道向老百姓灌输这种反动思想，挖空心思地企图消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有的青年人竟不知道自己的祖国，称中日战争是“皇军”来“剿共讨蒋”的。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殆尽，若对“皇军”表示稍许不满，则严加镇压。日本帝国主义还实行一种小恩小惠的“怀柔”政策，妄图麻木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思想，如送给小孩糖块吃……

日军的奴化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抓得很紧，要求极严。首先是训练小学教员。每年暑假将小学教员集中到延庆城集训，或半月，或十天，由日本人授课，灌输“大东亚共荣”和“王道乐土”的反动思想，教育股长王子修和王翻译竟向教师说：“日本人是咱们的亲爹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并要求其学习日语，使其向学生进行教育。学校课程都是伪政府编印的适应奴化教育的教材。各年级都有日语课。日常生活如上下操、上下课、集会，都必须使用日语喊口令或向老师问好。迎接伪政府官员和日本人到校，打日本旗和伪蒙疆旗，喊日语口号。不讲中国历史地理，大讲“明治维新”，教室布置也要适合奴化教育，挂日本旗帜，贴“王道乐土”的标语。日军占领初期，将伪察南政府的四项反动纲领配画张贴在教室和学校的墙上。如“铲除共党”画的是一个红脸巨齿的小人；“民族和协”是日察二人紧紧握手。四项反动纲领还要学生每天喊几遍，牢牢记在心上，时刻不可忘记。

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不可能完全奏效。具有民族意识的

教员暗中抵制，不堪忍受奴化教育的学生常常逃学，永宁小学和延庆小学有少数高年级学生秘密受共产党的教育而离开学校，参加了抗日工作。人民群众和青少年怀念祖国，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一天天在增长。

（延庆县政协供稿）

日寇在通州炮制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概略

王文续

20世纪30年代，正当我中华民族遭受列强凌辱，国家多事之秋，在冀东大地又出现一股逆流，这就是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的支撑下，在通州拼凑一个辖有22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它虽然是短暂的一瞬，却给冀东地区留下一块深深的伤疤。

背　景

1931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3个月时间，东北三省就沦于敌手。到1933年，热河、察北又相继失陷。中国军队退守长城隘口，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冀东地区就成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前线，当然也是日寇夺我华北必先鲸吞的战略要地。长城防线一一失守，随即密云、遵化、蓟县、玉田、丰润、唐山等地逐一惨遭蚕食，5月12日通州也为敌寇所占领。日本侵略军直逼天津，一面用武力相威胁，一面恣意寻衅，制造事端。在此国土行将沦亡，平津危在旦夕的时候，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屈辱求和，相继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933年5月31日签订的《塘沽协定》，强迫中国军队撤出冀东，冀东被划为非武装区，实际上这个抗日前线就拱手送交日本人控制了。翌年，亲日分子何应钦在征得日本

驻屯军的默许下，在冀东设置了两个专区，委派殷汝耕为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设通县），陶尚铭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设唐山）。不久，陶因不能取悦于日本而去职，由殷兼任。从而整个冀东大权，落在这个日本豢养多年的忠实走狗之手，为日本霸占冀东安排了理想的奴才。以后，日军又制造了“察东事件”，使察东又被划为非武装区；随之制造“河北事件”，签订了《何梅协定》；再次制造“张北事件”，而签订了《秦土协定》。这样，日寇很快就攫取到冀、察两省的军政大权。随后就紧锣密鼓地策动“华北自治”，“蒙疆自治”，与此同时唆使殷汝耕积极筹划“冀东自治”。一时，我大好山河阴云滚滚，人心惶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笼的。

出　笼

殷汝耕这个奴颜媚骨的民族败类，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归国以后一直投靠在日本的怀抱，自从兼任冀东两个专区的头目以后，看到日本侵略军已直逼平津，国民党节节退让，宋哲元态度暧昧，认为重演第二个伪满，借以卖国求荣的时机已到，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指使他的爪牙池宗墨等人，上窜下跳，奔走游说。对外拜倒在土肥原等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膝下，摇尾乞求，认贼作父；对内则趁日本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对宋哲元施加压力的关头，与宋的代表萧振瀛在天津密谋，企图同时表演“自治”的把戏；另一方面勾结汉奸，网罗失意政客、军阀，以及遗老遗少，如吴佩孚的副官长赵荣岭、北大教授凌子云、张之洞的儿子张仁蠡等，拼凑班底，备作装潢门面之需。他认为万事俱备之际，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胁迫宋哲元等人，限期宣布“华北五省自治”，一逼再逼而未得逞之时。1935 年 11 月 23 日，土肥原与殷汝耕密谋于天津日租界，提出由殷首先倡导“自治”，组织一个脱离国民政府的冀东傀儡政权。殷汝耕受宠若惊，欣然从命。次日赶回通州，冒天下

之大不韪，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胡说什么“……不得已接受战区六百万人民之呼吁……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同时，他还纠集了冀东地区一群乌合之众所谓三十六友，发表“民等愿代表六百万待死之人民……一致爱戴我委员长，作屏障于战区……”的通电。

顿时，全国各界人士骇然大哗，规劝、反对、唾骂的电文不下数千件。殷汝耕一意孤行，全然不顾，于1935年11月25日在通州孔庙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缉拿汉奸殷汝耕”的命令。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立即出来干涉，在访晤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时公然威胁说：“华北自治运动乃是中国之内政问题，非日本政府所能干预，然而若国民政府采取无视舆论之手段，例如逮捕殷汝耕之行动，则日本政府将不得已出于何项之处理，事态将陷于恶化……”。同时，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也发表了强硬的公告，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殷汝耕撑腰壮胆。

殷汝耕表演的这出卖国丑剧，就在日寇的卵翼下和全国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粉墨登场了，并于12月26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逆坐上了“政务长官”的宝座。

这个傀儡政府辖有通县、昌平、密云、怀柔、顺义、平谷（以上6县现属北京市）、三河、香河、兴隆、玉田、遵化、丰润、乐亭、滦县、迁安、卢龙、昌黎、抚宁、临榆（以上13县现属河北省）、蓟县、宝坻、宁河（以上3县现属天津市），以及唐山和秦皇岛两个市（见文后图）。这22县2市的总面积为32918.4平方公里。它的北部与热河相邻，东北和伪满接壤，西临北平，南部毗邻河北，西南靠近天津，东面和东南濒临渤海。大约有280公里的海岸线。在这幅员辽阔的沃野上，蕴藏有丰富的煤、金、钨等矿藏，盛产粮、棉、油、菜、果以及畜产和水产品，储备着富

饶的资源。全区有 624 万人口，又是倾销日货的良好市场。尤其是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有秦皇岛这个优良港口，不仅为日寇掠夺资源提供方便，也是日货源源流入中国广大市场的一条最好走私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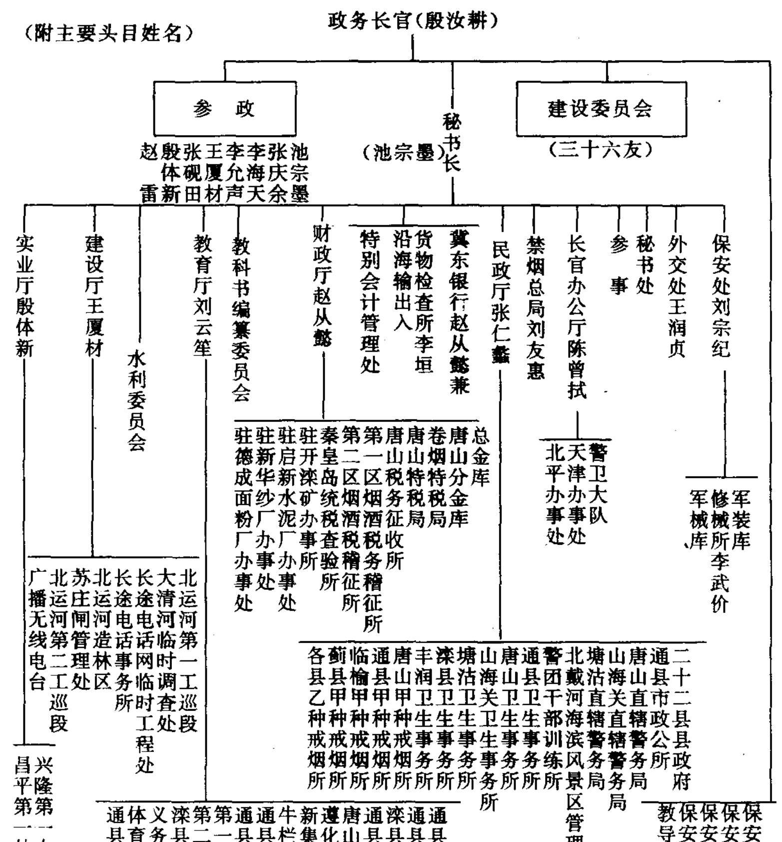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从地理位置上看，冀东 22 县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不仅资源丰富，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又有优良港口，既便于掠夺，更便于渗入，所以在经济方面也颇占优势。故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冀东大地早已垂涎三尺。

殷汝耕当上了儿皇帝以后，为了效忠他的主子，镇压人民的反抗，推行他反共卖国的政策，网罗一些社会渣滓，拼凑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和反动武装（见下表）。

当然这个傀儡政权是离不开太上皇的，在伪政府出笼后，不过几天，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就在通州东仓“就位”了，他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最高太上皇。随后日本守备队进驻西仓，日本宪兵队进驻大关庙，日本警察署进驻西大街。伪政府的各厅、处以及上上下下的伪机关、保安队、学校，都陆续安插了日本顾问或教官，这些倭寇操纵了冀东的军政财文一切大权。他们口头上高唱“中日亲善”、“同文同种”、“提携扶持”、“共存共荣”、“建设王道乐土”等动听的辞藻，实际上却骑在中国人民头上，飞扬跋扈，作威作福，为侵吞我国土，掠夺我资源，奴役我民族，残酷镇压抗日力量，坏事干绝。不久，日韩侨民纷至沓来，他们在通州开妓馆，设赌场，贩卖毒品，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尤其是韩国侨民（人们骂他们“高丽棒子”），欺侮中国百姓较日本人更凶，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此外，在大成街有鼓吹中日亲善的工具——宣抚班，在马家胡同有为满足日本军人淫逸生活的场所——自强社等等。总之，冀东已经成为日本人的天下了。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系统表

（附主要头目姓名）



倒行逆施

这个卖国政府出笼以后，在短暂一年多的时间里，由它日本主子驾驭，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一、出卖祖国的宝贵资源。有史以来所有卖国贼的嘴脸都是一个模式，殷汝耕也不例外，为了达到他的野心，不惜把3万平方公里的冀东大地拱手送给敌人，600万父老兄妹饱受蹂躏，惨遭奴役之苦，并且对所有的宝贵资源，也都毫不吝惜地任凭主子攫取。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向外侵略，拚命制造军火，需要大量煤炭，而它又是一个能源极度贫乏的国家，所以对蜚声中外、储量丰富、质地优良的开滦煤，早已觊觎良久，梦寐以求了。殷汝耕当然要满足主子贪婪的奢望，任凭日本到处"招募"、抓捕中国苦工，日夜采掘，致使祖国的黑色宝藏，源源不断地流入东洋。此外，蓟县、平谷、密云的钨矿和金矿，也是殷逆奉献的"贡品"，他安插原伪省长王胡为采金局督办，同意日本在蓟县设置"昭和采钨株式会社"，这些敌伪机构，为日寇掠夺金、钨大效犬马之劳。冀东盛产的粮食、棉花和油料，也是日本侵略者不可缺少的军用物资，他们一方面划分产区，按照田亩集中摊派征收，一方面滥发伪钞大肆抢购。农民辛苦一年的粮棉，被敌伪明抢暗骗，搜刮罄尽，到头来只能以糠菜、豆饼充饥度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凡日寇所需，殷贼无不一一摇尾恭送。而日本强盗掠夺这些宝贵资源，制作武器，充实军需，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二、实施所谓"冀东特殊贸易"，为日本主子走私活动大开绿灯。东北沦陷以后，日寇对华北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毫未放松经济侵略。正如日本关东军驻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宝寿良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中说："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期间亦难再行扩大……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于进攻

中国的华北，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而进行经济侵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走私将滞销的商品流入中国市场。又由于《何梅协定》等条约限制，中国海关缉私人员不能在“非武装区”行使职权，甚至被解除武装，所以走私活动日愈猖獗。这不仅破坏了中国经济，也影响了中国四大家族及美英的在华利益，因此国民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在此关键时刻，殷汝耕于1936年2月提出“加强对沿岸走私的管理和海关税合理化”，表面看来似乎对走私加强管理，其实质是规定对走私货物按中国正常的进口税降低关税率，并指定货物靠岸地及检查所。这无疑是对走私提供了诸多方便。对此，日本立即欣然响应，并声称日货一经冀东收税，便不再交纳其他税，这就是所谓的“冀东特殊贸易”。其后果是使日本走私活动公开化、合法化，而大量廉价日货迅速充斥华北，扩展到全国，就连原由华南进口的日货，也转道冀东了。日本在华走私，不仅倾销商品，同时也掠夺原料。以华北盛产的棉花为例，由于日本的掠夺，中国纱厂反而要出高价从国外购买“洋棉”，当然无力与日本走私纺织品相竞争，而纷纷破产。如天津1935年有6家纱厂，1936年就有4家倒闭，其余两家也奄奄待毙。日本走私活动不单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还严重地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显然“走私”就是偷漏关税，而关税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据秦皇岛、天津两地海关的估计，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仅从冀东走私的日货，偷漏税款达3400多万元，此外走私盐使盐税受损，走私棉纱、卷烟、煤油、火柴等会减少统税收入。总之，日本对华走私的危害，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是灭亡我国家，奴役我民族的手段之一。

三、吸吮人民血汗，大肆挥霍。殷汝耕出卖冀东以后，他作贼心虚，为了掩饰其肮脏的灵魂，编造一些欺人之谈，说什么“就任以来，夙夜兢兢，惟恐稍有陨越”等等，而实际是高居长官宝座，享受“荣华富贵”，过着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为达此目的，

他拚命吸吮人民血汗，通过截留华北关税、长芦盐税、京奉铁路收入等巨额款项，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从而捞取了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开办"冀东银行"，滥发伪钞，强制通用，供其任情挥霍。仅举数例以视端倪。

1. 殷贼叛逆以后，自以为得心应手，异想天开，要在通州修造一幢像样的府第，选定的地址是：南起万寿宫（今新华大街），北至今通州宾馆北墙，东起商老胡同（今多福巷胡同），西至今五金水暖模具厂，霸占旧城西北一角，大约近4万平方米的地方。如果加上近7万平方米的西海子风景区，整个"府邸"面积约近10万平方米。其中有百户民房被夷为平地。这处"殷府"采用中西合壁的结构，虽无高楼大厦，但所有厅堂皆为宫殿式建筑，雕梁画栋，碧瓦辉煌，厅堂之间地面有走廊相连，地下修造通道有暗室相接。南面正门借用原有的两棵合抱参天古槐，门内一座磨砖对缝、精雕细琢的八字大影壁，门前万寿宫臭沟已疏浚成一脉潺潺小溪，不仅显得宅第更加古朴幽雅，而且与风水有关（据说殷汝耕笃信佛教）。宅院北面与过去蚊蝇孳生、荒冢累累的西海子相连，当时这里也被改造一新，清除了芦苇杂草，挖浚了坑塘，整修了堤岸，塘内栽种荷花，沿岸广植垂柳，西岸建造了亭榭，北端残破的城墙改作假山，铺砌了上下土山的台阶，"山"道间有藤架，城头上造草亭，园内遍植花卉，水面上荡漾扁舟，树荫下安放长椅，湖光塔影，景色秀丽，这就是为殷府大院准备的后花园。如果这座府邸果真建成，尽管它是劳动人民用血和泪堆砌而成的，也算是殷贼卖国史留在通州的一点罪证吧！可惜白白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工程未及一半，就随着傀儡政府的夭折而停工，以后屡遭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一再破坏，终于变成一片废墟。

2. 殷汝耕当上了"儿皇帝"，自认为已是光宗耀祖，煊赫门楣了，在志满盈怀之余，又胡说："双亲在世无以奉养，理应大办冥寿，略尽孝子之道，以慰在天之灵。"于是使用搜刮的不义之财，

在伏魔大帝宫（现在南城派出所）邀请僧道念诵经文，超度亡魂，高搭席棚，大摆酒宴。那些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如蚊附膻，闻风而至。寿台上摆满了金器、银器、古玩、字画、寿幛、寿联等琳琅满目的珍贵礼品，这个官场狡兔借他爹娘的僵尸，大敲竹杠，中饱私囊。

3. 殷汝耕表面上高唱“财取之于民即用之于民，不敢妄费锱铢”，而实际是终日沉于酒色，溺于赌博的糜烂生活之中，诸如麻将、牌九无所不好。在他垮台之前，搜刮的民脂民膏输于赌博的不下数十万元。在他的影响下，贪污腐化之弊，风靡一时。当时通州市政公所是主管市政建设的机关，借殷逆大兴土木之机，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如拆迁一户民房，双方议妥作价1000元，要给市政公所开一张二至三千元的领据，其贪污部分高出原价的一两倍，仅举此例可见一斑。其它贪污手段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三十六友领衔的通县县长曹桢，在任不久，就携带公款9万元潜逃；宝坻县县长李宣樾是殷汝耕的契友，也搜刮了8万巨款逃之夭夭；建设厅厅长王厦材的弟弟，任教育厅总务科长，携赃款10万元，并拐带女戏子董菊花一并逃跑。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竟有如此众多的政府官员携款潜逃，其腐败之至是不言而喻了。

殷汝耕窃踞冀东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装潢门面，收买民心，搞了一些市政建设，其中很多供日本侵略者在战略上的需要和生活上的享受。比如在新城东北后街（今电信局）建立了自动电话局，以供作日本军用专线为主；另外在天后宫（今贡院胡同小学后院），凿了第一眼深机井为水源，在东仓建造水塔，铺设地下管道，设置十八处水楼，封闭所有“洋井”，改用自来水；此外还修葺了西海子风景区，整修了街道，翻建了闸桥，粉饰了一番通州的市容。尽管他挖空心思，企图标榜其“德政”，但是丝毫没有减轻群众对他的憎恨。当时流传一首民谣：“殷汝耕‘坐’冀东，不下雨净刮风，修马路垫大坑，闸桥又把洋灰承……”这是人民对

这个逆贼出卖祖国罪行的唾骂。

四、实施毒化政策。殷汝耕在通州设有禁烟总局，其它各县设有禁烟分局。这些禁烟局美其名为禁烟，实质上是使鸦片公开化、合法化。不论鸦片来自何方，只要经过禁烟检查、收税、盖戳，便可在冀东境内畅行无阻。从而使贩卖毒品的成了合法的经营者，从中获取暴利；吸毒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戕害自身。禁烟局收缴了巨额重税，而中国人民却遭受残酷的毒害，殷汝耕替他日本主子亡我民族帮了大忙。更有甚者，他纵容韩、日侨民贩卖比鸦片还厉害的吗啡、白面儿，一群鸠形鹄面、衣衫褴褛者出入白面房，不知有多少人因吸毒而倾家荡产，鬻妻卖女，殍毙于沟壑，这纯属一件胜似刀枪的杀人利器。

日寇不仅用毒品摧残中国人民的肌体，同时利用各种手段毒化人们的思想。他一方面设置新民会、宣抚班，修建广播电台，出刊“冀东日报”，作为反动宣传的喉舌，鼓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支持“大东亚圣战”，胡诌“中日同文同种”等谬论，另一方面还纵容各种反动会道门大肆活动。一时间冀东上空的瑟瑟阴风使人窒息。

尤为阴险的是对青少年一代实施奴化教育，在国语课中增添许多有关“中日亲善”的内容；篡改历史和地理教材；增设《孝经》等经学课；建立童子军灌输日本武士道精神；编造一些反动歌曲等。总之，通过各种渠道，使用潜移默化的伎俩，毒化广大青少年的幼小心灵。

五、日寇殚精竭虑妄想保住它炮制的两个先天不足的“怪胎”——伪满洲帝国和伪冀东自治政府，摆出一副貌似国际上业已承认的样子，指使这两个傀儡政权，各自派出大规模的使团，进行互访。1936 年 4 月 15 日殷汝耕派出以池宗墨为首的“冀满友好访问团”，出访伪满。除了拜访傀儡皇帝溥仪、“国务总理”张景惠、“外交大臣”张燕卿以外，还奴颜婢膝地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

植田和参谋长坂垣、宪兵队长武部，以及日寇在东北的大小头目，都一一叩谒。特别是面对东北沦亡五载，饱遭蹂躏，在鬼子屠刀下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白色恐怖，一片凄凉景象，而池逆却昧心地大肆吹捧："恭来满洲帝国，修聘数日间勾留备睹，所谓王道乐土之实在情形与中国南方各报所宣传者完全不同。""况种种建设无不有迈进突飞之势，处处涌现出蓬蓬勃勃之新气象，此果出于皇帝陛下励精图治之圣谟。而大日本帝国指导之功，亦诚不可没。""现在满洲帝国……王道之成绩伟矣哉！日满合作之效果宏矣哉！"一个月后，伪满也派遣以高崇禄为首的答礼使团，回访伪冀东政府。殷汝耕出动军民学生数千人，夹道迎接，挥霍巨资，隆重款待。这两条老狗，梦想通过其主子导演的这场丑剧，延长一点短暂的寿命，但是尽管他们强作欢颜，也掩盖不了内心的空虚，更挽救不了必将灭亡的命运。

六、拼凑镇压人民的军队。殷汝耕除了仰仗日本军队的卵翼外，自己也拼凑了 4 个保安总队和 1 个教导总队。其中第一、二总队本来是根据"塘沽协定"，不准中国军队进驻冀东非战区，该地区治安由警察负责。为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从 51 军抽出两个团，改编为两个特种警察总队，由张庆余、张砚田担任总队长，分别在武清、沧县训练。于 1935 年 5 月进驻冀东，第一总队先驻蓟县，又移防通县。第二总队驻抚宁，后均改为保安队。1936 年改编为冀东保安第一、第二总队，所以它不是殷汝耕的嫡系。第三、第四总队是 1935 年和 1936 年先后由滦县、唐山一带地方武装改编的，部队素质和装备都不如一、二总队。此外，在通县还驻有一个教导总队，它装备精良，士气旺盛，虽然名义上殷汝耕兼任总队长，实际上是张庆余掌握实权，其中还有一些没有丧失民族气节的官兵，如原警察大队督察长沈维干等。

殷汝耕为了维护其统治拼凑的这支极为复杂的保安队，最后反而成了他的"掘墓人"。

斗争火焰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冀东和殷汝耕的叛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冀东600万群众更是义愤填膺。1935年11月底，平津旅平同乡会及各界群众代表联合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昌平、香河、玉田、宁河、顺义、三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11县的爱国人士，先后发表“绝不附逆”的声明；临榆、昌黎、乐亭、卢龙、迁安5县县长相继离任赴省；华北教职员会议，也一致请求南京政府迅速采取步骤，保持全国领土及行政之不可侵犯；12月2日河北省旅京（南京）同乡会张继、李煜瀛转请南京政府速定解决冀东问题大计；12月8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师生发表宣言，反对自治运动；通县省立男、女师范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商讨对策，并和日伪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决意不当亡国奴而迁校北平，以示抗议，师生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分别迁往北平皮库胡同和干面胡同；12月9日北平大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卖国、反自治”的示威游行，这就是震撼国内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上述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使这个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如置于即将喷发的火山之口。

对于日本的侵略和韩侨的欺凌，不仅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就连伪保安队内部也孕育着强烈的反抗情绪，不少士兵常常路见不平，起而斗争。如通州西大街佐藤洋行的“博役”狗仗人势，在福来商行无故动手打人，保安队3名士兵上前劝解，却遭到这个“高丽棒子”的蛮横殴打，保安队气愤之下把他扭送总队，佐藤洋行几次前往要人，都遭到拒绝，后经日本顾问斡旋，才将那个“博役”释放。类似事件，屡见不鲜。

1936年驻昌黎的保安队200多人，在大队长张国乾的率领下，举行了起义，占领邮电局，紧闭城门，守城3日。日本大队

长古田前往谈判，妄图把起义官兵骗到唐山缴械。保安队将计就计，假意应从，乘机挟持古田上了火车，中途击毙古田，向北撤退，投入抗日行列，对广大保安队官兵影响极大。

北平的党组织在一二·九运动以后，随即派出共产党员深入冀东城乡，以教书、行医等职业作掩护，从事“反自治”的抗日救国活动，如北大学生王少奇、卜荣久、白坻中、刘卓群、王学黎等，利用假日到蓟县的龙山、太平庄、龙王庙等地发动群众，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自此冀东地区抗粮、抗捐的斗争日益激烈。他们还帮助通县简易师范学校搞起了“落叶社”，创办了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的《落叶》刊物，编写爱国主义内容的读物，给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思想，从而抵制日伪奴化教育的影响。共产党员黎巨峰、王自悟等同志，通过各种关系，多次会晤张庆余、张砚田等人，作了大量的工作，对保安队七·二九起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尾　声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出笼之日起，仅仅一年零八个月，就在 1937 年 7 月 29 日，在通州爆发了一起轰轰烈烈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殊死斗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通州事变”，或称“冀东事变”，确切一点说应该是“驻通州保安队‘七·二九’起义”[①]。它不仅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同时也彻底摧毁了殷汝耕的全部班底。7 月 30 日，日本酒井部队 1000 余人和一队日本警察，气势汹汹地开进通州城，大肆搜捕，疯狂屠杀，短短几天竟有七八百无辜群众惨遭杀害，至于奸淫妇女、焚毁房舍、谩骂殴打、人身侮辱等暴行更是罄竹难书，真是“乌云压城城欲摧”。而一些无耻的汉奸走狗，却在鬼子面前摇尾乞怜，为被杀死的日韩人修亭树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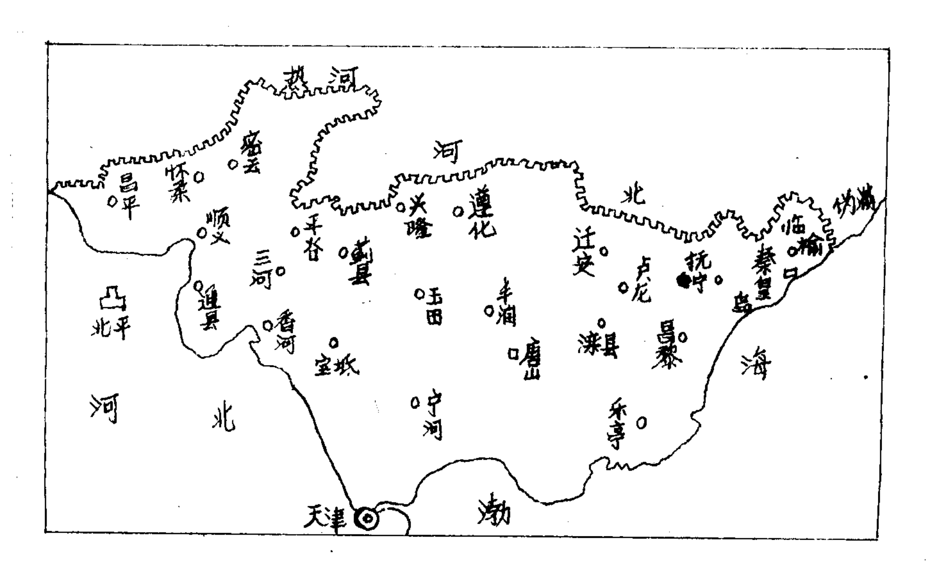
① 本会编辑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一书中有详细记载。

墓建塔，骚乱了两三个月才逐渐平息下来。日寇在对通州百姓暴戾恣睢、狼奔豕突的同时，逮捕了殷汝耕及其喽罗，进行审查。由于起义当天，惟独池宗墨离通外出，日寇觉得他与起义事件毫无瓜葛而受到信赖，因此在 1937 年 8 月 10 日把他扶上“政务长官”的交椅，迁“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于唐山。时隔不久，日本完全控制了华北，冀东傀儡政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938 年 2 月 1 日予以撤销，所辖 22 县归属伪河北省。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存在虽然仅仅是弹指一瞬，却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一页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汉奸殷汝耕出卖祖国的罪恶史实，同时也记录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顽强斗争的光辉事迹。

【作者简介】王文续，通县教师进修学校离休教师，政协通县文史资料委员会顾问。

（通县政协供稿）



日伪统治下的长辛店

刘秉德

日寇侵占长辛店

1937年7月6日夜间，我在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同事们坐起来互相猜测枪炮声的来历，大概又是29军打靶吧？议论了一阵还接着睡觉。天明7月7日（农历六月初一），这一天按例是我们懋德生商号改善伙食的日子。早晨同往常一样，我买了肉准备馅儿。8点钟左右，我们正在柜台里边包饺子。忽然看到街上有伤兵从北向南走过，有的头上扎着绷带，有的脸上贴着纱布。大家觉得很奇怪，打靶怎能伤了自己人呢？大家边包饺子边议论，但是谁也没想到会同日本开战。此时机枪声像放鞭炮一样响着。9点钟左右，警察下街挨户通知："我军在卢沟桥同日本军打起来啦，街上要戒严，赶快上门。"随后29军巡逻队在街上驱赶闲人，开始戒严，各商店相继关门停业。8日，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扫射，警察通知各商店挖防空洞，部队传授防空常识。开战以后，日机几乎每天都轰炸，但是它的目标是沿着小清河我军阵地。侥幸的是没有往街里扔炸弹。

长辛店是战略要地，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地处炮火射程之内，人民身家性命随时有被毁灭的危险。但是各界人士比较沉着，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听说有人外出逃难。主要是近年来29军对敌

斗争的英勇气概，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他们能顶得住日寇的进攻。近年来日寇任意欺压我国，压抑在群众心中的怒火此时也迸发出来。群众就是一个念头，军民团结把日寇赶走，所以各界人士都积极支援抗战。

部队从长辛店及附近农村征集来的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前线协助战士们挖战壕、修工事、送子弹、抬伤员，还往前线送给养，并且把他们在前线亲闻亲见我军英勇杀敌的动人情景，不断向后方传送。他们回来逢人便说我军昨夜摸过去又消灭了多少鬼子等等，极大地鼓舞了后方群众。

长辛店的商民，在商会领导下，从各商号抽调了一部分人，日夜在商会值班，为部队筹集柴草，代购蔬菜及其它物资。各商号还给加工馒头和烙饼。这些支前物资，每天按时准备好，由征集来的民工送往前线，保证供应不缺。商会还配合地方政府，向会员宣传我军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稳定人心。有些大商号还腾出房子让部队住。商会和其他各界人士一起组织慰问团，慰劳前线将士，大大鼓舞了士气。机车厂工人全力以赴，日夜给部队磨大刀，修枪炮，鼓励他们多杀鬼子。据说有的工人连家都不回，昼夜奋战。厂子里还大量支援军队钢铁器材，用以修筑工事。

令人敬佩的是29军将士军纪严明，公买公卖，不骚扰百姓。商会为他们筹集的物资，照价付款。当时没有固定的兵营，有许多驻扎在大街各商号，同群众相处得很好。常听他们说：只要政府有决心，我们就敢和鬼子拚。抗战开始以后，战士们慷慨激昂，在武器精良的鬼子面前，毫不示弱。他们的武器装备，确比敌人落后，甭说飞机，连汽车都没有。大炮靠马拉，行军凭两条腿。他们一边打仗，一边修工事。在长辛店东山坡和大宁村、文庄子、高佃一带修了一条战壕。用的器材全是战士们用肩膀扛的。我亲眼看到几个人抬一根铁轨，从机车厂抬到高佃，的确很艰苦。29军虽被人称为“杂牌军”，待遇上备受歧视，但是他们有一颗爱国的

红心，手中的大刀就是得力的武器。这些爱国将士，白天坚守阵地，夜间摸到敌人阵地上用大刀砍杀鬼子。近日几乎天天有大量杀伤鬼子的胜利消息，大家听了无不拍手称快。

仗一打起来，通往北平的交通中断，平汉火车只到良乡。原来有一趟小票车，往返于长辛店北平之间，此时也停驶。后来我方与日军再三交涉，达成协议，暂时恢复。原来的平汉铁路直达北平西车站，卢沟桥有一站，地点在城北，当时叫北沙岗（即现在的瓦窑一带）。抗战开始被日军占领，小票车到北平必须经过此处。具体条件是火车可以通，但必须接受日军检查。乘客到此不准下车，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以后才放行。

战争延续到7月26日又紧张起来，火车也停了。这一天敌机轮番轰炸。29军的一个指挥部设在商会院里（现在镇办事处），商会迁到北隔壁（孚盛煤铺）办公。敌机冲指挥部扔下一颗炸弹，因目标没有找准，炸弹落在南隔壁赵油房院内，幸未炸死人，只一人受点轻伤。

这一天我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据说我军已经越过永定河，又削了多少鬼子，人们非常高兴。次日（27日）又传来特大喜讯说：河东日军撤退啦，我军已经占领丰台，卢沟桥车站也被包围。人们奔走相告，都说日本鬼子可要完蛋了。不料到夜间10点钟左右，日军又开始打炮，炮弹落到铁道西红砖窑。这里并无军事设施，炮弹落在这里，也许是长辛店人民的侥幸，或是有意扰乱人心。这夜的炮弹就从我们头顶上空唰唰飞过，听得很清楚。直打到深夜两点多钟才停。人们传说，是沙岗敌人被我军包围在一个碉堡里，从那里打来的炮。这天夜里人们都没很好睡觉，天快亮时听见街上车、马、人奔跑之声乱作一团，不知何故。天大亮声音停了，我仗着胆子到街上一看，有的商店的人从门缝往外探头，有的隔门缝往外瞧，街上行人很少。不时有少数从机车厂回家的工人说：“军队全退啦，厂子里的大人物都跑了，只要是带轱辘的

都带走了（指火车、汽车等）。”此时我们才明白。昨天还热火朝天的抗日，今日像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如何应付这场大灾难，人人心里都在打鼓。

7月28日下午两点左右，日军开进长辛店。约4点钟，日本宪兵带着翻译，端着大枪，气势汹汹地到大街各商号，挨门挨户搜查。幸亏当时没有杀人。我们粮店有一支枪，是过去自卫用的，仗打起来就藏在顶棚里，未被搜着。以后交到商会，统一由伪警察所收走。

日军占领长辛店以后，进行休整。据说有的兽兵在南关外住户找“花姑娘”，年轻妇女躲走的不少。有一支部队驻在离懋德生不远的小老爷庙（现在十中学生宿舍），利用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为他们抓夫修马路，并向商号征用骡马，由日本兵带着翻译，到有骡马的铺户挑选。懋德生最好的一匹骡子被选中，牵走以后只付给日本老头票20元，当时这头骡子实值200元。说也奇怪，这匹骡子到那里连续3天不吃不喝。日兵认为有病，让粮店给换了一头。这头骡子回来以后，又吃又喝照旧干活。我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我觉得牲畜比汉奸还强，懂得反抗日寇。

驻在这里的日本兵常到粮店串门，有一名上士班长叫赤野的，多少会点中文，偷偷地用字条写给我们看。他说：“我们这次来打仗是办法的没有。”有时还写“中国人好人，蒋介石恶人”。有时还教我们学日语。出发前，偷偷地写了条子给我们看：“明天出发攻击保定。”由此可见，这场侵略战争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在日本人当中也有反战的。

日军开走以后留下部分留守部队，把一家杂货铺叫北永顺成的（坐落在大街大院口外）强买过来，改为日本妓院，从它国内征集来的妓女，供日本官兵玩乐。常看有的兽兵喝得醉醺醺的从这里出来，端着大枪拿中国人取笑。所以人们一见这样的人，就赶紧躲开。这块地方，解放后改作了部队的招待所，现在是家属

宿舍。日军还在西峰寺建立了一支狗队，专门训练军犬。这支部队特别坏，军犬每星期都得到东河洗几次澡，兽兵们牵着军犬从大街通过，有时故意发坏，对准行人用手一指，狗就去扑人，即便咬不着也吓一跳。所以每逢狗队一上街，群众就得往两边铺子里钻，兽兵们却看笑话。据说这支狗队害人不少，凡是沾点政治嫌疑的，有的就让狗咬死。我虽没有亲眼看见，但确有此事。这是日寇杀人的一种恶劣手段。

敌人扶植的伪政权

日寇占领长辛店之后，为了实现它灭亡全中国的阴谋，开始在后方建立各种伪政权。搜罗一些汉奸、地痞、流氓当爪牙，替它推行灭亡中国的各项政策，残害我国人民。不久在长辛店成立了维持会，会长叫连步云，住长辛店大街。此人是一名失意小政客，国民党时期当过区长，下台后在家赋闲。日本来了以后他大显身手，打着大旗欢迎日军，协助日寇维持秩序，建立伪政权，卖了不少气力。

长辛店成立了镇政府，镇长叫郭子清。在他手下，建立了保甲制。把大街分段划为若干保，十家为一甲，选甲长一人。十甲为一保，选正副保长各一人，为敌伪政权服务。

不久伪宛平县政府也由六里桥迁到长辛店。第一任县长叫雷恒成。县政府就设在原小老爷庙。县政府内有日本顾问，实际是“太上皇”。还设立了县警察所，在一些较大的村镇设立了分所。后来又建立了一支武装，叫警备队，替日军镇守后方。在农村则利用恶霸地主建立农村武装，专门对付八路军。如高陵村（现在划归房山区）的吴梦瑞、吴梦九就是东南乡的一霸，拥有一支自卫队保护自己，任意欺压乡亲。吴梦瑞在宛平县任有职务，吴梦九在家领导自卫队。有一次吴梦九被日军抓走，让他的一名亲戚贾某作证，贾说不认识，被吴怀恨。有一次在粮食集上吴梦瑞遇见

了贾某，不由分说揪住就打，并质问他为什么说不认识吴梦九（贾吴是表亲）。弟兄二人在东南乡独霸一方，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1940年3月30日，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原华北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任委员长。王上台以后帮助日寇毒化国人，麻痹人民思想。从以下两件事可以看出：第一件是鸦片开禁。过去政府多次明令禁止种、吸鸦片，虽然没有完全禁绝，但是吸鸦片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有，也是偷偷摸摸的。这次开禁以后，北平粮食店、煤市街一带纷纷开设大烟馆，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躺在那里抽大烟。长辛店当时也开了一家。这个委员会还鼓励人民种鸦片，当时长辛店南关外有人种了一块，特别引人注目。因为青年人都未见过，成熟时不断有人观看，我就是第一次见到此物。第二件是"尊孔复古"，提倡人的穿着打扮学习古人，男人穿长袍马褂，女人裹小脚。还准备在中小学里增添《四书》，让学生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将来当日本人的驯服工具。因遭到人民的抵制，增添《四书》没有实现。

王克敏还来长辛店"视察"过一次，县政府和警察所忙活了许多天，让各商号平垫街道，大搞卫生；还要求每个商号门前摆一个垃圾箱；强迫各家贴欢迎标语，并组织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欢迎团。王克敏死后由朱深接任委员长，未几朱深也死去，改换王揖唐。日寇投降以后，1948年王揖唐被国民政府逮捕处死。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压迫与欺侮

伪政权建立以后，长辛店已成日寇、汉奸、特务三结合的天下。它们凭借日本人的势力，欺压群众，敲诈勒索，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有一名叫韩德明的，外号韩老疙瘩，原来就是一个地痞。日本刚进长辛店他就冒出来，帮助日军抓人修路，做苦役，当

了小头目后，狗仗人势甚为嚣张。一天他拿一张日本票到懋德生要兑换法币。老职工解子绶说："现在日本票还没有流通，不知怎么换，请您过几天再换。"他当时就火了："你敢不要日本票，我去找日本人来。"吓得解直说好的，又作揖打躬，别人也相劝，结果给换了才完。

伪宛平县政府离懋德生很近，粮店因此经常受到伪职人员的骚扰。有一次一名叫阮春芳的伪职员指使他老婆到粮店赊一升绿豆被拒绝，结果用现钱买了一升。回去不多时，两口子端着绿豆找来，硬 说没给够，不由分说揪住解子绶的脖领子连打带骂，还要揪到县政府。后来经本店同人和顾客解劝，又给添了些才作罢。当时这样的例子在各商店是不胜枚举的。

日寇占领以后，一些城门、桥梁、车站都由日军把守。中国人通过，必须向兽兵鞠躬。有一次我从北平乘火车回来，出站时没向岗哨鞠躬，刚出站就把我喊回来，我觉得不好，赶紧找补。不料这个兽兵背后藏着一根棍子，抽出就打，幸亏我用胳膊挡开，未打着脑袋。

有一次在丰台车站，见有四五十个由东北回来的人，是被日军骗去挖煤的苦力，因累病不能干活才被遣送回关内。这帮人是保定一带的农民，身上衣服褴褛，如同乞丐，被日军作践的不成人样，旁人一见都躲着走。车站的伪职人员，见此情景不但不加怜悯，反而大声斥责。一个伪职员说："大家闪一闪，让这帮臭要饭的先上。"让人听了非常刺耳，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一上车，已经在坐的日本男女，纷纷往别的车厢躲，主要是嫌 他们脏。我和他们坐在一起，谈起来才知道是从黑河煤矿回来的。他们说："那里死人多啦，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死了当时就地埋在雪坑里了。我们实在不能干了，只是还有口气，所以才放回来。"

决不作"顺民"

在抗日战争中，长辛店人民遭受敌伪的蹂躏整整8年。这8年当中，死心塌地为敌人服务的是极少数。多数人同敌人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人心的向背。人们对抗战前途始终表示乐观，虽然大半个中国被敌人占领，从不认为我国就算失败到底，以为中国军队早晚还会回来；每听到一次中国军队胜利的消息，都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如"八·一三"上海军队的英勇抵抗，平型关、台儿庄的伟大胜利，总是念念不忘。1942年以后八路军对敌斗争的具体事例不断传来，更加鼓舞人心。对于敌伪什么"王道乐土"、"共存共荣"、"中日亲善"等等宣传，根本不予理睬。对于敌人布置的一些事情，能推就推，得搪就搪。仅就工商界与敌人周旋的一些情况来看，当时敌人不断向各商号要人，修炮楼，看铁道，做杂差，只要向伪警察花点钱就能应付过去，实在顶不过去就雇点老小去顶替，反正谁也不让自己人去。当时敌人对于战争消息封锁很严，真消息听不到，因此人们千方百计偷听电台广播。1944年以后，美国空军开始敌后袭击，长辛店上空经常能看到美国飞机在盘旋，火车站附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千疮百孔的火车头。飞机一露面人们不但不怕，而且争着看。每天夜间国民政府广播一次敌后轰炸情况（"盟军总部××号公告"），我几乎必听。此时八路军、游击队也深入到长辛店附近，不断袭击敌人。如一夜之间起走敌人在长辛店警察所保存的两千来支步枪、夜袭二老庄兵营。这些具体事例令人鼓舞，人们已经看出敌人的末日到了。

在经济方面，敌人的政策是把粮、棉、煤、盐、煤油等列为战略物资，由日本人控制。外运必须由日本特务机关开许可证。但是办许可证又很不容易。因此商人就采取捉迷藏的办法，你在明处卡，我就在暗处捅（指向伪职人员及警察花钱），任何物资都可

弄出来。1943年敌人实行“强化治安”，物资管制更严，专门设立了经济警察，监视物资出境。粮食一次准卖2斗，多卖除扣留实物外，还把卖方送警察所或宪兵队。伪市政府还规定，关闭粮食集市，冻结城区粮食，不准出售。只能出售把粮食、糠麸、豆饼等20多种东西掺在一起磨成的混合面。不准出售净米净面，违者受罚。混合面群众也得起早排队，有的人还买不着，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长辛店粮店虽然没有磨混合面，但是群众抢购使粮店难以招架，存粮被抢购一空。当时连火柴、手电筒都算违禁品，给一些伪警察和特务造成敲诈勒索的机会。这种混乱局面敌伪也有些担心，此时伪宛平县长已换成韩桂泉，他亲自到商会向会长王茂亭假惺惺地诉说了自己的“苦衷”。粮食集市重新开放后，价格上涨了将近一倍，售货限额未变，经济警察在大街挨家串。两个多月以后，日本人由东北调来部分玉米，使缺粮情况有所缓和。

物资出境限制虽然未变，但是有的商店也能把货弄进来卖出去。如从城里往外运货要许可证，只要在广安门岗哨花点钱，什么货都能运出来，敌人根本无法控制。

长辛店的商店到市内办货，须经两道关卡。一是广安门，二是卢沟桥，哪一处花不到钱就被扣留。出售时同样买通南北两头的警察和警备队，有时特务也到商店找麻烦，特别是卖给山区限制更严。虽然如此，当时德泰厚的煤油、食盐，恒兴永的米面，都销往门头沟和房山县的南北窖、班各庄、黑龙滩等地。发货时派人跟车，带上钞票，哪里拦截就用钱堵，如此与敌人周旋了8年。可以证明，长辛店人民没有作日寇的顺民。

【作者简介】 刘秉德，山西太谷县人。解放后任长辛店工商联副主任至退休。曾任丰台区政协一、二、三届委员。

（丰台区政协供稿）

日伪统治下的温泉

韩 杰 黄国耀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华北平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这年农历九月初一（10月4日），日军由青龙桥向温泉地区追杀抗日武装“红蓝箍”，天上飞着一架飞机，地上马队跑在前面，后面步兵坐在卡车上，凶神恶煞般地向温泉、苏家坨一带扑来。飞机飞得只有树梢那样高，机关枪声不断响起。正忙着在地里种麦子的农民被这景象吓坏了，有的躲进玉米秸垛，有的向村里跑。而横冲直撞的日本兵见有人跑就开枪，并用刺刀在玉米秸垛里刺来刺去。

从这一天起，日军侵占了温泉地区，温泉地区的人民就开始陷入了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

日军驻扎在温泉显龙山北侧原中法大学附属温泉小学里。开始时日本兵有20几个人，排长叫山下。以后常留在温泉据点里的日本兵只有四五个人，其余的分别驻扎到阳坊、南口一带。温泉另有伪警备队一个排和伪警察三队，共计100多人，队长周秉仁，副队长张歪脖。附近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和自卫团，训练棍兵，负责维持各村治安，为日伪军筹集粮草。从温泉往西10里，北安河、大觉寺以及西山一带，即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区，温泉就成了双方拉锯地带。白天是日伪统治，夜间八路军、游击队便进村开展活动，打击敌人。

为了防备西山游击队的袭击，日军命令拆毁辛庄村的“黑楼”，用其砖石木料在温泉修建一座三角城。“黑楼”是明代大太监高时明修建的养老的家庙，名“石楼别墅”，园门上刻有“玄同道院”四个大字。因其主建筑是有暗井的两层地堡式小楼，故当地人都叫它“黑楼”。日伪军强迫附近48村的农民，赶着大车来拆“黑楼”。农民们故意消极怠工，监工一走便都站着不干。监工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对民工们随便拳打脚踢，稍有反抗便要罚跪，大热天，让人跪在太阳地儿里，双手举着砖，头顶一碗凉水，坚持不住就要遭受一顿更严厉的毒打。这座三角城依托温泉显龙山而建，山顶建有碉堡和工事。自碉堡沿山势而下，分别建有西北走向和东北走向的两堵大墙，与山下一道东西走向的大墙相接，整座城池呈三角形，东、西各有一门，取名叫“胄乃城”。这座城把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要道围在城中，城外拉有铁丝网，还有树枝子夹成的鹿寨，企图阻挡抗日武装的进攻。1942年胄乃城修好之后，日本侵略者召开庆祝会，从北平城里找来戏班子搭台唱戏。但附近百姓对日本兵又恨又惧，都不来看戏，台下空空荡荡，弄得他们不欢而散。

日伪统治时期，温泉地区人民的生活苦到了极点。日本侵略军为了防止抗日武装的活动，夜间实行戒严，老百姓不许点灯，谁家点灯，日本兵就向屋里开枪。南安河村张小宝晚上学算盘点灯练习，被巡逻队发现，毒打一顿后还被抓到温泉据点内关押，后被人保出，幸免一死。白天，中国人见到日本人不许跑，如跑就会挨枪子。农民们整日提心吊胆，无心种地，又赶上那几年不是旱，就是涝，还闹蝗灾，地里没有收成。农民们吃不上饭，生活极端困苦，很多人不得不到张家口一带逃荒，或是到门头沟煤矿背煤，以换一口饭吃。在家的老弱病残，吃糠咽菜，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日本侵略者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当地小学必须开日语课，在学校上操必须喊日语。来往的中国人从三角城经过，见

到日本人要鞠躬，用日语问好。每家农民还必须准备一面日本旗，日本兵进村都要把旗子插在大门口，以示这户为“良民”。

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大肆屠杀无辜人民。在日本占领的8年时间里，温泉地区被日本强盗屠杀的就有100多人。三角城东南有一片低洼地，是日本强盗杀人的地方，被人称为“万人坑”。直到解放后，人们在那儿种上了果树，翻地时还多次发现人的头发和骨头。

张景林，南安河村人，是个穷苦的农民。他因被怀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就被特务、日本兵抓到温泉据点内严刑拷打，逼他供出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当时正是7月下旬，天降大雨，趁着敌人看守的疏忽，他跳窗逃到村外玉米地里，用农民的锄割断绳索，跑回家中，还没站稳，敌人就追了上来，把他五花大绑，又抓回温泉。在温泉三角城内，日本兵放出狼狗，将他撕咬得遍体鳞伤，连鼻子都咬掉了。最后，将他拉到“万人坑”枪毙了。

辛庄村夏占敖、沙涧村李秃子，都是给地主扛长活的穷哥们。他们参加了抗日武装“红蓝箍”，有一次走到马坊村一带，被日本特务抓住，带到温泉据点，在“万人坑”被枪毙了。在此处被杀害的附近农民还有前柳林村甄小龙、周家巷村二林子等人。当时在此处被杀害的人中有一个由于气嗓未断，后缓醒过来，自己爬到白家疃村西头老爷庙的一个茅房里，又被日本特务逮住，就地杀害了。

有一次，日本兵从沙河一带抓到3个抗日游击队员，企图押解到温泉审问。但这3个游击队员宁死不屈，一路上竭力反抗，大骂不止。于是在走到温泉东北边3里远的于庄子村头时，就被日本强盗杀害了，尸首随便掩埋在马路沟里，后被野狗和狼拖出，咬得稀烂。

日本兵还从附近农村抓来8名青年妇女，带到温泉据点内，肆意侮辱欺凌。受害者家属倾家荡产，苦苦哀求各村维持会长出面

讲情，几天后，这8名受尽凌辱的妇女才被放回。

温泉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1940年，在温泉村北2里地的辛庄村首先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支部由黄世兴、于福安等3个人组成。贫苦的农民如同在漫漫长夜中望见了明灯，迅速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温泉地区由于处在敌我拉锯地带，因此形成了敌我阵线参差交叉的复杂局面。各村维持会里都有一些人，白天日本鬼子来了，就应付日本人，夜间八路军来了，又为八路军服务。即便是维持会里的铁杆汉奸，由于惧怕游击队也不敢轻易陷害抗日干部和群众。日本鬼子在各村发展物色了一些特务，秘密为日本人服务，但这些都逃不过抗日群众的眼睛，村党支部专门安排一些革命坚定的农民"看特务"，监视特务的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各村都建立起红色联络站，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站岗放哨，为西山游击队送信，运送布匹、胶鞋、食盐等物资，护送城区革命干部到解放区去等等。

村党支部在西山游击队的支援下，带领农民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温泉、辛庄经常组织几十人到南口至沙河之间的埝头、马池口一带拆毁日军的铁路。有时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到太舟坞一带锯电线杆。1944年，游击队在夜间炸毁温泉三角城东门外的禹行桥，烧掉城边的鹿寨，并且向城内放冷枪，吸引敌人的枪炮，给予敌人很大打击。当时参加过战斗、站过岗、送过信的许多人现在还健在，说起当年的战斗，仍然眉飞色舞，充满了战斗的豪情。

温泉村的许多老人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坚强不屈的八路军女干部。她叫李淑琴，中等身材，圆脸盘。她从西山上下来，身上带着边区小报，到这一带农村宣传抗日道理，被温泉的日本特务抓住，捆绑在三角城内的一棵死杨树上。日本兵和特务对她严刑拷

打，威逼利诱，让她供出游出队活动的情况。李淑琴坚贞不屈，大骂日本强盗，历数他们的侵华罪行，并且咬紧牙关，一连几天不吃不喝，进行绝食斗争。有的农民还记得当时在夜间听见她被拷打时的惨叫声。后来，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她得到了日本兵的一支手枪，骑着敌人的自行车逃出了魔爪。

1945 年，日本投降了，温泉地区的人民才从日伪统治的魔爪下解放出来。

为撰写此文，作者曾多次采访知情人，其中温泉村村民胡宝山（现年 72 岁）提供了不少亲见亲历的材料。

【作者简介】 韩杰，45 岁，曾在温泉生活和工作过多年，写过多篇反映温泉地区人文历史的文章。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干部。黄国耀，65 岁，温泉乡政府干部。

（海淀区政协供稿）

日寇在南窖统治的六年

张玉泉

南窖位于平西南、房山西北部70余里的山区。该村历史悠久，人民勤劳，周围的群山中不仅有丰富的地下煤炭资源，而且是平西南广阔平原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寇为了掠夺这里的煤炭资源，破坏我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于1939年4月至1945年6月，在这里统治了6年半之久，当地人民受尽了蹂躏。

1939年4月13日凌晨，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全副武装开进南窖村，在伪大编乡乡长罗桂德的接应下，驻进村中心范家和杨家大院（当时百姓称这里为狼窝），立即召集地主、汉奸、伪大编乡的头子们开会训话，筹划建立伪政权和武装，以巩固他们在这里的统治。

一、奴 役

日寇驻扎的第3天，便遭到我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袭击。他们开始修岗楼、筑地堡、挖壕沟、村头路口建栅门等，通过伪大编乡、维持会三天两头催款、要材料、出民工，由伪大编乡委派工头监督民工。稍有懈怠，轻者挨罚、挨棍棒，重者致残或砍头。日寇在北山山顶上建有三层楼高的炮楼，楼下有暗堡，配有重武器，楼上建了10间平房做饭厅、仓库，四周是2米宽3米深的壕沟。周围拉上电网，网上挂满罐头盒，遇有动静就发出响声。岗

楼内的日寇吃、喝、用都由老百姓按时往上送，上下山往返10多里，都得人背肩挑，或毛驴驮，逢年过节还要送烟、酒、肉、水果。无论平日、节日，如不按时送到，日本兵便拿汉奸们问罪，或下山到百姓家里抢。

伪大编乡的伪军、伪警察在南山建了两层楼高的炮楼，他们的吃、喝、用也由老百姓定时往上送，稍有不顺心便拿老百姓出气。他们还在村内南、北、西三条主要路口修建了大门，安上铁栅栏，昼夜有日伪军站岗（街上设流动岗哨）。老百姓出入要出示“良民证”，还要给日军鞠躬、问“皇军好”，如若违反，不仅不让进出，还要挨整。一次，李丙山父子到山上种地回来晚了，进山门时没鞠躬、问好，日本兵不仅打了他们，还让他们双手举起一块大石头，嘴里刁一块小石头罚站。

日军出村去“扫荡”，或攻打八路军驻地，都从村里要夫子，跟在他们后头背弹药，扛粮食。战斗打响后让他们抬伤员，必要时把民夫推到前边挨打。1941年秋，岗楼里的日伪军去攻打我革命根据地马安时，从村里抓了一大批人去给他们运枪炮子弹和粮食，只有10多岁的李全中也被抓来，让他背一篓子手榴弹紧跟在后面跑，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趁督后路的日本兵不注意，扔下篓子钻进了草丛。那次许多被抓走的都没能回来。

二、封　锁

日军为了把我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困住，对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盐、火柴、袜子等实行禁运封锁，如发现有人运送，立即杀掉，致使南窖的老百姓很久没有盐吃，买不到日用品。一个外村人从县城给家住南窖的妹妹送来两双洋袜子，路遇日本兵，不由分说，被就地扎死。杏园村陈清奇到村里卖针线也被逮进岗楼，逼他交钱。第二天就被砍了头。南窖一带的百姓们终日提心吊胆，不知何时丧命。

老百姓不仅要忍受日伪军的折磨，还遭受着天灾的痛苦，从1941年至1944年，南窖地区连年发生水、旱、虫灾，所收无几。加上粮食、副食禁运，老百姓只得捋树叶、挖草根充饥，但没有咸盐又难咽下。当时村中有个“义合成”的小铺子存有30多缸咸菜汤，被百姓们抢购一空。

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少人冻饿而死。1942年春，青黄不接，董江的妻子带儿子去山上挖野菜饿死在山上，撇下皮包骨头的儿子趴在妈妈的身上惨叫。那几年树叶被捋光了，草根被挖净了，在这危难之际，伪大编乡一个头目的儿子程朴明目张胆地干起拐卖人口的勾当，那几年先后有数十名青壮年被骗到口外卖苦力，一些年轻的妇女则被卖到妓院。

三、“清　乡”

驻扎在据点的日军时常被我小股八路军、民兵袭扰。为此日军曾几次出动袭击我八路军驻地，每到一处便烧、杀、抢、掠。距南窖3里的水峪村就在一次“扫荡”中被烧掉半条街。为了防御我八路军的打击，监视我地下工作者和老百姓的联系，他们三天一大清查，两天一小清查，有时成帮结队，有时三五成群。更多的是换上便衣，分散到村内外各个角落寻找“可疑”的人，一经发现立即抓捕。1942年春，村民冯大朋从山外买了一小袋盐去山里换玉米吃，路遇日军被带到岗楼里，说他私通“毛猴子”（八路军），用刺刀挑死。

1941年秋，一队日本兵全部换上便衣窜到南窖附近的中窖村“清乡”，把村民都集中到街中训话，最后把七八个“可疑”的人带进岗楼里审讯，把他们仰面捆在板凳上，用小米掺上煤油再兑上水往肚子里灌，肚子鼓起来后再上去蹬，鬼子、汉奸在一旁哈哈大笑。有个叫杨玉清的被蹬坏肠子，当场死去。

更狡猾的是日军小队长别虎，经常穿当地老百姓的衣裳四处

探听情报，用汉语与老百姓对话，遇上青壮年农民便问：“兄弟，你抗战不？”如果你说·“抗战”，他立刻凶相毕露，把你带走收拾你，很多无辜百姓被他亲手杀害。

他们在“清乡”中发现背篓的、担担子的、驴驮的，都要检查，如有“禁运”物品，你就没了命。农民孟二印从外村借盐回来，在街上被迎面走来的别虎发现。别虎瞪起凶恶的眼睛盘问：“背的是什么？”孟说：“玉米。”别虎强行检查。机智的孟二印放下肩上的盐袋，正在别虎低头检查时，摘下头上的毛巾顺胡同溜了。别虎立刻通知各路口堵，还派人四处搜捕，结果一无所获。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南窖据点的日军感到末日来临，龟缩在炮楼里加紧战备，放松了对南窖地区的统治。当年7月我驻七区的八路军、武工队和民兵一举端了炮楼，摧毁了所有的工事，结束了日军在南窖长达6年多的统治，南窖人民重新见了天日。

（房山区政协供稿）

我在伪宛平县新民会前后

陈敬仁

七七事变之前，我在卢沟桥以北20里的古城小学教书，战争突然爆发了，我惊惶失措，顾不得学校期终考试，就匆匆忙忙想回家看看亲人的情况。我家住在卢沟桥，炮火之下不知吉凶祸福。

直接去卢沟桥已不可能了。于是西去麻峪、大峪过洋灰桥，沿永定河西侧，绕道卧龙岗回家。按说二三十里路走起来不费劲，可是一边走一边打听前边的情况，时间就耽误了。到了吕村，看到人们惶恐不安的样子，不敢再往前走了，决定到表叔家探听情况。一进村，就看到有乡亲们背着财物准备外出逃难，可也有从外地到这儿来的。

到了表叔家一看，家里人都来了，在战火中家人团聚，当然是很幸运的，只是二弟敬智、三弟敬厚，都在卢沟桥宛平县简师上学，不知为什么没出来。后来知道，他们参加了抗日活动。

卢沟桥沦陷了，没人顾得上在村里办教育，我也就失业了，随之带来了生活上的窘迫。我舅父齐久荣，原来是宛平县教育科科长，事变后日本人让他成立了一个临时组织，叫做“宛平县维持会”。这是第一个敌伪组织，开始网罗一些为日本人干事的人。我当时一是无知，二是生活所迫，就参加了。他叫我去“新民会中央青年训练所”受训，时间3个月，训练内容除了日语和体操之外，重要的一课，是“厚生”，内容是接受日本侵略者提出“大东

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等奴化教育。结业以后就分配到“宛平县新民总会”工作。这时伪宛平县公署和伪新民总会都相继成立了。县长雷恒成是汉奸，兼任总会会长，直接代他行使职权的是事务部长，是个实权人物，跟日本人联络密切。事务部长管着第一科、第二科以及一个训练所。第一科分管公文、庶务（总务）、会计、分会工作、联合协议会。除了一般性事务工作之外，还要建立分会组织。全县编成若干个乡镇，乡由十来个或几个自然村组成，多的上千户，少的几百户，镇则是人口集中的城镇，如门头沟、丰台、北辛安等。设立乡（镇）公所，选出乡（镇）长，建立新民分会，乡（镇）是当然分会，各伪保长是当然委员。具体事由一个干事去做，是经过“伪宛平县青年训练所”训练结业后，分配去工作的，这些人大部分是找碗饭吃才干这种伪职员差事的。联合协议会是每年一次的会议形式，总会长、事务部长、科长、分会长都参加例会，目的在于沟通情报，加强统治。第二科是新民会特务科，分管宣传、情报、青年团、少年团、妇女会、外围社团。其中宣传组下设新民教育馆，通过书报流通进行反动宣传，特别是在当时电影不普及的情况下，一次露天电影，有一两千人受到奴化宣传。情报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组织，由科长亲手抓，又亲自报告给日本人，跟伪宛平县警察所、铁路警务段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两个特务组织，警察所属地方性的，警务段虽说只管铁路警务，但他们权限很大，可以直接插手地方警务，在铁路沿线的车站建立“爱护村”组织，比伪保甲还要残暴凶狠。一些丧尽天良的警员，经常到百姓家敲诈勒索，稍不顺从即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轻则倾家荡产，重则遭受灌凉水，压杠子等酷刑被折磨死，有的被军犬咬死。同时，从二科组织的青年团、少年团、妇女会中物色了一些情报员，随时向他们递交情报，使无辜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所以，外围社团也是直接豢养出来的特务。另一个组织就是“宛平县青年训练所”。将在伪新民

会中央青年训练所结业后的成员派到这里做指导员工作。训练所所长由总会长（即县长）兼任，事务部长任副所长，下设主任1名，负责全所工作；有3名指导员，实际就是教员；学员有的是各乡选送来的，经过训练十天半个月就回各乡去了，不是专职人员，只是作为青年团、少年团、妇女会的骨干力量，也有招生考试来的，受训后，回到各乡（镇）当分会指导员或事务员。学习课程，上午为学科：有日语、地方自治、公文管理；下午是体操。我在训练所当了两年指导员，就调到第一科管理公文，以后当了第一科科长。在这期间，周围发生的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我看到第二科科长崔某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干事的丑恶行径，心里非常痛苦。有一次，他的情报员向他汇报：小屯乡的指导员在征缴防空墙用砖时推托搪塞。崔某立刻把小屯乡的指导员传去，又打又骂。幸亏有人帮腔说了许多好话，乡指导员才免遭关押。这一情况对我震动很大。

后来，战争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日本侵略者到了最后挣扎阶段。1944年夏秋季，美军的作战飞机，可以畅通无阻地飞到内地，日本侵略者没有任何防空能力，而美国飞机专门射击火车头，破坏运输线，使日本军用物资无法转运。日本侵略者为了保护火车头，在铁路两侧修筑防空墙，强迫各乡缴纳建墙用砖。面对这一现实，不少乡（镇）指导员都采取了拖的办法，表现一点良心。

我也是中国人，尽管在伪新民会没干过什么坏事，这名声也不好听，于是我悄悄离开新民会，到宛平县教育科当了两个月的教育科长，以后就到长辛店小学当了校长。

【作者简介】陈敬仁，北京人，1945年8月以后落户天津，担任教师职务，现已退休。

张霖整理

（丰台区政协供稿）

琉璃庙一带“集家并村”前后

鲁兴文 常宝增

怀柔县琉璃庙一带西起梁根村，南到峪道河和官地村，北止前安岭，东至今密云县的四合堂村。这一带村庄在日伪统治时期属伪满洲国的热河省滦平县琉璃庙村管辖。当时，我俩的住家都属琉璃庙村所管。鲁兴文全家拆毁家屋15间，从辛坎自然村并入冶子部落，常宝增家围在头道梁部落里。我们亲历了“集家并村”的全过程。我们的亲友有的家庭住址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他们在“无人区”的生活情景，我们也耳闻目睹了不少。写此文前，我们又找一些知情的老者，请他们介绍有关“集家并村”前后的情况，谨此说明。

所谓“治安肃正”计划

九一八事变以后不到一年时间，我国东北地区全部沦陷。1932年3月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1933年，日军从承德、滦平又向西一直占领到现今怀柔县北部和延庆县东部。随之，伪满洲国的“国境”警察来到琉璃庙一带，琉璃庙地区成了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地带”。从这里往西几十里归伪蒙疆政府管辖，往南紧挨着伪华北政府属地。

日军从军事上控制了琉璃庙地区以后，一面进行“日满亲善，日满共存”一类的宣传，一面拼凑需要长期统治的各种地方组织。

经过几年的策划，几经变化，固定了村甲的规模，完成了他们军、警、政等全套组织的配备。从军队上说，琉璃庙附近驻有伪满洲军，还驻有刘翰队、彭明队、姜振队、鞠凤队、田子队等地方性的“讨伐队”。从警备上说，以琉璃庙为中心设警察署（由日本人任署长），下设后山铺、大地、山神庙、四合堂、遮天沟梁5个警察分驻所，所内有一定数量的警察和自卫队。行政上建立了琉璃庙村公所，村下设甲，甲下为牌。从此，这里的群众陷入了苦难的深渊。特别是日伪的“集家并村”和“无住禁作地带”政策，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痛苦与灾难。

1938年，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滦昌怀联合县的工作人员来到头道梁、大地一带（属伪琉璃庙村管辖），建立地方组织，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晋察冀八路军十团进入丰滦密地区。琉璃庙地区的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十团打击敌人。同年5月，十团夜袭琉璃庙伪警所，俘虏全部伪警40余人，缴获警所全部武器和物资，并烧毁警所房院。1941年，十团在琉璃庙南10里的柏查子歼灭伪讨伐队100余人。平北地区日益发展的抗日斗争，有效地打击了日伪统治者的反动气焰。

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扰得日伪不得安宁。几乎在伪华北政府“治安强化运动”出台的同时，1941年伪满洲国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要纲”，并把滦平县列为“肃正”重点。日伪的所谓“肃正”是指“治安肃正”，它的“肃正”对象并不限于抗日武装力量，而是直接指向了手无寸铁的广大群众。

日伪统治者为实施“肃正”计划，又具体制定了实行搞“集家并村”、“部落化”，实行“国境地带无人区化”，划定“无住禁作地带”等一系列奴役、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政策。

日伪制造“无人区”搞“集家并村”目的是割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他们认为把八路军经常活动的地方搞成“无人区”，把所占领区域内分散居住的群众集中到一起控制起来，可使

所谓“民匪分离”，让共产党八路军“失去衣食来源”。出于这一目的，日伪军、警、政等统一行动，从1941年开始，前后用4年时间搞“集家并村”和“无人区化”。

无住禁作地带

1941年上半年，日伪决定把原属大地村公所（后并入琉璃庙村公所）管辖的粉头梁以南的八道河、交界河、西栅子、石片、官地、莲花池6个甲（时称南六甲）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也叫“无人区”），6个甲包括30多个自然村300多户人家，方圆二三十华里。在“无住禁作地带”不准住人，不准种地。这里的群众世代靠种地、砍山过日子，生活都很困苦，不让住无处去，不让种地没的吃，结果，少数户投亲靠友走了，大多数户没处投奔，只好与日伪周旋。后来，日伪军连续几次到“无人区”讨伐，烧毁了群众家屋，赶走了牲畜，逼群众离开。实在没路了，群众扶老携幼逃进山沟隐蔽处，搭起窝棚住着，偷偷种些地。没有吃的，以野菜野果充饥，生活苦不堪言。

1942年开始，日军、伪满洲军、讨伐队、自卫队加紧了对“无人区”讨伐“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伪军“扫荡”时见房（后来是窝棚）就烧，见物就抢（或捣毁），见人就开枪。在夏季讨伐时，还要从各甲要民工，让民工带上镰刀去“无人区”割青苗毁庄稼。民工都是种地的老百姓，不肯下手，日伪军就用刺刀逼着他们干。讨伐时，许多无辜群众被杀害。

1942年2月28日，日军、伪满洲军和伪自卫队共几百人到“无人区”进行大搜查，交界河村石小漏、石成山，石片村商显生等7名群众因躲避不及被敌人抓住，然后关进石片村商家屋内，先放火点燃房屋，又向7人开枪射击，其中5人当即死亡，2人中弹倒下，后被救活。

1945年3月27日，在日军头目的指挥下，伪满洲军和警察队100多人对八道河至石片一带进行“扫荡”，伪军到各山沟里搜查，烧了窝棚并开枪打人抓人。这次有常玉田、张怀明、李明生等24名群众被抓住，伪军用刺刀逼着他们走到尧潭沟口，先让他们站在一起，然后用机枪向人群扫射，24人当即倒在血泊中，日伪军扬长而去。这次惨案有14人被打死，其余的人受伤。死者中有60多岁的老人，也有年仅7岁的女孩儿。

小魏峪是个非常偏僻的山庄，属“无人区”，为了生存，这里的人们仍在老家搭窝棚种地。1945年4月，伪警察和自卫队讨伐到小魏峪，蔡玉合的妻子被抓住，一伪军对其刁难侮辱，遭到痛斥后，用刺刀活活把她挑死。

白水湖村的常德洲老人家里的房子被烧后，他又搭起了窝棚住，为一家人吃饭继续在山里种地。庄稼被割毁了，再种；日伪军讨伐，他逃上山。1945年5月28日，伪自卫队讨伐到白水湖，抓住了常德洲，毒打后以“私通八路”、藏有枪支为由将老人枪杀。

“无住禁作地带”的人民群众，从1941年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4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数次日伪军“扫荡”，群众吃、穿、住、用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集家并村

日伪统治者在实行“无人区”的同时，又于1941年春动员了当地军、警、政所有力量，强令群众分别到指定地点修建“部落”。按照日伪的规划，琉璃庙村所辖28个甲，每甲修建一个部落，让附近自然村的住户都搬进“部落”中居住。为了便于控制，“部落”位置基本是沿公路布点，少数不在公路沿线，但距公路最远不超过8里，“部落”之间的距离限于20里之内。“部落”的规模一般在50—70户左右，大的在100户上下。

“部落”的大致修筑是：选定一个村庄为“部落”地址，根据

附近要并进的户数所需的面积，在村周围修筑正方形或长方形围墙，把住户围在墙内。围墙一般高 4 米，宽 1 米，墙体结构不一，有的用石砌成，有的以土打墙。围墙四角筑有炮楼。贴着围墙内侧筑有 2 米多高、1 米宽的“马道”，以便人登上“马道”抵御墙外的进攻。一个“部落”一般在围墙通道处设 2 个或 3 个供人们出入的大门。每个“部落”都必须在正门旁专置一段白灰墙，用 2 米大的字写上“×××部落”。“部落”修成后，群众根据围墙的形状管“部落”叫“围子”，把日伪搞“集家并村”叫“归围子”；人们被逼进围子以后，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群众又把围子比喻为“人圈”。

开始修“围子”正是春天种地季节，日伪统治者不管种地不种地，令男女老少只要能干活的，都去背运石头、挖土垒墙。为加快进度，每个围子点都派有伪警察专门督修。群众眼看着地不能种，被迫去修围子，哪里肯出力干，况且群众非常明白围子修好以后意味着什么。因此，大家软磨硬泡不出力，与监工的周旋。后来，伪警察和伪甲长们手持木棒整日在工地呼喊着督修。来晚了的（自然村有距围子点 10 多里的）要挨打，干慢的要挨打，有反抗言论的更要打。谷雨节气过了，还不让种地，人们只好利用早晚时间偷偷地去种地。秋场村农民黄文中，起早到自家地里去整地，被当时大地伪警所所长杨守成等发现，当即把黄打得遍体是伤，不能动弹，被家人抬回后半年多才把伤养好。事后人们常议论：康德八年（1941 年）这里的老百姓只要能干活的，没有没修过围子的；参加修围子的几乎没有没挨过打的。到 1941 年秋（有的到年底），大部分围子完工。但这一年，农民的庄稼被耽误了，少收很多粮食。

1942 年初，日伪下令围子外所有住户一律搬进围子。划定给各户房基地后，逼人们先搬进围子后盖房。人们哪里肯拆毁家屋，离开祖祖辈辈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所以一再拖延。这时，日伪军

加紧对围子外自然村的讨伐，搜查八路军，有意制造恐怖气氛，伪警察、特务也四处活动，从政治上给老百姓扣帽子，说不搬进围子就以“私通八路”论处。最后，发展到对不搬进围子的村、户实行“三光政策”。到1942年夏，自然村的民房4000多间被拆毁，群众全部被驱赶到围子内居住。其结果是伪琉璃庙村公所管辖的28个甲，每甲修筑一个围子，196个自然村的1300多户、7000多口人，分别搬进各个围子。

群众并进围子以后，就失去了耕田种地、上山放牧以及和亲朋交往等各方面的自由。日伪有一套严格控制围子中老百姓的办法：从行政管辖上，每个围子为一个甲，甲下10户为一个牌，牌、甲都有邻保制度，如1户没服从管制出了事，牌内其他9户都要受株连。每甲设自卫团，任务是所谓保护“部落”安全的，青壮年都编在自卫团内为团员，在伪警察的指使下轮流在围子大门站岗，严格控制出进围子的人。并规定每天上午太阳出山开门，不能早了；晚上太阳落山前关门，不能晚了。关门后不准任何人出入。人们种地回来晚了就被扣上“勾结八路军”的罪名，轻则被打骂，重则被罚甚至关押起来。有时下地干活回来的晚，围子门被关上，人们就从围墙的泄水沟爬进，如果泄水沟被堵就要在外过夜了。日军、伪警察为了奴役老百姓，经常有意制造紧张空气，搞所谓防八路军的演习。围墙内的“马道”上按牌分段，每个成年人不论男女都在“马道”上分有“岗位”，并挂上写有姓名的木牌，规定每当听到集合讯号（敲钟或吹哨），不管在干什么事情，都要立即停下，拿起木棒或锹、镐等工具，立即跑向“马道”自己的“岗位”。晚到的、空位的要被追查。这种演习都在夜间进行，每次都有人被跌伤或因故被伪警打骂。

在围子里的苦难岁月

琉璃庙一带都是山区，当时群众居住分散，土地私有，每户

有自己的（包括租营的）地段、山场、树木，各家都在靠自己地段处居住，根据自己的家境分别在房前屋后建有猪、牛、羊圈、驴棚、鸡窝等一套设施。有的家屋附近还有小块园田菜地果树等。这些家底儿是庄稼人不可缺少的命根子，且大部分是世代居住这里的前辈用几十年的血汗攒置的。搬进围子后，这些都废弃了。因为从自然村并进围子的户，只有人的住处，没地方养畜禽，骡、马、驴、牛、羊、猪、鸡、鸭，在并“围子”过程中几乎全被处理掉。后来，围子内原有住户饲养的畜禽因经常被日伪强拉硬要，也所剩无几了。这项损失涉及各家各户，无一例外。如老虎哨村王本才是全村乃至十里八村之内数的着的富户，在原住处时，他家有地 20 多亩，有 5 骡 1 马挣钱的牲口，有 2 头驮土送粪干杂活用的驴，有牛 10 多条，羊一群（百余只），还有猪、鸡等。当时他家共雇工 7 人：种地长工 2 个，赶牲口掌鞭的 2 个，羊倌 2 个，牛倌 1 个。并进围子后，因为受围子的限制，迫使他把羊、牛、驴、马全部卖掉，又卖出 3 头骡子，只剩 2 头骡子自家赶着。雇工辞去 5 人，只留 2 人种地。并进围子一年多，使王本才这个有余钱剩米的户变得只能靠喝红高粱面粥度日了。家畜家禽的大量减少，造成了耕地严重缺肥，也影响了粮食产量。群众被逼进围子后，庄稼顾不上管，饭都吃不上，更没有时间和钱用于盖房。因此，进围子后有的户简单盖上两间，有的几户合盖一所房，十多口人在一所房里，轮流用一口锅做饭。多数盖不起房的户搭个马架子窝棚① 住。特别贫困户又缺乏劳力，窝棚也搭不起的，有的住进破庙，有的住在围墙的炮楼内。老虎哨村共 21 户人家，并进双文铺围子内 17 户，只有两户盖了房子，有 10 户靠西围墙根搭马架子窝棚住，还有 5 户搭不上窝棚住在炮楼内，另外 4 户因投靠亲朋

---

① 用 5 根 3 寸粗的圆木绑个架子，四周用秫秸抹泥为墙，顶上搭木棍、铺秫秸，抹泥苫草，称马架子窝棚。

并进其他围子，也都没盖起房子。住在马架子窝棚、破庙、炮楼里的群众，冬天透风，冻得难忍，夏天漏雨，又潮又热，更难挨。

群众并进围子后，失去了就近耕种土地的有利条件，大量土地荒芜。围子内大多数户是并进的，这些户距自己的耕地一般在三、五里之间，也有相当一部分距自家耕地在七、八里甚至十里以上，且多要翻山过梁，往返费时费力，耕作很不方便。地远运不去粪，只能生秴白点；加之日伪对围子控制得紧，劳力不能早出晚归，使相当一部分土地撂荒，耕种部分也打粮很少。据估算，归围子期间琉璃庙地区有2000多亩土地撂荒，各户平均约少打四成粮食，家家缺粮，人人挨饿。

粮食少，群众要长年以野菜、树叶等充饥。春天，吃山上的椴叶、栎芽、山菠菜，河边的柳树芽、牛舌菜，地边的榆钱、苣荬菜、人心菜和地里种的芥菜、春白菜等。夏天，吃山桃叶、苦杏仁汤及地里种的倭瓜、豆角等。秋天以杏叶（包括山杏叶）为主，还有玉米稔头等。冬天主要吃土豆、萝卜、萝卜缨、干杏叶、干山桃叶等。多数野菜树叶都需开水煮过再用清水泡去苦味才能吃。有时人们饿了没的吃，把尚未泡甜的野菜捞出来带有苦涩味就吃下充饥。野菜不加盐没咸味是难以下咽的，但有时买不起或买不到食盐只好“白（淡）着”吃了。由于长期缺粮，人们缺乏营养，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脱了像”，走道打晃儿。小孩吃菜吃得脸黄、肚大、肚皮发青。1942年夏，并进双文铺围子的王福田一家，家中断粮多日，实在没有的吃了，一天到地里打些高粱稔头拿家吃了，夜里全家从围子中逃荒走了。王春、王振元等4户，也因没吃的，全家人在夜间逃荒走了。

群众并进围子后，吃粮很少，体质差；住的窝棚内蚊虫叮咬，既脏又乱；原一二十户的村庄一下子增到七八十户，人多街窄，卫生条件差。因此围子内常发生瘟疫，常见的一是疟疾，一是伤寒病。有的一家子先后都染伤寒病，群众称之为“窝子病”。当时人

们连食盐都买不起，哪有钱买药治病，许多人在饥寒交迫又患病的情况下死去。并进头道梁围子的朱兴武之妻杨氏和黄文福等人都是这样死去的。

人们把围子称为“人圈”，一点都不过分。由于各方面的控制，山里的土特产和果品不能及时采收，即便收了也没处去卖，换不回钱来。因为这里做买卖属违法，罪名“密输犯”，要坐牢的。按日伪的规定，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对食盐、布匹、火柴、煤油等定期按量配售。但配售的物品因层层盘剥，轮到老百姓已经很少了。一年半年也买不到几斤食盐、几盒火柴。因此，日常用品特别缺。最突出的是穿的困难，当时人们穿衣太艰难了，男女老少都是混身的破烂衣服，甭说穿暖，就连遮体都谈不上。有的妇女因衣不蔽体而不出家门；有的一家一套好点的衣服，有事外出轮换着穿。多数家庭缺棉被或没有棉被，冬天夜里靠烧热炕、勤翻身取暖。

日伪的“集家并村”和“无住禁作地带”给琉璃庙地区人民带来一场重大灾难。因为它时间长达四年多，殃及到村村户户。现在一些老年人提起“归围子”和“无人区”，还沉痛地说：这样的灾难没经过，就是把过去某一年的受天灾、闹瘟疫、兵匪横行造成的灾难加在一起，也没有“归围子”、“无人区”造成的损失大。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伪满洲国也随之倒台。这里群众第一件事就是走出围子搬回老家。来不及盖房就在原房院处依旧墙搭个“偏厦”住进去。同年9月，共产党领导下的滦平县工作人员来到琉璃庙地区，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发动群众拆毁了围子（留了靠山临水和村边尚可利用的墙段）。

50年过去了，至今有些村庄的边缘处还残存着侵华日军和伪满洲国搞“集家并村”时“围子”的痕迹。但在青年中很少有人知道，每个“围子”都是一部日伪烧杀抢掠的血泪史。

【作者简介】 常宝增，72岁，日伪时期曾在伪琉璃庙村公所任雇员，现在当地务农。鲁兴文，61岁，现为怀柔县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

（怀柔县政协供稿）

日伪西郊机场往事谈

严　宽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在华北地区的统治，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决定在北平西郊修建飞机场。机场修建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于1938年3月25日开工，7月1日基本竣工并交付使用。1941年初，为了向南扩展飞机跑道，机场再次动工扩建。二期工程完工后，机场规模遂成定局。

北平西郊机场坐落在现海淀区四季青乡境内，以原柳林居村为中心，方圆占地约3000余亩。

笔者就日军当年修建西郊机场的有关历史情况，走访了部分四季青乡的老人，他们是当年修建机场的民工，有的还在建成后的机场里做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历史见证人。现将老人们所述情况整理如下。

神秘的日本房客

卢沟桥事变前不久，蓝靛厂突然来了一对日本夫妇，他们从一位旗人手里买下南大街一座叫西斋的四合院。日本男子叫青木，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中国的礼节也颇为通晓。他们住下后，不做任何营生，经常拉着一条狗，带着吃喝的东西，领着邻居的孩子到柳林居村外野餐。餐毕，把孩子们支走后，夫妇俩就开始画画，天天如此。起初，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用意，还以为

是画家写生呢。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土木工程师，奉命来此画飞机场的工程设计图。据说，他们将西郊一带的村庄、交通要道，甚至这一带的水井、庙宇位置都详细地画了下来。卢沟桥事变前夕，这对日本夫妇卖掉房子回国了。

1937 年 9、10 月间，蓝靛厂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领头的自称是青木的弟弟，名叫黑木。他骑着高头大马，手拿图纸，边走边看，并向行人打听几位蓝靛厂人的名字。由于行人疑其意歹，都佯装不知，黑木只得带着队伍走了。

1940 年左右，青木拖着受伤的残腿，一瘸一拐地又出现在蓝靛厂。他先到曾经居住过的西斋看了看，又走访了几位老邻居，此后便杳无音讯了。

日伪勾结建机场

1938 年 3 月和 1941 年初，在日本侵略军和伪华北临时政府授意下，中坞、小屯、南坞、蓝靛厂、西冉村、柳林居诸村的伪保长们，先后两次组织修建西郊机场工程的各项具体工作。

首先是强制搬迁，划界栽桩。当时划定的机场地界是以柳林居村为中心，南至西冉村、北高庄，北至中坞校场，东至南坞西半部，西至旱河山。以上地界内的房屋限期拆迁，坟墓一律迁移，耕地廉价征购。

这次征购土地完全是掠夺性的。占地 1 亩仅作价 40 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制的伪币，下同），只能买 300 斤玉米面，搬迁一间民房给 40 元，迁移一座坟给 15 元。按当地老百姓调侃的话说，这些钱“还不够一葫芦醋钱”。被强制搬迁的农民上百户，害得这些故土难离的农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柳林居村一位姓李的农民，舍不得世代生息的家园田亩，以“破家值万贯”为由，与伪保长辩论，拒不搬迁。伪保长就叫来日本兵威胁说：“房屋的不搬，土地的不卖，死拉死拉的有！”威逼之下，李家只得搬出自己的房

屋，居于中坞破庙，以给地主开苇塘为生。而那些伤天害理的伪保长们还借机雁过拔毛，中饱私囊。老百姓咬牙切齿地说："一修飞机场，肥了保甲长；耕田一被占，百姓要了饭。"

在中国的国土上，为侵略者修建飞机场，真是奇耻大辱。而日伪政府却在机场边立下"柳林居故村附近迁移公墓纪念碑"，以表彰其"功德"，碑文云："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暮春，政府兴建飞机场于京市西郊柳林居村，收用村有民地约三千亩有奇，田园偿以值，庐墓给价口。"

短短碑文的字里行间反映出日伪强征民房民田的历史事实。此碑今尚在，已成为中坞村一李姓村民家门口的垫道石。

征地后又为修建机场招收民工。负责修建机场工程的日军头目是天野，他带领一队日军驻扎在蓝靛厂原来青木住过的西斋，坐镇指挥属于"西松组"的一批朝鲜人监工和进行招工工作的伪保长。1938 年 4 月 1 日，他们在蓝靛厂西顶庙（即今北京市橡胶五金厂内）挂出"工赈管理所"的招牌，名曰"以工代赈"，实际是廉价雇佣中国的劳动力。来此报名的大多是当地的农民，也有部分民工来自河北省涿县、新城等地，民工总数最多时达 3000 余人。

机场跑道奠基需要大量石块，伪保长们献计到外火器营、香山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拆毁清代的营房及围墙的石头备用。西郊"京师外三营"的营房建筑，就是在修建西郊飞机场时被日伪破坏殆尽的。为了运送这些石块，他们又在当地强行摊派大车上千辆次。

机场的内部设置大致为：办公室设在机场东大门内的 30 多间平房里。机场下设南北两厂。南厂负责飞机大修，下辖厂棚、发动机、车工、机体、装机、电晶器等车间。北厂负责小修，下辖大格拉斯、AD、劳西豆（均为日本飞机型号）等 5 个车间，还有电瓶、油库、水泵、汽车等班组。

机场经常停留有 30 余架飞机，多时达 50 余架，均系民航客

机及运输机。

西郊机场属于设在宣武门的日本航空公司管辖。机场的总负责为铃木三太郎，南厂负责人伊藤，北厂负责人南田，警卫负责人吴本。机场共有日籍管理技术人员200多人，日本人平时住在城里，每天乘坐四五辆捷克大轿车上下班。机场的工程师均是日本人，其余技术人员中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机场的日常建筑工程和各种劳务的组织，都由50余名朝鲜人（人称“高丽棒子”）承管。机场平时有中国工人千余人，多系附近农民，从事建筑、维修、杂役等繁重劳务。此外，还有百余名日军和20多名伪治安队员负责机场的治安保卫工作。

消极怠工的中国民工

修建机场的劳动十分繁重艰苦。“工赈管理所”将3000余名中国民工编成40多个组，分别由50余名朝鲜人监工，每组指派一名中国人当工头，驱使民工披星上工，戴月下工，从事打洋灰、推轱辘马等笨重的体力劳动。民工们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下班时凭工具领取4角钱（只够买3斤玉米面）。他们干着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晚上住的是破庙宇，苦不堪言。

中国民工在机场干活是为了混饭吃，没有人真心为日本人干活。但是“高丽棒子”监工整天拿着洋镐把转悠，谁不干活就打谁，民工们恨死他们了。当时有谚语说：“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奴使奴，累死奴”（指朝鲜监工也是日本人的奴隶，却苦苦使唤中国民工），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民工身受日本人和朝鲜监工双重压迫的辛酸苦难。

为了对付这双重压迫，中国民工用磨洋工的办法来与日军及“高丽棒子”监工周旋。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干不干，三顿饭；你来我就干，你走我就散。”

为了有效地躲避“高丽棒子”的监工，民工们选出一个放哨

的负责瞭望。放哨的看见监工来了，一吹哨，大家就抄起工具干活；如果探听到监工有事不来了，大家就踏踏实实地坐着休息。

机场建成后，雇佣了大批当地农民进机场做工。这些中国工人消极怠工的一个办法就是随手抄拿机场的东西，如汽油、飞机零件、军衣、粮食、工具等，还编了首“拿东西谣”：“你拿我也拿，不要去管他，拿也不是偷，偷也不是拿；拿了赚下了，不拿是傻瓜。”

工人们拿日军的东西，有的是因为微薄的工钱无法养家糊口，顺手拿点东西，卖了后可以贴补点生活。还有的是出于爱国心，报复日本的侵略。如中坞村农民冯玉，是一位有头脑、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他粗通文墨，聪明好学，有一套修理飞机的技术，能从飞机的声音中，听出哪个零件有毛病。据说那首“拿东西谣”就是他编的。有一次，一个日军头目要坐飞机执行紧急任务，临行前让冯玉检查飞机有无故障，冯玉却故意将飞机上的小型发报机拿走了。飞机要起飞时，飞行员发现发报机没了，只好停止飞行。事后，日本人追查此事，因没有查出原因，只好不了了之。

罪恶累累的吴本“司令”

西郊机场建成后，成为日军一个重要的空运基地。机场由 100 多名日军和 20 多名伪治安队联合把守。警卫负责人叫吴本，人称吴本司令。他身体肥胖，一双三角眼，留着小黑胡子，为人阴险凶狠，勾结伪保长和伪治安大队长，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一次他伙同伪治安大队长张某主演了一场欲擒故纵 的骗钱把戏。他指使伪警察在中坞、小屯、蓝靛厂等村开设赌局，当赌徒下注正酣时，参赌的警察借口出去解手，借机密报吴本，吴本便迅速出动警车赶赴现场，“没收”全部赌款。事后吴本他们坐地分赃，还美其名曰“掏家雀”。

吴本还与伪保长、大地主张惠（解放初被镇压）结拜了把兄

弟，共同鱼肉乡民。1944年夏，时值酷暑农忙季节，张惠地里草苗不分，活茬干不过来，就通过吴本调了一拨为机场干活的外地民工给他锄草。其中一位小伙子血气方刚，见张惠狗仗人势，不愿意给他干，与张惠发生口角。张惠怀恨在心，便唆使吴本命令一个“高丽棒子”监工用铁锹将小伙子的脑袋劈成两瓣儿，小伙子惨死他乡。

吴本还勾结“高丽棒子”在蓝靛厂等地开设了好几处“白面房”，贩卖大烟、白面儿，毒害中国百姓。所获盈利，吴本拿大头。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死于吸毒者或因吸毒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吴本还经常纵容日伪警察搞恶作剧，来捉弄中国人。一次伪治安大队的王某进城逛妓院，因丢了钱包，怀疑是妓女所为，双方发生口角。妓女叫来“扛插的”（即打手）把王某臭打了一顿。王某跑回机场给吴本跪下诉冤，提出要借司令的军服用用。吴本当即脱下军衣给他。王某凭着这身“虎皮”，摇身变成了日本司令。次日清晨来到妓院，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直闹得那个妓女和“扛插的”给他跪下求饶，方才罢休。

类似以上这些勾当，吴本干了不知有多少回。

日本空军敢死队

1945年6、7月间的某天，西郊机场并排降下6架日本战斗机，飞机上装满了炸药，还挂着黑纱，一派出殡送丧的气氛。一会儿，从机场东门驶来了几辆卧车，停在飞机旁，从中走出几个日本军官，每人臂带黑箍，面色阴沉。在军官的前面站着6个年刚18岁的日本飞行员，他们挺直肃立，表情冰冷。紧跟军官之后是一排胸佩白花的军乐队。军乐队奏完悲壮的送葬曲后，几个日本军官分别向飞行员握手告别。礼毕，全场日本人向6个飞行员立正敬礼，以示壮别。飞行员迅速钻进机舱，发动马达，在众目

睽睽下，依次起飞，直到飞机消失在云间，仪式才告结束。

据说，这是日本人为其空军敢死队在执行钻敌舰烟筒任务前，所例行的“送葬”仪式。

盟军空袭飞机场

1943年底，机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在南厂做工。此人精明强干，善于交际，没几天就与吴本司令打得火热。

一天，机场四门紧闭，警笛急鸣，宣布戒严，警备队到处搜寻此人，也没见他的踪影。有人说，他进城逛妓院去了。吴本带着军警跟踪追击到妓院，也没逮着他。听说此人是国民党的特工人员，来机场做工是为了盗窃飞机分布图，图纸得手后，被日本人发现，此人即火速潜回重庆。

1944年初春，日本人为防空袭在机场设置了3个哨所，又在机场周围的坟地和树林深处建了许多飞机堡、防空洞及汽油库。一分哨设在中坞大泡子，二分哨设在远大粉房，三分哨设在狮子坟。仅一分哨就修了6个大飞机堡、16个防空洞、3个汽油库。日本人将飞机藏在飞机堡里，还架设了许多木头飞机作掩护。

一天晴空万里，机场上空出现两架飞机，大人小孩觉得新鲜，争看机尾冒的白烟。几天后，空中又出现两架大型飞机，正当人们看得出奇时，只见空中出现许多小飞机，直向机场中心俯冲，“嘟嘟嘟”一阵机关炮扫射，就将一架日本飞机打着了。这时日本机枪向空中扫射，小飞机又向机枪响处俯冲射击，机枪就哑巴了。刹时间只听一片枪炮声，又见机场及四周飞机堡、油库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再看那大肚子飞机和小飞机早就消失在云中。

据记载，这次空袭西郊机场的，是驻重庆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空袭时间是1945年2月6日下午3时。

这次空袭后，日本人检查被炸毁的设施时，发现停在机场和飞机堡里的木头假飞机一架没打着，打的全是真的，日军损失飞

机20多架。后来日本人就把机场的发动机工作间搬到白塔寺对面锦什坊街的顺承王府了。日本人自知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每逢中国人叫他们“太君”时，就说：“以后我们该管你们叫太君了。”

日本人叫人中国人“太君”的这一天，果然来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西郊机场的日本人就地待命投降，一律不准擅自离开机场。8月20日左右，天空中又飞来一架四个螺旋桨的大飞机，扔下几十个小黑点，日本人此时已是惊弓之鸟，以为又是飞机空袭，一个个抱头鼠窜。不想，小黑点落至半空中全打开了，原来是国民党和美国的伞兵。伞兵落地后，各就各位，迅速占领机场要地。接着又飞来两架D20型战斗机，从舱门跳出许多全副武装的国民党92军官兵，这其中还有那位盗图纸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从8月底到9月初，西郊机场接管完毕，机场的警卫和管理人员都换成了美国航空陆战队。

（本文根据四季青乡老人曾文玉、刘德水、崔保、段存、李玉侠、索德山、李宝华、王德友、李茂林等口述整理而成。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严宽，海淀区文物局工作人员。

（海淀区政协供稿）

汉奸殷汝耕

田广智

“殷汝耕坐冀东，不下雨净刮风”，这是冀东地区60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的一句顺口溜。殷汝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倒在日本侵略者怀抱里的铁杆汉奸。他推崇“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伙同其他卖国贼，将冀东人民抛进日伪统治的火坑，遭受亡国之苦。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留日学生——外交官——鹰犬

殷汝耕当汉奸的行径，可分三个阶段：即少年留学日本，接受军国主义的熏陶；毕业后归国，屡任对日的外交官，成为崇日、媚日的“日本通”；在与日本侵略者频繁的接触中，丧失民族气节，当了日本侵华战争中的鹰犬。

殷汝耕，号亦农，浙江平阳人。1889年生在显贵家中。聆庭训而发愤读书，逐利禄而忘食废寝。清政府废科举以后，在国内无进取之机。刚满17岁的殷汝耕，即东渡日本留学，考入日本高等预科，专攻日语，越三年，考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工科。毕业归国不久，又于1912年再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1916年毕业归国。

由于几度赴日留学，被誉为“日本通”。适值袁世凯死去黎元洪执政，恢复了参、众两院，汤化龙任殷汝耕为众议院秘书。翌

年，受中国银行委托，赴日调查金融。1918年护法政府成立，殷汝耕又被委以重任，当了驻日委员。1919年，唐绍仪代表西南赴日接洽外交，殷汝耕前后招摇，使之圆满结束。1920年回国后从事一段实业经营，又于1924年春再赴日本考察经济，归国赴云南任唐继尧的财政顾问。

殷汝耕献媚取宠日本侵略者，颇受日本统治者的青睐。恰巧，1925年冬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张作霖事件，殷汝耕是外交处长，参与了郭松龄的谋划。日本人在这个事件后保护了殷汝耕，将其藏匿于日本大使馆，后送往大连，使张作霖捕获不到。殷汝耕保住了性命，如脱笼之鸟，对日本人感激涕零，相机报效"救命之恩"。而这正是日本人的用心所在，经过多年的豢养，终于使其成为"效忠天皇"的鹰犬。

殷汝耕的底细，南京政府知道得一清二楚，然而在1927年，蒋介石却派其为驻日代表；第二年，黄郛掌管外交时，又委任殷汝耕为驻日特派员。从中可见国民党头目与日本侵略者之间不可言喻的关系。

秉日本之意成立伪政府

1933年，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继续向华北进犯。驻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奋力抵抗。但蒋介石竟下令禁止开枪，让国联来解决问题，致使长城抗战失败，日本占领了整个冀东地区。蒋介石让张学良下野出国考察，调来亲日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于5月31日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签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殷汝耕是签订协定的参加者。在此期间，设置了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派黄郛任委员长。根据《塘沽协定》，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后因陶尚

铭被日本人撤掉，"滦榆区"专员亦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日本所赐给的军政大权。1935 年 11 月 25 日，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在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基础上，由殷汝耕主持在通县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 月 26 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自命为政务长官。继伪满之后，在日本帝国的卵翼下，又孵化了一个新的儿皇帝。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陆军之一部进驻通县西仓，称"守备队"；日本宪兵进驻大关庙胡同，日本警察署也出现在通县西大街，美其名曰："帮助中国维持秩序"；日本特务机关进驻通州东仓，机关长是细木繁，称"政府"顾问。伪政府各部都派进日本顾问，如渡边少佐是第一保安总队的顾问，竹藤茂兼是伪教育厅的顾问，长友是通县县政府的顾问，在冀东 22 县和唐山市、秦皇岛市也都派了日本顾问。冀东处处挂起了太阳旗。殷汝耕在日本侵略者的庇护下开始进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

为什么叫"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呢？《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殷汝耕想步伪满洲国之后尘，成立一个什么"国"，和日本人商议，结果因规格不够，暂称"政府"，再图"大业"。从其命名，不难看出这个"政府"的宗旨，就是反共，只有反对共产党，消灭共产党，才能实现"华北五省自治"，达到日本帝国侵占全华北、全中国的目的。

为此，殷汝耕背靠日本，开始进行奴化教育，强迫各中小学及师范学日语，所有教科书必须由日本人参与编写，各校设日本顾问和教官，直接控制冀东的国民教育。在伪县政府内，设日语研究班，规定办事员以上的职员必须学日语，顾问口试成绩，以日语学习成绩的好坏作为浮沉的标准。还在县级各部门的会计人员中设学日语奖学金：一等 20 元、二等 10 元、三等 5 元，随每月工资发放。与此同时，日本浪人以个人身份出现，在冀东各县见缝插针，办日语学习班，引诱中国无骨气者参加。日伪寓奴化

教育于学日语之中，麻痹人民群众，妄图使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承认“自治”。

殷汝耕政府发布了种种镇压共产党人的条例、训令、布告等，使中国共产党在冀东的发展严重受挫。中共通县县委花仙洲、张文奎等同志，面对白色恐怖，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不得不化整为零，暂时解散各级党的组织。日本川岸旅团长（原驻古北口日军）密令殷汝耕“要像镇压马永德[①]一样对付共产党”。此后，大批共产党员死在殷汝耕的屠刀下。

殷汝耕为表示对“自治”的“坚定不移”，对“天皇的无限忠诚”，一面发表宣言骂蒋介石“大逆不道”，骂南京政府“腐败无能”，阐述自己“自治”的原因；一面捕杀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为了向日本人表示与南京政府决裂的决心，1936年4月，殷汝耕导演了一出丑剧，宣布同东北伪满洲国建立正式“国际关系”。伪满派专使李垣（曾任京兆尹）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祝贺，殷汝耕派池宗墨为专使，赴伪满祝贺。

殷汝耕与日本狼狈为奸，支持日本侵略者对冀东的经济掠夺。秦皇岛为冀东重要出口海港，殷汝耕辟为低税口岸，凡由天津输出或输入的货物，均改道于秦皇岛，大批日货源源入境，以致日本的人造丝、食糖、日用品等充斥于冀东市场，造成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的衰落。

1936年春夏秋，冀东大部地区没落过透雨。不仅麦秋无望，就是大秋也收获无几。乞食者如蚁，十室九空。这就是“殷汝耕坐冀东，不下雨净刮风”顺口溜的来源。然而殷汝耕却仍然向人民横征暴敛。以通县为例，殷汝耕令爪牙将全县23家粮栈和6个镇

① 马永德，遵化人，是关外义勇军孙永勤部的参谋长，孙部转移到遵化县时，保安队捉捕了马永德，殷汝耕命令将其交给驻马兰峪的日本宪兵队。不久马永德壮烈牺牲。

的库存粮登记造册封存，不准动用，以备日伪军需。当时，饥饿的人群，只能购买日伪配给的既难吃又造成便秘的“混合面”。

通州保安队起义　殷汝耕成丧家之犬

根据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冀东区为不驻军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河北省政府的名义，成立了五个特警总队，开赴冀东，警卫地方。张庆余和张砚田分别为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的队长。他俩均系国民党51军于学忠部下的团长。于学忠密令各队队长“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以后，殷汝耕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两字之差，即将特警总队窃为己有。张庆余驻通县，张砚田驻抚宁，皆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秘密赴津，到宋哲元家中请示工作。宋哲元说：“素悉二位热爱祖国，近又听俊杰（张树声）兄说二位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立场坚定，不再动摇。”临行前嘱他们加强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以防日寇侵略。

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不在北平。张庆余派心腹刘春台（伪冀东教育训练所所长）密往北平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冯对刘说：“现在我军和日军是战是和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并嘱刘密告张庆余，可委派心腹与29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后来张樾亭把张庆余、张砚田所部编入战斗序列。张庆余、张砚田在取得日本侵略军绝对信任以后，以保护日侨为名，把分散各地的保安队集中到通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南苑，并派飞机轰炸北平。张庆余、张砚田如坐针毡，焦躁不宁，密商立即起义。1937年7月28日夜12时，二位队长下令封闭通州城门，断绝交通，占领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无线电台和电信局，派兵攻打东、西

仓日本驻军。在激战中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各部门的日本顾问，如何田、甲裴、甲茂、竹藤茂美等统统被击毙。保安队持户口册，挨户搜查日本人和韩国人，进行清巢扫穴，不论男女，一律驱出户外，执行枪决。枪声过后，尸体满街。据日方建“慰灵塔”时统计，死者500多人。

殷汝耕闻警后，藏于贮银橱柜之顶，保安队搜其不获，恫吓差人，逼其说出殷汝耕下落，差人佯言道：“长官，请出来吧，张大队长迎接您老来啦！”殷汝耕信以为真，自橱柜上一跃而下，当即被捕，被押在城北吕祖祠内，以待处置。

29日上午10时许至黄昏，日军12架飞机轮番轰炸县城。入夜，起义军弃城挟殷汝耕奔赴北平，欲与29军会合，不料29军已撤出北平。队伍行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日军从城内杀出，将押解囚车的士兵冲散，殷汝耕趁乱脱逃。在与日军激战中，起义军伤亡严重。趁敌机轰炸之机，张庆余急令部下，化整为零，将全队组成120个小队，由连排长率队向不同方向分散，到保定集合，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宣告结束。

殷汝耕逃脱囚笼后，在北平城外惶恐徘徊。他家就住在城里南池子附近，娶的是日本老婆，叫井上民慧，妻弟井上乔之也是日本关东军的要员。但是他不敢进城回家，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过街老鼠，稍有闪失就会丧命，于是潜进一个故友家中。他这位朋友是北平安定门外一个车站的站长。30日下午2时，殷汝耕给驻北平的关东军头面人物副武官今井武夫打电话，请求救援。恰巧这天北平成立维持会，在会上，今井武夫通知出席会议的北平公安局局长潘毓桂打开城门，由北平关东军武官室渡边雄记悄悄地把殷汝耕带进城内，迎往六国饭店加以保护。6点30分，今井武夫接见了殷汝耕。经过询问，今井武夫命令他辞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长官职务。31日上午，殷汝耕向日本人写出辞呈：“通州事件虽然本人预先毫无所闻，但本人非但身为冀东自治政府长

官，并且兼任处于事件中心的教导总队队长，责无旁贷，痛感罪孽深重，理应引咎辞职。”事隔一天，8月1日天津日本关东军军部打来电话，命令以保护为名，将殷汝耕羁押在日本宪兵队。宪兵队就是日军屠杀中国人的阎罗殿，进去就甭想活着出来。今井武夫还是了解殷汝耕的，立即打电话给日军司令部说明情况：“在通州事件中，殷汝耕可以说和日本人一样，也是被害人之一，并且他感到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早已自动提出辞职。”但是，天津方面穷追不舍，又拍来电报，命令予以监禁。而北平宪兵队在没有把事实真相弄明白之前，仍持“保护”态度，把殷汝耕移到宪兵队楼上的队长房间内，给予特别待遇，听候军方处理。这天晚上，殷汝耕的妻弟井上乔之来找今井武夫，恰巧和殷汝耕相见，第二天井上乔之也被天津军方拘留起来。

殷汝耕为了苟延性命，8月4日向日本递交了哀求性的声明，称：“7月29日冀东保安队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等发生叛变，杀害无辜外侨，其残酷惨状非言语能形容。幸由日军予以击溃，但于心何忍，不胜悲痛，此次大变，何以对冀东七百万民众之信任，俱予之不德所致，更难以忍受良心之责备。关于善后处理方面，非徒叹愚昧之时，在各种善后对策中，首先本人应该引咎自退，以谢天下。”这份声明日军拒绝发表。殷汝耕由摇尾乞怜，变成丧家之犬，被转移到宪兵队的看守所，并且把他的同伙张仁蠡等所谓的厅长们，统统由通县抓来投入监牢，和殷汝耕押在一起。时值8月暑期，不给其饮食，人多屋窄，闷热异常。饥可忍，然渴难当。这些败类只能自接小便而饮。肌肤苍白如纸，须发似蓬蒿，混身污垢不堪。但是就在这种狼狈的环境中，殷汝耕仍在诵读佛经悼念“通州殉难者”，以表对日本的虔诚。

几个月以后，天津日军司令部查清通州张庆余起义，确实与殷汝耕无关，也知道了他们的傀儡政府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原秘书长池宗墨，在伪政府迁往唐山以后，便充

任了代理政务长官职务，为了彻底摘垮殷汝耕，夺取长官位置，才在日本人面前设下种种圈套，欲置其于死地。

天津日军司令部了解真相以后，在年底，由天津宪兵队队长宣告殷汝耕及其他同伙无罪，予以释放。殷汝耕被妻子井上民慧接回南池子家中。声称要过“隐居”生活，与政界断绝一切来往。然而他长就了奴颜媚骨，通州事件后，日本人在通州新城南门内旧千总衙门基地建起“慰灵塔”，殷汝耕闻听后涕泪俱下地去拜谒，又和日本当局挂上线。不久，他在汪精卫政府内又当起黄河督办。

南京正法　大快人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日本侵略者甘当鹰犬的殷汝耕随之在华北被捕，并于 1946 年 5 月 27 日由行政院司法部饬令最高检察署用飞机押解到南京。

1946 年 6 月 27 日，南京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对汉奸殷汝耕进行初审。出席审判的有审判长赵琛，陪审推事葛子覃、金世鼎，检察官王文俊，以及殷汝耕的辩护律师章士钊、端木恺、张文伯等。10 月 31 日，高等法院作出最后宣判。由庭长金世鼎宣读判决书：殷汝耕在七七事变前，犯下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首图暴动罪，处以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七七事变后，殷汝耕犯下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财产依法没收。

高等法院专设的执行庭设在南京朝天宫。该宫殿空旷宽大，可容万人，是南京有名的大殿。处决殷汝耕那天，南京市民争先恐后到朝天宫观看，宫内一时容纳不下，许多人只得站在街上。殷汝耕头发斑白，脸上皱纹很多，身着长袍。当庭长刚刚宣判完毕，殷汝耕开始狡辩，声称自己当汉奸是得到政府领导人许可的，并几次挣扎着想从衣缝中取出证据，以图表白，均被庭长喝止。殷汝耕犹不甘休，大喊大叫，但其声音被激怒的群众吼声所淹没。

随着庭长一声令下，法警一拥而上，将殷汝耕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一时间，执行庭内外前来观看的群众情绪激昂，有的举起拳头要打，有的高声叫骂。行刑队几次受阻，最后多赖宪兵、法警竭力支撑，维持秩序，殷汝耕才被押上囚车。警笛长鸣，囚车伴随沿街群众的叫骂声，驶向老虎桥监狱方向。随之“砰！砰！”两声枪响，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汉奸殷汝耕就此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作者简介】 田广智，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干部。

（通县政协供稿）

卖身投敌的房山县伪县长项镇安

杨亦武

项镇安，名西藩，号镇安，房山县大韩继村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十四日生。项家世代务农，光绪年间，项镇安父始到北京绸缎行经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在前门外廊房三条开斌记石印局。项镇安读过七年私塾、二年小学。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随父到北京斌记石印局做工，后到福泽银号学徒。民国元年（1912年），项镇安在斌记协父经商。从此，项镇安先后在北京、东北等地做事，当过警察当过兵，在政府部门当过职员，还做过买卖。九·一八事变前夕，返回原籍。民国21年（1932年），项镇安在北平珠市口开红果行；开始在北平定居。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北平。北平城内有位经营眼镜的日本商人，名叫坂本。此人清末就在廊房头条开店，经营洋纸油墨，与项家开办的斌记石印局时有生意往来，因此与项镇安交往甚密。日本侵略北平不久，坂本来到梁家园慎业里项镇安寓所，对项镇安说："现在你回不了房山，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找个好事，你就能回家了。"8月16日，坂本带项镇安到长辛店进见日军某部顾问乔本石笑。乔本石笑将项镇安带到军佐参谋北川处，北川命项镇安回房山组织维持会，北川说："不久皇军就到房山去。"说罢，提笔在项镇安的名片上签署了日文证件。9月14日，乔本石笑亲自到梁家园慎业里项镇安家里，命他提供攻取房山的引线人。项

镇安说："房山人陈月生、李君石可担此任。"遂给陈、李写了介绍信，略谓：乔本石笑来房山，请予接洽。9月16日，进犯房山的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的大石河防线，乔本石笑持项镇安之介绍信带领日军侵占房山县城。9月18日，项镇安奉乔本石笑之命，回房山县城组织维持会，9月底，房山县维持会成立，项镇安自任会长。10月，北平14县维持总会会长江朝宗委任项镇安为伪房山县县长。

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胡振海部得知项镇安出任伪房山县长，派蒋维平、冯子扬携同盟书潜入房山县城，与项镇安秘密接洽，劝其改弦更张，设法与活动于紫荆关一带的八路军取得联系，联盟抗日。项镇安虚与周旋，未为所动。

11月1日，胡振海率所部2000余人攻克房山县城，在县署对过的张家床下搜出抖若筛糠的项镇安，士兵将他拖至一家粮店，胡振海下令就地枪毙。房山帮派组织"家里"头目邵振亭出面劝阻，项镇安方免一死。胡振海沉吟半晌，命项镇安为房山百姓当县长，项镇安不从，胡振海怒道："你能给日本人当汉奸，不能给中国人当好汉？"项镇安佯从。胡振海留一队人马驻守县城，率部回山，并将项镇安父及妻女带走作"人质"。11月4日，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陈东来[①] 正式委任项镇安为房山县县长。

房山县城失守，驻北平日军大为震惊，11月28日下午，日军出动讨伐队3000人，9架飞机，10余辆坦克，由牟田口指挥，从县南长沟、县北坨里两个方向发动进攻。当日晚，项镇安逃离县城，从琉璃河乘火车返回北平，连夜向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报告了房山情况。29日11时，日军讨伐队开进房山县城。县城内胡部驻军已于28日夜主动撤往山里。胡振海派人将项镇安父及妻女送

① 陈东来的队伍系举旗拉杆的自发地方抗日武装，身着便衣，装备简陋，被群众称为"老便"。

回大韩继家中。29日，项镇安由北平返回房山县城。

牟田口所部3000名日军驻县城三日，留一个中队驻防，其余撤至良乡。此后不久，日军宣抚班招降王凤来及其所部100余人，改编为伪房山县警察大队。

1938年2月，日军驻房山县联络员乔本石笑成立汉奸特务组织宣武班，需要“精干、忠实的人材”，项镇安又从伪县署司法警中挑选孟显章、韩德山、赵国强、袁振等6人编入宣武班。

伪宣武班特务赵国强，房山北街人。此人系社会流氓，自从投靠乔本石笑，颇有势力，暗中活动要取代项镇安。项镇安不动声色，终于发现他私诈钱财，于是亲自报告日军石田队长，得到石田默许，项镇安将赵国强骗至伪县署拘捕枪毙。

4月8日，乔本石笑派宣武班特务韩德山、孟显章到长沟峪刺探胡振海部情况，韩、孟到长沟峪后被胡部发觉，胡部追到西庄将二人枪毙。10日，乔本石笑与司口队长率百余名日军到西庄报复，项镇安派出10名伪警。日伪到西庄村后，烧毁民房无数，当场将村民郭振荣、冯财、赵老五杀死。撤走时将冯兰、冯敏忠等20人捕到伪房山县署，随即将其中12人枪毙。

日本侵占房山以来，自田各庄至下坡店一带的电话线经常遭破坏，项镇安派出暗探侦察数月，在田各庄起出铜线3丈余。于是派伪警察大队长王凤来带领10余名伪警到田各庄村，将村长高俣、村民肖功、高甫财等5人抓捕。项镇安亲自审讯，次日，贴出告示将高俣枪毙。

伪县署有司法处，生杀之权则专于乔本石笑与项镇安。日军每次出动都要捕回百姓，伪县署警特也四乡刺探捕人。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县城被处死，其中有抗日义士，也有无辜百姓。或由日兵用刺刀行刑，或由伪警执行枪决。行刑时不准百姓观看，房山城内一“净街”，便是要杀人了。据不完全统计，项镇安任伪房山县长的两年间，经他审讯后杀害的房山百姓近50名。

1938年8月，项镇安成立伪房山县保安大队。王凤来的伪警察大队改编为保安第一大队，羊耳峪保卫团（头目苏志超）改编为保安第二大队，保安第三大队队长段荣梅，无人无枪，项镇安命殷耀东到河北、漫水河、大安山等20余村抽了40人，并征款购枪。

此后，项镇安又强令县城附近百姓到饶乐府为日军修飞机场，强占饶乐府300余亩土地。

1939年4月，房山自发武装王大牙部200余人与日军大岛部队长接洽亲日。大岛命王部开进房山县城，在小学校操场集合，听候编遣。伪涿房自卫团团长孔宪江恐王大牙亲日后威胁自己的势力，便密告大岛，谎称王大牙假投降，实与八路军约定里应外合夺取县城。大岛将大批日军布置在房山城内，四面城头架起机枪，王大牙率部一到，便被强行拉至东街祠堂后身，先行埋伏的日军即刻将该部包围。大岛命王部缴械，王部见此情形，不肯交枪。项镇安上前道："老乡亲放心，今日要被机枪打死，我先死。如果我在，大家就不会死。"王部受骗，全体缴械，结果被日军装入火车拉去当劳工，只有王大牙跳车逃脱，投奔了八路军。

1940年4月9日，丛殿墀任伪房山县县长。项镇安去职回北平，与张仲华在门头沟开煤矿，后因水而废。1943年，在房山周口店与人合股开裕民煤矿。

1953年，项镇安被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死于狱中。

【作者简介】 杨亦武，房山区文化文物局干部。

（房山区政协供稿）

石匣汉奸张英杰

王敬魁　李光亚

1937年7月，伴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密云县石匣镇。长期驻扎的是日军守备队的一个小队，队长叫岗岛，翻译是山东人，30多岁，名叫张英杰。

张英杰搜刮民财，欺压百姓，效忠日军，得到其主子的信任。他一人身兼五职，除担任翻译外，还任密云警察队石匣分队队长，挤走了原密云县警察所石匣二分驻所所长，并自任所长，还担任村保甲自卫团（亦称棍团）团长和“先锋队”队长。

日本守备队驻地在石匣镇北大街路西草场头条东口。张英杰多住这里。大门口有3丈多高的炮楼，白天日本兵和伪警察下楼站岗，晚上多龟缩在炮楼里。中国人从这个门口过，都要给日本兵鞠躬，否则拉回炮楼，经张英杰审问，轻者罚跪，用枪托子杵肚子，用脚踢，重者便扔到狼狗圈里，任凭日军的20多条狼狗撕咬。

张英杰经常给日军带路，到石匣城外“扫荡”、“梳篦清剿”，到“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施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3年8月一次“扫荡”，把挂甲峪、沙峪子、小庄子等村的牲畜、粮食、衣物全部抢光后，又把这几个村子的房屋全部烧毁。果子峪村郝玉山的祖母，因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被活活烧死在屋里。挂甲峪村晁士军、晁士如、晁金生等20多人，

被捉到石匣日军守备队，经日军和张英杰拷打审问后，转押到古北口、承德，只有晁士军越狱逃回，其他人都含冤死去。

1943年冬天，张英杰带领日军去石匣城南“扫荡”，说这村有人“私通八路”，把村民集中起来，想方设法折磨老百姓，强迫男女老幼统统脱光衣服趴在地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趴下还有规定：趴得不整齐不行，肚子胸脯沾地不行。若违反了规定即遭毒打，称这是“西瓜趟”，使百姓的精神和肉体遭到极大摧残，有的妇女因不堪羞辱而自杀。

“先锋队”的驻地在石匣北门城楼上的一座庙内，有30多人，都是些汉奸家属或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其武器是木把铁头的钩连枪。张英杰经常带队去城外抢东西，骡、马、牛、羊、鸡、鸭、衣物、粮食、木料、砖瓦，什么都抢。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张英杰还带队到村里抓人，把人先押在“先锋队”队部，让保长或乡长出面用钱赎人。什么时候他认为钱交够了，才把人放走。他认为钱不够，就限几天交齐，若不交齐，就把人活活折磨死。有的中等人家，卖了房子和土地，加上借债，好不容易把人赎回来了，可没过几天，又被抓去。贫困人家，借不着债，只好听天由命。

1944年6月，张英杰到城南的上金山村胡吃海喝乱抢不算，还到一户姓蔡的家里抓人，将这家的男子肚子扎个窟窿，肠子都钩出来了。因无钱医治，这名男子含恨死去。从1938年至1944年，经“先锋队”抓的人有100多名，被赎回去的只有10多名，其他人都被治死。

石匣二分所的驻地在西大街路北。成员有10多人，负责集市、店铺的税收。石匣镇地处燕山脚下，西南距北平240里，东北距承德240里，京承公路、铁路经过这里，是东北与华北交通必经之路，每月逢二、四、七、九为集日。石匣城为正方形，每边1里，城内十字街两旁，商贾八方云集，店铺商号一家连着一家。在密

云县境内人们常说：密（云）石（匣）古（北口）三镇，石匣商业居首位。日军进关以后，这里的生意不如以前兴隆。张英杰当所长后，强行收税，税率不断提高，还到各商号以收税为名，敲诈勒索，硬性摊派，对经商者经常打、骂、罚、抓，致使集市日渐冷落，城内店铺商号逐渐关板停业。1937年，城内有店号1000多家，从业5000多人，到1943年，只有店号近500家，从业不足2000人。停业倒闭的日杂商号有逵亿远、同义兴、庆有堂等，布业有广育号、广泰魁、恩记布庄、义升栈、同聚公、双龙栈等，百货有庆长永、聚顺和、荣记等，饮食业有东来顺、三义栈等。第四次“强化治安”以后，县伪警察局印制了“输出入物资搬运证”，凡出入石匣镇的物资必须事先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发给搬运证，在城门处有二分所和伪警察严格检查，无证运输，轻者没收罚款，重者以“通匪”论罪。

密云警察队石匣分队和二分所驻在同一个院内。有伪警察20多人，他们掌管石匣镇的户籍，维持地方“治安”。日本守备队宣布“集家并村”时，让城外邻近的小村庄村民移到城内居住，拒搬的当场打死。把城外的部分村庄划为“无住禁作地带”（无人区）。张英杰带领伪警察经常到“无住禁作地带”检查，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就毁，见庄稼就割。石匣城四门只留北门可以出入，其它三门都被堵死。北门有日军和伪警察站岗，老百姓出入北门必须有“良民证”，对“不顺眼的”或“可疑的”人就带回警察队严刑拷打，有的就喂了日军的狼狗。

警察队还逼迫老百姓挖“治安沟”，此沟深5米，宽11米，距城3里，围城而挖共长12里。规定青壮年挖沟，老弱妇女拣石头。挖沟的老百姓没有任何报酬，且自带工具和干粮，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不准休息，动作稍慢即遭打骂，许多人连累带饿晕倒在沟里，却被认为有意怠工，横遭毒打，甚至当场被杀害。石匣城内六村曹庆瑞的儿子，只有13岁，挖沟时稍一打愣，被走过来的张

英杰看见，举木棍就打，孩子刚要解释，又被重重打了几十棍，等收工时，乡亲把他抬到家里，已经断了气。

春季，敌人不让挖沟的百姓种地，致使大片土地荒芜，粮食收成锐减，百姓生活愈陷困境。因此，老百姓都气愤地把“治安沟”叫做“毁民壕”。

待“治安沟”挖完，张英杰带人把潮河水引进沟里，说是“护城河”。这给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带来极大的困难。

张英杰亲手组建了自卫团（亦称棍团），团部在北门里瘟神庙内。石匣自卫团把18岁至45岁的男子编成10个队，计1000多人。城内5个队，城外5个队。每人手持5尺长木棍。城内的棍团，每天日落后在城墙上、街巷口站岗，每50米一岗。晚8时以后，不许任何人行走。发现情况，立刻报告，先敲大锣，再敲大钟，全体棍团成员集合，配合敌伪军行动。城外5个队在城外围按固定地点夜间站岗，严格盘查。凡年龄在15岁以上的行人，没有“良民证”的当即抓捕。发现情况，也先敲锣，报到城内。城外棍团白天还有送情报的任务。情报内容主要是通知城外各大村乡保长的摊派粮草及款项。

棍团团员李桂才、魏恩桂在南门城墙上站岗时，正遇上两名“满洲兵”持枪从此处逃出城。张英杰得知后，便在石匣东大地召开全体棍团团员大会，硬说李、魏二人有“通八路”的罪行，各打100扁担。打得他俩皮开肉绽，奄奄一息。

张英杰经常穿着便衣，冒充八路军试探群众，有谁对日本兵不满或盼望八路军来，便捉走。就是对参加棍团的团员也不放心，也常化装试探。1944年7月的一天夜里，张英杰冒充八路军试探正在站岗的曹永发，曹信以为真，便把日军装备、部署及伪组织的情况详细地说了。此时，张英杰便露出真相，把曹永发的两眼蒙上，送警察队押了三天。到第四天，张英杰召开全体棍团团员大会，把曹永发的后背插上“通敌利敌曹永发处极刑”的招牌，予

以处死。

日军投降后，张英杰被捕入狱，被判处死刑，石匣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作者简介】李光亚，75岁，原石匣镇居民，1949年以后，从事教师职业。

（密云县政协供稿）

■ 掠 夺

日军在大井一带占地的经过

张 霖

1936年，日军在丰台大举增兵，继而又以营舍不够为借口，谋在丰台至卢沟桥中间地带建筑兵营及飞机场。这件事在王冷斋的遗稿《卢沟桥事变始末记》文中略有记载。为了搞清日军在这一带占地的始末，我们先后三次访问了当时具体经办这件事的熊万普。他已90高龄，但对此事仍记忆犹新。下面是熊万普的回忆。

七七事变前，日本人要买地建飞机场，幸亏县里来人开导、作主，才顶住了日本人的诱惑，把地保住了，没让日本人得逞。这件事我得从头说起。

当时我家在丰台西边2里来地的地方，是个小村，叫新房庄，附近有李庄子、马茶馆、孙庄子、朱庄子等十几个小村，经种的土地南边到铁路（现京广线）路基，北到大井村。这片土地紧靠丰台西侧，共有百十来顷土地，我当时也有一顷来地。

1936年秋天，地边上来了几个人，有两个铁路警察，还有几个外国人，拿着皮尺、标杆、绘图仪等工具，在地里蹚来蹚去，又量又画。我看到以后，马上到了村公所，问管事的刘殿臣：这些丈量土地的跟咱们打招呼没有？他说没有。当时我在村里也算是

个管事的会头，就赶到地里，上前打招呼："辛苦几位！画图干什么呀?"有一个自称姓任的对我说："不瞒老弟说，这地方日本人要建飞机场了。"我问他："有没有上边的公文呀?"他说，"还用什么公文呀？这点小事还不是咱们陈局长说了算！"说着，他向我讲了铁路局长陈觉生的来历。原来陈觉生的母亲是日本侵华司令土肥原的妹妹。我说："我们庄稼人不管土肥原、地肥原，庄稼人没地种就没活路了，现在还不能听陈觉生的，没公文不能丈地。"好说歹说算是把眼前的几个人对付走了，可我知道这不是好兆，也不能算完。到了村公所，把叔叔大爷们找来，说明情况。有的人当时就说："老侄子，你带着干，要出钱，我们拿；要出人，我们上。"商量来商量去，我决定到县里跟县长说。那时宛平县政府在卢沟桥城里路北，县长是王冷斋。我到了县里，可巧县长不在，把情况跟秘书说了说，秘书虽然没有作主回答，却说，农民可不能随便把地卖给日本人，这事我一定跟县长说说。老乡们知道我去县里报告，都很赞成，有点血性的老乡说这事不能善罢甘休，要我带着大伙顶着干，但是也有些胆小怕事的人，吞吞吐吐。当时，东北三省归了日本人，搬出溥仪当了儿皇帝；殷汝耕在冀东当了汉奸；丰台东头（现在铁路材料厂）由北宁路出钱给日本人修了兵营，有个叫一木少佐的日军大队长，整天骑着马在街上转来转去，还到处搞军事演习。这一切弄得人心惶惶。我想，如不想点高招，这地方就算保不住了，要是让日本人把地弄走，还不如眼前跟那些吃里扒外的人折腾折腾。于是我就找人分别给南京国民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写了公函。在这个当口，日本人采取双管齐下、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私下偷偷到处串通，找摇摆不定的农民，骗他们具结，说只要在一张纸上写上"我的地自由买卖、愿意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就给他两块现大洋。另一方面，托人找我说情，以给我在丰台附近买100亩好地，盖一所房子为条件，让我不干预建飞机场买地的事，我回绝了说情的人。他们的圈套没

能成功，相反，我们的村民个个拒绝画押，表示坚决不出卖自己的土地。日本人见软的不行，就企图强行占地，在村头地边卸砖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南京国民政府来了公文，把好大的信封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地，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帮助处理。署衔“行政院孙”。大伙都猜这是行政院长孙科批的公文。有了这个公文，我心里就有底了，立刻去找王冷斋县长。他说：“冀察政务委员会也来公文了。宋哲元委员长派来一个叫洪大中的，随时同你联系。”据说洪大中自幼在日本读书，对日本的风土人情都懂，是县政府的一个秘书。这个人办事很认真。不久，在我们的村公所装了一部电话，便于跟他联系了。当时的丰台除了铁路有电话以外，地方上有电话的还不多。王冷斋县长还嘱咐我们：要让村民拧成一股绳，不能随意行动，有事要同县里联络。这一来算是有主心骨了。

村里的人虽说还不齐心，但有点胆量的人把地边的砖堆给推倒了。一些原来三心二意的人也都拒绝画押，表明不卖自己的土地了。可是日本人并未善罢甘休。没过几天，日本人亲自找我来了。拿着四样礼物，到了村公所，一个翻译介绍说：“这位是冀东政府负责五县的宪兵队长叫山下臣次郎，这位叫木村雄一。”介绍完了就开门见山对我说：“你只要不领着村民拒绝卖地，我们会给你很大好处。一是在附近给你买100亩好地，二是给你盖一所新房。”我一听就火了，这是给我设圈套来了，我就说：“你们甭弄这套戏法，农民就是不能卖地。你们拿来的礼物，喂狗去吧！”四个家伙一看我不听这套，马上翻脸了，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摔，说：“你还敢违抗大日本吗？”我当时也豁出去了，也把手枪一摔，比他的声音还大还狠，说：“现在还不是挂你‘膏药旗’的时候。”说完，我就通知村里的自卫团，集合听候命令。忽啦，自卫团来了，一些胆大的村民也赶来助威，我跟着又摘下电话，向洪大中报告

了这里的情况。

一看这情景，四个家伙灰溜溜地走了。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一位29军的排长来到村公所找水喝，我把他让到屋里，他才说是奉洪大中的命令，带领32名弟兄跑步前来保护的。我留神一看，才发现房脊上有持枪的弟兄在观察动静。等把情况向这位排长说明以后，这些弟兄才撤离村公所。

由于有县里和上边的支持，村民们又团结一致，当时总算把农民藉以餬口的土地保住了。但是没过多久，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丰台以及华北的大片土地沦丧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为日本人垂涎已久的丰台西侧的大片土地，在1937年的秋收时节被日本人强占了。他们在土地以及房基地上钉了木桩，限定村民10天搬出界外，否则连住房都不能再拥有。有的人舍不得辛勤经营起来的宅院，迟迟不肯动手拆房，最终房屋被日本人强行拆除。从此，在这里世代居住的村民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由于日本人占领了南苑机场和西苑机场，于是改变了在此修建飞机场的计划，而建起了华北最大的军需仓库。仓库内设有铁路专用线，侵略者把武器从日本运到这里，又拿这些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仓库周围戒备森严，拉了两道铁丝网，还设有一道高压电网，仓库四周设有炮楼，仓库的西墙就是原来的村边，南北一线，就有5个炮楼，炮楼由日本兵站岗，夜里大探照灯一亮，道道寒光就像张开的一张张血盆大口。

日本投降以后，这所仓库被国民党军队占用。解放以后，解放军接管，仍作仓库用，还驻有总后勤部部分机关。现在人们仍习惯于称“西仓库”。

【作者简介】张霖，曾任丰台区文化馆副馆长，离休后担任丰台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至今。

（丰台区政协供稿）

日伪统治下的房良“新民合作社”

卓成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广大地区逐渐沦陷，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其“以战养战”迅速占领中国的目的，在对华北地区实施军事占领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占领区的经济侵略。

房山、良乡地区临近北平，是日本侵略者实施经济侵略的首当其冲目标。1938年春，占领房、良地区的日本侵略者为稳定占领区的民心，以整顿社会秩序为由，派出由日本人和部分中国人组成的战后社会调查小组，对房、良地区进行社会情况调查。调查结果，由组员肖昔生（中国人）在当时华北的新民月刊创刊号上作了详细报道。报道中说：“良乡事变后，富室逃避他乡，加之以兵事之余，散兵游勇，聚众劫掠，粮食缺乏，金融吃紧，民生愈困，饥民铤而走险，流为盗匪，社会秩序完全破坏。即中产之家，亦不敢安居乡里。”华北地区伪新民会就是在这种“整顿社会秩序”的理由下，在侵略者的控制和直接参预下，拼凑起来的。当时的良乡县被日寇确定为河北省“新民会的实验县”。

新民会成立后，为了把握民众，直接接触其实体问题，于当年3月在平郊开设的良乡实验县指导部及北平四郊实验区的工作中，设立农村合作社。

在房、良地区，日军为整顿农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其提供战争补给而推行合作运动，并于1939年2月成立了良乡县合

作社联合会，在城内南大街设购买部一处。同年在全县的 93 个乡中，大力强行组建"新民合作社"76 个，并要求各乡村的富商和中产人士出资入股，参加合作社。由于统治者的强制措施和高压力，迫使乡民入股，因此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在全县发展了社员 2599 名。当时统治者开办的《新良乡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在"新民合作社规约"写在前面的几句话中说道："新民合作社虽已达成量的进展，但质的充实尚需极大之努力，因农村教育之不普及。新民合作社成立后，对合作虽有简单之认识，然而如何经营管理运用等技术问题，业务、事务进行方策之确立，尚完全不能理解。若如此冒昧进入实行之阶段，则前途只有失败。故为健全新民合作社组织，对各社之圆滑统制[①] 监督及指导，确有实施合作理论之灌输，与业务技术的训练之必要。"鉴于此，日本侵略者在良乡地区以县合作社联合会名义，对全县优秀监理事进行合作事业训练，灌输日本的合作理论及业务和技术，以期能迅速达到全面开展新民合作社各项工作的能力。但由于乡民抵制，又值春耕大忙季节，原定训练学习 1 周，只得改为训练 3 天。为工作推进之需要，县总会又将讲义、训练要旨、首期毕业典礼成员合影照片等资料，刊登在《新良乡月刊》专号上。

"新民合作社"成立后，各社按照统一的格式，制定了良乡实验县村新民合作社规约，共 32 条。其中第 17 条规定，设理事长 1 名，理事 4 名，监事长 1 名，监事 4 名。规约第 18 条规定，理事长从社员中互相选举 5 名理事，由县指导部及县联合会任命。合作社规约还规定，实验县总社下设辅导机关和役员、事业会计。县下属各乡镇设分团即分社。因而形成以县新民合作总社为排头，各乡镇分团（分社）为结点的，日伪统治下的新民合作社的经济渗透网。

---

①指日本人对合作社的一种间接统治方法。

“新民合作社”的主要经营机构为设在良乡镇内的合作社购买部。购买部以购进大宗民众日用之需要物品，然后再高价、有计划地供给农村。当时所经营的物品有食盐、砂糖、火柴、煤油、海味、纸烟、文具、肥皂、杂货等。购买部所用购物资本部分为乡镇民众集资入股，部分为侵略者抢掠而来。购买部名义为经商，实质多为日本侵略者的情报眼线。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商品经它进货批发，也就严格地控制了商品的流向，尤其控制了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煤油等进入解放区，为日本统治者制定对解放区实施的囚笼政策服务。

“新民合作社”除参与经营各类商品把手伸向占领区的市场管理、控制税收外，同时还担负为战场前方筹粮、贮粮、修建粮食仓库等多种与战争有直接联系的各项任务。

1941 年良乡地区的“新民合作社”机构和组织基本健全，日本侵略者又把黑手伸向了房山县，于 3 月初组建了“房山县合作社联合会”。理事长暂无，日常工作由副理事长担任。当时担任副理事长的是一个叫小洛道田的日本人，常务理事也由日本人田口多喜雄担任，理事设 3 人，监事设 2 人，系房山县城内豪绅，并设总务、信贷、业务 3 个科，城内南街设购买部 1 处。

随着房、良两县日伪控制下“新民合作社”机构设置的逐渐完善，日统治者以战养战的阴谋计划得以逐步实施。特别是 1942 年开展的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后实行的“配给制度”，就是这一时期日伪强力贯彻经济渗透的集中体现。

“配给制度”的本质就是掠夺，它是为适应侵略者以战养战而实施的。它采用不同的方式在占领区实行配给组合。工厂不加入配给组合就得不到原料，商店不加入配给组合就得不到商品等。但加入了配给组合，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信任金”存入日本银行。每一组合又必须聘请日本顾问，组合董事长如是华人，也必须经日军司令部批准。这样就使日伪统治区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了。

在房、良地区，日伪统治者还筹建粮食公仓，对粮食实施配给，农民一年辛苦得来的粮食送归公仓，每日每人仅能领取 6 两至 12 两，3 岁或 6 岁以下，50 岁 60 岁以上者，均不能得到粮食的配给。其它对食盐的配给、煤油配给、纸张配给等都控制在最低的限度。目的就是以此来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

1942 年 10 月，日统治者在刚刚结束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又开始实施对统治区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与此同时，以经济蚕食为主的“新民合作社”也提出相应的方针，即“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确保农产，减低物价，革新生活，安定民生”，以此为实行之基础而普及强化乡村合作社。

在房、良地区，“新民合作社”还相继在北市、肖庄建立农民实验厂、农场，培育推广白薯秧、小鸡、洋槐树苗等适合农事改良的物产品种。

在生产资料方面，合作社插手矿产，如煤炭、灰沙石。在消费方面统购配给杂谷、面粉、食盐、火柴、洋蜡、肥皂、纸张、煤油、砂糖等，以配合第五次“治安强化”的实施。

1943 年，抗日战争战场形势发生极大变化，日伪统治者为适应战场的变化，提出“以华制华”的政策，撤出县级联合会日本人副理事长，改由代表大会选补的华人副理事长。但日伪统治下的“新民合作社”仍然充当了统治者的御用工具，是日寇经济侵略的主要职能机构，经济波及面之广几乎遍布整个日伪统治区。房、良地区的各个乡村角落都留下它插手的痕迹。

平西广大解放区的人民对合作社经济的蚕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捣毁伪新民合作社购买部，建立秘密联络点、地下交通线，粉碎敌人的经济蚕食、粮食封锁。由于日伪统治者的日趋没落和广大民众的反对，“新民合作社”作为日伪统治者的工具也已成人民的众矢之的，百

姓们称他为黑心合作社、昧心合作社，它已名存实亡。随着1945年7月17日八路军攻入房山县城的枪炮声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号角，“新民合作社”终于结束它的罪恶使命。

（文中部分资料参阅了房山区供销社编撰的《合作社大事录》）

【作者简介】 卓成栋，北京煤矿机械厂宣传部干部。

（房山区政协供稿）

密云县日伪合作社联合会简介

曹佩章

一、组织及目的。1938年密云县伪新民会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我国人民财物，以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于1941年春，由伪新民会内分出一个“密云县合作社联合会筹备会”（以下简称县合联会），由日本人泉泽未治、中国人周兴武主办。首先召集各村镇一部分青壮年集训。学习合作条章，毕业后分遣回乡，组织各村镇基层社。同时县里组成伪合作社联合会，设有总务、事业两科，总务科分人事、庶务、会计三系。事业科辖有县城两所粮食交易场、石匣办事处两所交易场（牲畜、粮食），古北口办事处一所交易场。另外还组成了塘子、溪翁庄两办事处（不久即撤销）。以上组织完成后，县合联即与伪新民会分开，迁到县城南街路西广增益布庄，直属伪河北省燕京道公署。

二、人事安排及调动。县合联理事会名誉理事长由历任伪县长兼任，前后有张鸿宾、杨秀涛、韩宗琦、丁广拳等，理事有那元钧、冯广志、信佐臣、傅乃臣。日本人泉泽为专职常务理事，总务科长那元钧（东北人），人事系长唐德厚（东北人），庶务系长姓常（东北人），会计系长安仲琪，事业科长先后为周兴武（北平市人）、宋贵祥、马振邦。县城交易场主任前后有张仲贵、王子章、曹庆勋。石匣、古北口、塘子、溪翁庄都设有办事处。1943年县给联会常务理事改为中国人，前后有那元钧、唐德厚。日本人改

任顾问，先后有泉泽、粟仓，竹本等。

三、职员待遇。计分四等。一等为役员，多为日本人（待遇不详）。二等为会务员，科长级，月薪50元（伪联币）以上。三等为雇员，月薪35元。四等为见习雇员及博役，月薪20元。后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每月配给实物，以维持生活，计有面粉、食粮、食油、火柴、纸烟等。

四、主要任务及活动情况。该会成立初始，以改制便民、兴利除弊为标榜，而实际愚弄乡民。县城和各办事处成立交易市场，以控制税收及斗户[1]。物资成交后，由经手人开一小票，由买方持票纳税。凭小票开给正式票据，验票出场。票据每本百页，加盖钢印编号使用，采取复写两份，一份交给纳税人，一份核算报表（斗税2.5%，科1%[2]）。县合联会在1943年春曾籴进一部分粮食（玉米），平价贷给各村社社员，秋后无息偿还（只办过一次）。此外每月事业科及各办事处配给社员一部分紧缺日用品（煤油、火柴、肥皂、纸烟等）。综上工作，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关心民瘼，但实际上未认真办理，甚至为一些不法分子蒙蔽操纵，便民成了害民，而县合联不过问，只注意数字调查，经常有日伪宪特人员到总会及各交易场查询。运输物资出入，均须经县合联会日本人常务理事签字盖章发给许可证。否则没收严惩。

1944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内外交困，撕去掩饰，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一日伪县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勒令各伪机关，集中一切力量，按期完成粮食征收任务。伪新民会负责宣传动员，伪县政府负责催收监收，伪警队严格催缴，武装抢夺，县合联会停止其他工作，负责收纳，筹设仓库，专人看管，逐日呈报，直至出库结算。如有违误，直接交日宪严惩。会后伪县政府随即紧急

---

①斗户指市场上一种管理人员，专门负责称量粮食的人。

②斗税指地方税，科指上缴的税。

召开各伪乡保长会议，分配数字并宣布，如逾期不交者，即派伪警队强征，重则采取“三光”政策。此时正是城市居民配给54种“混合面”时期，乡间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幸有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保住一些粮食和其他物资。虽然如此，也被日伪掠夺去一部分粮食和其他物资，仅石匣地区就强征杂粮120余万斤，花生3万余斤，棉花千余斤。1945年春以后，陆续由北平、天津、石家庄等地运往日本国。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还余一小部分杂粮，为国民党政府接收。

【作者简介】 曹佩章，78岁，原石匣镇居民。

（密云县政协供稿）

日寇对石景山炼厂的经济掠夺

关续文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侵华日军的一支小分队，在一辆坦克的掩护下，从丰台驶入了石景山地区，占领了他们觊觎已久的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厂（今首钢总公司的前身）。我曾在石景山炼厂工作过，50年代又参加了首钢厂史的调查工作，故对日寇在石景山炼厂的经济掠夺了解较详，今追述如下：

早年的觊觎

日本帝国主义要霸占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蓄谋已久。早在1891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藏相胜田就公开叫嚣："日本国民经济的基础不能不求诸东亚，而东亚之中，尤以求诸面积广大、物资丰富之中国更为必要……故掌握中国经济之支配权，从帝国观之，亦最为紧要。"由此可见，日寇对龙烟铁矿的垂涎决非偶然。

1914年中国人自己刚刚知道龙关山出产的赭石是赤铁矿的时候，设在天津的日本大仓洋行就刺知了这个情报，并拿到了矿石标本，而且还特派专员到龙关县勘察。1916年，中国有人拟意开采这个铁矿，日本又要贷款1000万日元"以敦邻谊"。后来虽因寺内内阁倒台而没能实现，但是日本垂涎龙烟铁矿的野心却已毕露。

龙烟铁矿开采后，日本曾多次派遣经济特务刺探情报。1918

年10月15日，龙烟铁矿公司经理张新吾致电龙烟铁矿兼代主任、工程司（即现在的工程师）程文勋："三菱公司欲购本公司矿石，现派技师若林弥一郎，偕同随员二人前往参观烟筒山矿地，乞妥为招待，并将情形善为说明。若林君系矿师，随员中有地质学者一人"（《沦陷区铁矿之现状》，资源委员会季刊，第一期）。1922年秋，当石景山炼厂建设初具规模时，日驻华使馆又派4名日人驱车入炼厂内刺探情报。化铁处主任胡博渊得知后，拒绝其参观、拍照，双方发生了争执，后以日本使馆赔礼道歉了结。1928年国民政府接管龙烟铁矿之后，日本仍然为窃夺龙烟铁矿加紧活动。到1931年，日本驻张北领事山崎诚一郎致函察哈尔省政府，要求将龙烟矿务局的一切财产、管理机关名称，以及所在地代表者姓名和住址等情况告知，其蛮横欲夺之心暴露无遗。1936年8月，国民政府驻日商务参事向实业部报告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兴中公司社长十河长信氏约谈华北可办诸事业，于龙烟尤为注意"。事隔两月，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田代便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商讨开发龙烟铁矿一事，拟中日"合办"。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迫不及待地以军事手段占领了龙烟铁矿与石景山炼厂。

铁桶般的统治

1938年4月，日本侵略军委令兴中公司接管龙烟铁矿和石景山炼厂。按照日本人的习惯，龙烟铁矿改名为"龙烟铁矿株式会社"，石景山炼厂改名为"石景山制铁所"。自此，石景山炼厂与龙烟铁矿逐步分开。

日本侵略者为确保对龙烟铁矿资源以及山东金岭、湖北大冶等地矿产资源的掠夺，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参预下，直接插手石景山制铁所的治安、生产、经营、管理与扩建，建立起庞大的统治机构，以实施对人、财、物等残酷而野蛮的榨取。

首先，建立了“石景山工业地带爱护会”。

据昭和 18 年（1943 年）2 月 1 日《石景山制铁所概要》记称：“为了石景山制铁所的完满经营，保证这一地区的治安绥靖和劳动力的供给，以及扩建所需砂石等建筑材料的提供，建立起附近 49 个村的爱护会，其中总会为 36 村，3969 户，居民 24186 人（其中男 13155 人，女 11031 人）。将军岭（石灰石矿）分会为 13 村，593 户，4943 人（其中男 2719 人，女 2224 人）”，形成了以石景山制铁所和将军岭石灰石矿（炼铁熔剂所用矿）为中心的方圆 136 平方里、耕地面积为 24 万余亩的区域。区域内自然村大略有北辛安、庞村、山下村、古城村、杨庄、苹果园、金顶山、北府、琅山、模式口、西井、麻峪、黑石头、高井、五里坨、三家店、龙泉雾、军庄、杨家屯、东山、安南河、石口村等。

“爱护会”同宛平县所建立的各村保甲制度相结合，并增设情报员和联络员各一人，各村情况每天报告一次。

制铁所规定：每户不管农闲农忙和家中有无劳动力，必须出工 1 人，由保长（或指定专人）送往“爱护会”，再由该会办理手续转送制铁所内。这些劳动力最初完全是“义务献工”，家中没劳动力的还要由户主出资雇工。这种所谓的“义务献工”实质是无偿榨取华人劳动价值。此外，“爱护会”还设“元宝队”，搜查抗日异己。该会由石景山制铁所委派日人森安治郎为会长，华人李新元任副会长，翻译为李攸然。

其次，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管理组织。

石景山制铁所设工务、作业、总务、警防四个部和一个“业务管理委员会”。各部设若干课，课下设若干系。其中作业部辖制铁课（高炉、特炉、送风、补修四系）、化工课、调整课、部长室；工务部辖土木、建筑、动力、工作四课；总务部辖总务（人事、厚生二系）、劳政、经理（会计系）、用品、运输、生计、病院、检查（直属系）等各课；警防部辖警防队、地方课（总务、连务二

系）和直属保安系。此外，在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还设有本部，其中辖秘书和调查二室、庶务和物资二课、天津出张和八幡事务二所，及一个东京支社。总计，石景山制铁所共设1会、4部、2部长室、15课、51个系（其中一为生计所属课制）和1个病院。

在工务部下又设若干基本建设包工柜。诸如兴中运输公司、国际公司、清水组、成水组、飞岛组、松本组、真田组、西本组、西松组、大林组、增成动力、今村制铁所、大正铁筋株式会社、日满土木、三合工业与义和祥等。

石景山制铁所及外包工组织统由日人管辖，从所长、部长、课长、系长、职长、工长直到工员，均配备日人充任，华工只有被奴役的“权利”。

第三，建立起庞大的警防系统。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石景山制铁所后，最初建起了二三十人的防卫队，旋即发展为警防部（后改名为防卫部）。部长由日本宪兵大佐菊池阳三兼任。下设（1）警防队第一、二大队（为营级建制），每个大队计500人，下设三个中队、九个小队、27个班和一个直属情报班，另有一个训练所。职责是“防谍”（防八路军、游击队），并配合日本国光部队驻军作战。（2）取缔系（相当于中队，连级建制）有百余人，系长由日人洛关充任，职责是门岗守卫、防盗。（3）保安系，由宪兵曹长大佐藤充任，系对内为政工组织，对“政嫌”人等有处死的权力，计20余人。（4）善邻课，为领导“爱护会”、搞敌工专案的特务组织，有百余人。

在石景山地区，还驻有日军的国光部队（后为中岛部队，建制为中队，百余人）和福田部队（保卫日军武器弹药库），以及防空平林部队。

日伪组织有伪北平市警察总署驻石景山地区的警察三队和四队（后为六队），伪宛平县警察署派驻有警察所，以及“新民会石景山办事处”等。

此外，在北辛安镇设有日本警察署，任务是管理治安、日人户籍与处理民事纠纷。厂内还成立了“日本留民会”、“在乡军人会”及“国防妇女会”等日人组织。要特别一提的还有日驻华大使馆，也在制铁所的比邻（庞村）秘密设立了一个工作组，重点防范日人中的反战行为，监督生产。

以上的诸多组织人数达2000余人，把不大的石景山工业地区围得像铁桶一般，变成了一个阴森恐怖的世界。华工们每每进入石景山制铁所表门[①]，便可听到门旁取缔系的刑讯室发出撕裂心肝的惨叫声。日寇对无辜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施以坐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火通条烫，以及寒冬季节赤体捆绑在门前电线杆上泼水冻等种种酷刑。在沦陷之恨的天日里，每日进厂真不知是否能活着出来。

掠取农民的土地房产

石景山制铁所以“爱护会”的名义建立起对附近村落的统治后，为扩大炼铁规模，强化以我国华北地区为“大后方”的战略基地，又开始了征用土地。

1938年4月，制铁所为扩建炼铁、炼焦、给水和日人宿舍，确定占用土地2.5万亩，涉及拆除4个自然村的3000余间民房。为掩人耳目，每亩地价是：优地40元，劣地30元，尚不足农田年收入的1/10。北辛安、山下村、模式口和古城等村农户得知后愁肠欲断。对这种强盗行为，他们抱定“不领款、不交契”进行抵制。制铁所见有阻力，便串通伪宛平县政府，出动警察，对抗拒者搜查拘押，责令交出地契，接受价款，注销产权，强行拆除房屋，并抢走无数牲畜财产，实乃不恤民命。这次占地造成“数万人无地可耕、无房可居，遂成流离、饿殍状态，老弱骸体，沟满

①表门，即大门，因挂有钟表告之时间，故称表门。

盈”（《为请求恩准发还被日人强占民有之房地产事》档案资料）。伪宛平县公署同石景山制铁所交换的第十号函件道：“查此次占地，民众生活无依，农民绝望，纷纷破产。”

1943年夏进行了第二次占地，占地1万亩，最好水田每亩作价伪币230元，只能折合88斤玉米面；房屋折价每间200元，此时砖价每块8角，尚不足建半堵墙的钱。

石景山制铁所两次占地，总计为3.5万亩，其中包括山下村、南庄子两个自然村和北辛安一条3里长街道的1/3。此外，还强占了石景山场和山上的全部庙宇寺院。

加紧攫取华北资源

1938年4月20日，兴中公司在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协助下，共同投资组织生产，对北洋政府筹建的日产250吨的第一炼铁炉开工修复。经过对贮水池、泵站、水塔与炼铁炉等设备稍事修补，于是年11月20日点火开炉。

同年10月，日本以3.5亿日元组成“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以我国华北地区作为侵华后方基地，进行资源掠夺。

1940年2月，在日本军部扩大钢铁生产的指令下，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共同投资，改组了兴中公司经营的“石景山制铁所”，改名为“石景山制铁矿业所”，各出1250万日元扩大钢铁生产。于是，由日本八幡制铁所拆迁陈旧的日产360吨焦炭的索尔维（Solvay）式废热副产炼焦炉一座及洗煤机等设备，1942年3月投产。年底，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与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又共同投资1亿日元，组成“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经营华北地区钢铁和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了重大的转变，日寇面临更大的困难。为挽救灭亡的命运，日寇调整了政策；经济上由对华北的重点开

发变为单一的超重点的军火经营。为扩大生产规模，“石景山制铁矿业所”改组，归属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领导，随又改称“石景山制铁所”，计划扩充炼铁、炼焦、制钢等设备，年产50万吨生铁，并配以炼焦、洗煤等设备，故此，急速从日本和我国南方等地拆迁来一些炼铁、炼焦等设备。

1943年2月，从日本釜石制铁所拆迁了一座因技术落后而淘汰、停用10年之久的日产380吨炼铁炉，于当年12月15日在石景山点火开炉（称第二炼铁炉）。据制铁课技师川野茂所作的《第二炼铁炉概要》记称：为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钢铁紧急增产方案，而扩张石景山制铁所。即：将日本制铁公司釜石制铁所第一号炼铁炉一座，连同卷扬、装料、瓦斯送风机等主体设备与附属设备、材料，分别由日本各地凑集迁平，于1943年2月7日破土动工。当年5月炉基浇灌完成，再经炉体等设备安装，于是年10月16日竣工。经烘炉干燥后，于12月15日点火开炉。鉴于战争状态，资材缺乏，各种机器及人手困难，并在运输中遇到了种种阻碍，故此，在移设中一切未能如愿进行……设备及作业系统均失完善。此间，从津、沪拆迁与新建11座日产20吨的炼铁炉，亦先后开炉。

1943年3月，为配合炼钢、炼铁计划，着手修建容积为120万立方米的第二贮水池。

4月，着手拆迁上海南市发电厂的两台6400千瓦与3200千瓦发电设备，于翌年1月5日建成发电。

1944年2月，从日本大谷制铁所拆迁来一座日产600吨的炼铁炉（称第三炼铁炉）和日产650吨黑田蓄热式65孔焦炉一座；同时建造第二洗煤场和机修厂。

日寇还于该年从我国湖北大冶钢铁厂拆迁两座日产450吨炼铁炉。但在运送北平石景山途中，遭国民党空袭，两座炼铁炉毁于战火硝烟之中。拆迁计划遂告破产。

残酷剥削华工

为了以最廉价的劳动力掠夺我国矿产资源，日本人在石景山制铁所的劳务制度中规定：华工（称苦力）日班为10小时；运行工人为12小时，并实行超限度的连勤制，“国际”、“兴中”运输公司等部门的华工连勤多超过24小时。工人进入“锅伙”[①]便被扣押了“良民证”，自身失主，只得干活并接受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资。工人的日工资一度买不到1斤玉米面，无力自顾，更难以养家餬口。饿死者、卖儿卖女、劝妻改嫁者比比皆是。冬天来临，寒风凛冽，工人只能以麻袋片、水泥纸袋裹身御寒。每日上班，工头们押着一长串一长串蓬头垢面的工人，装运赤铁矿的混身染成了红颜色，装卸煤炭的混身染成了黑颜色，那水泥纸袋做的“衣裤”，走起路来发出“淅沥哗啦”的摩擦声，令人惨不忍睹。他们吃的是豆饼面、混合面蒸的窝头，菜也仅是咸菜，喝的是刷锅水，住的是席窝铺。每日清晨，工头以鞭子唤起工人，路过“锅伙”的人们都能听到工头的叱责声凶如狼嚎，此伏彼起。累病倒下的工人，再无“油水”可榨，便被工头拽出居所，扔在路旁任苍绳吸吮，以致口鼻眼生蛆，呻吟待毙，最后，竟被野狗裂身而逝。

1943年夏，阴雨连绵，蚊蝇孳生。石景山制铁所内外的卫生环境坏到了极点。“锅伙”蒸得的窝头，不到10分钟便爬满了苍蝇，拿食它若摘蜂巢。到了9月，终于暴发了流行性的“虎疫”（即霍乱）。9月16日《新民报》登载了消息，称，“石景山是虎疫危险地区，平市与石景山遮断交通5日。”昭和18年（1943年）9月的《北支那制铁月报》则云：

北平方面的虎疫，蔓延到石景山制铁所。9月8日发现在苦力中有二名病患者。次日又发现三名。且有继续

①锅伙，指华工们居住、吃饭的地方，一般是搭个十分简陋的席窝棚。

发生可能。因此本社、所，立即采取了紧急对策，在石景山作业所内设立防疫团，以期作好彻底防疫。

鉴于虎疫的发生，北平市的开业医生及北平行政学院学生，对防疫工作进行了支援，并为作业所所属的社员、工人及苦力实施了预防注射。对患者及保菌者（带菌者）实施了隔离收容。同时将作业所场地全部作了彻底的清扫。还进行了驱除和灭杀苍蝇。

同时，在皇军、宪兵及警察的统一指导下，对附近村落进行了检查。对检查出来的患者实行隔离；并切断附近村落交通，以防病毒传播。

为了做到对爱护村民传染途径的自治隔绝，委派爱护会，设立了石景山地区华人病患者收容所，并对传病菌媒介——苍蝇，组织了收购。已购到116包的成绩。

从这段文字看，侵略当局似乎成了一位“救世主”。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了穷凶极恶地掠夺我矿铁资源，也为了日人不被传染上瘟疫，制铁所当局实行了野蛮的、毫无人性的“强行隔离”，即组成“防疫团”，在军、警、宪的配合下，于制铁所内外实施大搜查，凡是患病者，不管是什么病，强行装上防疫车，扔进附近的几个采石大坑，埋上白灰，活活把人呛死，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

又据《北支那制铁月报》对从事建筑业十大社（即包工柜）的调查：“9月11日这天，义和祥苦力有44人因病隔离（扔进万人坑），有258人逃亡（失踪）”。“在砂石场180名苦力，4天内隔离为136人，其余44人全部失踪”。“虎疫发生前使用苦力（指外包工）为12370人，发生后苦力减少到11280人，逃亡者1090人。从作业所及建筑包工柜所管辖的工人看，由于虎疫，所减少人数，至少有5600余人。这对建筑工程进度大约要拖延20天，给作业带来了很大障碍。”

这场虎疫在日寇惨绝人寰的“防治”下，于9月24日消灭。“此次虎疫实际患者8人（其中死亡日人2人、华人4人）；带菌者34人。疑似患者17人，合计58人。”（据《北支那制铁日报》）这个数字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把那么多人扔进“万人坑”，完全是草菅人命。为掩人耳目，“11月15日在制铁所东邻北辛安镇东庙举行日华殉职者、病殁者供养祭，请日僧侣超度亡灵。表彰石景山爱护会村民在防疫中有功者12人”（引自《北支那制铁月报》）。

这场毁灭性的虎疫灾害之后，制铁所当局不得不调整对华工的待遇。据昭和19年（1944年）9月《石景山制铁所劳务管理概况》记载，当月华人粮食配给数量与基本工资为：

1. 佣员（华人领班）、常佣方（常临壮工），依据每个月出勤数无偿配给（粮食）。其基本量每月30公斤。未满17岁童工及女工给其1/3。

2. 工资：（九月末实发日工资，其标准如下。单位元，联合准备银行纸币）

资格	最高	最低	平均
雇员	3.67	2.94	2.77
常佣方（里工）	2.21	1.25	2.08

然而，当时北平市的物价是（以8月份计）：玉米面每斤5元，油每斤40元，煤球每百斤30元，布每尺12元，房租每间50元（月租）。以雇员日工资（最高）3.67元计，即使全月满勤30天，仅得工资110.1元，也只够买25斤玉米面的。由此可看出，华工工资仍然低得可怜。

华工们在劳动中，基本上没有劳动保护措施，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仅据昭和19年（1944年）3月《北支那制铁作业月报》记载，是月竟发生工伤事故31812次。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榨取华工的剩余价值，摧残生命，已达到登峰造极之地步。

占领者的末日

1943年，日本已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由于维持战争必须仰赖于钢铁资源，日寇对石景山制铁所愈加重视，1944年，其大小头目先后来到制铁所“视察”，为之撑腰打气：6月28日，日本国务大臣藤原一行参观了石景山制铁所，并了解了进度与困难；8月20日，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到石景山制铁所“视察”；9月30日，日驻北平使馆经济部长冈松，到石景山制铁所“视察”；10月25日，东条事务官结成顾问团，到石景山制铁所“视察”。

然而，此时的石景山制铁所“损兵折将”，已面临着一派不景气的局面，先是制铁株式会社社长田尻于7月21日病逝，由福田庸雄继任，随后收缩了制铁所内部机构，从原来的6部、27课、90个系，改为5部、1会、13课、50个系。

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8月6、9两日，美国先后于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此际，飞机不时空袭石景山制铁所，使当局惶惶不可终日。

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石景山制铁所及龙烟铁矿等地的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如丧考妣，往日的淫威一扫而光。华工见此，无不欢欣鼓舞。

8月15日，炼铁炉冶炼状况每时俱下；至24日，日人仇心不解，将第一、二炼铁高炉中的铁液冻结在炉缸内。

在日侵华的8年中，日人投入2961人（其中石景山制铁所1357人、龙烟铁矿1139人、北支采矿269人、北支钢铁贩卖株式社123人、久保田铁工所73人），奴役华工约6万人。掠夺龙烟铁矿砂374万吨，生铁27.0952万吨（其中石景山制铁所为25.0257万吨，龙烟为2.0695万吨）。

（石景山区政协供稿）

日本帝国主义对平西煤炭的疯狂掠夺

张启林

平西的门头沟、房山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有着悠久的采煤历史。自明末清初始，就有“京师百万户皆仰给于西山之煤”的说法。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平西的煤炭进行了疯狂掠夺，平西的矿工遭到残酷的剥削，平西矿区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日寇对平西矿区的全面统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在其大队长堤茂三郎的率领下，进驻门头沟地区，在城子等地建立了据点。1938年秋，日军对房山煤矿区大规模进攻，协中煤矿工程师鲍贵被日兵绑在一棵杏树上活活挑死。日寇开始了对平西矿区的法西斯统治和血腥的掠夺。

位于门头沟圈门外的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是平西最大的煤矿，它创建于1923年，属中英“合办”，英方股东为麦边，中方股东是周奉璋。实际大权掌握在英人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英两国成为交战国，1942年2月27日，麦边与日方代表白鸟吉乔签署文件，“麦边将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49%的股份无偿让渡与日本”。自此，日本对该矿实行军事管理，军事管理人即为白鸟吉乔。

在日寇统治下，我民族工业惨遭厄运。1938年初，日本人黑川和川南首先强占了民族资本开办的门头沟西山矿，并把该矿改名为“川南工业株式会社”，然后，他们又“购买”了民族资本家胡仙洲开办的门头沟东部的利丰矿。

民办小煤窑更是日寇抢掠控制的对象。白鸟吉乔凭借武力强迫门头沟各小窑出的煤只能卖给他开办的西新井收煤所。日军在门头沟地区的各个路口、桥头设立卡子，不准煤炭私自运出，如有违抗者，轻的没收，重的施以酷刑。有一次竟抓去50多人，严刑拷打。这种倒行逆施使小窑纷纷破产。1939年5月26日《新民报》记载：“门头沟煤窑1936年前150余家，工人3万余人，现仅存50余家，工人不足万人。”

日寇在统治门头沟煤矿期间，没添置一台机器设备，却用24000元在该矿周围建起了16座炮楼，用以镇压工人的反抗。利丰矿生产指挥部的主管由日本军官亲自担任，日本兵经常下井“巡查”。在中兴矿，驻有日兵的派遣所。

1943年冬，天气异常寒冷，平津两地市民急需煤炭取暖。但身为“北平煤窑管理理事长”的白鸟吉乔，却利用自己对平西煤炭的垄断地位，对平西的煤炭严密封锁，强行收购，囤积居奇，造成平、津两地的煤荒。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北平的小学生上学要带块劈柴，大学生要求早下课，还有的学校被迫停课。而此时白鸟吉乔却乘机抬高煤价，获得了大量利润。

日寇对平西煤炭的大规模掠夺

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日寇对平西的煤炭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据有关资料记载，门头沟各矿窑在沦陷期间部分年产量为：

1938年	80万吨
1939年	29.9万吨
1940年	155万吨

1941 年	203 万吨
1942 年	189.9 万吨
1943 年	108 万吨

日寇开办的大台煤矿，仅在1939年10月至1942年8月两年多的时间内，就生产了148963吨煤炭。

房山地区的煤窑在沦陷期间，部分年产量为：

1938 年	10.6 万吨
1939 年	9.2 万吨
1940 年	17.3 万吨
1941 年	19.4 万吨
1942 年	15.3 万吨

日伪时期，平西各矿窑所产的煤炭大部被日寇掠走，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被日军直接运回国内。

平西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

1. “煤窑的饭，拿命换”

门头沟矿区的地质条件很复杂，但日寇却无视这些，照样实行野蛮式开采，矿工的安全根本无法保证。保安煤柱是井下安全生产的必备条件，但门头沟煤矿却把井下大巷边的保安煤柱采空，甚至井筒四周的保安煤柱也被采空。据老工人回忆，当时该矿被采掘的保安煤柱占全部保安煤柱的40%～50%。

这种疯狂的掠夺，不仅缩短了矿井的寿命，而且也夺去了无数矿工的生命。“煤窑的饭，拿命换”，这是当时矿工生活的真实写照。上罐笼挤死，掉落井筒摔死，落顶砸死，滚帮砸死，炮崩死，淹死等，工人处处受到死亡的威胁，伤亡事故不断出现。1943年只门头沟煤矿被砸死人数就达48人之多。1942年该矿发生了一次冒顶事故，砸死六七个工人，当时朱凤江被埋在里边还没死，喊救命，但日寇为了不影响出煤，让工人用炮崩，工人弟兄们不

干，用双手把煤扒开，朱凤江才得救。

恶劣的生产条件吞噬了无数矿工的生命，也摧残了广大矿工的健康。许多矿工未老先衰，很早就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受害最严重的是童工。使用童工可获得更大的利润，井下许多劳动，童工可以干，但童工的工资不及成年工人工资的一半。所以，各矿都尽可能大量使用童工。门头沟煤矿的童工一直保持在全矿工人总数的30%左右。童工深受折磨与摧残，他们幼小的身躯在死亡线上挣扎，正像童谣里所说的："厚铁板，窄又长，上边爬着个穷儿郎，饿着肚子把煤推，不知小命在何方。"

2. 血汗被榨干

长期以来，门头沟的工人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深受多种形式的剥削和奴役。日寇占领后，工人的生活更加恶化。

据门头沟煤矿1942年9月记载：矿工月工资50元以上者3人，30元以上者28人，30元以下者519人。包工的月工资是：30元以上者75人（包括包工头），30元以下者1800人。而当时的玉米面每斤7～8角钱，包工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30斤玉米面，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之深，实属罕见。

残酷的剥削，榨干了工人的血汗，许多工人被饿死、累死，有病没钱治——等死。那时门头沟地区的一头骡子是120元钱，而门头沟煤矿工人因工伤或因病死亡，只给40元钱和一口薄棺材，也就是说三个工人才顶一头骡子钱。有些工人死亡，没家属来找，就被扔进乱坟岗。

日伪时期，平西矿工处于亡国奴的地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于日寇的压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平西矿区紧靠我平西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党组织在矿区内开展建党活动，领导工人运动。矿工们多次配合我军打击敌人，夺取了矿内大量物资。矿工们还进行了罢工、怠工等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些斗争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溶为一体。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平西矿区终于从日军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作者简介】张启林，北京矿务局党史办公室干部。

（门头沟区政协供稿）

日寇掠夺昌平县石棉矿藏见闻

王福顺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以此为导火索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寇在军事入侵，残害中国人民的同时，加紧对被占领地区的经济掠夺。现将当年日寇在昌平县禾子涧村无偿开采石棉矿的有关情况的所见所闻追述如下：

禾子涧村、溜石港村位于昌平西部山区，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沦陷。当时禾子涧村居住着 100 多户人家，溜石港村居住着 150 多户人家。1938 年初，日寇在两村分别建立了据点，开始统治当地百姓，并从事罪恶的掠夺。日寇发现了禾子涧村蕴藏着丰富的石棉矿资源，便迅速组织开采。

当时开采石棉矿的是日本钱野公司，他们利用当地廉价劳工从禾子涧村开采石棉矿石，送到溜石港村加工粉碎，磨成石棉粉后，用汽车拉到天津，然后海运回国，劫为己有。当时日本商人都住在溜石港村，常住的五六个人，记得其中有降崎、渡边、奇来、上田等，我被抓去强迫给他们做饭，受尽了欺侮。

日商从禾子涧村及附近老峪沟村等强征了六七十名民工为他们开采矿石，开始时有日本商人做监工，后来他们收买和雇佣了当地的几名工头，矿上的一般事情均由几名工头负责办理。工头常常来往于禾子涧村、溜石港村，听从日商的吩咐，组织矿上开采。开采石棉矿又苦又累，而且危险性极大。一般石棉洞要开采

十米到几十米深，矿工们要在几十米深处从事重体力劳动，劳动工具简陋，劳动量很大，又没有安全设施，经常发生工伤事故。为了继续他们的掠夺行为，他们不得不发给劳工们一些工钱，但一个劳动力从早到晚劳累一天，流血流汗，日商却只发给仅能购买二三斤食盐的工钱便算了事，压榨中国百姓可谓到了极点。

禾子涧、溜石港两村大约相距 15 公里，当时没有公路，汽车不能运输，日商便强迫溜石港村百姓用各户的小毛驴从禾子涧向溜石港驮运矿石，每天驮运一次，每次要用十多个至二十个小毛驴，每个毛驴每次驮运矿石约一百五六十公斤，每天大约有两千多斤重的石棉矿石驮运到溜石港加工粉碎。哪天用谁家的小毛驴驮运矿石由他们指派，指派到谁家，谁家就得去，否则便会遭到伤害。每次往返近 30 公里的崎岖山路，人力、畜力均消耗很大，但是他们也是只发给价值二三斤食盐的工钱。

矿石在溜石港粉碎成石棉粉，开始时，日本人强迫百姓用村中仅有的两盘碾子粉碎矿石，后来由于规模扩大，两盘碾子明显不足，他们又从阳坊运来 10 盘碾子，这样每天有 12 盘碾子为其粉碎矿石。从事粉碎劳动的都是他们抓去的当地民工，日本商人在旁做监工。矿石经过加工粉碎过滤成为石棉粉，装入袋子，每袋大约 170～180 斤重，然后用汽车运走。日寇对劳工监管很严，根本不给休息时间，劳工们被迫从早一直干到晚，只有监工不在的情况下，才能偷偷地休息一会儿，而日商却吃喝玩乐，坐享其成。劳工们整日苦干，工钱同样少得可怜。

日商还经常打骂劳工。我当时为他们做饭也常常遭他们的打骂，有时区区一点小事他们也会大动拳脚。有一次一个日本人让我把茶碗递给他，由于听不懂日本话，错把香烟给了他，这个日本人当即狠狠打了我两个耳光，还骂个不休。

日商还雇用了一个叫王连海的中国人为他们做事，此人家住北平，跟着日本商人来到溜石港，每次分派劳动都是由他去通知，

由他负责组织驮运矿石和加工粉碎，同时还负责分发工钱等。

日商开采矿石、欺压百姓之所以肆无忌惮，因为有日军的武力保护。禾子涧、溜石港村都有日军据点，各有20人左右，一方面为的是他们的军事战略，另一方面也负责保护日商掠夺我石棉矿石。据点里的日军与日商关系密切，常常来往，共同策划他们的侵略计划。

从1940年至1944年，日寇无偿开采我石棉矿达5年之久，掠夺走石棉石粉约1000多吨。如今在通往禾子涧村的公路上还可清晰地看到山上大大小小的石棉矿洞数十个，它们将永世记录着侵略者的罪行，记录着那沧桑的岁月。

【作者简介】王福顺，1918年生，昌平县高崖口村溜石港村人，现在当地务农。

李志江整理

（昌平县政协供稿）

回忆日寇在分水岭村掠夺黄金

刘凤美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50年了。5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对昌平地区惨绝人寰的杀人、放火行径在我县尽人皆知，而日寇在黑山寨乡分水岭村掠夺黄金的情况就鲜为人知了。

黑山寨分水岭村地处昌平北部山区，这里富藏金矿，采金业在日伪以前就已有50余年的历史。沦陷前这里有四个矿区，即洪德金矿、瑞吉金矿、意金利金矿和瑞大金矿，分属不同的资本家经营。其中最有名气的、采金量最高的要属田万义的瑞吉金矿。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瑞吉金矿真有准，早早晚晚吃小米"，反映了当时瑞吉金矿的昌盛。同时也说明了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瑞吉金矿的矿工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昌平地区沦陷，分水岭金矿从此日渐凋敝，但仍能维持。1940年，日寇得知分水岭金矿含金量高，且易于开采，便强占了田万义的瑞吉金矿。日寇霸占金矿后，组织了200多附近及外地民工为其采矿，又从山下雇佣了20多名中国人为其组织劳动，做稽查、监工等，还有4名矿警持枪护矿。常住分水岭负责采矿的日本商人5个人，有江藤、小川、老浦、二浦和三浦。江藤是个小头目，矿上的事情都听从他的吩咐。但他又受一个名叫宫本的日本商人指挥，宫本不常住分水岭村，但常来常往，那时分水岭村还没有公路，宫本来去都是骑一头小毛驴。

矿工在山上采矿分成若干小组，各组矿工自愿组合，每组几个到十几个人不等。

采矿过程自始至终是以组为单位单独完成，各小组互不相干。每个组开采一个矿洞，采出的矿石装入袋子扛下山，集中放在一个大院内。各组矿石单独放置，然后各负其责，进行加工粉碎。矿石粉碎通过石碾子完成，每天有12盘碾子粉碎矿石，大块矿石先用锤子砸碎后，再放在碾子上粉碎，粉碎后的矿石粉经过加工过滤后成为金粉。产出的金粉当场由矿工和日商五、五均分，一半留给矿工以便继续为其出力，一半日商据为己有。表面看矿工们还有所得，似乎合情合理，但实际上日本人是无本万利，坐享其成，是纯粹的赤裸裸的掠夺。

日本人贪婪黄金，根本不顾矿工死活。矿工在洞中采矿，安全措施极差，两年时间里夺走了3个矿工的生命。其中两人被炸药炸死，一个因矿洞塌方砸死。但日本人却不闻不问，继续他们的罪恶掠夺。

在日本人穷凶极恶的掠夺过程中，矿工们为反抗掠夺同他们进行了机智斗争。矿工们采矿遇到含金量高的矿石，便偷偷收藏起来，然后看准机会带下山。但是这样做也相当危险，因为日本人为防止矿工收藏挟带矿石，在山上山下都安排了几名稽查人员负责监督，下山回家都要搜身。我当时同本村几个人一起采金，每天早晨从山下向山上带炸药，白天采矿时，发现含金量高的矿石，便将其砸碎，放在装炸药的罐子里，然后在上面铺一层纸，再将没有用完的炸药装入罐里，这样即使检查也很难发现。就这样我们几人几乎天天都带回家一些较好的矿石。有时遇到搜查较严时，我们找机会将好的矿石收藏在山上的某个地方，由于我们本村人熟悉地形，晚上或其他时间绕道取回矿石。其他矿工也同日本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日本人掠夺的黄金量。

日本人无偿的掠夺，最后遭到了可耻的下场。1941 年底的一天，我一小部分八路军采取突然出击的战术，一举击毙了日本人小川、二浦和三浦，江藤和老浦借机逃跑。自此日寇未敢继续开采金矿，从而结束了日本人对分水岭黄金的掠夺。

1940、1941 两年时间里，日本人共从分水岭掠走黄金七八百斤。日本人对昌平人民、对分水岭村百姓可谓负债累累。

【作者简介】刘凤美，1922 年生，昌平黑山寨乡分水岭村人，现在当地务农。

（昌平县政协供稿）

日伪时期的湖门锰矿

刘文平

湖门村位于昌平北部山区，属下庄乡所辖。日伪时期共有30余户人家，100多口人。这里有着丰富的锰矿资源。日伪以前，湖门锰矿由当地王天喜、徐连俊经营。抗日战争爆发后，1941年被日寇强行霸占，自此，湖门锰矿资源便源源流入侵略者之手，附近百姓也沦为侵略者采矿的奴隶，受尽了日寇的欺压。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目的之一便是掠夺财富，他们所到之处，资源、财富无一幸免，就连我们偏僻的小山村也难逃罪恶之手。日军在我们湖门村建立据点后，发现了村中锰矿，便强行霸占，派了上田、金斯等七八个日本商人组织开采。他们征用了本地及外地100多民工，分布在山上20多个矿洞中开采矿石。

我15岁那年给日商做饭，16岁上山为日商采矿，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掠夺罪行。当时采矿采取分班制，有时一天两班，有时一天三班，每班几十人。一个矿洞有几个人开采，有的打眼放炮，有的向洞外运送矿石，运送矿石都是用小篓往外背，非常辛苦。有的矿洞延伸几十米上百米，而且狭窄、低矮，向外背送矿石有的地方需弯腰而行，有的矿洞还需要攀登几处阶梯，极为费力。开采出的矿石最初时用小毛驴驮运到兴寿乡秦城村，然后用汽车运往河北省蓟县（今天津市郊区）加工提炼。由于畜力运程较远，运量太小，造成矿石积压，后来他们在锰矿附近修了一条高线即高

空索道，开采出的矿石用小毛驴驮运到高线上端，通过索道吊车滑行运送到长陵乡老君堂东水峪村，再通过人背驴驮运到车场，用汽车同样运往蓟县。这样能节省时间，每天大约有50吨重的矿石运下山。

日商对外地矿工，名义上是管饭，实际并不白吃，生活很苦，几乎天天吃高粱米，而日本商人却是整天大米白面。据点里的日军另起炉灶。矿工、日本商人和据点日军吃的粮食及油、盐、酱、醋等都是由矿工或村中其他百姓背上山。每次背粮需几十人，每人身负上百斤重的粮食，要走几十里的崎岖山路，其劳苦程度可想而知。

日商也发给矿工们一些工钱，但却很少。本村及附近矿工一个月仅仅能得到五六块钱，而外地矿工，由于在矿上吃饭，到头来得不到几文。

矿工采矿有日本人在旁做监工，矿工经常遭日本人打骂，稍不如意，便施以棍棒，有的矿工被打得死去活来。针对日本人无偿的掠夺，无人性的欺压，矿工们也同他们开展各种斗争。虽然矿上有日本人和矿警监督，但他们一般很少进矿洞中查看，因为矿洞很深，阴暗又潮湿，非常危险，所以，有机会矿工便在洞中休息，如听到监工进洞的声响，便接着干，使日本人无可奈何。各矿洞采出的矿石都要用一种量具衡量。所谓量具就是一个下边大，上边小的无底的梯形大木斗，每斗装半吨矿石。矿工们为了使自己开采的矿石显得多，在向木斗装入矿石前，将木斗的下边尽量嵌入地下，这样表面看量具装“满”了，实际装的矿石减少了。有几次这样做被日商发现，矿工们惨遭毒打，但矿工们仍没有放弃同他们的斗争。

为维系掠夺，湖门锰矿防备较严。除湖门村据点有一个中队20多人的日军保护外，还驻扎着伪警备队，另外，矿上还雇佣了十多个人组织了矿警队，均荷枪实弹保护着锰矿。

日寇非常害怕八路军的袭击。他们每天都要各村负责人汇报当天情况，了解是否有八路军经过，可见他们做贼心虚，畏惧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面临侵略战争的全面失败，湖门锰矿的日寇也愈感日暮途穷，已无心继续经营，所以，他们于1943年底草草收场，结束了为时3年的掠夺。3年时间，日本人掠走我锰矿石5万多吨。

【**作者简介**】刘文平，1925年生，昌平县下庄乡湖门村人，现在当地务农。

李志江整理

（昌平县政协供稿）

日本统治时期的墙子路钨矿

张守太 蔡德茂

密云县墙子路的钨矿蕴藏量丰富，西从苍术会北山的璃玉沟，东至墙子路东的老庙沟，长达10公里，矿线长，矿石含钨量达50%以上。有的地方掘开地表层不足1米即可挖到矿石，当地人们说墙子路的钨矿“顶皮红”。1938年日本人在墙子路设立据点。第二年夏季，日本矿业商人陆续在这里设立了收购钨矿石的机构。当时有高周波、九洲、新新、兴亚株式会社下属的矿山矿业所。高周波矿业所隶属密云县沙河矿山事务所，所址在墙子路东大街蔡德茂家的院里。兴亚矿业所在现在的卫生所院内。南关有九洲、新新矿业所，分别在王玉有、贺庆贵院内。这四家矿业所，高周波矿业所的实力最雄厚，是日本人长田伯玉经营的，工作人员有经理、会计、保管、验质、过磅、庶务各一人，都是中国人，其余三个矿业所各只有两名中国工作人员，负责收购、外运业务。

因为钨矿线埋藏深浅度不一，因此按地势开采的矿井有立井、平坑、明槽三种。采矿工人都是当地群众结合的小组，每组4～5人，生产方式是靠手工钎钻镐刨。工人从井下用筐背出来混矿石，再进行挑选，然后肩挑、牲畜驮，卖给矿业所。矿石按质分为四等，依等论价。从1939年到1941年的两年开采中，高周波矿业所的日收购量可达1至2吨，九洲、新新、兴亚矿业所的日收购量可达2～3吨，高周波矿业所有载重两吨的福特专用车一辆，平

均每天往密云沙河火车站运送一次。

1941年秋，新新矿业所与塘子矿山矿业所合并，九洲、兴亚矿业所撤走，高周波矿业所被华北重工业公司接管经营，改名华北重工业公司墙子路矿山矿业所，其主管人是日本的西田，翻译是朝鲜人金森，工作人员与以前的编制相同。1942年春，他们就地收购矿石，就地提选，并在墙子路城内东南角占地1500平方米，建起了选矿厂，设备有立式发电机组一台，粉碎机一台，电碾子六盘，洗池四个，淘汰盘五部，技术人员都是从外地雇用的。1944年西田和金森调去密云后，该厂就由一个孙经理维持经营，直至1945年旧历七月初七日墙子路解放。

日本投降时，驻墙子路的日本兵偷跑到兴隆，只有伪警察、自卫团驻守，我地方武装歼灭了这伙武装后，为防止敌人卷土重来，将这个小工厂砸毁。

【作者简介】张守太，69岁。蔡德茂，68岁。二人均为密云县墙子路村村民。

蔡世龙整理

（密云县政协供稿）

奴　化

沦陷时期的黄村农业职业学校

朱景岚

河北省黄村初级农业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农职）创建于1934年，校址在北平南郊黄村镇南，西距黄村火车站一里许。该址最早为八国联军侵华时意大利兵营。农职成立前，先后建立过“京兆第二中学”、“京兆第一初级中学”、“河北省立第十八中学”、“黄村初级中学校”。新中国成立后，黄村农职改为河北省黄村林业学校。1969年，林校迁至河北省易县，校址移交给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和中央林业管理干部学院。

1941年至1944年，我曾在黄村农职农十八班学习，对日伪统治下农职的许多事耳闻目睹，时隔50多年了，仍记忆犹新。

当时学校共三个年级，每年级两个班，一个园艺班，一个农作班。教职工20多人，学生200多人。在课程设置上，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日语、修身等文化课，英语只上一学期；专业课有动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园艺栽培学、育种学、土壤肥料学、气象学、病虫害学，还有农场制造等。不同专业各有所侧重。

学校大权掌握在日本教官和少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手里。他们一方面对师生滥施淫威，发号施令；一方面提倡复古读经，以麻痹师生的反抗意志，并通过日语课、修身课以及

朝会、周会，直接宣传“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广大师生心底都埋藏着强烈的民族之耻和亡国之恨。

记得1942年学期初，新派来一名日语教员名叫傅锡英，河北省滦县人。他长着一副蚕豆型脸庞，一对小眼睛，留着小平头，身穿一身深蓝色协和服，盛气凌人。他开始给新入学的农二十班上课时就骂孟广聚、孟广勤兄弟俩为“龟兔赛跑”，两人稍露不满，立刻遭到他拳打脚踢。

在同年深秋的一天，傅锡英给我们班上日语课，一进教室就横加指责。他提问王玉成同学（西胡林村人），因回答不合他心意，立刻打嘴巴。王玉成不服，用手搪了一下，这可把傅锡英惹恼了，又是拳打，又是脚踢，打得王玉成鼻青脸肿。全班同学再也忍不下去了，纷纷高喊：“不许打人！”傅锡英狞叫着：“怎么，要造反吗？”但当他环顾周围，看到同学们一张张愤怒的脸时，只好悻悻地住了手。在下课去饭厅的路上，同学们抑制不住悲愤之情，边走边议，最后决定罢他的日语课。

下午，第一节仍是日语课。全班同学聚集在宿舍里，没有一个人去上课，教室里空荡荡的。透过后窗，看到傅锡英趾高气扬地走进教室，又气急败坏地走出教室，同学们开心极了，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不久，教动植物的朱采章老师急匆匆地跑到宿舍来，告诉我们说：“傅先生去车站了，很可能是去找日本兵，你们可要小心啊！”说完就匆匆离去了。当我们正在商量对策时，忽听得一声枪响，从后窗看到傅锡英带着几个日本兵已进西门了，边走边打枪。大家当机立断，不能甘当刀俎下的鱼肉，走为上策。于是纷纷跳过宿舍院南墙，又跳过土围子，有的向东，有的向南逃跑了。我和刘景耀、巴恩瀛、张宝琦几个人顺着平固（今京开公路）公路向南跑到大庄村，看到路西是一片起伏绵延的大沙丘，认为这里是藏匿的好地方，就走进沙丘深处，躲了起来。

天渐渐黑下来，我们又饥又渴。秋风萧瑟，寒气逼人。学校

不能归，有家不敢回，亡国之痛油然而生。这时忽听到远处有人喊："十八班的同学，回学校吧！"我们警惕地循声找去，看到两个人正在沙丘边儿上喊话。我们认出其中的一个是十六班孙义方同学，就跑到他们跟前打听情况。孙义方告诉我们多亏教务主任宋抚辰老师出面周旋，才把日本鬼子打发走了。宋老师派十六班的同学，正在黄村周围寻找我们班同学呢。我们怀着对宋老师的感激之情，随着他们回到了学校。

晚饭后，正准备睡觉，没料想校方在傅锡英的胁迫下，对十八班同学逐一进行审问，追查罢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审问中，不少同学又遭到傅锡英的毒打。由于审不出个结果，最后，校长决定把当夜未归的邢祖培、常庆明、张树礼三名同学开除学籍(两个月后，宋抚辰老师多方斡旋，又恢复了三名同学的学籍，通知他们回校上课)。这次小的学潮虽被压下去了，但是民族正义感却在广大师生心头扎了根。傅锡英也收敛了许多，在我们班再没敢打人。

罢课事件发生后不久，省里派来一名日本教官叫松田耕三。松田教官实际上是监督学校的太上皇，学校大小事情都要通过他。松田是个小个子，长着一脸络腮胡子，一对三角眼，经常板着一副黑面孔。每次周会他都要讲话，宣传所谓"日中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王道乐土"……他监视着师生的思想和行动，有时甚至听窗根儿；他总提着一杆汽枪，到处乱窜，活像一个黑色的幽灵。我们对他都十分小心。

松田除总揽学校大权外，还兼着十八班十九班的日语课，每班两节。实际上他只讲一节课，另一节叫同学们自己复习。同学们的反日情绪就表现在厌学日语上，因此日语复习课多借故离开教室。有一次松田来我班检查复习课，发现大部分同学不在教室内，他立刻打发人把室外的同学找来，责令在教室前排成长队，从队首到队尾每个人抽了两个嘴巴。同学们眼里噙着泪，把仇恨记

在心底。听说在十九班也发生过这样的打人事件。

1942年是沦陷区人民最难熬的一年。由于日寇疯狂的掠夺，各种物资缺乏，特别是食品奇缺。北平地区开始吃“混合面”。所谓“混合面”是用发霉的豆饼、麸子、橡子磨成，“配给”北平的老百姓，蒸窝头成不了团，要用手捧着吃，味道又苦又辣，吃后肚胀拉稀屎。学生住的宿舍院有东斋、西斋和北斋。院中间是小树林，厕所设在南墙内。由于吃“混合面”坏肚子，来不及跑到厕所就泻在小树林里。林里粪便狼藉，臭气熏天。如果说沦陷区是个大牢笼，那么当时的农职俨然是个牢中之牢。

唯一使同学感到一点慰藉的就是黄村农职里尚有一批好老师。他们具有民族的正气，不与日伪合流，热心教育，贫贱不移，严谨治学，诲人不倦。

教务主任宋抚辰老师，宛平县人，在同学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教我们作物栽培和育种，还指导我们大田实习。他身体力行，一丝不苟。不仅传授给我们专业知识，还培养我们搞科学实验的本领。他培育出的高产高粱2004号（也称歪脖高粱）享誉一方，当时已在大兴、宛平推广。大家最欢迎他讲故事，每逢大田实习在地头歇息时，他就给同学们讲故事，《聊斋》中“画皮”、“胭脂”、“聂小倩”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同学脑海中。在潜移默化中，同学们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他关心同学，保护同学，罢课事件要不是他从中斡旋，恐怕同学要遭到更大的伤害。

农场主任郑亚藩老师是密云县人，也是受大家尊重的老师，教园艺班的蔬菜和果树。他不仅知识渊博，且写得一笔好字，板书时，笔锋挺拔，刚柔并济，成为同学学习的楷模。他指导园艺班同学在菜园里实习，培育出硕大的西红柿、粗壮颀长的黄瓜，让人赞羡不已。学校的果园、苗圃、桑园、花卉温室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由于对日伪统治的愤懑，他总是不苟言笑。偶尔

在讲课时说一两句隐晦的讽刺时政的话，同学们都心领神会。

教数理化的教师叫刘琴堂，河北深泽县人，北师大理化系毕业。他专业造诣极深，是讲课最受欢迎的教师。不到50岁，已须发苍白，走路也老态龙钟了，但讲起课来，声音宏亮，抑扬顿挫，语言精炼而幽默。同学们听他的课感到有魅力，因此记得牢。记得上化学课讲王水性质时，他幽默地说："谁吞了金戒指，喝口王水就化了。"大家在笑声中记牢了王水能溶解金子的性质。

同学们不仅钦佩他的学识，更钦佩他的为人。他爱国，把唯一的儿子送去大后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日伪面前，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他的敬业精神使同学感动。他细心备好每一节课，亲自准备做实验，每节课都使同学有所得。他身体不好，但从未缺过课。过重的负担，加之营养不良，使他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1943年年初他病倒了。因无钱住院治疗，病势日益沉重。短短两三个月便溘然长逝，终年仅50岁。学校将其草草埋葬在北门外，送葬时同学们都泣不成声。

1943年年初，留日生杜庚新被派到农职任训育主任，兼园艺蔬菜课。他精力充沛，气质不凡，对日本教官不卑不亢，对同学和蔼可亲。当跟同学们混熟了的时候就偷偷地向同学介绍抗日的消息。"台儿庄大战"、"南京大屠杀"等消息都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的。他鼓励同学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离开沦陷区，到抗日的大后方去。他像一股春风将农职凝滞阴霾的空气一扫而光。在这年年底，他去了大后方。后来听说他到陕西武功西北农大任教。

我很羡慕他。一年之后，我也去了大后方。

【作者简介】朱景岚，大兴县离休干部，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离休前任大兴农村职业高中校长。

(大兴县政协供稿)

我记忆中的日伪统治

彭兴文

我是怀柔县汤河口镇土生土长的。这里曾沦为伪满洲国热河省滦平县所管辖的西南边境上一个中心据点。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就是满街的日本军队，村里就安上了伪警察局（后改为“国境警察署”)。1938年我8岁上国民初级学校（小学）时，已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从国民初级到国民优级（高小）一直念到国民高等学校（中学四年制)，可以说我的学校生活，基本是在日伪统治下度过的，因此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家乡的殖民主义统治，特别是用奴化思想毒害我国青少年的罪恶行径，至今使我无法忘记。

学校生活

具有多年殖民主义经验的日本侵略者深知“欲亡其国，必先亡其魂”的文化侵略和攻心战术。为灌输奴化思想、培养驯服工具，他们采用的最毒辣的手段就是抓学校教育和语言同化。日伪当局一开始就把日语定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课，并和“满语”（即汉语）一起并列定为伪满洲国的“国语”。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学日本的51个片假名（字母)；学生上体操课都必须用日语喊口令；音乐课第一节就要学日本国歌；学校教师都必须能说简单的日语，能教初小的日语课，不会的要赶快学。我上学的第一位老师田仲

岚是私塾出身，因不懂日语，到第二年就不知道给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升入国民高等学校（中学）以后，日本加紧了全盘奴化教育的进程，学校里配有日本副校长（实际掌权人物）和日本教师，来了一部分“满洲人教师”，多数是从日本回来的满脑子“日满亲善”的留学生，他们用日语上课，硬逼你加紧学习日语，不然你就听不懂课，跟不上班。当局还规定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都必须达到三等日语翻译的程度，能达到二等翻译水平的则以配给大米白面、改善伙食作为奖励，诱使学生放弃其他学科的努力，片面学习日语课、练习日语口语。

学校每天朝会必须先向日本东京的天皇陛下遥拜，向“满洲国皇帝陛下”遥拜，施鞠躬九十度的最高敬礼，然后合手宣誓，誓词大意是：“满洲建国和大东亚建设的使命，担在我们青年人的肩上。”后来还叫天天念日本经（时间太长了，经文已经忘掉）。

在学校里也和军队一样，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比如同学之间，低年级学生必须敬高年级学生如长辈，不论年龄大小，也无论在任何公共场合，见了面必须向高年级学生举手敬礼；高年级学生有何指教必须照办。

老师讲课多以日本国的内容为主。例如讲历史课就讲日本是“天照大神”缔造的，向学生灌输“惟神之道”。伪满在长春（当时称“新京”）也建立了“建国神庙”[①]。1940年伪皇帝二次访日，从日本捧回“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建国之神，从此宣传说伪满也和日本一样，起源于天照大神，说溥仪和日皇帝如一人，因而伪满国民也是日本国民一部分，都必须懂日本的明治维新和纪元2600年的历史。学校里的地理，除了讲伪满洲国“行政区划”内的19个省、162县、37旗、14市、1个特别市之外，主要是讲日本地理，北起库页岛南至台湾，各地分县行政区划、风土人情。学

① 建国神庙是为纪念伪满洲国建国而修建的庙。

校对学生严厉封锁一切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消息，搞得学生（包括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知道宝岛台湾原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光知道这里大家都是“满系人”，日本是“亲邦帝国”，是日本人“解救”了满洲，对日本必须无限忠诚。满洲俨然就是第二日本国，老百姓就是日本的下一代。

还有一件事，就是从称日本是“友邦”、“盟邦”到称“亲邦”。伪满洲国建立初期，老百姓和学生都成天被告知是“大日本帮助我们建立了满洲国”。到处写着“日本友邦”、“王道乐土”等大字标语。我小学二年级时，开始学习、背诵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 1935 年 5 月 2 日颁发的《回銮训民诏书》，称“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之后每逢各种集会，如学校开学、毕业典礼，社会上各种节日，特别是“诏书奉载日”（即颁发“诏书”之日），都必须宣读“诏书”，藉以训练小奴隶，养成盲目服从的习惯和灌输封建迷信思想。宣读“诏书”时，有人戴着洁白手套，捧着装有“诏书”的用黄绫布裹着的木匣，高举过头顶，走入会场，从此时起，全体人员便一律鞠躬九十度静听，直到最高主持会议人读完、送走“诏书”，全体人员才能直起身来进行下项内容。“诏书”从头到尾都要求学生背诵。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开始，伪皇帝颁发了《时局诏书》，“诏书”要求“齐国人而尽奉公之诚，齐国力而援盟邦之战”。1942 年伪满“建国”十年时，伪皇帝又颁发了《建国十周年诏书》，称“献身大东亚之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从此，日本“友邦”、“盟邦”又改称为“大日本亲邦”了。校长训话说，“以后改称日本为亲邦了，亲邦就是和咱们的父母一样，因为没有日本亲邦，就没有我们满洲帝国，我们的生存必须依赖大日本帝国”云云。就这样，每次改称都是从伪满皇帝颁发“诏书”开始，伴之以校长训话、社会宣传。从“友邦”、“盟邦”、“亲邦”这三部曲中就已经明显地看出日本侵略东北，使之一步步殖民化的狂妄野心。

在学校里日本除了执行愚昧学生、缩短学制、减少知识课程和增加日语、殖民奴化课程以外，还摧残民族文化，怂恿学生向往奢侈靡烂的生活。他们规定，非伪满出版的报刊书籍不准带入学校，不准私自传阅，也不准背地议论“国外”事情。同时他们却印发有色情内容的“流行歌曲”印刷品，使这些靡靡之音在校内校外广为流行，校内成天不绝于耳的都是《何日君再来》、《盼君早日返家园》、《忘记了当初那段美姻缘》、日本《阳春小唱》之类的歌曲，把学生们闹得昏昏沉沉，糊里糊涂，人无斗志，甘心充当日本的小傀儡和小奴隶。

到了1945年日伪倒台的前夕，遇有伪满征兵、催粮催草、摊派税款等活动，都要抽调高年级学生外出宣传，让学生充当日本的侵略工具。

社会见闻

日本侵占东北14年，无论是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镇压、还是思想上的严密控制，都绞尽脑汁，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记得，日伪统治初期就设立过鸦片专卖所，专门收购当地种植的鸦片和卖给吸烟人的“大烟泡”，这就是日本步英帝国主义后尘，用鸦片毒化和剥削殖民地人民的“鸦片政策”。当地人民深受其害，造成了烟毒泛滥。我家就有我三爷和二叔吸毒成瘾，成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废人。这种现象一直到1945年秋当地解放后，由县人民政府和区公所采取具体措施组织戒毒，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吸毒者又重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日伪统治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紧张时期，为了支持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经济掠夺。他们在汤河口镇附近开发了兰营英石矿和大北沟门金矿，疯狂抢掠我国的矿产资源。还推行一种叫做“出荷”的政策，比如“粮谷出荷”，就是强迫农民卖粮，采取“先钱”手法，按每百斤1元先付给定款，签定契约

规定"出荷数量"，等到秋季，不管收成好坏、农民够不够吃，都必须按原定数"出荷"。什么东西一缺，就马上规定"出荷"，到后来连炕席也要"出荷"，搞得民不聊生。

由于日伪的残酷压榨，农民那种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无法继续，不得不以树叶、野菜充饥。一到春天、夏季多数人都要浮肿，不知有多少人因此悄然死去。老百姓没的穿，只好以麻包片当衣服。有人在秋后背上百八十斤粮食和山货（如大扁杏仁、山杏仁）躲开公路，爬山越岭、绕开日伪敌卡去怀柔（归伪华北政权），换点布匹和食盐回来，弄不好被逮住，就会定为"密输犯"，轻的挨打受罚，没收全部物品，重的还要判刑坐牢。

除了经济掠夺外，对人力掠夺也随之加强。从1940年起伪满洲国开始实行征兵制。对那些所谓不合格未被征用的青年（俗叫"国兵漏子"），说是根据伪满《国民勤劳奉仕法》的规定，都编入"勤劳奉仕队"，每年要去指定地点尽"勤劳奉仕"义务（实际就是当不给任何报酬的劳工），藉以剥夺我劳动资源。

伪满洲国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实行"次长制"。县、地方警察署、中等学校以上，都配有日本人副职，如副县长、副署长、副校长。这些副职实际是掌握大权的人，遇有重要事情都是先召集副职（日本人）到上边开会研究，然后才叫正职（中国人）去开会，布置执行。各级机关（中国人）首长，全都是真正的傀儡。在基层伪政权中实行村、甲制度，主要利用原有旧势力人物。村公所受县公署的监督管理。在农村组成甲（行政村）、牌（10户一牌），实行邻保政策，把老百姓严密控制起来。日本人就利用这些伪基层政权组织，收"出荷"、抓劳工、摊派捐税，欺压当地人民，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1941年，汤河口实行了集家并村，在日伪划定的地点修部落围墙，把10里至20里以内的老百姓强迫搬到部落中一起居住，由伪甲长和部落警察控制着大门，闹得老百姓自己的房住不上（如不

按规定时间拆、搬，就放火烧掉），自己的地也不能及时耕种，生活一天比一天苦，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只有在内心里憋着日益强烈的反抗怒火。更有甚者，他们把离汤河口50里外的对峪、大峪两沟山区（现属密云县）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无人区”。日本侵略者采取“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在古洞沟、琉璃庙等地派驻了武装警察讨伐队（彭明队、刘汉队等），轮流去“讨伐扫荡”，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

日伪从精神上奴役、统治当地人民的工具，就是伪满洲国从上到下（直到村级）都设有的伪满协和会。“协和会”标榜“日满一心一德、民族协和、王道乐土和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圣意”，向老百姓灌输所谓“建国精神”。他们让老百姓背诵《国民训》，念念不亡日本“亲邦”。规定，男满20岁青年均为“协和会”会员。在县公署，由日本副县长任头目；村公所这级也有专职3人（如汤河口村公所）作“协和会”工作。他们除了大搞图片宣传（叫做演文明戏），涂写“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等大字标语以外，还定期从各村（甲）抽调青年到“协和会”，每期3个月进行轮训，企图把青年训练成推行侵略政策的骨干和反共的先锋。

日寇的野蛮侵略、伪满傀儡政权的残暴统治，从一开始就激起了汤河口地区人民的无比仇恨，从少年儿童到成年老人，都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斗争，进一步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觉悟与斗争勇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不畏惧斗争环境的艰苦，坚持做军鞋、交公粮，以实际行动支援平北抗日的八路军老十团，抗击日本侵略者。直到1945年日伪垮台，当地人民反抗活动一直未停。

【作者简介】彭兴文，怀柔县汤河口镇党委办公室主任。

（怀柔县政协供稿）

日伪对中国小学生的奴化教育

张　珍

日本侵华时，有目的、有计划对中国青少年一代进行奴化教育，手段是阴险的，用心是恶毒的。我的故乡是房山县尤家坟村。从 1939 年到 1945 年，我先后断断续续地在本村小学和长沟小学读书，当时，我的家乡已沦入敌手，所以，我的小学生活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侵略者进行奴化教育，采用了潜移默化的方式，使青少年在不自觉中，树立日本帝国“神圣”、日本皇军“神圣”的思想。尽管侵略者大肆宣传什么日本侵占中国是为了“大东亚共同繁荣”，但是由于我们亲眼见过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见到过他们残酷迫害中国百姓的种种罪行，所以谁也不相信它那套谎言，人们的内心深处无不充满对敌人的极端仇恨。

据我所见所知，日伪在学校搞奴化教育的主要方法和内容是：

一、经常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共荣”的思想。我记得村里的维持会长、日伪大编乡的乡长，经常到小学校给学生训话，说什么“中国是有名的‘东亚病夫’，中国在工业上比不上日本，人家日本皇军的枪支全是三八枪、高射机枪，还有飞机、大炮。中国军队大多数都是老套皮、汉阳造，打不了多远。日本在东三省建了许多大工厂。日本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新生活”。要求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拥护皇军”，见了“皇军”要敬礼鞠躬。那

时我们都把日本兵打的旗子叫“膏药旗”，校长和维持会长就多次嘱咐我们说，那是日本国的国旗，应当说是“太阳旗”，不能说是“膏药旗”，那块红色图案，是太阳，“它要照亮全世界”云云。

二、经常组织小学生列队欢迎日本人进村进校。我在本村和长沟小学上学时，是学校鼓号队的成员，曾多次被组织列队出校，到村口或校门口，“欢迎”日军来校训话。1944年的春天，房山县的伪县长王德育和几个日本军官要来长沟小学。校方强迫全校50多名鼓号队员和二三百名师生，早早地列队站在西长沟的村口等候。将近一个小时后他们才到，鼓号队吹迎宾号，师生呼欢迎口号。王德育及几个日本兵大摇大摆地从我们面前走过，还不时地向我们招手致意。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伪政权简直是奴颜卑膝，日本侵略者不可一世。

三、在小学设置日语课，学唱亲日歌曲。在长沟小学，三、四年级设了日语课。说是学好了日语，将来跟日本人打交道更方便，当时教我们日语的是一个青年教师，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语。这个日语教师一心倾向日本，教课方式，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谁背读或默写不出来，他就要动手打学生，有时用藤子棍打脑袋，有时用“戒尺”打手板，相当凶狠。所以我们就怕上日语课。

学校规定，在校老师和学生必须学会唱日本的国歌，这是上边的要求。那时，我们天天必唱日本国歌，以致现在我还记得开头一句歌词大意是歌颂天皇的。我们还学唱过“新民会会歌”，这支歌也是宣传“东亚共荣”的。

四、组织小学生参观日军武装演习。我的家乡属日伪天开乡管辖，天开乡驻守许多日本武装部队，日本兵经常在大场院里进行练兵活动，学校就组织老师学生去参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看日本兵练刺杀。两排日本兵，面对面地列队，每人手持长柄木枪，互相向着胸部戳刺，每个日本兵胸前都有护胸板，互相戳杀时发出刺耳的响声。有个别的不用力，教官就将他拉出队列，狠狠地

打他嘴巴。被打的日本兵，越挨打，越要在教官跟前站立，等着再打。看了这场面，我们深感日本人真凶啊！

五、以开朝会的形式，进行维护日伪统治的教育。朝会，就是学校早晨开全体师生大会。我在长沟小学上学时，家距离长沟12里，学校要求走读生不准迟到耽误朝会，如果误了朝会，以旷课论处。因此，我们每天都要起大早赶到学校，以班列队上朝会。那时长沟小学校长段某，每天主持朝会。他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先训话，然后带领全体师生呼口号。训话的内容是强调遵守学校“纪律”，不得违反“纪律”，不准听信“谣言”和传播“谣言”。呼口号内容每天都是一样的，我还记得几句：“保和平，建国家，剿土匪，救人民……”那时通过上朝会，给学生的基本印象是：日伪统治不得怀疑，维护日伪统治是每个学生必须遵守的纪律。

六、参加日伪举办的运动会。我参加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运动会。一次是1942年夏季。驻天开乡的日军出动两辆卡车，把尤家坟、五侯、岳各庄、周各庄等村的学生，运到涞水县的娄村，行程100多里，参观日军在娄村举办的运动会。这个运动会的参赛者，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由田径运动员做表演。运动场面很大，除成千的观众外，运动场四周，全都用苇席圈起来，上面贴满了诸如：“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剿灭共匪！和平建国！”之类的标语。另一次运动会是1944年秋天，房山县举办的全县小学生运动会。运动会项目很多，远道而来的运动员，管吃管住；竞赛优胜者，都获得了奖品，第一名都得了银盾。搞这样的“运动会”，无非是企图给人一个日伪政府“很关心青少年的体育锻炼”的印象。

【作者简介】张珍，原房山区畜牧水产局党总支书记，已退休。

（房山区政协供稿）

日伪时期华北农事试验场史略

苏 迅

出北京市西直门，由白石桥北行，可直达海淀区文化科学城。就在这条路上，有一座现代中国农业科学领域的最高学府、解放后建起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它的科学声誉在国内外远扬。而今提起它的前身，还有一段悲怆的历史，北京西郊一带的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今做一回顾，以便后人得知。

筹建试验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进而占领热河省，并于1935年11月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名为"防共"，实为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至此，我东北、华北大片土地沦为日军势力范围。1936年9月，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决定，在青岛市江苏路19号建立"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名义上是为山东地方进行农事改良。1937年4月，日本东亚同文会又筹建起"天津农事试验场"，业务由"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经管；同时还在河北省建立棉产改良机构，亦为该所统管。1937年日军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军侵占了北平市。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全中国，首先要巩固华北，建立后方粮棉基地。1937年底，在日寇操纵下，一批汉奸在北平市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翌年4月筹建伪中央农事试验场，办

事处设在北平市西城鲍家街21号，它的试验农场设在西直门外白祥庵村。同时宣布，设在青岛市的伪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及天津伪农事试验场合并到北平的伪中央农事试验场。

强占土地

建试验场首先需要土地。就在1938年4月，秋元真次郎受日本军部委派，带着一批助手，稻塚权次郎、大枝益贤、中富贞夫等人，来到白祥庵村。他们首先到几个村子勘测调查，很快又找到几个中国人，为日本人联系购买土地。此时日本人依仗占领者的淫威，在篱笆房村、大钟寺、躺碑庙、白塔庵村、六堆村、小李村、二堆村、皂君庙村等到处游说，说买土地建立试验农场，是为了“中日提携、大东亚共存共荣”，是为了“华北农民福利，增加生产”等，让农民将土地卖给农场。同时出了告示，每亩地价50元（伪币，折合今天约300元人民币）；一间房子好的20元，次的10元，一个坟头双人10元，单人5元。在日军淫威之下，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如果不卖地，惟恐全家性命难保，只好忍痛割舍自己的土地。日本人限期几天办理手续，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强占了3300亩土地。老百姓个个惶恐不安，因为没有自己的政府，无处讲理，只有忍气吞声。

这次日寇强占土地事件，造成11个村子、50多户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是失去了命根子。特别是1940年日军在华北搞“强化治安”，失掉土地的农民更是受尽煎熬。如张海斌一家5口，十几亩土地被占后，全家破产，无以为生，只靠打零工糊口，终日难得一饱。农民王嘎嘎，因土地房屋被占后，无处居住，全家露宿街头，手里仅有的一点“卖”产业的钱，没有几天就花完了，只得靠乞讨过日子，最后流落他乡死于外地。总之，日军强行买地建试验农场，给西直门外以北一带人民造成了大灾难，至今一些老人谈起来，仍痛恨不已。

组织机构及人事

伪中央农事试验场成立后，立即雇用十几名工人挖渠、打井、平整土地，开始种植试验；并公布了农场的组织部门及人事安排。该场主要两个部，直属场长管理。一是农业部，下属7个业务科，即耕种科、农业化学科、病虫科、畜产科、林业科、家畜防疫科、农业水利科；3个行政课，即秘书课、会计课、文书课。另外还要管华北各省支场、试验场、原种圃等21个单位。二是农业技术训练部，它主要担负培养农业技术人员。该部不仅管本场培训部，亦管辖济南培训学校，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部门。

伪中央农事试验场名义上是受伪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王荫泰管辖，实际上该场场长秋元真次郎直接受日本军部领导。农业部长中富贞夫、训练部长大枝益贤，以及各科科长、课长，各支场场长均是日本人。建场后根据业务部门需要，每年陆续增加人员。北平的试验场1938年4月有职员几十人，至1943年3月职员已达658名，日本人364人，中国人294人。到1945年秋，职员已达810名，日本人约420名，中国职员约390名。全场科技主持人全部是日本人，中国人均做一般性科技工作，那时有少数中国大学毕业生来场工作，也只是承担一个项目。该场还雇用中国工人约200人（长期正式的），少数人干室内辅助工作，大部分在地里劳动，由几个工头监督管理。随着侵略战火的蔓延扩张，日军的粮、棉、油、副食物资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日本人的生活待遇主要靠配给制。而中国职工生活待遇更是清苦，职员每月工资伪币60多元，配给40斤面粉一袋，有时还配给一些粗粮；工人每月工资40多元，配给半袋面粉（约20市斤），另配给几十斤粗粮。那时伪币贬值，中国职工主要靠配给的这一点儿粮食勉强维持生命。

农业技术训练部

建场当月，农业技术训练部应运而生。因急需人员，立即在北平市招收100名中国学生，另从日本国内招收几十名日本学生。此时大院内已经盖好两幢学生宿舍，一处叫兴华寮，日本学生住宿；一处训练部，中国学生住宿。农技训练部有食堂、教室、活动场地。

训练部初建时学制一年，学生们主要学习课程有日语、基础理论知识、农业科学技术等。中国学生一入校，日本人就命令将头发推光，换上军服，戴军帽。清晨起床后半军事化操练，早餐后，上午学习业务课，下午到地里劳动与实习，晚自习后吹哨熄灯。学生们学习劳动都很繁重，生活更艰苦，一天三餐限量而食，困难时缺乏粮食，搭配倭瓜红薯；吃的蔬菜，主要靠自己种植。有的学生吃不饱，偷着出大门买食物吃。训练部规章很严，平时不准出大门，不准回家，两星期放假一天。那时日军将粮食运走，北平市民无粮可吃，只能买到混合面（混合面是几十种杂粮糠皮磨成的），所以学生回到家更吃不到好食物。实际上这些学生是在饥寒困苦中学习生活的。

学生毕业后留在本场工作，也有到华北各省支场任职。1943年第5期结业后，根据形势需要，学制改为两年毕业。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招收了最后一期学生。日本人在北平办训练部的同时，1938年5月还在山东办了济南乡村师范学校、乡村建设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农学院、高级农林学校等，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留在华北各支场工作。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北平“训练部”和济南各校毕业的学生热爱祖国，精神焕发，奋发图强地钻研农业科学，很快成长为科学技术骨干，并取得丰硕成果，有的直到现在还在辛勤地为祖国的科研事业而奋斗着，这当然是侵略者所始料不及的。

土地使用及建筑

试验场强占土地约3300亩，大院围墙内约700多亩，墙外边绿地、道路占地约200亩；试验用地南圃场约700亩，北圃场900亩，中圃场800亩。此外，日本人还向大钟寺等处借地十几亩。

谈到试验场的建筑，日本人确实是大动了脑筋的。工程开始，首先将场部用红砖沙子灰的围墙垒起来，这在30年代的西郊是首次见到。同时盖起了面积达348平方米的西大门，大门很有特色，它的拱顶和两侧全部是黄色贴面。红色大墙和黄色大门，在周围绿色庄稼相映之下，显得特别耀眼。大门口驻有一个“警卫班”，“警卫”都是些中国的愚氓，他们倚仗日本“主子”的势力，有时还带着警犬夜晚巡防，老百姓视他们为日寇鹰犬，避而远之。

实验大楼被日本人视为重要工程，为此从日本国内请来很多建筑工程师进行设计施工。三层大楼约7850平方米。楼的骨架是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楼墙垒成后，墙面同样是黄色贴面，从远处看去金黄一片，突出所谓东洋气派。据说，黄色贴片是从日本国内运来，因之有个日本人吹嘘“这显示日本富强”。整个试验农场的设计，处处渲染侵略军的“威风”和野心，从实验大楼看，其外型像一只永不沉没的军舰，若从空中俯视，则像一架飞机。在设计图纸上它是个“亚”字。试验大楼计划3年盖成，而5载竣工，1943建成的只是前半部“西”字型。楼的后半部由于日本经济困难，无力再建而告终。

实验大楼内部的装饰、设备都比较先进，大多数是从日本运来，防腐器皿柜、硬木实验台，水、电、暖气齐备。在所有实验室墙壁上，装有全套供应煤气的紫铜管子。大楼的地下室是供暖锅炉房，还有供全场食用的深水井，水塔设在大楼顶端部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楼二层正面有个高级贵宾室，禁止普通人进入。里面陈设着文物古瓷，地板上铺着大地毯，壁上镶嵌

着一幅金丝锦锈壁画，上绣一对意欲腾飞翱翔的彩凤凰。紫檀办公桌后面，有一把金线绣制的豪华椅子。整个室内古色古香，充满日本贵族的豪华气派。据说这间贵宾室是为了迎接日本天皇而准备的。谁知侵略者好梦做尽，到头来乃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就在大楼竣工时，它的东边 50 米处，一座炼焦车间，还有一座高 20 米，直径 20 米，立体圆型，厚钢板制成的大瓦斯罐也交付使用。生产出来的煤气通过大管道输送至实验大楼及院内各宿舍楼等处使用。此项工程，当时在海淀一带甚是罕见。

大楼前庭院布局也是很讲究的。楼门外已建好一座大水池，宽 20 米，长 40 米，池中间有个像蜡扦似的水塔喷泉。水池周围有 4 块对称的草坪，周围有 1 米多高的侧柏围圈着，里面花草树木很齐全（解放后，经农科院几十年扩建整修，现已是个漂亮的花园式庭院了）。

试验场其他科室、宿舍楼房工程，至 1943 年也陆续竣工。如农作物各科调查室 、种子库、昆虫室、仓库等处 29 项，建筑面积为 8031 平方米；畜牧科 21 处，3917 平方米；家畜防疫科 38 处，约 8077 平方米。宿舍设计要求既实用又要有日本风格。首先盖起一栋佐官宿舍楼（佐官就是校官），外墙壁刷成白色，名曰“白楼”。标准套间两室一厅，日本式装饰，横推拉门，木制地板；卧室里铺着榻榻米（日本人铺的厚草垫子），室内有大小壁橱 4 个，设有带煤气管道的厨房、带抽水设备的厕所。这套房子可住 4 口之家。另建一栋尉官宿舍楼，名叫“灰楼”，住室设计亦是日本式的，可住两个人。这栋楼带集体食堂，不出楼可就餐。还有一栋为士官级单身楼，因是红砖砌成，名为“红楼”，是为一般日本人集体宿舍。这 3 座宿舍楼房建筑面积约 7000 多平方米。

从整个试验场的规划看，应当说是比较科学、严谨的。日本人如此精心投入这么大经济力量修建这个“农事试验场”，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打算永久侵占北平及全中国的野心。

试验场所有工程全部由日本福昌公司承包，下包给韩国人商社施工，雇用中国工人干活，大小工头层层剥削，真正干活的人拿到极少的工资。据知，当时一个瓦工或木工，劳累一天得到的工资只是2.50元伪币和5斤发霉的黑豆饼面；一个成年壮工，干的是又脏又累的粗活，每天工资1.50元伪币、4斤黑豆饼面；一名童工，一天只给5角钱伪币、2斤黑豆饼面。这些工人，吃不饱肚子，身上衣服不能遮体，多数人瘦骨嶙峋。吃了发霉的黑豆饼面，个个拉稀，体质下降。干活时稍有怠慢，就被工头打得遍体是伤。那时大工头都是韩国人，大家背后叫他们"高丽棒子"。施工现场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例如建灰楼宿舍时，有一天早晨刚上工，工头让工人往楼顶上背送水泥，工人们肚内无食，体质很弱，背着80斤重的水泥，勉强往上爬行。2尺宽的跳板又陡又窄，工人在跳板上晃晃悠悠，真是难行。突然，有一河北籍壮工脚一歪，没踩稳，身体重心倾斜，从二层楼高的跳板坠落下去，背上的水泥砸在身上，当场死亡。另一个壮工看到有人掉下去了，身子一颤抖，也摔了下去，因受严重内伤，奄奄一息，送回家去3天也含冤而去了（此人是海淀区城府村人，名叫周大升）。当时工头给两名死者家属各10斤玉米面了事，还反咬一口说"是工人违章造成的"。从这次工伤事故看，工人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那时中国人的生命还不如草芥。日本帝国主义高喊"中日共存共荣"完全是欺人之谈。干活的工人有几句顺口溜："日本鬼子真叫坏，不是打来就是踹。吃不饱来穿不暖，生命要还阎王债。"工头欺压工人，工人不敢硬顶反抗，只能消极怠工，造成工程进度缓慢。工人们悄悄地传说："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三点钟，一天撒三遍，回来就收工。"由于工头凶狠，工人们互相提醒少挨打，流传着："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你不长眼的。"意思是干活时，眼睛得多注意工头，否则就要倒霉受苦。

试验场主要工程至1943年秋季基本竣工，交付使用，部分附

属房屋 1945 年完成。

试 验 研 究

1940 年 6 月 1 日，日本人宣布将“中央农事试验场”更名为“华北农事试验场”，其业务及管理范围不变。当时该场主要任务是对我华北农业、畜牧业、林业进行改良品种、改进技术、防治病虫害的研究和试验。他们充分利用劳动力便宜，试验设备较好的条件，选出了一些好的作物品种，如小麦华农 1 号、2 号，玉米华农 1 号，甘薯冲绳 100 号。研制的畜牧兽医药品疫苗有鸡新城疫苗、防治牛瘟疫苗等。以上培育出来的作物品种和兽药疫苗都在华北各省推广应用了。科学本身是进步的，为提高生产技术开辟道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日本人侵占我北平之后搞农业科研，其目的还是为了侵略战争服务，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搞 所谓“工业日本国、农业中国”，利用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土地辽阔，土壤肥沃，盛产粮棉的自然条件，把中国建成他们的天然的“后勤仓库”。侵略者是非正义的，必然遭到全世界人民反对。1945 年 8 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本稿承蒙朱凤绥、方悴农、董毓鳌、马德媛、周长龄、鲍瑞林、李德海、郭学忠诸位老师和同志协助提供资料，本人万分感谢。）

【作者简介】苏迅，北京市海淀人。1947 年冬在北平农事试验场当过工人，1949 年北平解放后留下工作。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区划研究所人事处长等职，1989 年离休。

（海淀区政协供稿）

编修民国27年密云县志始末

冯广霖

民国25年（1936年）至28年（1939年），我在密云县伪政府当书记员（俗称贴写），曾经参加了民国27年（1938年）县志的抄写工作，知道一些此志的编修过程，现在回忆如下。

日本侵华以后，密云县属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管辖，伪冀东政府长官殷汝耕派舒乃藩当密云县知事（县长），不久舒被调走，王缙继任县知事；又派来日本人川本定雄为顾问。汉奸王缙只是傀儡，日本顾问掌握实权，县里一切事情都听从川本定雄摆布。

民国26年（1937年），川本定雄为了掌握密云的经济、政治情况，尤其是密云的矿藏储备、生产情况，决定在民国19年县志草稿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密云县志。

“新县志编修委员会”的主任由县知事王缙担任，副主任是川本定雄，总纂武絅堂（密云绅士），协纂：宗伯滇、陈穆卿、马眉轩（古北口绅士）、王慎三（石匣绅士）、武谷峰，秘书宁作民和各科科长为委员（如建设科长冯广汉，教务科长张景巡等）。又派杨慕唐、宗保南、陈兆凤、韩德林为编辑。当时编辑分工是：宗保南摘抄旧县志，陈兆凤收集整理图表、照片，韩德林收集分类整理文字资料，杨慕唐汇总后，交“编委会”审议定稿。

“编委会”设在南街路西白衣庵院内。“编委会”建立后，川本以编委名义，命令伪警务局长刘景禄通知第一、二、三、四分

局长肖保任、戴继良、刘学有、张建初和各分驻所所长，责令各村村长限期搜集地方特产、社会习俗、古庙碑记等各种资料，然后汇总交“编委会”。另外，川本还责成县城商会会长信佐臣、石匣商会会长韩香久、古北口商会会长刘沛然，以及称斗、屠宰、花生等牙行，把密云、石匣、古北口三镇各商号的资金、利润、税收等状况，按行按户造册填表报县备用。“编委会”还组织“中美照像馆”等一些摄影人员现场拍了一批黑白像片，如三镇屠宰场、国民中心校教职员、承审处审理案件、名胜古迹等。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编委会”把我县的矿藏分布、城内外道路等搞得特别仔细，如把墙子路钨矿、瑞华金矿的储量、分布、采矿过程、运输路线都写进了县志。川本定雄还在“密云县财经状况和矿藏资源”的篇章后用日文写了说明。与此同时，日本人以“中国没有冶炼技术”为名，把我县大量的金矿粉、钨矿粉运回日本国。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有中日两种文字的密云县县志，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民国 27 年县志。

【作者简介】冯广霖，密云县城关镇居民，学生时曾抄写过民国 27 年密云县志，现为退休教师。

（密云县政协供稿）

毒　化

我们所知道的通州土膏店、白面儿房

刘新三　董　兴

日本侵略军占据我华北后，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加紧推行了毒化政策来配合其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渗透活动，他们纠集了通州城内的日、韩浪人和地方上的汉奸、地痞，建立了运销毒品的网点，妄图用这种手段来麻醉我国人民抗战的思想，使我们中华民族慢慢失去抵抗的能力，以达到他们统治奴役的目的。

土膏店、白面儿房的出现

日本人于1938年在通县开始筹划施行毒品政策。1939年初，通州城内的第一家土膏店（即大烟馆，又称鸦片馆）仁记土膏店在北大街开业（经理袁子恒，山东掖县人）。接着，亚东土膏店在南大街开业（经理王子恒）；新乐土膏店在鱼市口内开业（经理刘益民，通县刘老公庄人）；利通土膏店在东大街开业（经理梁润亭）；六兴土膏店在西大街开业（经理唐松三）；公记土膏店在鼓楼后开业；通义土膏店在东关粮食市开业。一时，土膏店遍及通州城内。同时日、韩浪人又在通州城内各街巷开设白面儿（海洛因）房十五六处。

大烟、白面儿的来源

通州城内土膏店的烟土大部分是国货，也有少部分是外国货。国货中一种是察哈尔烟土，来自张家口地区坝上各县；另一种是热河烟土，出自赤峰、八里汗、大庙、锥子山等地。这两种烟土主要靠私人用骆驼队运到通州，每两价格在三块银元左右；再一种是东北产的“东北边货”，很有名，出烟多，价格较高，每两四五块银元不等；河北涿州、易县、良乡和定县的本地烟土，价值二块银元左右。外国进口的有：苏联的“俄国红包”、印度的“印度大土”等，其价格很高，每两八九块银元。白面儿主要来自朝鲜，是到中国做买卖的朝鲜商贩运进来的。

土膏店购进烟土之后，自行加工，通过破土、过淋、熬膏、烧炮四道工序就能吸用。白面儿不用加工，吸用很简单，放在香烟里就可吸用。

常客与经营

随着土膏店的出现，沾染吸毒嗜好的人越来越多。常来土膏店吸毒的烟客为有钱人家的浪荡公子、土豪劣绅、流氓地痞、无业游民以及失意的小官僚政客；还有一些外地小商小贩、小手工业人员、锔锅锔碗的、焊洋铁壶的，有的和尚也常常光顾土膏店。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家自己买烟土炮制，也有的去烟馆买烟泡拿回家中吸。

烟馆的生意很兴隆。仁记土膏店大约每天卖 50 元左右（当时面粉 2 元一袋）。有的土膏店为了能更多地赚钱，采取了雇用女招待的办法招徕烟客。女招待主要陪伴烟客吸烟，她们都有一整套熟练的烧泡点烟的技术。烟客吸足大烟过了瘾后，精神上来了，就开始和女招待调逗戏笑，动口又动手。女招待为了满足烟客要求，使自己能够得到一些额外小费，对烟客的言行，毫无顾忌，十分

放纵。鱼市口内新乐土膏店雇用女招待多达8人。

吸毒的危害

大烟和白面儿都是麻醉性毒品，正常人久吸上瘾后，身体逐渐衰弱，精神萎靡不振。尤其是上来烟瘾后，打哈欠，流鼻涕，四肢无力，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就像瘫痪的残废人一样，不抽足大烟，不过了烟瘾是不能活动的。当时通州城内到处可以见到衣衫褴褛、步履踉跄、面黄肌瘦的“大烟鬼”。有的“大烟鬼”无衣无食连饿带冻，无家可归，死在沟壑之中。常到新乐土膏店的烟客李某（名字记不清了），家中富裕，因沾染吸毒恶习，最后倾家荡产，死在了城门洞里。通县砖厂有个外号叫陈大疤瘌的烟客，因吸毒把住房卖了，媳妇也转让给别人。当时因吸毒造成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屡见不鲜。有的“烟鬼”为了弄到钱满足吸毒的奢望，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沦为盗匪。有的卖国求荣，充当日本人的汉奸走狗。还有的坑蒙拐骗，敲诈勒索。这也是当时通州城内社会治安秩序一片混乱的原因之一。

1945年日本投降了，毒害通县人民7年之久的土膏店和白面儿房相继关闭。

【作者简介】刘新三，原仁记土膏店的伙计；董兴，原新乐土膏店的厨师。

王文宝整理

（通县政协供稿）

长辛店的白面儿房子

王玉祥

日伪统治时期，我家住在长辛店大街车店口，亲眼看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罪行；一些外国人也依仗日本军队的势力在北平地区开办了很多“白面儿”房子，经营“白面儿”（即海洛因）来毒害中国人民。仅长辛店大街这么个小地方，姓崔的、姓朴的、姓金的开的就有十几所。四合院有一所“白面儿”房子，这是朝鲜人一个姓崔的开的。这个店比较大，到这儿买“白面儿”、抽“白面儿”的特别多，他的势力特别强，稍不注意，他便勾结官府把人抓起来，所以街坊邻居都不敢惹他。一次，长辛店大街有一个中医，叫何乐清，和这个姓崔的发生了口角，本来是一件小事引起的，何乐清会武功，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打了个半死儿，给中国人出了口气。因此姓崔的叫来了警察，把何乐清抓了起来。穿过长辛店大街时，何乐清高喊：“我是中国人，为什么抓我？外国人滚出去！”在警察局里押着，有很多街坊邻居都给他送吃的，慰问的人群络绎不绝。可见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外国人卖“白面儿”，毒害中国人民，是多么愤恨！

长辛店大街车店口路南有一家叫李天来，是个破落户，他把自己的小院子卖给了一个姓朴的朝鲜人。这个姓朴的为了扩大“白面儿”的营业，便在这里开了个戏园子，唱昆剧和京剧，唱戏的是中国人。这样就招来很多看戏的，“白面儿”卖的又多又快。

当时，长辛店也有少数中国人到朝鲜人开的“白面儿”房子里买来一批“白面儿”，自己再去卖，赚点钱来维持生活。德心园澡塘子对过，有个叫柳三的卖“白面儿”。长辛店大街路西南荡子对门有一个叫刘士清的，卖过“白面儿”。天主教堂旁，有一个史家大院，是个卖“白面儿”的地方。宝善堂的后面，有一个院子，是中医郎先生的儿子郎四儿卖“白面儿”的地方。丰台大街上也有几家朝鲜人开的“白面儿”房子。当时，还有一种“白面儿”针，像现在的吗啡一样，打这种针能上瘾，和吸毒一样，有的人扎得浑身溃烂。“白面儿”是怎么做的，我不清楚。长辛店东河沿地里，经常有一些朝鲜人，到了晚上，拿着很长的手电筒在那里做白面儿，他们不让中国人看。

日本侵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他们卖“白面儿”，毒害中国人民，弄得抽“白面儿”的人倾家荡产。抽“白面儿”，比抽大烟方便，弄一棵纸烟，“白面儿”往上一放，就可以抽，抽一两口就过瘾。有的人抽上几次，就等于上了“贼船”，下“贼船”却很难，不抽就不行了。不抽，就没一点精神，耷拉脑袋。所以，有的人不吃不喝不穿也要抽“白面儿”，还有卖地卖房子的，甚至还有卖儿卖女卖老婆的。抽“白面儿”上了瘾，有抽死人的，有的抽“白面儿”冻死在野地里，还有的抽“白面儿”爬到井里的。我父亲开火车，染上了这种毛病，本来我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父亲当火车司机能挣点工资，但是一抽“白面儿”，就给抽穷了，我和我妹妹经常到史家大院那家“白面儿”房子去赊点“白面儿”，等我父亲跑车回来再去还帐。每次去买回“白面儿”来，我和妹妹都偷偷地留一点，积攒在一起，万一买不起的时候，父亲来了瘾，不能跑车，我们就拿出来让他抽。有一次，我和妹妹到史家大院赊来以后，天都黑了，又偷偷地留出一点，谁料，一阵大风全给吹跑了，我和妹妹很害怕，哭哇哭的，没办法，周围邻居都知道了，大家又凑了一点钱，买了一点“白面儿”拿回家，

让父亲抽。他抽足了，精神上来了，好去跑车，挣点钱，全家还得靠他吃饭呢。这样，我们家的日子越来越不行了，终日受苦受罪，挨饿受冻。母亲对我说：“你爸爸抽上‘白面儿’，上了贼船，就算完了，咱们不怕艰难困苦，挨饿受冻，拼着命也不能叫你爸爸把你妹妹卖给高丽棒子。”这时，全家已泣不成声了。

卖毒，使不少中国人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给中国人带来很大危害，这也是日本鬼子的罪行之一。当时，我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29 军士兵不怕。有一天，我看到 29 军士兵手持大刀，给长辛店所有的“白面儿”房子都站了岗。进去的人不管，出来的人挨个搜身，发现买“白面儿”的就全部没收。后来，把卖“白面儿”的全部带到了军营。据卢沟桥镇镇长王宗锡说，他家住在宛平城里，亲眼看到了 29 军士兵抓了 30 多个卖“白面儿”的，押在宛平城，还枪毙了一个卖“白面儿”的大户。七七事变那天夜里日本人打枪，第二天一早，30 多个卖“白面儿”的犯人跑出了城。

【作者简介】王玉祥，1915 年生人，北京长辛店人。现为北京市磁钢厂退休工人。

张海思整理

（丰台区政协供稿）

日本鬼子与大烟鬼

陈桂祥　王德成

我们是海淀六郎庄老住户，经历了军阀、日伪、国民党、共产党四个历史时期，酸甜苦辣咸都尝过，最苦的还是日伪那8年。混合面我们吃过，吃完了拉出的屎，风一吹就没了；洋工我们磨过，磨一天挣二斤大云豆，不够一葫芦醋钱；“虎烈拉”（霍乱）我们也得过，差点被日本宪兵给活埋了。然而，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大烟、白面和吗啡对中国人的毒害。

西郊有“三多”

当时西郊有个民谣：“西郊有三多——日本鬼子多，大烟鬼多，饿死鬼多。”这“三多”有连带关系。日本鬼子多才大烟鬼多，大烟鬼多才饿死鬼多。因为来中国的日本鬼子多了，所要的费用就多，日本帝国主义拿不出那么多钱养活他们，就叫他们在中国就地取“财”，自给自养，这样日本鬼子就出了许多发财的贼招儿，其中最毒的一招儿就是“烟粉计”——贩卖大烟白面儿，图财害命，毒化我中国人。

当时海淀一带有三家白面儿房：西门宽街一处，南栅栏胡同一处，蓝靛厂一处。这白面儿房如同阎王殿，“高丽棒子”就是阎王爷，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人只要与白面儿房有了缘份，就得卖房卖地，倾家荡产。抽了大烟的人满面烟容，骨瘦如

柴，雪地横尸，随处可见。目睹这人间鬼蜮世界，时人才说出了“西郊有三多”的感世之言。

败家如山倒

在六郎庄南有一座清水脊门楼、阴阳瓦房的四合院，一看就知是富户之家。房主名叫周老疙瘩，城里有买卖，乡下有地。日本来了以后，他染上了抽大烟吸白面儿的嗜好，眼看着人不成了，亲戚朋友为了挽救他，把他送进挂甲屯的“戒烟总会”受戒，他受不了“蒙古大夫——恶治”的苦，又跑出来，不但吸白面儿，还扎上了吗啡。手中的钱没了卖家具，家具卖没了就卖地，最后愣给那座四合院拆了卖木件(因房子质量太好，卖房没人敢买)。就为了这口大烟白面儿，几年的工夫，好端端的一个小康之家给抽没了。

二张飞临走悔不该

六郎庄有一个叫“二张飞”的，从名字就知他是条汉子，稻地活没有不成的。他 18 娶妻，20 得子，转年又生一女，小两口男耕女织，生活挺好。不料有一次二张飞吸了别人赏的一口烟，一来二去就与南栅栏白面儿房挂上钩。有多少好心人劝他戒烟，他总以“我爱抽，没抽你们家的钱”冲人肺管子。等到他抽得骨瘦如柴、由一条汉子变成了大烟鬼时，他才醒悟过来，就把妻子孩儿叫到床前说：“你们娘儿三个逃活命吧。我这一辈子对不住你们!”妻子带着孩子前脚走了，二张飞后脚就出去了，至如今二张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郑秀珍卖身吸白面儿

平西蓝靛厂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素以出美女闻名乡里。日伪时期，村里有个父母双亡的大姑娘，名叫郑秀珍，由于人长得漂亮，搞对象挑花了眼，高不成低不就给耽误了。那个社会的世

道，一个孤身大姑娘就走上了下三路，人都叫她“野玫瑰”。

“野玫瑰”不知什么时候也吸上了白面儿，弄得家室空空，该卖的全都卖了，人也珠黄半老了，最后在宽街白面儿房附近搭了个窝棚，暗自为娼。那些“做阔全凭鸦片烟，花下作鬼也神仙”的大烟鬼，在白面儿房吸足了来了精气神，就跑到窝棚里与“野玫瑰”鬼混，一次给一包白面儿钱。郑拿到钱再跑到白面儿房喷云吐雾。时间一长，人们又管她叫“白面野鸡”了。

小押如虎狼

“高丽棒子”除了开白面儿房，还开设一种当铺，人称“小押”。

小押是白面儿房的派生物。那些大烟鬼穷途末路，十个有九个铤而走险去盗窃。他们将偷来的东西拿到小押典当。“高丽棒子”则值十给三，从中渔利。有时“高丽棒子”还将押物公开招领，巧取民财。1943 年春，中坞村一个叫“野狐狸”的大烟鬼偷了地主张某的一匹马，拉到蓝靛厂小押去卖。“高丽棒子”收下马后，便贴出一张“招领马匹”告示，张某闻讯赶来以市价赎回。曾有伏地文人作了一首打油诗：“一二三四五，小押如狼虎。先吃大烟鬼，后吃失物主。”一旦有人问起偷主情况下落，“高丽棒子”守口如瓶；反之有人偷了日本的东西，“高丽棒子”则甘心为日本当密探。1945 年初，北平西郊机场从日本进的一批飞机零件全部丢失，机场的吴本司令命“高丽棒子”限期找到偷主。偷主王才闷了一段时间到小押出手，当场被“高丽棒子”稳住，暗中通知吴本司令。一会儿一辆荷枪实弹的摩托车开来将王才逮捕送入西苑日本宪兵队。后来王才经人作保放出，他见到家里人的头一句话是：“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可见他在宪兵队吃了大苦头。

一则奇怪的传说

日伪时期，北平西郊尽闹“拍花子”，弄得太阳一落山，大人

就不准孩子出门。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这样一段故事：

有两口子带着一个3岁小小子过日子。丈夫白天上班，妻子在家挑花，平时就让孩子在街门口玩儿。忽然有一天孩子不见了，找遍了街坊四邻也不见踪影，急得夫妻俩抱头痛哭。于是夫妻二人串联亲戚朋友四处寻找。有一天，男的在西直门车站看见一位高丽女人背着一个睡觉的小孩，越看越像自己的孩子，上去一把揪住那个妇女问个究竟。女人见状很慌张，想夺路逃走，男的岂能松手，二人吵闹起来。这时走上一位伪警察盘问事由，那男的细说分明，警察命令女人放下孩子叫男人辨认，当这位女人将孩子解开时，那位男的“呀”的一声，昏厥过去。原来他的孩子被开了膛，制成木乃伊，里面装的是大烟白面儿……

是不是真有这事，谁也闹不清，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大烟白面儿对中国社会的毒害。

不要忘记过去

“愣抽你别哈，愣哈你别扎，一扎就完啦！”这是日伪时期北平流传的关于抽大烟吸白面儿扎吗啡的顺口溜。意思是说：大烟白面儿开始是放在烟枪里抽；后来抽不过瘾了，就将白面放在银纸上用烟灯烤，将烟气全都吸入口中；等到哈也不解气了，这才扎吗啡，扎得浑身跟疥蛤蟆似的，一到这份上，人就离死不远了。

回想当年大烟鬼的情景，我们浑身上下都起鸡皮疙瘩。日本鬼子用“烟粉计”毒害中国人的事，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作者简介】陈桂祥，84岁，六郎庄人，日伪时期给日本人做过工，现退休闲居。王德成，67岁，一生务农，现退休看门。

严宽整理

（海淀区政协供稿）

■反　抗

平郊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籍援朝

北平郊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始于1938年初。1937年11月，聂荣臻率八路军115师主力一部开辟了华北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3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聂荣臻命令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委邓华率领部分主力开赴平西门头沟，攻占敌据点，摧毁伪组织，解放平西10余万人口，建立了宛平、宣（化）涿（鹿）怀（来）、房（山）涞（水）涿（县）和房（山）良（乡）等抗日县（联合县）政权。1938年5月，邓华支队与宋时轮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支援冀东人民的抗日大暴动，平西被日伪占领，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宋邓纵队返回后，又恢复了根据地。1939年3月，平西专署成立（时称冀西第四专署），专员杜伯华；5月，中共平西地委成立，郭永明任书记。1939年2月至1943年6月，平西军民粉碎了日伪多次"扫荡"，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1943年6月以后，日伪无力再组织对平西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1944年，平西军民开始了对日伪的局部反攻。1945年4月以后，八路军平西部队开始了猛烈的攻势作战。4月，解放了斋堂川，5月，攻克昌平，6月，收复涞源。至抗战胜利，平西山区已完全掌握在抗日军民手中。

平北根据地包括现属北京的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等县。卢沟桥事变前，这些县多已沦陷，日伪统治势力较强，给平北根据地的建立带来很大困难。但平北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1940 年以前，这里已有八路军少数部队活动，也曾建立过抗日联合县政府。1940 年上半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①]主力 7 团、9 团一部和 10 团先后开进平北，随之建立了中共平北工委（后改为平北地委），苏梅任书记；7 月，成立了平北军分区，程世才任司令员，段苏权任政治部主任；组建了晋察冀第十四专署（平北专署），专员张致祥。在日伪疯狂“扫荡”、“蚕食”根据地的日子里，平北地委制定了“长期坚持，一点一滴地巩固与发展”的方针，经过艰苦的斗争，度过了困难时期。1944 年，平北的形势好转。1945 年 5 月，平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根据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向日伪广泛出击，曾一度攻入沙河镇，逼近北苑；8 月，解放了华北重镇张家口等城市，并配合苏蒙军队对日作战。抗日战争结束时，平北大部地区已获解放，建立了昌平、延庆、怀（柔）顺（义）、丰（宁）滦（平）密（云）等 10 个县（联合县）政权。

冀东抗日根据地所辖现属北京的平谷、密云、顺义、通县等地，当时属于冀东北部根据地。1938 年 7 月 6 日，冀东人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抗日大暴动。抗日武装先后攻占了昌平、平谷等 9 座县城，建立了平谷以及昌（平）滦（平）密（云）、密（云）平（谷）蓟（县）等 10 个抗日县（联合县）政府。10 月，冀东抗日武装西撤平西，斗争形势转入低潮，留下的千余人仍坚持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而政权工作暂时停止。1939 年下半年，在冀

① 成立于 1939 年 2 月，萧克任司令员，陈漫远任政治委员，参谋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伍晋南。

热察挺进军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展平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后，冀东地区抗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党政军领导机构相继建立，至1941年春，冀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从1941年5月起，华北伪“治安军”主力开进冀东，扬言要与日军“提携”，“彻底覆灭共军”。冀东八路军先后进行了“打治安军战役”、“复仇战役”等多次战役，不断打击日伪军，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7月，冀东地委、专署分别扩建为中共冀热边特委，冀热边行署，李运昌任特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特委下设5个地委，行署下设5个专署。1945年1月，冀热边特委改称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边行署改称冀热辽行署，军分区也扩建为冀热辽军区。8月，冀东八路军一部在对日伪的反攻作战中，一度打进顺义县城，攻入通县机场。至抗战胜利，冀东大部国土已经解放。

现属北京的大兴县，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平南（即冀中大清河北）根据地。抗日战争初期，大兴就有农民自发的抗日武装，以后八路军冀中五分区又将大兴县采育下路联庄会收编为五分区游击11团。大兴人民与冀中人民一起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西、平北、冀东、冀中四块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从战略上形成了对日伪统治的中心北平的包围态势。日伪统治不断遭到抗日军民的打击，始终不得安宁。

抗战8年，根据地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数不胜数。王仲华（董毓华）、白乙化、包森、徐智甫、胡瑛、任宗玉……无数先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业绩和英名将永远铭记在北京人民心中！

【作者简介】籍援朝，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处长。

（北京市党史征集委员会供稿）

我在沿河城三年的地下斗争

王树瑞

1941年1月，平西区党组织派我到沿河城日本警务段为日本指导官当“使役”，让我以这个身份搜集敌人的情报，配合我平西抗日游击战争，直到1943年11月杀死日本清水小队长、火烧警务段，前后近3年时间。这是我参加革命的开始，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但是党的教育、培养、信任和严酷的斗争考验，使我终生难忘。

“101”与“一郎”

1940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门头沟的沿河城。沿河城地处丰沙铁路线的中上段，离北平80公里，是日军进攻我平西根据地、掠夺我平西矿产资源的交通要道。

日本进城后，又筑碉堡又建警察所、维持会。为了讨伐平西游击队和掠夺矿产资源，保证铁路运输安全，他们还设立了警务段。警务段里有十多个日本指导官和三个中队伪军，约400人左右，他们叫“满铁队”。

1941年1月，平西区党组织获悉，警务段要让维持会给他们找几个小孩到那里当“使役”。有一天，我大哥王树芳从山上打柴回来告诉我说：“老韩、老王让你回村去一趟，他们在大核桃树底下等你有事。”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到那儿就知道了。我知道大

哥是党的地下交通，不该他说的话他一字也不说。

我的家原住在沿河口，离沿河城3里地。日本占了沿河城以后，害怕游击队袭击，实行大并乡，把五里三村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住，我家也被赶进城，就住在离警务段第三道铁丝网大门不远的地方。老百姓上山打柴、回老家背粮拿菜才许可出城。我哥哥就是借上山打柴和游击队接头。

我走出家门，心里盘算："一定是有重要的事，不然为什么他们俩人找我呢。"老韩叫韩晓照，他是我宛平县敌工部的干部，老王叫王学强，他是区公安员。我大哥常给他们送情报，我跟他们也很熟。

我进了沿河村，远望大核桃树底下一个人也没有。等我走到树底下的时候，王学强同志在地堰下边等着我呢。他说："给你寻个吃饭的地方。"他知道我从小没父母，生活很苦，才这么说。我问他上哪儿，他说给日本人当"使役"去。我不明白当"使役"是怎么回事，他说就是给日本人当"使唤人"。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伺候日本人，我饿死都不去。"他笑着对我说："'使役'是你公开身份，你的任务是搜集日本鬼子的情报。为了完成任务，你要好好地伺候他们，挨打挨骂都不能跑回来。"我这才明白，这是交给我的任务。我问他："我才13岁，干得了吗？"他说："人家要的是小孩，大人还不要呢，我们看你成，才让你去的。"最后他告诉我："你的代号是101，以后有情报写在纸条上可不能写你的名字，要写101，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

几天以后，维持会就把我领到警务段，让我伺候日本小队长石山和清水两个人。他们给我起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叫"一郎"。

夜送情报

才到警务段，我不熟悉伺候日本人的事，时常挨打。要是由

着我的性儿，早就不干了。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任务，眼泪咽到肚子里，把满腔怒火压下去。有一回，清水说我没有把他的碗洗干净，把我叫去，不由分说，大嘴巴一个挨一个的抽我，我的脸和嘴立刻就肿起来了，最后他一脚把我踢进屋里去。我实在忍受不了，就跑回家去，见到哥哥、嫂嫂就伤心地哭起来，告诉大哥，我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了，让王学强换人吧。我大哥看我被打得这个样子，也很难受。他找到王学强同志一说，老王说："回来可不成，打不死就得去。你告诉你弟弟说，记住日本鬼子的仇恨，咱们打他的日子在后头呢。"后来，三个日本兵也出来找我，我才又回去了。

从那以后，我慢慢地学会了怎样伺候他们，挨打的时候也少了，我跟他们也混熟了。因为我每天要给他们打扫卫生、做饭、买菜，所以我可以随便出入石山、清水的住屋和警务段的大门。

1941 年 4 月一天，交通员王树芳和索振斌找我，说王学强同志让我到沿河口去一趟。我到那里，老王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搞一份"满铁队"的花名册。我知道花名册就在石山的保险柜里，钥匙就在他办公桌抽屉里，可是因为我的文化低，就是拿出花名册，一时半会儿我也抄不完，那是很危险的。后来我等石山到北平休假去了，在清水晚上洗澡的工夫，我走进石山的办公室，打开保险柜，取出了花名册，让通讯员索振斌按照约好的地点把花名册交给了王学强同志，他们抄好了又让王树芳给我送回来。

1942 年夏天，有一天晚上天阴得很沉，伸手不见五指，天气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忽地起了一阵风，跟着霹雷闪电，瓢泼大雨下起来了。我一看没什么事了，就躺下睡觉了。没想到，半夜石山把我叫起来，说让我给他们做饭。我心想："半夜三更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一定是有什么急事。"我正在淘米，石山把翻译官找来，他俩叽哩呱啦地说，我也听不明白，只听见有"游击队……沿河口"六个字。我一捉摸沿河口一定是有什么情况，急忙把米

下到锅里，顶着倾盆大雨，爬过三道铁丝网，一口气跑到我的家，告诉我大哥王树芳，要马上通知王学强同志，今天夜里敌人有行动。

凌晨3点钟，日本兵和“满铁队”冒雨出发了。没想到天刚大亮，他们就回来了，只见大雨把他们淋得跟小鸡子一样。我见石山满脸怒气，就赶忙给他打洗脸水、换衣服。他发疯地嚎叫：“他妈的，什么情报，统统是假的！”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倒在椅子上。

事后我才知道，多亏我及时送出了情报。那天夜里王学强等人正在沿河口开会，他们接到情报立刻转移到山上，敌人包围了沿河口，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结果连个人影也没见到。那次情报是王树芳、黄恩博两个人用大绳把索振斌、李集云从城墙上送下去，为争取时间抄近道送给王学强的。

刀放在了脖子上

沿河城的日本鬼子，常遭到我平西游击队的打击，他们越来越胆小，就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为了增强防卫，他们又在离沿河城15里的楼岭山上，增驻了一个伪军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的任务是封锁我根据地各村的联系。

为了打击敌人，韩晓照同志让我摸清楼岭伪军的活动情况。我通过“满铁队”的人，了解到楼岭小分队有30多人，每个月要换一次防。在换防时，他们要带的是一个月的粮食、弹药。粮食、弹药都由民夫担驮，伪军在后边押送。有一次换防，我事先摸清了他们换防的时间、行动路线，而且了解到这次是由“满铁队”的刘队长护送。我把情报交索振斌送给王学强同志。到了那天，我游击队埋伏在通往楼岭的王乐口村附近。当伪军和民夫走入埋伏圈后，我军突然发起攻击，民夫一听枪响都跑了，刘队长挂了花，伪军一看队长挂花也都四散逃跑了。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缴获了敌人一个月的粮食、弹药。

“满铁队”的伪军都是中国人，不少人是被迫当兵的。为了争取他们便于开展工作，我有时偷点日本人的饼干、罐头给他们吃。有一个姓杨的小个子，我叫他小杨，他老家是昌平县，有个老娘跟他在沿河城住，生活很困难，我也常搞点吃的给他老娘吃。

日本指导官里有个叫佐藤的，他管弹药库和食品库，常让我帮他打扫库房搬子弹。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些子弹，然后再送到交通索振斌那里，由他再转给游击队。我偷的子弹，装在一双日本人的白袜子里，然后扎在我的裤腰里，趁日本人还没起床的时候送出去。没想到，日子长了，佐藤对我有了怀疑。有一天早晨，我又在日本兵没起床的时候出去送子弹，一出大门没走多远，就看见佐藤在半路上等着我呢。他问我上哪去，我说给石山买菜去。他问我腰里鼓鼓的是什么，上前一把拉住我，从腰里把两袜筒子弹掏了出来。他把我拉到院子里，问是不是给八路送去，我一口咬定：“不是，我是给‘满铁队’的小杨子送的。”佐藤问：“为什么给他偷？”我说：“小杨子说他的子弹不够用。”佐藤说：“你说谎！”只见他“刷”地抽出了大马刀，一手揪住我的耳朵，把刀就放在了我的脖子上。他喊道：“不说实话就死啦死啦的有！”他听我还是不改口，就收回了马刀，派人把小杨子找来。小杨子一看这阵势就吓坏了。佐藤问他：“这子弹是不是给你偷的？”小杨子说：“我的子弹不够，他给我偷过。”佐藤把我们俩打了几个嘴巴，这码事就算完了。这回要不是小杨子一句话，我的脑袋就掉了。

攻心战

为了瓦解敌人的斗志，我军在日本战俘中组织起一个“反战同盟会”，让战俘们写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宣传品，然后散发到日本军队里去。

有一次，王学强同志让我把宣传品带到日本指导官那里去。我就利用每天到火烟楼那里给日本人取矿泉水的机会，让他们把宣传品送到火烟楼等我。有一大卷，外边包装得还挺好看。我气喘吁吁地扛回来交给石山说："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我在小泉子那里拣的。"鬼子知道我不识字，所以他们并不怀疑我。石山看了"哈哈"大笑，他把那些东西又卷起来，后来运到北平去了。像这样的宣传品，我带进去好几次。听日本人说，那里有些是讲日本人怎样过樱花节的，这是个日本全国性的大节，每到这天，全家都要团聚欢庆，日本兵看了宣传品，自然就会怀念亲人，思念家乡，不愿在中国打仗。我叫它"攻心战"，后来我也想方设法地做这方面工作。

有一次，清水喝了酒高兴，让我给他唱歌。我说我不敢唱。他问为什么，我说那都是八路军唱的。他说："没关系，唱给我听听。"我就大胆地给他唱《五月的鲜花》、《卢沟桥小调》，还有一个小调，歌词是我们游击队编的，是唤起日本兵思念家人的，有几句词我还记得："家住东洋三岛上，爹娘、父老都在高堂，幼弟十五妹十二。最可悲——新婚三月好梦征程……"后来不但清水让我唱，日本兵也让我唱，我也学会了几句日本语，一边唱还比比划划地解释歌词大意。有个长得傻里傻气的日本兵，我叫他"傻柱子"，他是管弹药的，经常挨打。他越挨打，我越接近他，给他唱歌，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跟他混得很熟。后来我就给他做工作。我说："他们净打你，你到中国来做什么？还不如逃跑呢。"他说他不敢跑，因为家里还有父母、妻子呢。我就利用和他的关系，多次打着伪军的牌子向他要子弹、药品，然后再给游击队送去。有时候为了拉关系，也要点饼干、罐头送给"满铁队"伪军吃。

我们搞"攻心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制造日本鬼子和伪军的矛盾，对日本鬼子和伪军区别对待。当时我华北战区有个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放下武器不杀"，就是为了分化瓦解敌人的。

那次日本鬼子包围沿河口扑了空，就总想袭击我游击队驻地。有一次，我听说他们要到西大台村清剿我游击队，就及时地送出了情报。我游击队埋伏在西大台村外的两个山腰上。

日本鬼子有个孙翻译，是个东北人，这小子抢男霸女无恶不做，沿河城内就有十几个妇女被他奸污。他也穿着日本鬼子的黄军装（伪军穿的是绿军装）。这天他们出发还跟往常一样，让伪军在头里，鬼子在后边。上午七八点钟，进入了我埋伏圈，游击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真是“兵从天降”，敌人一下子乱了阵。火力集中打击穿黄衣服的日本鬼子，十几个鬼子被打死了七八个，那个汉奸孙翻译也被当场击毙。沿河城的老百姓听说这个坏蛋被打死了可高兴了，都说游击队给群众除了一大害。说来也巧，这次“满铁队”的伪军一个也没伤亡。吃饭的时候我听他们议论：“八路军的子弹都长眼了，专打穿黄衣服的鬼子，不打咱中国人，往后咱可不能作恶。”这次对伪军教育不小，一直到1943年11月我们消灭日本指导官，打死清水小队长时，他们都没出兵支援鬼子。

拔 钉 子

我平西游击队先后派进警务段的还有师长敏、李继云，他俩在“满铁队”工作；还有一个小刘（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在日本兵营房里工作。我们当时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常凑在一块玩，日本人也不介意。有的时候，我们还搞点鬼子的香肠、罐头、香烟，晚上在一块以打麻将牌为名，互相谈谈个人知道的情况。然后就把这些情况汇总起来写成情报，交给在城里活动的交通员索振斌、王树芳、黄恩博、韩志兰等人送给游击队。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1943年10月底，我平西游击队提出要消灭指导官，拔掉警务段这个钉子。王学强同志和我接上了头，让我首先摸清敌人的情况。我借帮佐藤清扫弹药库的机会，查

清了库房里有 11 万多发子弹、几支手枪、几支步枪、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我从“满铁队”那里了解到小杨在 11 月 5 日夜里值班，我还了解到 11 月 3 日有一部分鬼子回北平休假。我就根据这三点情况写了情报，交给王树芳送给王学强同志。过些日子我接到王学强同志指示：行动日期定在 11 月 5 日夜 12 点，让我设法把鬼子灌醉，打开大门，接应游击队。

11 月 3 日，石山和一部分鬼子回北平休息去了，院内只有清水小队长、佐藤、小松、山口、大成等几个人了。每当石山一回北平，剩下的鬼子就散漫自由了。到了 5 日这天鬼子悠闲无事，下午我就跟管烧洗澡水的索振亭说：“今天早点烧洗澡水，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洗洗。”水烧好了，我就请清水他们洗澡。我就在这个工夫到他们的屋里，把他们的手枪、大枪、子弹都给锁在他们自己的箱子里，手枪套还挂在墙上。如果他们发现，我就说：“你们都洗澡去了，院里我一个人怕出事。”做完了这事，我又马上把早已准备的酒菜摆满了清水的办公桌。几个鬼子洗完澡肚子也空了，我就顺势把他们让进清水的屋里。他们大吃大喝起来，喝过了一个时辰，就有一个鬼子支持不住了。我就把他扶上床让他睡下，其余几个也喝得东倒西歪了，我就把麻将牌拿来让他们打牌，我说：“今天晚上，你们就痛痛快快地打吧，我出去给你们放哨站岗，保险太平无事。”他们大喊大笑地打牌，我就出去了。我先把四架修电话的梯子顺到围墙外两架，墙里立上两架。我为什么要立梯子呢？因为警务段是个方圆半里多的大院，院墙有 2 丈多高，墙外有三道铁丝网。日本鬼子指导官住在院的南头，北边住着“满铁队”的伪军，还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大岗楼叫大板仓，里边住着一班日本鬼子，南北相距有半里远。我们的游击队如果走正道，进了大门还要往北走，绕个大弯经过两三个岗楼才能到指导官的宿舍。这样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如果进了大门就翻墙过来，下墙就是鬼子的宿舍了，这样又安全又快。

时间不早了，我心里很不踏实，生怕情况有变化。为了探听动静，我到伙房里拿了一块羊肉，借口给家送肉，到大门的岗楼里向小杨要出了钥匙，小杨子还说："回头给我弄点吃。"我说："那还不好办。"我打开三道大门，出去一看，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的心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往上提，简直要跳出了嗓子眼儿了。

我回来的时候，三道大门都没上锁，我告小杨子说："我一会儿还有事要出去，门没锁，省得再开了。"我又回到南屋，见清水他们的麻将打得正欢，我又给他们添了添灯油，拨了拨灯。

我第二次出大门时，走出第三道铁丝网没几步，就看见两个人影，站在头里的那个人问我："你是黄家的外甥吗？"我说："是。"那人又说："那你也是我的外甥，我是李文华。"我大舅黄国珠、表兄黄恩普都是我宛平县的干部，我听他们说过李文华是游击队长。我叫了他一声"大舅"。他说："咱们走吧。"我说："你们再等我一下，我得先和大门岗楼的小杨子说好。"站在李队长身后还有一个膀大腰圆的大个子，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急速地回到岗楼对小杨子说："游击队杀指导官来了，我也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一听八路军要来，有点害怕，就说："我有心跟你走，可是我的老娘怎么办？"我说："那也好，今天是来杀鬼子的，碍不着你的事，只要你不打枪，也不杀你也不逮你。"他说："你放心吧，我心里明白。"说完，我就跑出去，领着李队长、大个子他们，一共5个人爬梯子上墙，从墙上直接就登上了清水他们打牌的南屋。又从南屋顺墙头上了东屋，从房顶上看清了四个鬼子打牌的情况。就在这时，不知谁登下来一块瓦，"叭"的一声落在了地上。我看小松警觉地大喊："谁呀？谁呀？"只见李队长和那个大个子紧跟着扔出去两颗手榴弹，大个子又顺手打了一梭子枪，屋里的灯立刻灭了，鬼子乱作一团，只听见他们在大连铺上"通通"地跑，我知道他们找枪呢，心里好笑。我跟李队长说："放心吧，他们的枪和子弹都让我给锁上了。"随后我们5个人都从房上跳下来，我溜进

西屋，急中生智，拿起字纸篓，倒上煤油，点着了猛地向南屋一扔。我们也随着火光冲进去。这时清水也看清了我，他瞪起两只血眼，“呀!”的一声，向我冲过来，声嘶力竭地喊：“一郎，你的心大大地坏了坏了的!”我们俩扭打起来。就在这关键时刻，那个大个子一个箭步上来，拦腰抱住了清水，我抽身出来，拿起大个子的大镰刀，拼命地照着清水的大肚子砍去，还有人拿手榴弹砸他的脑袋，几下子就结果了他的狗命！字纸篓的余光，照见床下有两只脚，拉出来一看是小松，也让我用大镰刀砍死了，没有一袋烟的工夫，5个鬼子就上了西天。

埋伏在外边的游击队和500多民夫，听到枪响也顺梯子涌进来，抢走了枪支弹药，在日本洋人服务社当会计的李青云也把库房打开，把食盐、香烟让大家抢走。大伙用山镐从岗楼的枪眼开了一个大洞，大队人马就从这里撤离了。我点一把火，把鬼子的信鸽房、库房都点着了，火光照亮了游击队和群众前进的道路。

这次警务段的伪军没有动，大板仓的一班鬼子也只打枪，没敢出来。在拂晓前，我们安全到达了根据地——王大台子的外曹子村。天亮以后，我们开了庆功大会。韩晓照和王学强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会上县游击队政委谭林同志把我高高地举起来，夸我是中华的好儿子，任务完成得好。韩晓照、王学强也表扬我这次任务计划得好，完成得好。我跟王晓照同志说：“多亏游击队里的那个大个子，要不是他手疾眼快劲头大，我就得死在清水手里。”韩晓照说：“他的外号叫‘干得了’，也跟你一样是个从小没父母的穷小子，他也是拓峪村的人……”可惜的是，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从那以后我就没见到过他，可是“干得了”却永远记在我心里。

为解放全中国继续战斗

随着沿河城战斗的胜利，我被党派入警务段为日本鬼子当“使役”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做为“101”，我的历史使命也胜利完

成了。我随游击队来到了根据地，在那里受了两个多月的训。因为我当时才15岁，不便于参加游击队打仗，王学强同志就让我继续做沿河城的敌工工作。

后来日本鬼子又重建了警务段，他们把我哥哥王树芳逮去打了100多棍子，问我跑到哪儿去了，我哥哥什么也没说。为了控制我哥哥，鬼子把他留在警务段挑水。我因为暴露了身份，不能直接出面活动了。1944年3、4月，王学强找了两个人，帮我在包家坟的南山上挖了一个洞，让我在那里隐蔽。那里是个深山老林，没有人去，条件十分艰苦。吃粮靠我嫂子送，吃水要到10里以外的山泉子提。有时吃的接不上了，就找些野菜野果子吃。我哥哥借回家吃饭的机会把日本鬼子的情况告诉我嫂子，我嫂子借给我送粮的机会再告诉我，我再转给王学强同志。那时王学强住在离我15里远的东柜山上。就这样我坚持了一年多。日本投降以前，驻守在沿河城的日本鬼子被迫撤离了。1946年4月，经王学强同志介绍，平郊武工队队长王秀川把我调到昌宛七区武工队任敌工委员，为解放全中国，我又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受了锻炼。解放北平时，我被调到补训团当指导员，训练俘虏，一直到全国解放。

【作者简介】 王树瑞，原房山区建委副主任，离休干部，已故。

（房山区政协供稿）

石景山炼厂内外的抗日怒火

关续文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龙烟铁矿、石景山炼厂之后，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面对敌人的血腥统治从未屈服过。他们或以游击战在其制铁所外围打击敌人，或隐秘斗争于敌人心脏，开展反奴役、反掠夺的艰苦卓绝之抗争，留下了光辉业绩。

据石景山制铁所的《制铁月报》第一号（1939年11月～1939年12月）“警备治安状况”载：

> 石景山制铁所附近一带，因地理关系是北平近郊共匪盘踞的最大危险地区。被消灭了的正规军（指国民党29军）的残兵，以及共匪和少数匪徒相互依存，组织成千上百人的土匪集团在附近一带活动。特别是本制铁所的企业性质，成为这些匪徒的攻击目标……
>
> 下面把去年（指1938年）11月下旬炼铁炉点火以来至12月末之间匪徒袭击情况列举如下：
>
> 11月25日上午10时，警备员阿部、小山及其他3名人员为铁道工事去军庄石灰山，途中遭到约50名匪徒的袭击。还击后由于周围情况恶劣不得不撤退……
>
> 12月16日下午5时40分，在永定河对岸1里半的地点，发现约1000人的匪徒在活动，门头沟守备队立即出动，本部也动员全体人员，并把主力调往永定河方面

昼夜严加警戒。制铁所没有异常……

12月31日，在八角村发现两名带有手枪的土匪，已逮捕送往石景山守备队。

以上这段文字说明，在制铁所周围，人民的反抗是相当英勇顽强的。到了抗日战争的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永定河西建立了游击区与根据地。石景山制铁所警备部门派遣谍报员，侦察、掌握了我抗日游击队在宛平、昌平、怀来、房山等县的武装分布。1943年5月《警防月报》与1944年7月《制铁月报》分别绘制了所谓“匪团分布图”，图上显示出，我抗日游击队已经形成一支威慑敌胆的力量。上述两《月报》还载文道：“中共党十分重视本石景山制铁所，作为工作的目标是必然的。当第一期建设工程迅速完成之际，不断派入人员，巧妙地冲破重重罗网，伪装潜入搜集情报，进行欺骗宣传且日益尖锐化。”“昭和19年3月25日（中共）昌宛县政府新五区区长（兼助理员）高致民部约20人（便衣携手枪）潜入我宛平县第六区（门头沟一带）曹各庄及附近部队驻地，秘密侦察有关石景山地区各工厂警备状况及机关制度。特别是华人从业人员的动静。”“3月24日15时30分，小型第六熔矿炉羽根（日文，即冷却水箱）输水管断水，抓获两名企图破坏炉况的不法分子。本事件并非纯属中共系统所为，或许是蒋系统的策划行动。此疑问，移交给派遣到现场的人员正调查中。”“7月，在将军岭，石景山制铁所属的石灰石矿治安不良，造成作业困难。”

《制铁月报》又记：“昭和19年5月30日11时10分，在支那（东亚）的美国空军P51型战斗机两架，空袭了石景山地区。飞机在2000米高空出现在永定河西南上空，盘旋于石景山东方，旋即在金顶街日人住宅上空急降，以13毫米口径的机关炮扫射了从北平上行的636号列车。司机、副司机受轻伤。防空部队以高射炮对空射击，二飞机执行任务后离去。”为此，制铁所修筑了沥青

池与机车掩体，每每空袭，便点燃池内的沥青形成雾障，直闹得石景山上空黑烟笼罩，惶惶不可终日。

以上译录的部分敌档，说明了我抗日军民在制铁所外部打击敌人的情况。在制铁所内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所开展的斗争也是英勇卓绝的。

1938年中共地下党员白振东、王长林二同志在天津从事工运工作，因暴露了身份，转移到石景山制铁所工作。他们以小包工头目的身份为掩护，领导工人与敌人斗争。他们还组织一个“民生土木公司”，明里承包土木工程，暗里作为地工人员进入制铁所活动的据点。

1940年11月，日军为毒化石景山、门头沟地区民众，成立了“景门地区新民会”，总部设在北辛安镇的铁壁街悦来店内。日人藤井任主事，华人卢文莲任教官，由各村保长抽派一二名识字青年组织了“新民青年训练班”(共50人)。卢教官系我中共北方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入的地下工作人员。在训练中，他利用训导机会宣传抗日救国，培训我方骨干，并秘密教唱进步歌曲。他的得意弟子杜文敏至今仍能哼记：

八路军、新四军打到敌后方，建立根据地十九块，亿万人民得解放！共产党、毛主席——人民大救星！

在历时3个月训练即将结业的前夕，藤井奉调回国。“新民会”大院铁门紧闭，厨师、杂役都被支出去。卢文莲召集全体学员说：“经过学习大家就要回去。今后要爱国，要加强团结。要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都是中国人，要多为老百姓办好事。”最后，他坚定地说：“如有失言，走漏今晚的事儿，就如同此碗！”话落，抄起讲桌上的茶碗向地上摔去。响处，碗碎，示意如碗一样，粉身碎骨，身败名裂！

训练班结束后，学员杜文敏、肖印才经介绍安排在与制铁所毗邻的“久保田铁工所”，分别任华人警备队长与宣抚系工作人员。

石玉江等人仍回到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自此，这支抗日力量在制铁所内外发挥着作用，有的鼓动索粮罢工，有的刺探日军情报，有的掩护通信员与西山游击队队长傅长江等人潜入石景山地区活动，有的策反日人，给日寇以强有力打击。

1943年我中共华北局城工部还派遣曾任冀中游击队支队长的杜广信同志来石景山地区任工委书记。杜广信同志在冀中与日军较量，威慑敌胆。敌人曾布示“以一寸骨头，赏一寸金”捉拿其人。他对石景山电厂与制铁所的地下党员提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咬紧牙关度过最后阶段”的战斗号召，给党员与地下关系以极大鼓舞。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开展反掠夺的斗争，并瓦解敌伪警备人员。

1944年夏，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失利，美国大举反攻，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在苏联红军的严重打击下摇摇欲坠。在这种战略转机的形势下，日军为挽救其垂死命运，疯狂地掠夺钢铁。这年7月13日，日本驻华使馆向石景山制铁所发出指令：“自7月21日到月末作为特别增产旬。其间，日产生铁平均应达到380吨。”制铁所当局为贯彻指令，派出了军、警、宪、特工人员分别深入到第一、二高炉与11座特型炉现场，实行从选矿、上料，到鼓风、炉前等一系列工序的监督。选矿场烟尘弥漫，鬼子们扬着皮鞭轰赶着装车、选料的苦力，连吃饭都在劳动中进行，工人们苦不堪言。入夜，监督的鬼子疲惫了，张洪奎等给炉内上了百斤重的大块矿石，刘万元拆了炉子的耐火砖充当原料填入炉内。从易县来的卢焕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鼓动工人说：“不给他按程序上料，要多装矿石，少装焦炭。”只弄得13座炼炉七死八活，奄奄一息。当局在《调查报告》中哀叹：“遵照7月13日大使馆的指令，自7月21日到月末作为特别生产旬，其间日生铁平均产量应达到380吨……但遗憾的是，只完成210.2吨，不到原指标的55%。”“第一、二高炉（指两座大炉）的成绩颇不好，与目标相

比，只完成不到39%。”当局认为，原因是：“（一）原料装炉量不足。（二）劳力作业能率低下。（三）优质矿石与原煤到货不佳。本旬间，武安、利国优质矿石及中兴、新泰的煤炭都到货不好。不得以使用劣质矿石及原煤。（四）停电及空袭事故发生。24日京津间动力线事故停电。29日空袭警报，都造成停风。”孰不知，工人的奋力抵抗，乃是真正的重要原因。

在我抗日民众的坚决抵制下，日军“特别增产旬”的计划遭到沉重打击，宣告破产。

（石景山区政协供稿）

用敌人的钢铁支援抗战

吴太伯 郭若楷

1942年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第五个年头，战争的形势已从敌人的进攻转入到敌我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对沦陷区人民实行强化治安，对解放区进行疯狂的“扫荡”，采取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当时解放区的物资非常紧缺，必须通过沦陷区地下党员和人民群众往解放区偷运一些物资，以便解放区军民坚持进行抗日战争。

长辛店铁路工厂是修理平汉铁路机车车辆的重要工厂，它对维持平汉铁路的交通起着很大的作用。敌人依仗铁路统治着沿线地区，所以对这个工厂控制得很严，工厂门口不但有武装的日本鬼子站岗，而且在工厂四周的围墙上还装有铁蒺藜和电网，只要人挨上电网，就得丧生。虽然敌人控制得很严，但是我地下党员和群众采取种种方法同敌人周旋，曾经几次用大车从工厂运出钢铁等金属材料，既破坏了敌人的生产，又支援了解放区的抗战。

1942年初，我地下党人赶着两辆大车从工厂往外运材料，被日本人发觉了，开枪射击，我地下党人也开枪还击，边打边退，日本鬼子看走远了也就不敢再追了。

另一次在1942年冬季一天夜里，工人邢映元、邢映红两兄弟为帮助地下党从工厂往外运金属材料。在工友的帮助下，他们买

通了站岗的敌人，拉下电闸，断了围墙电网的电，趁机把白天早已准备好的钢铁材料越墙扔出去，到外边再装上大车拉走。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日本鬼子发现头天晚上刚卸的一车车轴（火车上用的）不见了。再用品场的主任（日本人）工藤松五郎赶紧报告总厂，不一会，汉奸特务头子王玉杰带人就来了，还拉着一条大洋狗，在再用品场四周寻找线索，让洋狗各处侦察。后来在围墙的铁蒺藜上找到了一个日本式的工作帽，从帽子上发现有个戳子，一看是邢映元的名字。王玉杰拿着帽子到班上找邢映元，没有，一问工人都说今天没看见上班来。他又找到货场的事务员，从工人名册上查出邢映元住家地址。于是王玉杰拉着洋狗带着两个日本鬼子直奔邢映元的家。

邢映元、邢映红家住在杨家坟，距工厂西北七八里地远的一个小山村。由于夜里从厂里搬运钢铁时很紧张，邢映元帽子挂在铁蒺藜上也没发觉，以致惹出后患。

这天夜里邢家兄弟把运钢材料的大车送走后，为了酬谢几个帮忙的兄弟，请他们到家里喝点酒吃顿饭。正在吃饭时，特务和日本鬼子也找到了邢家，一砸门，人们就知道不好。有的立刻跳墙逃走了。门开后敌人闯进院中，先把邢映元捆了起来，接着四处乱翻，把睡觉的火炕都给拆了，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几个敌人开始动手毒打邢映元，追问钢材藏在什么地方。邢映红一看打他哥哥就急了，悄悄拿起一根铁棍，冷不防向一个日本鬼子头上打去，一下就把那个鬼子打倒了，这时在场的人也都抄家伙跟敌人打起来，敌人来的不多，吓得赶紧往外跑。邢映红拿着铁棍就追，追到村南小河边，敌人回头开了枪，邢映红中弹牺牲，敌人逃回长辛店。大家趁敌人逃走之机就把邢映元的绳子给解开了，因为知道敌人必来抓人，让邢映元连夜逃了出去。乡亲们又帮助把邢映红安葬了。

这天夜里，果然开来了大批的日本鬼子和汉奸队，包围了杨

家坟，在村头架起了机关枪，邢家人都逃走了，只剩下邢映元的老父亲。敌人把邢家里里外外又搜查了一遍，还是什么也没找到，敌人无可奈何，就把邢映元的父亲给捆走了，送到警务段关押。后来敌人找不到什么证据，邢家托人把老人保了出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邢映元不敢回厂上工，从此就失业了，靠到各处做临时工维持生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邢映元回到长辛店铁路工厂要求复工，国民党当局不予恢复工作。后来他到丰台材料厂当临时工，解放后在廊房铁路给水所工作，1962年退休，1977年去世。

【作者简介】吴太伯，原为二七车辆厂工人，现任长辛店“二七”纪念馆负责人。郭若楷，“二七”纪念馆职员，现已退休。

（丰台区政协供稿）

马家堡火车站日本“东亚大路”专列被颠覆事件

卢学道

1944年，我在马家堡火车站当搬道夫。7月上旬的一天，“东亚大路”专列通过马家堡火车站，因为我没有接到放行信号，没搬放行道叉，致使这辆专列在此颠覆。乘客都是侵华日军中高级文武官员，死伤800多人。这对日本华北驻屯军是一次很大打击，对华北各抗日战场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趟“东亚大路”专列，车厢为鲜艳的黄绿色，车次为101，车牌上写着“北平←→东京”，实际是中国北平与朝鲜釜山之间，每周对开两次。只在天津、山海关、奉天（沈阳）、平壤、汉城、釜山等大城市停车，釜山到日本东京用轮船往返联运。一路上中国列车遇到专列，都要避让。那天该次列车通过马家堡时间是早晨7点21分。7点15分了，站长还没有给我放行信号，我顺手拿起电话询问站长，摇了几次不通。我实在是纳闷，是站长不在屋，还是由于八路军炸火车头，扒铁路，火车误点迟发？电话还没有放下，“东亚大路”列车呼啸着进站了。因为我没有放行，火车头直奔避让土道叉，车头当即翻倒在道沟里。一阵轰响，一片烟尘，车厢互相碰撞，有的头扎了地，有的打了横，有的摞起，有的像驴子打滚车轮朝了天。这个场面把我吓傻了眼，愣是没想到逃跑。眨眼间，跑来两个日本人，凶神恶煞地抓住我，脚踢拳打嘴里骂。

我分辩说："不干我的事，找站长去！"他们扯了我去找站长。我想：这"漏子"太大了，不走没好结果。就在他们堵着站长室的门，又叫又骂的时候，我乘机跑下了路基，钻进了方圆几十里的大苇塘。当时我家住在柳村苇塘边上，到家告诉家里人，自己出了大事故，全家快逃活命吧！没有细说，我又钻进了苇塘。天黑以后，我摸到看丹村东边南信号地方，当时也常有待发的列车，找司机探听一下消息。他们都知道马家堡火车站闯了大祸，我感到在此地已不能存身，就爬上了南去的列车，到了杨村火车站。乘车头上煤灌水的机会，我下车进了庄稼地，想办法找活路。可巧杨村有个朋友，他在铁路上干过活，后来在家种地。第二天我跑到他家，说"被铁路除了名，想找点活干，找碗饭吃"。于是就在各村帮农活打短工混日子。转年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我才回到丰台，看看家里的亲人还有没有，幸好家里人全在。经他们一说，我才知道这次事件给我们全家带来的悲惨遭遇。

原来，我逃跑以后，日本宪兵队和丰台警务段把我全家，即我母亲、老伴和我 15 岁的儿子抓起来，严刑拷打，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追问我的下落。对我儿子说："老八路的跑了，小八路死了死了的！"后又把他们娘三个转押到前门站警务段。奇怪的是在押一个多月中，有一个伪警官，常借上厕所的机会，到牢门口和我儿子说几句话，表示一点安慰。有一天他到牢门口，用手示意，让我儿子走近一点，小声告诉他说："我想办法把你们放出去。"第二天就有日本宪兵把娘三个押到审讯室。日本人讲话，那个警官当翻译，问了很多话，最后说"事故查清了，这事不牵涉他爹，让他回来，把事情经过和太君说一说，还可以上班挣钱过日子。"后来他们把娘三个放出来，这显然是"放长线，钓大鱼"。更奇怪的是：他们娘三个释放那天，这位警官远远地跟在后面，出了站口，凑到他们仨人跟前小声说："见了卢学道，可别让他回来呀！"他还给买了三张回丰台的火车票。

听我儿子说：这位警官姓霍，日本投降后，我到前门站打听几次，始终没有找到这个霍先生。

列车颠覆前20多天里，常有两个不认识的人，在我上夜班时到闸楼乘凉聊天。天南地北都说，其中也问到我：这里一天过多少列车？那颗红绿灯是管什么的？谁指挥你搬道？电话通哪里？……那时，八路军经常在黄土坡到廊坊之间，炸火车头、扒铁道。再说，出事的前几分钟，火车站的信号灯、电铃、电话为什么同时出现故障？放行信号灯不亮了，电铃不响了，电话也不通了。这一连串的现象说明，这次颠覆日本列车，决不是偶然的事故，而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一次斗争。

当时，火车站的地下党、八路军相当活跃，有的人为了解脱责任，就说我是八路军，这次颠覆日本列车是我一手制造的，还说炸火车头、扒铁路，都和我有关系。其实，我并不是八路军，也不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才知道，当时马家堡火车站的副站长许言武是地下党员，申小田（解放后曾任廊坊火车站的站长）是丰台火车站的地下党员。后来，他们曾捎信向我慰问。1959年冬天，有一位老干部找到我儿子卢永祥，他说："在日本统治时期，你们一家人受苦了，给咱们抗日战争立了大功。"

【作者简介】 卢学道，京汉铁路搬道工，已故。

邢锦堂整理

（丰台区政协供稿）

平谷抗日游击总队始末

吴郁周

1938年7月19日，八路军四纵攻克了平谷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平谷县抗日救国总会，并改编旧平谷保卫团为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当时，我正值青年，在抗日救国精神感召下，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游击总队二大队，任文书，目睹了这支只生存了不足一个月的抗日武装的兴亡。今天把这段旧事写出来，或许会给后人一些有益的思考。

1938年春，我因抱不平吃了官司，丢了北屯小学教员的工作。官司了结后，伪县政府教育科指派我到西胡家务（今东古）任教。这年暑假，教育科派我到蓟县新集中学（旧河北省立十中）参加教师讲训班。此时正是七七事变后，日寇已大举进犯华北。我到新集时，学校已驻满军队，到处兵荒马乱，讲训班已无法开办。无奈，我又返回平谷。7月20日，我到县城去，欲向教育科汇报新集情况，作个交代。不料平谷城也被一批奇特的军队占领。我进城时，只见站岗的士兵穿的是灰布军装，脚登草鞋，身后还背着大斗笠。这些士兵虽然衣着不整貌不惊人，但说话和气，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人们都用惊异和敬佩的眼光打量着他们。整个平谷城笼罩着一种不寻常的气氛。我走进县衙，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只见伪县政府大堂东侧黑烟滚滚，人头攒动，人群之中，火舌正吞噬着成堆的文书簿册。原来，那是在焚烧伪政府的

税契和地租帐簿，围观者无不称快。大堂西侧，伪县长的小汽车歪斜在地，冒着残烟，已只剩下一副骨架，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我忽然觉得世道变了。听人说，是红军在昨夜攻进城内，伪警及伪县府人员如鸟兽散，伪县长李永森及日本顾问杏田也从南城水沟钻出逃之夭夭。这红军，就是挺进冀东的八路军四纵队。

次日，父亲催我到县城去卖掉家中积存的一点烟叶，换些钱来度日。我不曾经过商，在街上白白蹲了半天，也没卖得几个钱。正在无聊之时，只听一个声音喊："嘿！吴先生，你个教书人怎么也做起买卖了？"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李俊廷。此人是穷苦出身，当过土匪，身高力大，性情莽撞，是山东庄大地主张国栋（外号大白薯）的团丁头目，我在北屯教书时与他相识。不等我搭话，他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做买卖？八路军号召抗日救国，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我这里拉起了抗日游击大队，就缺个识文断字的人给我帮忙。你要肯来，就到火神庙来找我。"我也是热血青年，常言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国难当头，岂能坐以待毙？再说，一旦成了亡国奴，这书也无法再教下去。我立即答应了他，回家向父亲说明了自己的打算，傍晚就到火神庙找到李俊廷。他欣喜万分，给我安了个文书的差事，任务是登记前来报名的游击队员的名字，包括姓名、年龄、住址、枪型、枪号等。

原来，四纵解放平谷县城后，成立了以姜时喆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平谷县抗日救国总会及分会，广泛发动广大群众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并决定将原平谷保卫团改编为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县保卫团总部原在伪县府西跨院，副团总王廷贵（酸枣峪人）、秘书王兰生（城关人）在四纵攻城前已闻风而逃，只留下了保卫团人员枪支、名册等，已被四纵收存。保卫团原是一支地主武装，又称"联庄会"或"伙会"，要求地主们每40亩地必备长枪一支，80亩地两支，以此类推。一般凡备两支

长枪以上的大户，还备有短枪。保卫团的建制设总团和区团。县为总团，团总由县长兼任；区设区团，区团长及团副等由当地大户出任。当时平谷划为三个区：城关为一区，独乐河为二区，山东庄为三区。三个区各设区团。经过四纵的争取动员，各区团均同意改编为抗日游击总队，并推举原第二区保卫团团长张敏（字子捷，韩庄人）为游击总队队长。原一区保卫团改编为第一游击大队，王长生（号博然，北台头村人）任大队长；原二区保卫团改编为第三游击大队，王璞（字蕴山，洙水村人）任大队长；原三区保卫团改编为第二游击大队。由于三区地主张国栋势力最大，枪支最多，便指派李俊廷当了大队长。我当时对二、三两区游击大队番号的相互颠倒颇有意见，但上级已定，无法更改，也就由它去了。张子捷起初对出任游击大队长犹豫不决，一怕得罪原保卫团副团总王廷贵，二怕下属不服，指挥不灵，三怕真格地抗起日来硬打硬拼，损兵丢枪赔老本儿。可是一想，这正是把持全县武装大权的良机，又可图抗日救国之美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假装再三推诿后，他又欣然领命了①。

游击总队及各大队的改编就绪后，招兵买马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抗日政府要求8月10日前各游击大队务必点齐人枪进行集训。原平谷保卫团下设有联防区，全县共18个联防区。游击队决定按联防区建立中队，下设小队（班）。于是，各联防区本着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的精神，抓紧进行招兵动员。由于原保卫团就是地主武装，现又以种种手段突击招兵，游击队难免鱼龙混杂。当时规定，有枪户可自带枪支报名加入游击队，也可花钱雇人顶替，如不能找人顶替，也要交出枪支。总之，所有枪户必须承担抗日责任。于是，有枪的富户都慌乱起来。有的为保枪硬着头皮报名参加了游击队，有的以重金雇人顶替并讲

① 张子捷后来成为汉奸，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镇压。

明必须保护好枪支，有的枪户怕上战场丢命而雇人去支差，也有的富家子弟想到外面闯荡一番而自携枪支报名……总之，各个阶层、各种动机的人都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下云集起来。全县报名在册的游击队员共千余人，每个游击大队约300多支枪。

为提高游击队战斗力及军政素质，8月10日，各游击大队开始集训。一、二大队集中到平谷，三大队集中到南独乐河。游击队成员，特别是中队长一层的干部大都是富家子弟，他们生活懒散，害怕艰苦，不受管束，到游击队后，依然自由散漫，纪律松弛，我行我素，今天有事离队，明天又请假外出。在他们的影响下，教练工作很难进行。四纵为了加强对游击队的政治领导，选派了优秀干部到各游击大队当政治指导员。但他们到各队后，或被敬而远之，或受到公开排斥。我记得二大队到平谷后，当天下午进驻上营村，第二天早6点起床后出操点名实到219人，由大队长李俊廷对全体队员训话，宣布了游击队员四项守则：一、不准擅自离队；二、要爱惜枪支；三、离队要向队长请假；四、冲锋陷阵不准后退。正要解散时，副大队长沈继贤带来一位矮个子八路军，他就是派到二大队的政治指导员代承举，是一位江西老红军。我给李俊廷念过代指导员的有总队长张子捷、政委胡突签名的介绍信后，已见李面色不悦。回队部后，代承举认真地向李俊廷等人询问大队的各方面情况，并不断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又建议下午召开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李俊廷已越来越不能按捺自己，眼里露出了敌视和怀疑的目光。当代指导员要过刚才宣布的四条游击队员守则细看时，李俊廷在他对面坐下。代指导员看过后，提出守则中应加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还不等代指导员把八项注意说完，李俊廷便伸手抓过那四项守则，先揉作一团，然后又撕成碎片，站起来忿忿地说："这个不算数，下午开会另订吧！"说完扬长而去。下午开干部会，代指导员向大家进行了政治动员，通过了新的游击队员守则，但从始至终，李俊廷一言

未发。我见李心胸狭窄，与代指导员对立，曾设法从中调和，却无济于事。后来，李俊廷与代指导员的对立情绪愈演愈烈。李多次阻拦代指导员给队员讲话，以至指着代的鼻子问："这个队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气得代承举回了部队。其他两个大队也有类似的情形。由于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得以贯彻，游击队的旧习气不能克服，部队一盘散沙。有的游击队干部错误地认为，部队只要能打仗就行，纪律是次要的，对不良倾向听之任之；有的干部相互勾心斗角，争权夺势；还有的干部随便打骂下级。如此集训了不足10天，游击队便拉上了战场。

8月，敌人为了扑灭冀东抗日大暴动的烈火，调集大量伪蒙满军队从长城以北向平谷、蓟县扑来。平谷城是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8月20日左右，敌人以重兵从兴隆出发，经三十二里沟西直扑平谷东北而来。抗日政府决定以游击总队三个大队的全部兵力，集结到靠山集以东、黄崖关以南地带阻击来犯之敌。我们二大队当晚在上营接到命令，火速到靠山集集结待命。部队连夜出发，约夜间12点到靠山集南街口。总队召开了中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作了战斗部署及动员，决定以一、三大队为南路，二大队为北路，分别埋伏在大坝梁两侧阻击敌人。各队早4时开饭，备足一天干粮，5时出发奔赴指定地点迎敌。我虽然是文书，也向李俊廷要了一支老式金钩步枪，五发子弹，以备杀敌。我们赶到大坝梁时，天刚亮。我穿一双软帮礼服呢布鞋，鞋帮已被露水灌湿，还掉了半个鞋底子。下山找附近老乡帮助将鞋锥好后，太阳已老高。我回到阵地时，只见游击队员们早已各自找好隐蔽地点，有的在吸烟，有的在闲聊，多数人在暖和的阳光下鼾睡起来……约正午时分，忽听得"轰"的一声，敌人的炮从山下打来，把熟睡的游击队员们从梦中惊醒，紧跟着，机关枪、迫击炮一齐响起来。有几发炮弹落在我们不远处，炸得沙石飞扬，蒙住了视线。游击队员们哪里经过这种阵势，一个个慌了手脚。忽听一个声音大喊："中队长，

张奇挂花了！”中队长杨昆山喊：“二班来四个人把伤员抬下去……”我爬起来朝山下打了两枪，只见身穿黄军装的敌人正在沿山路向上猛跑，有扛机枪的，有扛掷弹筒的，有端大枪的。而我们阵地上，六、七中队已乱作一团。有的人借抬送伤员之机上了西山沟，有的趴在地下不知所措，只有少数勇敢的队员在坚持向山下射击。眼看敌人已逼上山来，只听得李俊廷用嘶哑的声音大喊：“各队准备西撤！”大部分队员撤离阵地。最后撤离的，在山下遭敌人机枪扫射，许多人伤亡。我随通讯班由原路返回靠山集。传令兵传来大队长命令：二大队晚6时前到井峪村集合。我随伤员撤到山东庄，吃了一顿小米饭，安置完伤员后赶到井峪，天已大黑。大队集合点名，已不足半数（约90余人），还不见了大队长李俊廷。

后来得知，一、三大队均已溃散。我们二大队到井峪村集合的，多是枪户雇用的队员，大多数富家子弟都已带枪回家。这些留下来的队员，士气低落，纪律松弛，有的竟携枪胡作非为。副大队长沈继贤也无力管束。我因害怕队员无理取闹，以求医为名躲到乐政务。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沈继贤找到我，要我回去，并告诉我他亲手毙了两个为非作歹的队员。他还带来了八路军三支队领导单德贵（后叛变）的一封信。是写给大队长的。我拆开一看，信中说：“我队在小峪子村抓获四名持枪抢劫犯，均供认是你队游击队员，见信请来人研究处理办法。”沈继贤听完信后，一定要我同去见单德贵。他想把剩下的人和枪全部交给单。

我和沈继贤骑毛驴到苏子峪找到单德贵。单对我们很热情。我看过他们抓获的四人名单，都是从一大队溃散的。单气愤地说：“他们用打鬼子的枪来杀中国人，必须枪毙这些败类！不知二大队将来作何打算？”沈继贤看了看我说：“我们大队长不知去向。我们想把部队全部交给司令（指单）代管，是不是可以？”单说：“你回去给队员们开个会，告诉他们，愿意抗日的，可以到这里来，

但必须遵守纪律，肯吃苦；愿意回家的，把枪交到这里来。如果谁再持枪为非作歹，如同这四个人的下场！”离开苏子峪后，我借故去了陈庄子，大约一个月后，听说沈继贤在井峪西山被鬼子包围，牺牲了。二大队剩余的人是何去向，我不清楚。至于大队长李俊廷，据说是在撤下坝梁传令部下到井峪集合后，自己骑一匹白马，携一些枪支去了北平。他想把枪变卖捞一把，不料也被鬼子捉去杀掉，落了个人财两空。一、三大队溃散后，队员大部回家。凡被雇来的队员，回去把枪完璧归赵，交差了事。8月23日，平谷城被敌攻破。一大队两位中队长何禄及王尚贤在平谷城北门外被守城敌军抓获，后都被杀……

（平谷县政协供稿）

对晋汉臣自卫团的改编

原房山县志办公室

1937 年 9 月 16 日，日军占领房山、良乡县城后，便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在离房山城约十几里远的二站村村外，日军一次便杀死躲进天主教堂的逃难百姓 80 余人。国破家亡之恨，唤起了不愿做奴隶的房山人民。他们纷纷起来，决心和万恶的日本强盗血战到底。到 1937 年底，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从山里到山外，有的是单个村子，有的是村与村联合，最多是十几个村子，组成各色各样的地方自卫武装。这些武装名称不一，人数多寡不等，有的叫“六山会”、“联庄会”、“自卫团”，有的叫“抗日复仇军”、“杂牌军”、“红枪会”……最多的数百人，少的几十个人。与地方自卫武装同时兴起的，还有数路土匪。

1938 年春，邓宋支队到平西，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一方面抓地方建党建政工作，一方面派人去做争取自卫团和土匪的工作，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房山境内有两条较大的河流，一条叫拒马河，一条叫大石河。拒马河源于山西灵邱，流经河北省涞源、涞水二县入房山境，再向南流入涿县。其流经房山一段，有百里左右的山区。自张坊往里，每涉一次河为“一渡”，共有“十渡”。十渡地区风光绮丽，山明水秀。距十渡村十几里远，有个掩在重峦叠嶂中的山村叫平峪。平峪村不大，有一两百户人家，当时出了个有名的人物叫晋汉臣。

晋汉臣家境殷实，本人曾在天津做过买卖，曾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欺辱，富有爱国心。因山外土匪经常进山掠扰，1937年9、10月份，以晋汉臣为首，在十渡联合六渡、八渡、西庄等村组织了地方自卫武装“六山会”，任务是保境安民。1937年底，晋汉臣领导的“六山会”曾和霞云岭地区的自卫团联合，号称“国民六路”。1938年春，八路军来到平西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一致抗日”，极大地鼓舞了饱受日寇蹂躏的平西人民。当时两地自卫团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意联合抗日。但霞云岭自卫团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自卫团主要首领始终对八路军怀有敌意，于1938年10月初的一天，突然三路包围了我军驻在堂上、王家台、霞云岭三地的八路军，致使我驻王家台的一连八路军战士牺牲60余人。这一惨案发生后，晋汉臣非常气愤，出于正义，断绝了和霞云岭民团的联系。

1939年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成立，司令员萧克。组建了平西游击支队，司令员黄光明，政治部主任张汉民，总支书记高克恭。平西游击支队下设五个大队：昌宛大队、涞涿大队、宣涿怀大队、房良大队和特务大队。晋汉臣是特务大队大队长。大队下设三个连，计300余人。虽然队伍被编，但仍由晋汉臣指挥，有相对独立性。为了使这支部队真正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平西游击支队曾派一位同志去特务大队任教导员，做争取晋汉臣的工作。但与晋的关系没有搞好，于是，司令员黄光明派总支书记高克恭带几个同志去检查工作。

农历四、五月份，拒马河还是枯水季节，麦子即将黄梢。山里特产的五月鲜杏儿将熟未熟，青中透黄，略带酸根儿。高克恭带几个人来到特务大队。特务大队正在张坊一带驻守。司令部在张坊，三个连分驻塔照、大峪沟、南尚乐三个村。听说平西游击支队总支书记来检查工作，晋汉臣亲自带人前来迎接。高克恭那时二十二三岁，中等身材，英气勃勃，身穿土黄色军装。晋汉臣

当时已五十出头，个子偏矮，且身体肥胖。俩人一见面，就一见如故，十分亲热。

当晚，晋汉臣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招待检查组同志。同时还把分驻各村的各连连长请来，和高克恭带来的人一起入座。晋汉臣显得十分高兴，在酒席上，他滔滔地讲起自己怎样在天津做买卖，以及后来怎样组织自卫团的事。虽然晋汉臣比较开明，但他手下的人并不全跟他一个心思，有的始终对八路军怀有戒心，而且沾染流匪习气，恶习不改。喝着喝着，有两个连长醉意朦胧了，一个连长一边端着酒杯，一边口里含含混混地咕噜着，表示对共产党八路军不满。晋汉臣当即发了火，指着这位连长骂道："混蛋！你还有点中国人的味吗？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连一点中国人的气味都没有吗？"

晋汉臣强烈的民族意识，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时早有人上来，把两个喝得醉醺醺的连长扶了下去。

酒宴直到深夜十一二点才散。为表示自己的诚意，晋汉臣把自己住的北房腾出来给高克恭住，自己搬到东房去。

就这样，俩人很快就混熟了。

"高书记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一天闲谈时，晋汉臣问高克恭。

"我是森林大学毕业的。"高克恭说："我没上过学。"

晋汉臣奇怪了："那你的书记是怎么当的？"

高克恭微微一笑，"我是生活书记。"

晋汉臣放心了，憨厚地说："噢，你是随从副官一类的？"

高克恭不禁笑了起来，应声说："对，就是那么个角色呀！"

过了一段时间，问题调查清楚了。决定将原先派到特务大队任教导员的同志调回，并考虑再从其他部队调一个同志来。晋汉臣知道后，表示一定要高克恭留下。后来经请示黄光明同志，高克恭就在特务大队留了下来任教导员。同时，各连都派了指导员。

为此，高克恭征求晋汉臣的意见。晋汉臣略一思量说："这没什么，只要不在部队中发展共产党员就可以。"

过了些日子，晋汉臣突然提出了一个藏在心里许久的问题，"高书记，咱俩是不是可以结拜把兄弟呀？"

问题提的这样突然，使高克恭一愣。他看看晋汉臣，见晋汉臣正以期待的目光深情地望着他，拒绝吧，不好办，原来派来争取晋汉臣的同志所以和他关系相处不好，就是单纯发号施令，使晋汉臣觉得看不起他。联想到晋汉臣的历史，他虽然比较开明，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但封建意识浓厚，崇尚哥们义气，还是答应的好。但这事又不能贸然决定，需经组织同意。想到这里，高克恭说："这个问题你好好想想，我也好好想想。"

晋汉臣见高克恭当即没表示可否，也就不再说什么。

事后，高克恭立即把通讯员叫来，写了一封急信给平西游击支队司令员黄光明。黄光明表示同意，高克恭即和晋汉臣结拜为兄弟，晋为兄，高为弟，但未举行任何仪式。此后，二人的关系和以前大不相同。

结拜不久，晋汉臣就把高克恭领到家中和老母及弟弟相见。

晋汉臣家是个四合院，坐北朝南，有 20 几间房。房顶一水儿的青石板。石板很大，很厚，不像有的山村的石板薄而易碎，这儿的石板有 1 寸左右厚，雪青色，一两尺宽，三四尺长。院内很整齐，很干净。门前有一株大槐树，院后有不少柿树和山杏树。俩人一进门，晋汉臣便将家里人一一给高克恭介绍。

晋家是个比较典型的封建家庭，家规家教很严。晋汉臣事母至孝。在家中，母亲说一不二。晋汉臣弟兄六人，他是老大，就是兄弟之间也分尊卑长幼。每有客人来，晋汉臣坐下和客人吃茶闲聊，老二在旁侍陪。老三若进屋，老二经长兄允许方可坐下，再由老三站在一旁侍奉。

高克恭一来，晋汉臣便叫人去拒马河上捕回鲜鲤鱼款待。发

现高克恭的被子脏了，晋汉臣便叫家里的人连夜给拆洗，高克恭虽百般推辞，但拗不过，晋家几房媳妇一夜未睡，拆完洗，洗完又一点点用熨斗熨平熨干。到第二天早上，俩人出门时，被子已缝好，拆洗得干干净净，晋汉臣的几个兄弟一直送出老远。

自此以后，俩人赛过亲兄弟一般。

晋汉臣是商人出身，不善于打仗，且年过五十，身体肥胖，就是平时行军，别的干部配备一头骡子，要给他配备两头骡子，一头累了，换乘另一头，身边还总有两个勤务兵侍候。高克恭则相反，他祖籍陕北，十几岁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山西到河北，由河北蔚县到平西，之后又到冀东，从冀东折转昌平，由昌平到房山拒马河，转战千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每到战斗，枪一响，晋汉臣就问高克恭："老弟，怎么办？"高克恭说："你在家里，我出去！"下边的连排长见俩人关系这样亲密，态度也渐渐转变了。

转眼到了西瓜上市的季节。

这天，高克恭正患病，发高烧，卧床休息。夜里，突然一个通讯员闯进屋来，送来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特务大队驻石窝的那个教导员，准备乘夜黑人不备时带队去投降敌人。这个人姓叶，原是国民党兵，被我俘获后参加了革命队伍，是个"解放兵"。一般人认为他是个老红军，平时很尊重他，谁知他在形势严重时发生了动摇。姓叶的本来带部分人去执行任务，中途他极秘密地把通讯员叫到跟前，要他通知隗连长把家里人也带出来，一起去拒马河南岸"执行任务"。通讯员很机灵，他早看透了姓叶的企图。他回到村，把这事对隗连长一说，隗连长感到事情严重，果断地对通讯员说："你快去张坊，把这事告诉高书记，先不要告诉大队长。"通讯员一直找到高克恭，详细汇报了此事。

高克恭听通讯员一说，马上起身，不顾病痛，带通讯员去找晋汉臣，晋汉臣一听就发怒了，焦急地说："他要逃跑，这怎么办？"

高克恭镇定自若："不要紧，我去处理。"

晋汉臣说："不行，你正发高烧呀！"

"现在还顾得了这些？"

高克恭匆匆收拾了一下，随即跨上马，带十几个人连夜向塔照奔去。

这一夜风清星暗，月亮只有一个弯弯的金边儿。一行人沿着山路坎坷急行。大约有半个时辰，一行人来到塔照村外一道小山梁上。宽宽的拒马河就在眼前，听得见哗哗的水声。从山梁到村内，大约有一二里路。村里只有少数几盏昏暗的灯光，偶尔听得到轻悄的人声。高克恭命令通讯员说："你去告诉隗连长，但不要让姓叶的知道，不要说我来了。"

隗连长这时正在村内焦急地等着，姓叶的叫他集合人，他不集合，通讯员跑下山，来到河滩上，把情况告诉隗连长。姓叶的也在一边听着，他知道高克恭来了，便带了几个人往山上爬，隗连长急了，怕姓叶的加害高克恭，立即带一班人在后面紧追上来。

姓叶的来到高克恭面前，紧张极了，但仍极力掩饰内心的惊恐，"高书记，我们打算带人去南岸开辟工作。"说完，姓叶的还煞有介事地回头对隗连长下命令："老隗，通知队伍赶快做饭！"

高克恭想先稳住他，说："你要开辟工作，为什么不先请示？你是教导员吗？"

姓叶的张口结舌，但仍极力辩解："趁黑过去，敌人发现不了，天亮就过不了河了。"

"拒马河水这样深，你怎么过？"

"我从下游水浅的地方过。"

迷蒙的夜影中，姓叶的感到高克恭锋利的目光紧紧逼视着他，他不由浑身战栗。这时硬拚是不行的，他唯一的办法是尽快摆脱困境。于是，他仍强装镇静地对手下人命令："队伍集合！"

号令一出，没等队伍集合，他先跌跌撞撞地顺山坡跑了下来。

有几个不明真相的人想随在他后边走。隗连长急切地问高克恭：“怎么办，高书记?”

高克恭说：“队伍不会跟他走！”并命令：“他再去就把他抓回来！”

果然，姓叶的跑到镇江营，被大队侦察组捉回。

事后，晋汉臣拍着高克恭的肩说：“老弟，你真行！”

1939年11月，挺进军进行整编。特务大队奉命开到宛平山区一个叫桑峪的有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子。这次整编规模较大：原32大队编入31大队和33大队，改为冀察军区6团和7团；原12支队和平西游击支队编为9团，平西游击支队的五个大队合编为一个营——9团3营，约1000余人，晋汉臣任营长，高克恭为教导员。副营长是李继高，这人很能打仗，后来每有战斗，总是冲锋在前，实际上是代行营长职务。

整编后，9团的第一个战斗行动是攻打南北窖高线公司。南北窖距房山县城四五十里，地下煤藏丰富，是平西主要煤炭基地。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日寇就在这儿建立了据点。这次战斗，炸毁了北窖高线公司锅炉房，使煤炭运输一度瘫痪。这次战斗中，高克恭同志也负了伤。养伤期间，由任成举任3营教导员。不久，任成举在杜家庄战役中牺牲，高克恭又回到9团3营。

从到特务大队那天起，高克恭就和各连指导员一起，秘密地做发展党员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各连都建立了支部，营部有教导员办公室，下边还有几个干事。同时，为了戳穿敌人有关“赤化”的欺骗宣传，消除晋汉臣的戒心和促成他思想的转变，在平时，高克恭要求党员在战斗中要冲锋陷阵，起模范带头作用。另外，当时战斗频繁，捷报很多。每次战斗后都有统计，某某营伤亡多少，共产党员多少。高克恭有意识地把这些捷报给晋汉臣看；他看了后很受感动。

一天，部队在西庄住下，晋汉臣终于忍不住地对高克恭说：

“老弟呀，共产党真好呀！你和黄司令讲讲，也给咱们请来几个共产党员！”

高克恭故意风趣地说：“去年咱们俩谈判时，你说不准发展共产党呀。”

“那是什么时候，那时脑筋不开窍！”晋汉臣十分坦率。

见晋汉臣这样真诚，高克恭兴奋而认真地说：“大哥呀，咱们营不单有，而且各连队都有呢！”

晋汉臣愕然一愣，但马上醒悟过来：“看来老弟你是不糊涂呀，你早发展了党了！”

“是呀！”高克恭说。

“原来你是共产党的书记呀。”

说着，俩人面对面畅爽地笑了起来……

1940年底，晋汉臣调平西任贸易部长。几个月后，日寇进山“扫荡”，他看形势严重，离开部队开了小差。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日寇曾想委任他为华北一个“剿共司令”或副司令一类的官职，他拒不接受。相反，他还做了不少抗日工作，后来还把自己的弟弟和侄子送到部队。

晋汉臣虽然离开了队伍，但那些来自拒马河畔的贫苦农民的子弟，则在革命队伍中渐渐成长起来，很多人成为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1941年春，鬼子再次进犯我根据地，9团在片上至沈家庵一带打了一仗，歼灭敌人百八十人。不久又在长操、三流水一带用刺刀拚杀鬼子60多人。

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九团成了保卫平西根据地的主力团队之一。1944年，九团开赴陕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彻底解放，踏上新的征程。

（房山区政协供稿）

我所知道的自卫军

李春山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丰滦密县委在所辖地区，村村组织自卫军，男性16至45岁，身体健康的人全部参加。区里建立自卫军大队，行政村建立自卫军中队，自然村建立分队，分队下设自卫军班，每个班一般5至10人，设正副班长。自卫军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从自卫军成员中选出一些抗日意志坚强，年轻力壮的骨干，组织模范队，模范队是半脱产的武装基干民兵。

自卫军的任务是转送物资，站岗放哨，广布地雷，保护青苗，传送情报，破坏交通，配合部队作战。模范队除执行自卫军的一般任务外，还下设爆炸、侦察、游击等若干战斗小组，直接配合部队作战。

自卫军的武器是手榴弹、地雷、火枪、土枪、柴刀和木棍等，一般没有钢枪。模范队的武器是钢枪，还备有火炮，并根据武器装备分为大枪班、牛腿火炮班、爆破班等等。

我曾在自卫军内担任分队长，现将我所了解的作一简要回忆。

保护青苗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在长城内几十里设“无住（人）区”；长城外小村集中到大村设“部落区”，实行集家并村，我们称“人圈”。长城外属伪满洲国，不让老百姓种地，伪满洲队见到老百姓

种地就开枪，黄峪口、西口外、西白莲峪村即属这种地区，但是这里的群众坚持与日本鬼子斗争，没进“部落”，而且坚持种田。

1941年夏，日本鬼子得知黄峪口、西口外、西白莲峪等村的庄稼长得好，就带着200多名伪满洲队，押着几百名民伕，手持锄头、镰刀来破坏青苗。自卫军得此情报后，由丰滦密联合县武装大队长王振东指挥，事先埋伏在黄峪口段树梁的山顶上，把两门火炮装足铁渣或铁球，等敌人到庄稼地时，我们就放炮。敌人和民伕听见炮响藏起来，我们就停止放炮。过了一会，日本鬼子又吆喝民伕出来破坏庄稼，我们就又放炮。就这样，我们一天放五六次火炮，两门炮轮换着放。这一年，敌人来过五六次，每次两三天，我们都是这样打击敌人，因而保住了大部分青苗。

站岗放哨

1941年的丰滦密地区敌强我弱，活动在这里的八路军挺进军10团经常转移。当时，敌人据点较密，如冯家峪、西白莲峪、石佛、白马关、下营、董各庄、马营、石塘路等村都有。为了打击敌人，保护群众，自卫军在每个村都设置了监视敌人的岗哨，昼夜轮流站岗，随时警戒敌情。当时采取接力式转送情报，如敌人由白马关据点出来，站在西白莲峪山头的岗就高喊：“敌人由白马关出来了，有××人，向南边方向去了。”接着，冯家峪、西庄子、保峪岭、赶河厂等村的岗哨接着高喊。这样一山传一山，十几分钟就能传出几十里远，使群众安全转移，减少损失。这是白天采取的方法。如果夜间敌人出来，就采取送信或扔手榴弹报警。

岗哨又分为大岗和小哨。重要的山头、路口、交通要道设大岗，昼夜执勤，由自卫军担负执岗任务。小哨一般在村头、街口，由儿童团、妇救会来担任执勤任务。小哨和大岗互相配合，在抗日根据地发挥了作用。

传递情报

传递情报是自卫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在配合八路军10团作战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40年12月，下营村的自卫军中队长李印山和队员张益之、村干部姜子林等人，得知住下营的日军铃木大队哲田中队及一批日军官将于日内沿白马关河川向密云撤退，便设下“酒肉计”，备酒席宴请敌翻译官。席间将其灌醉，套出敌部的兵力、武器、撤退时间、路线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告10团。10团据此在冯家峪南湾子设伏，歼灭敌寇90多人，取得了冯家峪战斗的胜利。1941年5月，下营自卫军为10团提供了准确情况，取得了东白莲峪伏击战的胜利，歼敌20多人。

破坏交通

1940年秋，自卫军为了配合10团粉碎敌人的大“扫荡”，把董各庄至白马关的公路挖了大壕沟或堆上大石头，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联络。榆树底下村的自卫军先后三次破坏汤河口据点与长哨营据点之间的电线，剪走电话线13里，还截获汤河口据点满载白面的运输马车一辆。被我10团击溃的伪满讨伐队也不断遭到自卫军的袭击，其中张家坟自卫军歼溃兵三名，缴轻重机枪一挺，手枪两支，步枪一支。

广布地雷

1941年4月，10团建立了炸弹厂，开始在水堡子西大梁，后移至莲花瓣的山洞里，共有29名工人。他们利用简陋的设备，为部队制造地雷、修理枪支等，供给部队和自卫军使用。

当时在丰滦密地区广泛开展地雷战，各村自卫军都成立了爆炸组。每当敌人“扫荡”，就在村边、道口、山沟、山梁、屋门和牲畜圈里到处埋设地雷杀伤敌人。炸弹厂根据需要造出了踏雷、拉



雷、串雷、子母雷、天女散花雷、水雷等各式各样的地雷，分给10团和自卫军。埋雷方法更是花样迭出，虚实莫测。路中埋雷，房门旁挂雷，把大石头凿上炮眼，装足炸药，敌人经过时会炸得尸骨横飞。赶河厂战斗中，有两个敌人跑到冯家峪就是踏上地雷炸死的。西白莲峪的自卫军还在沟里埋了地雷，炸死几名伪满洲队。

地雷战在反“扫荡”中发挥出巨大威力，有效地迟滞和限制了敌人的行动，使敌人不敢在山里随意活动。

转 送 物 资

为了保障部队和自卫军的物资供给，自卫军也负责军用物资的转运、贮藏等工作。当时在迎城岭和石洞子设有两个粮站，一般每个粮站都贮存100多万斤粮食。粮食品种主要是小米，还有少量大米和白面。这些粮食是从平原村庄用驴驮、肩背或人挑运到这里的。粮食运来后，自卫军除负责保卫工作外，主要工作是暂时贮藏，先把粮食运到山沟梯田里，在梯田正中挖大窖，窖四周用石头垒好，中间放上大囤底，用踅子把粮食踅好，囤底下面和踅子旁边用木头垫好，囤尖粮食上放生石灰，石灰上面用油布苫上，然后把挖窖的新土散开，用盖杈子把梯田盖两遍。粮食贮存以后，由自卫军通知部队和地方武装，选适当时机由部队和自卫军共同运出，一般在地窖不超过一个月。

由平原转送来的鞋袜，贮存到离村较远的山洞里，把食盐存到山顶干燥的崖膛里，随时准备转运给10团。

自卫军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密云抗日战争历史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作者简介】 李春山，曾任自卫军分队长。解放后担任过密云县副县长，现已离休。

王敬魁整理

（密云县政协供稿）

焦庄户抗日地道战斗争概述

王恩桥

焦庄户位于顺义县东北部的龙湾屯乡，距北京东直门60公里。它位于燕山脚下、金鸡河边，是一个紧靠平谷、密云、怀柔三县的边界村庄。抗日战争时期，焦庄户在蓟平密联合县的基础上，曾先后隶属于平密兴、平三密、平三蓟联合县的第四区，俗称老四区。1939年秋天，策应冀东暴动的八路军邓宋纵队三支队80多人来到这里，开辟抗日地区。接着，区干部朱晓轩、彭仲愚等先后进村，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组织起青救会、妇救会、民兵基干队、儿童团和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在群众斗争中，贫苦农民马福迅速成长，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4月，村里建立了地下党支部。1943年4月，公开建立村政权，马福当了村长，成为全村对敌斗争的带头人。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他们组织全村的青年民兵学习冀中地道战的经验，由最初的“蛤蟆蹲”逐步发展成“地下长城”，开展了英勇的抗日地道战斗争。

1941年春天，马福为八路军游击队隐蔽了一批弹药，因走漏了消息，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庄，逼问谁是马福。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虎口脱险。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他和区基干队的张敬贤等人诱捕了日伪特务张怀德和李宝让，还在瓜地处决了特务伍衣子。到1943年4月，村里的民兵自卫队发展到80多

人，改编成民兵中队，中队长马文藻，指导员焦克纯，中队副李永生。还成立了妇救会，主任石英宁。成立了党支部，由马福担任支部书记，韩伯忠、焦广等先后入党。为了进行抗日斗争，马福等决心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经过一次次的挫折，最后才和张敬贤等一起，在茶棚村一个保长家里弄到一支枪和72发子弹。从此，他们经常出没在敌占区，抓特务，逮汉奸，教育敌伪人员；埋地雷、砍电杆、破公路、扒铁道，闹得敌人火车开不动，汽车不能行，出门地雷炸，电话打不通。1943年秋天，马文藻带领民兵和区小队一起，在密云到白岩的公路上埋设地雷，把日军的一辆汽车炸翻，打死押车的日军1人，缴获电台1部，大枪1支，子弹500多发。冬天，他们又冒着大雪，连夜破坏敌人电话线10余里，砍电杆40余根，割电线30000多斤，打得敌人坐卧不宁。敌人悬赏捉拿马福，声言捉到马福上秤称，有一斤份量给一斤钞票。为了防备万一，大家商量，给马福造了个假坟，对外宣传马福"暴病身亡"，蒙蔽敌人，保证了马福的安全。

1943年冬天，抗日战争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焦庄户的抗日斗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附近的县、区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经常来到这里，学习、整顿、休养；伤病员也来这里治疗、休养；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也运到这里隐蔽。这样，焦庄户就越来越引起敌人的注意。

为了保证抗日军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焦庄户人民在平三蓟四区区委书记王田等的指导下，开始挖隐蔽洞。他们在白天选好房旮旯、墙背后等不显眼的地址，夜里就悄悄地动手挖起来。第一个洞挖在韩义家，第二个挖在焦克敏家的羊圈里，第三个挖在马文藻家的猪圈中。这种洞上口小，底下大，下去一个人往里一蹲正合适。在洞口横上一根棍，再篷上一些碎柴禾，什么也看不出来。这就是焦庄户最初的地道，俗称"蛤蟆蹲"。

不久，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马福蹲在洞中，躲过了敌人的

搜捕。但他发现这种洞虽然能暂避一时，但若被敌人发现，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只有束手就擒。于是，他们又和区委王田书记商量，改进地道。他们学习煤矿里巷道的办法，把洞挖深、掏长，还开了几个出口，即使被敌人发现，还可以打，打不了也可以跑。这种直筒式地道比“蛤蟆蹲”进了一大步，但群众思想却不通，怕夏天灌水房倒屋塌，怕敌人发现了遭到报复。

于是，他们分析了形势，一户一户地进行动员，讲清“现在大敌当前，保存革命力量要紧”的道理。同时，干部带头，先在自己家里挖。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还制订了出工付酬的办法。按照工程量计算出全部费用，按地亩分摊到户，合理负担。出工的群众每挖一方土，发给一定数量的小米。终于使群众打消了顾虑，积极投入挖地道的工程中。施工过程中，他们还发动群众想办法，用打通气孔的措施解决了地道里缺氧的问题。

不久，区干部刘发叛变，经常带着日伪军进村抓人。由于有了地道，一有敌情，群众就下地道。从村里下去，从村外出口跑出，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但是，凶恶的敌人抓不到人，就往地道里灌水、熏烟、放毒气……给地道的安全造成威胁。

1943 年冬天，三通顺（由平三蓟划出）联合县教育科长徐进来村指导，介绍了冀中开展地道战斗争的经验，并指导他们改造了“翻板”设施。这种设施就像一个凹字形，地道平掏一段后，突然向下挖。挖 1 丈多深后，再往前平掏 1 丈多远。然后返上来，最后再平着往前 掏形成一个“翻洞”。在凹字形的左、右上角，装上木板，再盖上黄土，洒上水，既能防水灌、烟熏、放毒气，还可利用这个关口打击敌人。在施工中，民兵派出小分队，到敌人据点前打几枪，喊一阵，转移敌人注意力，掩护群众施工。儿童团在村口站岗放哨，不让生人进村，保守地道的秘密；青壮年下地道挖土，妇女老人在地面装筐运土。马福身先士卒，轻伤不下火线，鼓舞了群众，男女老幼情绪高涨，日夜奋战，终于修成了南

通唐洞、北连大北坞，全长 23 里的“能藏、能走、能防、能打”的“四能”地道。

地道完工以后，县里领导进行了验收，并将情况向冀东 14 军分区做了汇报。不久，分区司令员曾雍雅召集各县的武装部长，在焦庄户开现场会。当场让大家下地道视察，并试验了防烟、防水设施。他号召各县向焦庄户学习，指示焦庄户再挖几个大洞。敌人来了，连牲口也要下地道，让敌人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大家一致称赞：“这简直就是一座‘地下长城’啊！”

新型的地道修好后，焦庄户人民更有效地打击了来犯的日本侵略军，保卫着自己的家乡。

【作者简介】王恩桥，顺义县委党史办公室干部。

（顺义县政协供稿）

古堡除奸

王敬魁

1943年春天，乍暖还寒，乌云笼罩着日寇炮火洗劫过的一个长城城堡——密云县石塘路破败不堪，到处是残垣断壁，街道两旁的房屋还带着火燎烟熏的痕迹。

日寇“扫荡”之后，留下一个日军小队和四个汉奸特务，在城堡中心设立了据点。特务队长叫李连成，人称李阎王。另一个是高怀，外号高坏。这伙特务认贼作父，依仗日寇的势力，抓人抢粮，无恶不作。有一次，赶河厂村郑保长带着民伕去修炮楼，李阎王硬说是“磨洋工”，说声“打！”话音未落，高坏抄起木棍劈头就打，几棍子就打得郑保长等人昏死过去。

一次，特务高坏到石塘路南门肉铺，白吃白喝不算，还假装和掌柜的套近乎，高假惺惺地说：“干这行真不好，伤天害理。不干吧，日本人不答应；干吧，咱都是三里五村的乡亲。”开始，掌柜的没有理会他。过几天，高坏又是这番话。掌柜的没看透这家伙的用意，便说：“你怎不投八路军呢？眼看鬼子快完蛋了。”高说：“想投八路人家不相信怎办呢？”掌柜的说：“你们要投八路，是真心，我就能引见。”高坏当时表示谢意。这天太阳刚落山，高坏就把肉铺掌柜逮去交给日本兵。日本兵让特务用棍棒打，皮带抽，灌汽油，坐老虎凳，用刺刀割去耳朵，用菜刀剁去手指，逼他说出八路军的住处。肉铺掌柜宁死不说，最后被活活折磨死在

日本据点里。

一天，特务队长李连成碰到一个外乡商人，拉着两匹骡子，驮着土布。李硬说是给八路军送的，将这名外乡商人捆绑到据点内的一个木桩上，派人找来一名屠户，逼着这名屠户剜出外乡人的心脏。李阎王抓起血淋淋的鲜人心，狼吞虎咽地吞下肚去，还恶狠狠地说："我吃了人心，有了豹子胆，以后打仗我什么都不怕。"四个特务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经常强奸妇女。有的妇女被糟蹋以后，爬上长城，跳下山涧而死，有的投进涛涛的白河身亡，使不少家庭家破人亡。

汉奸的罪行对我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造成很大的威胁，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石塘路当时的三名共产党地下党员牛凤祥、邓德如和任文礼决心为民除害。

有一天，给日军和特务作饭的我自卫队员（民兵）送出情报：四个特务一起赌钱，高坏总是输了不给钱。一特务到董各庄特务中队去告状。高坏又气又恼又害怕，嘀咕着想逃跑。牛凤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邓德如和任文礼，并安排他俩在鼓楼（石塘路城中敌据点附近）下面，自己在南街监视特务的行动。

第三天上午，高坏果然出来了。走到鼓楼前向烟摊的沈掌柜要烟抽。沈掌柜说："这里没有好烟，到家里去拿吧。"高坏随沈掌柜往南街走去。邓、任二人悄悄跟踪过去。在南街的牛凤祥也发现了这个情况。在拿香烟的工夫，三个人碰面，邓、任去找绳子，牛凤祥在墙角处等待时机。

不一会儿，高坏拿着10盒香烟从沈掌柜家往回走。牛凤祥假装遛跶，与高坏碰个对面擦肩而过，突然猛转身，将特务抱住，欲按倒在地，但没有按下去，两人扭打在一起。这时，邓德如、任文礼飞步上前，将高坏牢牢地按在地上，用准备好的旧毛巾堵住嘴，用牛皮绳捆住胳膊。让沈掌柜带道，出了城堡南门，来到石

城口外的长城根下。我南石城村的自卫队员听到这个消息，找来镐和锹，挖了一个大坑。这时，牛凤祥派邓德如回村，观察日本据点中日寇和特务的动静。他和任文礼把特务捆在一棵大杏树上，数说其罪行。高坏筛糠似地浑身哆嗦着说："我有罪，我有罪。"战战兢兢地请求宽恕，企图蒙哄过关。这时候，南石城村的部分群众赶到这里，齐声喊："砸死他！砸死他！"

正在这时候，石塘路城走出几个人，远处看像是日本兵和特务。为了防备万一，牛凤祥他们把高坏扔进坑里，用石头结果了他的性命。这个作恶多端、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卖命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高坏失踪后，三个特务认为他逃跑了，暂时没有追查。过了几天，又从内线得知，特务队长李连成要在下午去董各庄上司那里报告军情。李连成一个人去董各庄，这又是个除奸的好机会。牛凤祥、邓德如、任文礼三人一商量，决定埋伏在特务返回的必经之路——塌子沟菜园。第二天中午，李连成骑着毛驴走到菜园的时候，牛凤祥三人从菜园窝棚里同时冲上去，出其不意地把特务队长从驴背上拉下来，缴了武器，拉到塌子沟西的山沟里，用山石砸死。当地百姓人心大快。

几天内除掉两个特务，剩下的两个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门了。

牛凤祥三人和住在石炮沟附近活动的八路军老十团（白乙化曾任团长）取得了联系，决心除掉最后两个特务。老十团派一连长周德礼带领一个排来到距石塘路 3 里的赶河厂西峪村，牛凤祥三人带领马营村和石塘路的 11 名精明强干的自卫队队员也来到西峪，共商除奸大计。大家认为，特务虽少，但住在日本据点内，里边有 30 多个日本鬼子，还有迫击炮、重机枪等精良武器，必须制订一个既不惊动日寇，又能消灭特务的计划。当即决定分三路围住日本据点。

作战方案制订以后，已是三更时分，由牛凤祥带路，潜入城中，一路负责警戒，另外两路分别从前后院摸进特务住所。一个曾给据点站过岗的自卫队员佯装成送情报的人，叫醒特务高某，递给他一张叠成三角形的白纸。当高某发现这是一张空白纸，刚要发脾气的时候，乌黑的枪口早已对准了他的胸口。后院的特务张永州也同时束手就擒。当我军民押着两个特务来到石塘路城外西峪沟门的时候，战士们打了两排子弹，吹起了胜利的军号。号角声在石塘路上空回荡。

第二天清早，日本小队长发现四个特务都被八路军除掉了，不由得说："八路，胆子大大的！"

不久，日寇撤离了石塘路据点。

（本文根据邓德如、孔德才等十多名当事人或目击者介绍整理。）

（密云县政协供稿）

抗日堡垒户

王国士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与我党我军、与我们的干部战士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筑成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那时，有多少个抗日堡垒村在敌人灭绝人性的摧残下巍然屹立，多少个抗日堡垒户舍生忘死地支持革命，像保护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保护着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时我在平谷县花峪村李树棠同志家度过的日日夜夜。

1943～1944 年间，我在承兴密联合县六区担任区妇联主任。当时抗日战争已由相持阶段逐渐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因而也是日寇临近灭亡作垂死挣扎的时候，斗争十分残酷。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疯狂的“扫荡”，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到处炮楼林立，壕沟纵横，一片恐怖景象。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对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六区是今平谷县北部的深山地带，环境十分艰苦，斗争也更加残酷。我当时主要活动在长城沿线以北的上下白羊、大小段洼、罗家沟、朱家台、南水峪、南树林、花峪、熊儿寨、老泉口、五里庙、牛角峪、关上一带。这儿的大小村庄都被日寇烧杀抢掠过多次，群众生活非常困苦，但抗日热情都很高，斗争很坚决。当

时的妇女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妇女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坚持反“扫荡”，掩护八路军伤病员和地方干部，还要做军鞋支援前线。那时，妇女的任务决不比男同志轻。中国的广大劳动妇女，深受几千年封建压迫和“三从四德”旧礼教的束缚，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自由权利，苦难最深重。但是，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她们一旦走上了打日本救中国、闹翻身求解放的道路，就焕发出很高的革命热情，做出很了不起的贡献。

在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围攻和频繁“扫荡”的日子里，我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就到花峪村住宿。这个小山村里住的全是贫苦农民。1940 年，江东、林远（刘国忠）同志就来这里开辟工作，因此，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对敌斗争十分顽强。李树棠和李树声两位同志是这村的第一批党员。当时，李树棠是村支部书记，李树声是村长。由于有村党支部的坚强领导，村里的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都有坚实的基础。

我来花峪村就住在李树棠家里。他家一共 7 口人，有父母双亲、两个妹妹和他的妻子、女儿。他们全家对我都非常好。尤其在日寇“扫荡”的残酷环境中，他们不惜一切地保护着我的生命安全，支持我的工作。李树棠的妻子叫景玉明，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良而又能干的农村妇女。由于丈夫的影响，使她对革命工作早有明确的认识，并默默地为之尽力。1944 年，我介绍她入了党。在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我不仅有十分的安全感，更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李树棠排行老五，我总是称呼他们夫妻俩“五哥”和“五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每当我叫起五哥和五嫂的时候，一种亲切甜蜜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五哥每天都很忙碌，终日不得休息，很少回家。花峪村地处战略要道，经常有大批的粮食及各种军用物资由平原转运到山区根据地，花峪是必经之路。因此，这里的党员、民兵和群众要全力以赴地进行运输、坚壁工作。粮食是抗日军民的命根子，一粒

也不能叫敌人抢去。尽管花峪村离敌人的镇罗营、土门等据点很近，粮食军需品的转运任务很繁重，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另外，我八路军的伤病员和地方干部也常来这里隐蔽，都得到群众的全力保护。可敬的花峪人民，他们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这一切，都是和五哥的工作分不开的。

我接触的更多的还是五嫂。她是村里的抗日妇救会主任，非常能吃苦耐劳。平日里，她要组织村里的妇女姐妹洗军衣，做军鞋；我们的队伍一来，她一天要为战士们做许多顿饭，自己却顾不上吃一口。除此以外，她还要承担起侍奉公婆、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和干农活的重任。在日寇大“扫荡”的日子里，她又要参加对敌斗争，还总要把我的安全挂在心上。每天清晨 3 点钟，五嫂就要把全家人都叫起来，背上仅有的一点粮食、衣物、炊具，拉上毛驴，扶上老人和孩子，匆匆上山，把我和全家人分别隐蔽在山洞里。这时，村里的民兵小分队一部分负责保护隐蔽群众，一部分留在离村不远的地方，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天蒙蒙亮的时候，附近土门、镇罗营据点的敌人便倾巢出动了。走在前面的是特务、伪军，跟在后面的是端着刺刀的鬼子。由于怕踩响民兵埋下的地雷，这些家伙们都是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摸进村里。当他们发现村子里空空如也，既抓不着人，也抢不到粮食时，便兽性大发，到处捉鸡追猪，烧房子，还无耻地往水缸里拉屎撒尿，气急败坏地叫骂：“老百姓对皇军大大的坏了！”“统统的是八路的干活！”……除附近据点的敌人常来抓人抢粮外，北口外和热河的伪满“讨伐队”也常来配合“清剿”“讨伐”，有时竟连续十天半个月不断，手段更加残酷。每次敌人进村骚扰，都要折腾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肯罢休。这时，饥饿疲惫的五哥五嫂又要组织群众下山回村，还要搜集情报，研究安排下一步的对敌斗争……我正是从这日复一日的难忘经历中真正地认识了我的五嫂。她为着革命和妇女的解放事业终日奔忙，从未叫过一声苦。

李树棠、景玉明全家，是一个坚强的抗日堡垒。50多年过去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他们。

【作者简介】王国士，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已离休。

（平谷县政协供稿）

记我的父亲周硕臣先生

周景和

九曲黄河东入海，一生咆哮多坎坷。父亲虽然已去世2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勾起我不尽的回忆。

我家的祖籍在山西洪洞县，那里的祖坟上至今还立着一个周姓翰林的石碑，从父亲以上的四代起，有三支开始逃荒，我们这一支人最后到房山县惠南庄定居。

父亲名国梁，字硕臣。他诞生在1900年。父亲的教书生涯开始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九・一八事变，日本扶植傀儡建立了满洲国。两年后日本帝国主义越过长城一线，加速了它在中国殖民统治的进程，平津受到直接威胁，学生积极组织南下宣讲团，一时爱国呼声四起。父亲被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鼓舞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被他视为一个坚定的信条。于是，他就在教学之余，对比着中国的兴衰史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文集，研究三民主义。西安事变前后，父亲对蒋介石积极反共、对日方实行不抵抗政策极其愤慨，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他实行三民主义，积极抗日。结果，这封信被蒋介石冷置起来，父亲对蒋介石的最后一点幻想终于破灭了，从此，他便把希望寄托到共产党身上。

1937年秋，父亲在同事李振东的帮助下，偷偷地到了山区，在"野三坡"找到了共产党。他从山里带回《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一系列宣传品，开始了抗日宣传，走上了抗日道路。

1938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邓华支队（当地人称他们“黑马队”）来到平西，接着党又调宋时轮支队来平西加强力量。组织上找父亲帮助做征兵、筹粮等工作。父亲为了以实际行动号召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斗争，把六哥周南等人送到我房涞涿联合县政府所在地“野三坡”抗日中学。后来，在五哥周景岩的一再要求下，父亲又把五哥这个生活上的唯一帮手也送到县里参加秘密工作，接着又动员舅舅参加了革命，并把年仅13岁的八哥周景橙送到了十渡的抗日高小。

1940年，平西的武装力量空前壮大起来，除了七团、九团、县大队等大股力量外，每村都有游击小组。根据地其他方面的建设诸如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及教育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那时父亲经常跟着县委副书记赵然活动。从赵然身上，父亲感受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和共产党人的伟大。1940年6月，赵然同志当选了房良联合县政府的县议会议长，父亲当选了副议长，从此，他们的合作就更密切了。一次，不知敌人怎么知道了我方有粮食抢运到穆家口子了（地名记得可能不准），就风风火火地来抢粮食。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又不在那里，情况异常紧急。父亲和赵然同志立即组织村里的干部民兵带领群众转移粮食。也就在这时，敌人的枪声打响了；枪一响，村里就乱了。看着纷乱的群众和来不及运走的粮食，赵然也急了，而且急得他一时没有好主意。父亲当机立断，对赵然同志说：“这几袋粮食运不走就烧了它。眼看咱们叫敌人追着屁股打，不如布置民兵边打边撤。咱俩赶到前边去，让运粮的人离开大队，到小路上去单独隐蔽起来，然后设法引诱敌人去追县大队。”赵然一听，心里顿时一亮，立刻布置了后卫，跟父亲赶到大队前边去。父亲领着运粮的人进入了一条不起眼的小山沟，把粮食暂藏进了一个石洞。赵然同志则叫大队带了几袋粮食，故意边跑边撒，把敌人引走。事后，赵然同志说：“我亏了有你这么个参谋长了！”

1940年秋天，五哥调到边区社会部工作。为了扩大情报网，与游击区的同志们联系方便，社会部的负责人王友同志（钟子云）指示五哥在长沟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站。父亲听五哥说了以后，就积极支持五哥开展工作，决定以我家的名义，由景春二哥、景秀四哥（二人均是大伯父的孩子）出任正副经理，在长沟开了一个“振兴文具店”，对外卖些书籍、纸张、笔砚等；对内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报纸，秘密接待同志，传递情报。为了便于工作，父亲还在村里办了个小卖部，来掩护工作，传递消息。

1941年，经过多次“扫荡”的日本侵略军知道他们是剿灭不了八路军的，于是又发动了所谓的“强化治安”运动。平西革命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随即搞起了大生产运动，进行自救。但有不少物资还是要到敌占区去搞。父亲就利用各种关系，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搞到了食盐、无线电器材、药品等大批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这年秋天，父亲见县大队的100多个战士还穿着单衣，夜里宿营时一个个冻得让人看不下去，就问赵然同志，战士的冬装是怎么解决的？当父亲知道根据地太困难，一时解决不了时，就主动由自家承担起给县大队战士做军服的任务。他自己掏钱买棉花布匹，自己找人做，使战士们及时地穿上了棉衣。

1941年，平津等地的地下党组织与平西根据地的来往愈加频繁，王友同志指示五哥在我家设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在封锁沟外接应进出山的过往同志。五哥又找父亲商量，父亲直爽地说：“这是咱家份内的事，咱们宁可掉脑袋，也要掩护好同志。要是谁把消息漏出去，他就不是咱周家的人！”这样，我家这个交通站先后接送过数十个同志，其中多数是向往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用化名的工作同志。有时，一次要接待几个人，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搞交通站时给家里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头一件是：这年冬

天接周彬的那一回。当时，五哥虽然调到了社会部，但也受县委的双重领导。赵然同志指示五哥到北平西交民巷去接北平地下党城委周彬同志（当时叫张培华）。赵然向五哥交代说，张培华同志是边区政府姚依林秘书长的爱人，一定要保护好她的安全；而且她那里的情况复杂，接头时要找不到张二小姐（张培华）或张四小姐（张培华的妹妹），就不要暴露身份。后来五哥在北平先同张四小姐接上头，又同她一起到天津去接张培华同志。张培华见形势紧张，就问五哥叫什么？五哥说叫周景岩，张培华同志就说："好，那我就叫周彬。"并指指妹妹，"她叫周平。"这样，按计划五哥和周彬先从琉璃河下车回家，路上二人以姐弟相称，就说弟弟接放寒假的姐姐回家，然后再由黄云同志的哥哥送黄云和周平乘车到涿州，再由五哥把他们接回去，最后在家里聚齐再越过封锁线到根据地去。后来，她们姐俩为了保留这段美好的回忆，一直使用"周彬"、"周平"的名字。解放后，我们两家还经常来往。姚依林夫妇对父亲及我们兄弟的感情依然很深。

另一件是，这期间跟张大中同志的交往。由于张大中同志到我家来往的比较频繁，交往比较多，感情也比较深。记得解放后在中山公园的一次会上，父亲见到了他，请他到家作客，他很快就来了。到村口他让汽车停在离我家很远的地方，特意步行一段路程来探望父母，可见彼此感情之深。

1942 年 4 月，在去根据地的途中，父亲不慎被捕了。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李振东和李丙辉同志及一个叫张府的老乡。之后，宪兵队让特务王殿臣带路抄了我的家，抄家时还带走了二哥耀亭和四哥景秀。在狱中，敌人对父亲严刑拷打，老虎凳的砖曾加到三块，但始终没有动摇得了父亲的革命意志。他在狱中有诗写道："忧国忧民志未酬，身陷囹圄更何求；青山处处埋忠骨，拼将吾血灌神州！"

最后，经组织决定，由五哥卖了家里的 40 多亩好地，凑了 2

万多元大洋，才把父亲和狱中其他未牺牲的同志营救出来。

父亲出狱后，赵然同志代表组织来看望他。赵然同志对父亲说："是组织上让你家属卖了地去营救你们的，今后有什么困难请提出来，组织上一定给你们解决。你们一家人都参加了革命，是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啊！"

但父亲激动地说："我周硕臣早就把一家人交给革命了。一抓进去，就没想活着回来。现在回来了，要感激党！要说要求，我只求党给我更多的工作；如果我死了，党要把我的孩子们拉扯上，让他们继续跟党干革命！"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阜平温塘召开全边区参议大会，父亲光荣地当选为边区参议员。会议期间，父亲认识了新当选的参议长成仿吾同志，见到了聂荣臻、萧克、程子华等同志。在会议期间，父亲还看到了根据地中心的广大军民那种崭新的精神面貌，领会了新的精神，心情异常兴奋，激发了他更大的革命热情。开会回来后，他工作更带劲了，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对党的事业也更加忠诚了。

1945年春的一天，有个同志要父亲把一封信捎到县里去。就在父亲送那同志出门的当儿，我无意从桌上拿起信来玩，并撕成两半。父亲回来一看，脸都气白了。对我这个两岁半的孩子，他无可奈何，急得团团转。后来，他想到在村里党支部工作的九哥（周景朱），就拿着信带着九哥到县里，要求县里先把九哥押起来，等县里把事弄清楚再放。县里信任父亲，执意不肯。父亲除做严厉的自我批评外，仍坚持这样做，直到上级领导对父亲说，信上的内容及保密的必要性已过去了，父亲才把九哥带回来。

1945年8月，日军侵略军的末日到了，我军解放了张家口，国民党也很快抢占了平津。这时，房山一带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原来投靠日军的石窝乡大乡长崔士廉也蠢蠢欲动。他看父亲在当地的威望很高，就企图拉拢父亲为他们办事，并传信请

父亲到房山当他们的县长。还挑拨说："老蒋开到华北的军队有几十万，八路军是成不了气候的，死不了也只能钻山沟，你跟着他们受什么罪？跟他们干了那么多年才当了个副议长，你还喝他们的迷魂汤。"父亲听后，对那个传信的人说："你回去对崔士廉说，我周硕臣没忘记他在辛庄杀的那几个贫农，他手上的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让他死了那份心吧！"

崔士廉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不久，原来的汉奸队"孔团"的何茂银，就带着蒋军扑向村来。这次偷袭幸有群众掩护，我家才免遭劫难，但前来找父亲联系工作的南尚乐村的陈化一同志却因隐蔽不周被敌人杀害。

不久，父亲以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常驻代表的身份到了张家口，参加边区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所做的筹备工作。当时边区参议会有三个驻会参议，一个是参议长成仿吾同志，当时他是华北联大的校长；一个是董岳同志（名字可能不准），他解放后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再一个就是我父亲。父亲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正当中共为和平建国而奔波时，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父亲眼看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要大打了，就立即返回故乡，准备在解放战争贡献更大的力量。

父亲回家不久，地方上就搞起了土改运动。父亲第一个交出了房契和地契，对家里的粮食等也都做了整理，拿出去交给村里平分。由于当时的土改运动有些过火，我家被划成地主，但父亲毫无怨言。后来，以谭惠民县长为首的土改工作队又到村里搞了土改工作复查，把我们的成份纠正过来，父亲对政府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大加赞赏。

解放以后，父亲从 1949 年到 1953 年做了一届房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 1956 年 12 月到 1958 年 4 月又做了一任房山县人民委员会的副县长。后来他感到年纪大了，提出辞职申请，被安

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作馆员，直到1966年7月12日，在“文革”的恶浪冲击下，父亲才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旅程。

【**作者简介**】周景和，房山区南尚乐乡惠南庄村人，现为小学教师。

（房山区政协供稿）

回忆我的父亲马维驰

马继纲

我们家很早以前是平谷县上镇村一个大户。爷爷名叫马子合，人很精明，积累下一份不小的田产。到了我的父辈，家道中落，却仍有一方大户的架子。父亲是长子，便成了这家业的支撑者。父亲名叫马维驰，字希江，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生人，自小受的是繁文缛节的管教，却偏偏养成了刚阳侠勇的气概，加上身材魁梧，胆气过人，好打抱不平，专与穷人为友，在地方上颇有响名。

那时大户人家，多置有枪支弹药。我父亲也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只要他那把盒子枪一甩，便指哪打哪，弹无虚发。有一回当着众人，他把枪往天上一指，一声枪响过后，从天上掉下两只鸽子。从此，“神枪马维驰”的称号也就传扬出去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失守，平谷县也很快成了日本人的占领区。1938年，邓华、宋时轮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开过来了。农历五月十六日，先头部队过石匣。二十日，这支先头部队进入了镇罗营，捣毁了那里的警察所，然后大部队进驻上镇、关上、南水峪，宣传和发动群众抗日。

队伍一来，上镇村的财主们、有些农民家的小伙子们，由于受谣言的蛊惑，都吓跑了。我们一家全跑了，躲在外边听消息。慢慢有人说，共产党的队伍风餐露宿，秋毫不犯；又有人讲，共产

党的队伍，扛枪杆的大多是农家子弟。也有人捎来话说，我们一家再不出面，就要处死我爷爷马子合。

我爷爷吓得不行。但是，我父亲心细胆大。他经常出门在外，接触过不少人物，曾听说过共产党的队伍是专打日本鬼子的，于是他挺身而出，第一个回到村里。本想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想一露面便受到了热烈欢迎。

陆陆续续，逃外的人们回了村。队伍上的领导与我父亲整日整日地交谈，谈民族的生死存亡，谈老蒋的消极抗战，谈共产党八路军敌后抗日的决心，号召各阶级各阶层统一抗战，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

一天夜里，我父亲与队伍上的一位领导郑重地一握手，从此参加了游击队，并被任命为密（云）平（谷）蓟（县）联合县的游击大队长。

旧历六月二十二日夜，第四纵队的队伍冒雨打进了平谷城，伪县长、警察局长及日本顾问仓皇逃命。我父亲领导的游击队在抗日政府及第四纵队的领导下迅速发展。他们化整为零或集零为整地四处奔走。东至兴隆县，西至古北口，风餐露宿，废寝忘食，捉汉奸，打土匪，收编地主武装，改造地方民团，扩充抗日队伍，宣传抗日十大纲领，建立乡村抗日政权，还配合兄弟游击队打击敌人。我父亲自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坚定地相信：共产党好，共产党的事业能成功。他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

下营村有个高守青，肚里墨水不少，家境也挺富裕，对抗日的统一战线持消极态度，不出人，也不出钱，因此，游击队配合联合县政府，罚高家买了600双胶鞋，送到队伍上。

上镇村有一户财主叫刘兴斋，日子挺富，家里有人有钱又有枪，只是任啥也不出，也挨罚买了胶鞋，从此对我们家有所忌恨。

我爷爷胆小，一直担心万一形势有变化，一家人都要受我父亲的连累。于是不久，我们那个大家庭便分了家，析了产。我们

这一股分了个“马家老店”，继续那骡马客栈的营业。我父亲说：“这也好，不管将来是天塌地陷，还是千刀万剐，都由我一人去承受，与父母弟兄们无关。”

我父亲曾率领游击队，在西峪山口打过伏击。队伍埋伏下不久，几辆拉鬼子的大汽车便从坡下爬了上来。我父亲一声号令，长枪短枪一齐响，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过了老半天，鬼子才集合队伍，摆好阵容，架上大炮小炮，冲我父亲他们埋伏的地方狂轰滥炸，临了一看，连个游击队员的影子也没有，早跑了。

那时候，我父亲他们就是这样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前晌还在水峪，后晌早到了关上，夜里又到陡子峪、墙子路或青灰岭什么地方去了。

抗战形势大发展，敌人不甘心。1938年旧历六月，一批伪满蒙军配合日本鬼子从长城北面向平谷进军。

旧历七月二十八日平谷城失守，平谷第一个抗日县政府仅存了35天，许多爱国志士惨遭杀害。此后，正规军撤往平西，地方游击队也因战事失利，转入分散活动。我父亲也暂时退去戎装，回归上镇，明里做马家店的掌柜，暗里与部队领导继续联系。

马家老店在村西口，紧对西河场。我父亲常对着西河场上小道发呆发愣。那时候，马家老店里雇了个大师傅叫周福成，是刘店那角子人。周师傅挺好，在老店里受了不少的累，也给了我父亲许多帮助。

马家老店有个常客叫曹立清，是位山东人，小学教员，原先在镇罗营的警察局里吃文墨饭，后来局子被端，我父亲与我三叔马步芳把他从老单那里保下来做了小学教员。此后，曹立清便在上镇村北的大庙里教书。这个曹老师，每天让学生们练习童子武装操。曹老师与我父亲过往甚密。有人说，曹老师是共产党的外围人士。

此后的形势越来越紧，日伪军到处捕人杀人。有人劝我父亲：

出去躲躲吧。我父亲摇摇头，照常在马家老店里当掌柜。

再后来，西河场那地方，常有外地的陌生人瞎转悠，看得出，不是好人。有一回，我父亲在老店里眯起一只眼，隔着窗户瞄了两个正转悠的外地人。一旁的周师傅问："枪子够上够不上？"我父亲说："够得上。"可我父亲没打。他说："我一打枪，全村人都得遭殃。"

老店的北胡同里住着张万余，他暗里当汉奸，认了个日伪特务作干爹，那特务常在他家吃住、抽大烟。

1939年腊月二十三，马家老店过小年。二十四，阴天，下小雪，雪粒儿下得唰唰响，小北风一刮，天挺冷。后半晌，马家老店进来三个外地人，一个上了炕，两个坐地下。炕上有另外两个客人，是常客，都做羊皮生意，一个叫王坦，一个叫张连池，都是遵化附近人，和老店很熟。

那仨人说是要吃饭。仨人点了三样：面条、烙饼、饺子。周师傅自然要忙活一大阵。吃饱了，喝足了，跑堂的进屋去算帐，那仨人说："让你们东家亲自来。"我父亲那会儿怀里正抱着我一周零几个月的弟弟，听了跑堂的话便挑开门帘进了屋。

那仨人问："你就是马维驰？"

我父亲说："不错，正是我。"

那仨人又问："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干啥的？"

我父亲挺从容，一笑，点点头。这仨人在西河场转悠过好些日子，也在张万余家打探过好些回。他们一进来，王坦和张连池便看见了他们腰里别着家伙。

王坦和张连池替我父亲着急，进来的周师傅也替我父亲捏了一把汗，但他知道我父亲的本领。父亲的盒子枪就放在大柁上，大柁离地不高，只要轻轻一蹦便能将枪取下，然后一个"鲤鱼打挺"之间便能将那三个人干掉。但是我父亲没动。他依旧担心枪战之后，日伪特务们会让全上镇人遭殃。

下午三四点钟，我父亲放下我弟弟，朝马家老店里外望了一眼，又朝王坦、张连池和周师傅拱拱手，便被三个特务绑走了。我父亲五花大绑走过西河场，没掉泪，也没回头。乡亲们站在村口，泪眼汪汪地望着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父亲被逮走后，全村人写了保据保他，但不管事。为逮他，特务们下了不少功夫。他是敌人黑名单上的要犯。他只在密云落脚，又连夜被解往了古北口。

在古北口过堂，逼得挺凶，打得也挺凶，但我父亲啥话也不说。时隔不久，我母亲辗转到古北口探监，看见我父亲被特务们割下了两只耳朵。

与我父亲脚前脚后被捕的，还有镇罗营、熊儿寨等处8个人，其中就有曹立清。

不久后，我父亲从古北口被押往热河，再不久又从热河被押往锦州，以后便被杀害了。怎么杀害的，没人知道。刑场在哪，没人知道。何日何时辰，也没人知道。我的父亲，就那样悄悄地永别了妻子儿女、兄弟姐妹，永别了上镇村，再没回来。他就义时，年仅30几岁。

【作者简介】马继纲，平谷县镇罗营乡上镇村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担任过生产大队会计。

刘廷海整理

（平谷县政协供稿）

爱国人士蔡兴斋

江　东

蔡兴斋是一位终生未离故土的农民，又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爱国人士。30 年代，他做过乡长，抗战爆发后，当过抗日村长，两面保长，以后，又任过村教育委员。他的特殊经历使他历尽坎坷。他有过迎来胜利的欢欣，也有过蒙受冤屈的苦闷，然而，他热爱祖国，矢志不移，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

蔡兴斋（1913～1990）名叫蔡宝旺，字兴斋，北京市平谷县靠山集乡将军关村人，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8 口之家，自耕土地 31 亩，有耕牛 3 头、驴 2 头。他童年读过两年私塾，粗通文字之后，就在家中劳作。他不但很早就担当了家务，而且十分精明能干。他善交朋友，肯于助人，办事公道，不贪不占，在村中热心调解公众纠纷，勇于担当公务，21 岁时，就被村民公推为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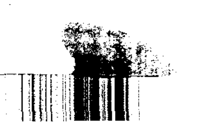
1936 年，他因到蓟县为本村聘请教师而结识了冀东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子光，此后，过从甚密。1938 年 6 月 16 日，我八路军邓（华）宋（时轮）四纵队奉党中央命令挺进冀东，配合闻名于世的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6 月 19 日，四纵主力在攻克兴隆县城后转移至将军关，蔡为避免战事，阵前攻心，晓以利害，瓦解了将军关守敌，并以乡长身份热情接待了我军。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八路军秋毫不犯的严明纪律深深感动了他。他主动为部队筹粮筹款，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又积极向我军介绍当地

情况，为我军标定地图和行军路线，深得邓、宋的信赖。8月11日，邓华在将军关召开军、地工作会议，蔡应约参加了会议。会议一方面决定了平谷、蓟县、玉田、丰润、遵化、迁安、卢龙、滦县县长，准备开辟地区；另一方面，安排了部队筹粮筹款等问题，要求蔡兴斋协助部队供给，委任蔡为将军关村村长。8月13日，日本关东军从靠山集进攻将军关，蔡引导我部队安然转移到长城四座楼。就在这一天，蔡的父亲蔡景彦老人正在西山放牛，惨遭日军杀害。国仇家恨，更加坚定了蔡兴斋抗日救国的决心。

10月17日，宋时轮率四纵队及冀东暴动部队西撤，遭到日军前后堵击，受到严重挫折，平谷地区抗日工作处境困难，西撤前只留下很小的三支队，由单德贵率领坚持游击战争。入冬，这支部队指战员、伤员无过冬被服，急需1000元补给。蔡兴斋闻讯后，立即设法筹集。他从村公所支出150元，自己解囊500元，仍不足，又卖掉耕牛，凑齐1000元送上，解决了三支队过冬燃眉之急。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将军关战略地位重要，日军始终在这里建立据点、严密设防。长城以外，被日寇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无人区”。长城以内，日寇严密封锁，频繁“扫荡”。这使得将军关不仅成为日寇的巢穴，更是我方对敌斗争的前沿。而身居虎穴的蔡兴斋始终与我抗日政府保持秘密联系。他明里是日伪“保长”，以合法身份应酬敌人，挥洒自如；暗里却是我们的抗日村长，敌伪工作联络员。他临危不惧，巧妙周旋，用他的勇敢和智慧，多次为我方筹措物资，剪除敌特，营救我方工作人员于危难之中。

1940年1月，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区党分委阎老湾会议后，决定开辟新区，巩固扩大游击区。4月，成立了中共蓟平密联合县委员会及县政府，蔡兴斋与县委书记李子光、西北办事处区委书记江东、主任刘云峰等取得联系，被秘密委派为地下联络员，与我方负责联络工作的白涛直接联系。8月，将军关安设了日军据点，



并驻防大批伪军。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我军炮弹厂急需雷管。刘云峰找到蔡兴斋，请他设法解决。蔡接到任务后，苦思苦想，终于有了办法。敌人当时正在修筑将军关外思家岭“治安公路”，运来大批雷管炸药，储存在陡子峪伪警察分驻所内，由日本所长中川保管。要想弄到雷管，就得打中川的主意。一天，蔡兴斋从海子村龙王坑买了四条鲜活大鲤鱼，分两包装进口袋，搭在驴背上，骑驴来到了分所。见中川后，放出活蹦乱跳的大鲤鱼说：“中川太君，今天我给你送来好酒菜的有！”中川大喜，立刻喊来厨师张自勤，令他架火烧锅熬油炸鱼。不一会儿，黄澄澄香喷喷的鲤鱼片端上桌来。蔡与中川相对而坐，中川开了一瓶日本清酒，二人就着炸鱼，举杯对饮，连干数杯，酒酣，蔡问中川：“鱼的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大大的好吃！”“阁下想不想再吃？多多的吃？”“想吃、想吃！多多的，大大的，哈哈……”“阁下要想再吃，轰——轰——”蔡用双手比划着炸鱼的样子，“炮的（指雷管）给，鱼大大的有！”中川一听便明白了，说：“你的大大的好。炮的大大的给！”他醉醺醺地向后一仰，喊来翻译李润田，随手将库房的钥匙交给了李：“开仓库的，炮的给蔡！”这李润田是我们的内线人，又是蔡兴斋的好友，立即会意从仓库取出 135 盒（总计 13500 支）雷管，暗中装进蔡兴斋带来的口袋里，明里只拿几盒叫中川看后，交给蔡兴斋手里。蔡兴斋指着雷管说：“这炮的给，鱼的三五十斤的不成问题……”此刻，中川已烂醉如泥，蔡兴斋将口袋搭在驴背上，不慌不忙地走了。事后，我方秘密酬谢了李润田。

1940 年 11 月，我撤销西北办事处，成立平密兴联合县。此后，日寇连续搞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惨烈，对平密兴地区我抗日根据地，更是百般摧残。抗日战争经历了最艰苦的时期。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蔡兴斋毫不动摇。他坚持战斗岗位，巧妙与敌斗智。陡子峪有一个屈翻译，卖身日寇，充当汉奸，并狗仗人势，欺压群众。这家伙是个大烟鬼，经常向各村

勒索钱财和黄金，老百姓恨透了他。平密兴二区区长丁佐仁根据群众要求，决定除掉这个恶棍，但因敌人设防严密，很难下手，要求蔡兴斋设法。正巧，1942 年 12 月初的一天，将军关有 15 名鬼子兵外出参加对花市、快活林等一带山区“讨伐”，据点里只剩下五六个鬼子兵和一个班长，这班长有一个中国籍的父亲，名叫岳桎。行前，敌人担心巢中空虚，怕出问题，放警犬围守据点，给我方活动造成困难。蔡兴斋给鬼子出主意，说只要把空营房用封条封上，东西一点也丢不了。鬼子很满意，放心地走了，趁此机会，蔡打发李成顺利用到据点送鸡、菜和烟卷的机会，探明了屈的住所，马上给二区小队捎去一封信，要他们连夜赶来除奸。也巧，这封信被当时住在南山的李子光同志接到。李子光怕二区小队去人多，目标大，会给蔡兴斋添麻烦，便改派县政府警卫班长刘瑞章和刘顺二人去完成任务。他们连夜赶到将军关，先到蔡兴斋家问清了底细，蔡大嫂给他们烙了几张饼，二人边走边吃来到陡子峪分驻所南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屈的家。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作梦也想不到八路军会深更半夜找上门来，只得束手就擒，但他的老婆却大吵大闹。为了不惊动敌人，刘瑞章二人速将屈带出了陡子峪，这家伙要赖不走，被硬拖到东陡子峪沟口处决了。事后，屈的老婆探清八路军惩办她男人是蔡兴斋策划的，便到兴隆伪警察署告了蔡的状。兴隆来电话质问陡子峪分所，正好接电话的是翻译李润田，他巧妙地应付了上方，马上通知蔡兴斋赶快出去躲躲。蔡兴斋想，如果自己一跑了之，不仅证实了敌人的怀疑，今后也就无法继续在这里坚持做抗日工作了。他深知自己所处地位的重要。在这之前，李子光同志就担心蔡兴斋的处境危险，曾派人捎信叫他离开将军关，或做一些别的工作。蔡兴斋理解领导的关心，但他说：“先顶一顶看，实在不行再说。”此刻，在这危急关头，他冷静一想，走是下策，便灵机一动，找到那个鬼子班长的父亲岳桎，说：“我这个保长不能再干了。我为皇军效

力，却有人说是我叫八路军杀了屈翻译，皇军若是怪罪下来，我怎么担当得起！我不如到北平去躲起来吧。”岳说：“不要怕，我给你作主。”蔡说：“你官小，作不了这个主。如果你想作主，就给茅山的清佳队长报告，说屈的死是因为他借皇军的名义胡作非为所致，与蔡保长无关，不要叫蔡保长走。”岳即从命，给清佳通了电话。清佳果然说：“屈的顶坏，死了死了的没有关系；蔡保长大大的好，跑了的不要！”就这样，敌人自己把蔡兴斋留了下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深感兵力不足，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游击区，有如陷入泥潭，处处被动挨打。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敌人大力推行“以华制华”的战略。到处增派伪军，加紧对我根据地的“讨伐”。而一些敌伪军政人员见日寇走下坡，败局已定，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在这种形势下，争取和瓦解敌伪力量成为我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1943年6月，伪满宋庆讨伐队进驻将军关。宋庆和李润田是老朋友，此人来自东北，原是抗联部队里的一个营长，所部被日寇缴械后改编为讨伐队。蔡兴斋很快通过李润田的关系认识了宋庆。7月，宋庆队讨伐塔洼金矿，金矿里有我方工作人员。在敌人的包围和枪击中，我方联络科干事马林、金矿主任三山和晓东三人被敌人抓捕，我方工作人员郭玉彬在突围时手被敌射伤，文件包落入了敌人手中。在审问中，马林一口咬定自己是金矿工人，没有暴露身份。为营救被捕的同志，郭玉彬托人找到蔡兴斋，请他设法。当时，蔡正在平谷城里办事，闻讯后立即赶回将军关，了解到三山、晓东被关押在陡子峪，马林被关在将军关宋庆队。蔡马上和李润田同去见宋庆。李先对宋庆说，讨伐队所抓三人都是矿上作金的工人，不如一放了事。蔡兴斋又说，三山是他黑水湾的一个亲戚，实在不是八路。宋庆表示，人可以放，但必须通过日本副队长冈村。蔡兴斋又拉着李润田去陡子峪见冈村，力保三人，并说宋队长已同意放人，“就看阁下的说话了”。冈村见势，也

就顺水推舟，同意放人。但是，三山、晓东在警察分所中川所长手里，还要打通这第三关。二人又回分所找中川，蔡兴斋对中川说："八路的手被打伤跑了的有，兜子的血的可以作证。三山、晓东我的晏庄的亲戚大大的，八路的不是，有晏庄保长晏长发的作证。晏保长已经来了，就是胆子小，太君的不敢见。"就这样，蔡兴斋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再三，终于救出了三位被抓的同志。事后，晏长发拿出白涛给的十两金子要酬谢蔡兴斋，他婉言拒绝了。我方酬谢了李润田，又派马林拿两千元酬谢宋庆。宋庆说："咱们都是朋友，没仇没恨的，用不着这个；再说，我是中国人，原也是东北军的，又是杨靖宇将军的部下，没说的。"不久后的一天深夜，由蔡兴斋出面相约，宋庆和李润田、和我方的白涛在中心村东坡大石洞口会了面，双方互通了情况，建立了联系，使我对敌联络工作在将军关深深扎下了根。

为了争取和瓦解敌人，蔡兴斋不放过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不怕承担风险，不惜花钱费力。这年农历九月，宋庆找到蔡兴斋有事相求。原来，宋的手下有41名40多岁的老兵，准备退伍回东北通化老家。眼看就要入冬，可这些老兵们连一身棉衣都没有。讨伐队既拿不出钱，又没有布和棉花，更没人给做。宋庆不忍心叫这些老兵挨冻离去，便找蔡兴斋帮助解决。蔡一口应承下来。他先找在村里开布铺的老妹妹买了布，每人连里带面约30尺，41个人就是120多丈，又从自家拿出100斤棉花，再找来自己的老嫂子们突击缝制，四五天工夫，41套里面三新的棉衣做成了，如数交给了宋庆。这些老兵们穿上了蔡保长送来的厚实暖和的新棉衣，无不感激涕零。临行那天，老兵们列了队，宋庆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记住，你们身上的棉衣是怎么来的，咱们做人可得讲良心！"谁知这些日夜盼望归家乡的老兵因为汽车抛锚而在兴隆耽搁了两天，第三天，承德方面又来命令，叫这些老兵[illegible]回原地继续服役驻防。以后，他们在街上只要见到蔡兴斋，都[illegible]举手行礼。蔡

有事情找他们，他们都乐意帮忙。宋庆和我方见面后，知道了蔡兴斋的底，蔡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找到他，他都尽力相助。

敌人在对我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的同时，更加紧了经济封锁。当时，我方纸张十分困难，军队、地方都急需用纸，而纸张又是敌人对我根据地严格禁运的物资之一。按敌人的法令，私买纸 10 张者即判死罪。为了解决我方急需，白涛叫蔡兴斋设法从敌占区买进一批纸张。蔡凭借自己的关系，派人到兴隆县城荣源号去搞，荣源号里竟无货。1944 年春天，蔡又派人到赤峰，终于买到了 18 令，每令纸合 500 斤小米。这 18 令纸装了 18 麻袋，就是用宋庆队运送给养的汽车运回了将军关，押车人有宋庆队的司务长和我方的李成顺。纸到将军关后，10 麻袋存在蔡家东院粮房里，8 麻袋存放张国俊家。三天后的一个夜里，我方派人将这批纸张秘密背运到中心村办事员刘贵处，由刘贵全部安全运交我抗日政府。这批纸为我方解决了极大的问题，而买纸的钱，是蔡兴斋卖掉了自己一块林子才偿还的。

不久，我平三蓟联合县二区征收军鞋，蔡兴斋派吴万隆把将军关应交的 20 双鞋送去了。送鞋人在返回途中被特务抓住，搜出了我方开的收据，连人带据押到了将军关。蔡兴斋闻讯后立刻去找宋庆要人。宋正在抽大烟，他取出那张收条，随手用点烟泡的火点着，烧了。他笑着说：“趁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事儿，我当着你的面烧。”然后，放了人。

1945 年 9 月 11 日，伪满洲军 24 团少将团长兼伪热河省西南军管区（通称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黄方刚率部起义，参加我八路军，随同起义的还有伪满洲军 8、11、12 团及 12 个讨伐队共计 2 万余人。黄部的这一起义壮举沉重打击了敌伪势力，壮大了我军，在冀热传为佳话。而黄部起义的曲折过程中，也渗透着蔡兴斋的心血。

1943 年 11 月间，黄方刚奉命与宋庆换防，亲率 24 团 2 营

（含2、4、6连及一个重机枪连）进驻将军关，宋庆队调防三道河子。黄宋原都是东北抗联老友，已有多年不见。二人交接之际，宋将蔡兴斋做为好朋友介绍给了黄方刚，并在蔡家用烟用饭。黄方刚一头扎进蔡家，连住5天后才回了兴隆团部。从此以后，蔡兴斋就抓住了这位黄团长。24团的一营驻黄崖关，二营驻将军关，三营驻黄酒馆。每营除三个连外，都有重机枪连，装备精良，实力雄厚。在兴隆、蓟县一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争取此人的工作十分重要。由于有宋庆这层关系，蔡兴斋尽可从中斡旋。

1944年3月间，将军关我秘密村干部贾连生等6人因策动黄部二营四连两个士兵投了八路军13团而被该营抓捕，关押在兴隆县日本人的“留滞场”（死囚集中营）。蔡兴斋受6人家属之托，到兴隆找黄方刚要求将6人保释。蔡兴斋见了黄，说明事情原委，要黄放人。黄说，人可以放，但得让两个日本团副知道。说话间，正好两个日本团副进来了，黄向他们通告了此事。一个日本团副却十分傲慢地坚决反对，并说要将6人交军法处处决。黄大怒，撕下自己肩上的少将肩章，不住地抽打那个日本团副，边打边喊：“你是团长，我是团长？放肆！”那个日本团副架不住黄团长的发作，只得笔挺地站着答：“阁下的团长！阁下的团长！……”另一个日本团副也急忙表态：“阁下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黄方刚立命蔡兴斋当面写下保据。蔡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条子给了黄，黄收下条子，叫传令兵找来6人，当即释放。

我党对黄方刚早有了解。此人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广州起义，负伤后到上海医疗，后派往东北工作，与我方失去联系，曾在东北抗联当连长，是宋庆的部下。抗联受挫后，所部被日改编，黄得日寇重用而青云直上。1944年后，欧洲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法西斯日暮途穷，我抗日战争已由相持转入反攻，日寇统治岌岌可危。在冀东战场，我八路军游击队连连出击，重创日伪。10月1日，我拔除前苇塘敌据点，全歼刘文选

伪满讨伐队。这种形势，迫使黄方刚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前途。从1944年到1945年，我13团团长兼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给黄方刚先后去信三封，信中晓以民族大义，劝其弃暗投明，回到人民一边。黄也在一次回信中表示，悔恨自己走错了路，愿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1944年3月，舒行就派韩济民（贾国卿）、张东屏二同志秘密来到蔡兴斋家，要通过蔡与黄方刚取上联系。蔡请二同志吃了饭，向他们建议，联系黄方刚最稳妥的办法是通过宋庆。二人根据蔡的指点，找宋庆去了。

1945年8月的一天，黄方刚急匆匆来到蔡家，神色很不一般。他一见蔡兴斋，便说有要事相商。蔡叫孩子们回避，把门一关，问有何事。黄说，伪热河省公署省长姜全鄂刚把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电报通知了他，他又接到上方命令，要将他部调往奉天。蔡问他准备作何打算？黄说，他准备投靠八路军13团，但不知怎样才能马上与13团联系上。蔡告诉他，想投13团就赶快找宋庆，宋与13团已经有直接联系。黄听从蔡的指点，马上返回找宋。这时，我方舒行司令员已派出参谋长韩济民、郭子忠，准备与黄、宋谈判起义事宜。9月10日韩、郭到达前苇塘宋庆部，不巧，宋到兴隆伪县公署于佩珊县长处开会去了。韩将电话打到兴隆伪县署，接电话的正是于佩珊。韩说，我是八路军韩济民，奉舒司令员命前来会见宋队长和黄少将，请共商大事！1小时后，宋庆先骑马到前苇塘与韩相见，安排了谈判事宜。次日黄方刚乘汽车到前苇塘正式谈判，宣布起义。舒行司令员赶来见了黄，黄羞愧交加，禁不住失声痛哭。谈判进展顺利，所有起义部队经过改编，与我13、16团及三个支队，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旅，14日，在兴隆县城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蔡兴斋就是这样，身任伪职，在敌人眼皮下默默地为抗战做了许多可贵的贡献。他坚韧不拔，毁家纾难，肯于牺牲个人利益，却从来没有出过名，得过利，没有向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讲过任何

条件，也没有炫耀过个人的功绩。解放以后，他一直是一个安于本分的农民，为建设家乡出力。

【作者简介】 江东，曾任辽宁省本溪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文联主席等职，1983 年离休。1940 年～1945 年任中共蓟（县）平（谷）密（云）联合县西北办事处区委书记、中共平密兴（隆）联合县委宣传部长等职。

（平谷县政协供稿）

身在敌营心向人民的曹荣久

燕龙生

抗日战争时期，提起曹巡官——“曹噜噜”，平谷城里城外干部群众多有知晓。他身在敌营，心向人民，并遵照我党李子光等领导同志的指示，做了不少营救抗日干部、家属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好事，得到党的信任和人民群众的肯定。虽然他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有关他的事迹仍然没有被人们忘记。

“曹噜噜”名叫曹荣久，又名曹万仓。1897年生，河北省南皮县花园村人，家贫。他少年时期在家乡读过高小和简师，20岁投笔从戎，参加了江苏的军阀部队，再从江苏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历任排长、连长、副官等职。军阀部队垮台后，他考入哈尔滨中东铁路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任路警巡察员。1934年9月，曹荣久经熟人推荐来平谷县先后任伪公安局督察长、一分局局长和伪县警务局警察大队长。七七事变后，日寇向我华北大举进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阶层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敌斗争。1938年6月，八路军邓宋支队开到平谷将军关。7月19日深夜，八路军冒雨攻打平谷城，战斗1小时许，城内伪职人员多半仓皇逃命。身为伪警察大队长的曹荣久趁势打开了平谷县城北门，迎来了这座古城的第一次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平谷城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很快开展起来。曹荣久积极参加了由原平谷保卫团改编的平谷抗日游击总队，任军需长。8月，敌人出动大

批蒙古军和伪满军从长城以北向平谷蓟县大举进攻，我游击总队在将军关一带防守，被敌打散，平谷城遂被敌人攻破。9月邓宋部队西撤，留下单德贵（后投敌）的三支队在平谷坚持游击斗争。单命曹荣久仍回伪警界任职，为我抗日武装做地下联络工作。曹荣久接受了这一任务，直至抗战胜利前，他先后在南独乐河、夏各庄、胡庄及平谷伪警务一所充任巡官、所员。虽然他“官”越做越小，但一直与我方李子光、刘芝龙、丁作仁、李春秀等同志保持秘密联系，尽力为抗战做好事。

曹荣久先后两次在夏各庄伪警分驻所当巡官，时近两年，与我游击队及地方抗日干部关系密切。他知道我游击队缺乏枪支弹药，当时的伪警手里也无枪支，便利用个人关系到处搜寻子弹，终于集得各种子弹100多发，经过干部王乾同志转交了游击队。一次，曹荣久和姓关的及姓丁的两个伪警骑车到夏各庄刘瑞芝家里串门。刘在外当八路军，这天恰好回到家里。大家正在说话，不料几个鬼子兵沿着曹荣久三人的自行车轱辘印儿跟踪到刘家，闯进院门。在这紧急时刻，曹荣久立刻带两个伪警起身迎了上去和鬼子周旋，他说：“太君的请屋里坐！”“太君的辛苦大大的……”刘的妻子急中生智，忙将刘腰间的盒子枪一把夺过，揣在自己怀里。几个鬼子被曹一伙人“热情”地簇拥到屋的当儿，刘瑞芝溜出了院墙，化险为夷。

1943年秋，我军在甘营一带大挫日寇。敌人气急败坏，抓到了我南山村抗日游击队模范队长刘坤（号文生）同志，关押在夏各庄警备队。敌人对刘坤同志严刑拷打，把他吊起来，用火烧他的胸部和腹部，刘坤同志英勇不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李子光同志立即密信在夏各庄当伪巡官的曹荣久，叫他到望马台村开会。曹荣久按时赴约，接受了营救刘坤同志的任务。他到平谷城里买了酒和点心，送给日寇警备队长和翻译官，经过一番活动，将刘坤同志转到了夏各庄警务分驻所看押，实则保护起来。后又以刘

坤生命垂危，由保长保外就医为名营救了出去。刘坤同志后来成为我二区队大队长，解放后是南山村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他曾多次给青少年讲抗日斗争故事，也给老同志们讲述曹荣久营救他时的情形。

曹荣久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保护过我抗日干部的家属。1943 年 5 月，由我方派遣参加日寇“特别人员训练所”的抗日村干部夏各庄刘子勤、王都庄杜美林（王臣）、望马台于池及杨各庄陈启四同志，按照我方指示，在杨庄户与稻地村之间的路上将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梁某处死，尔后携枪支去了南山游击队，而刘子勤及陈启的家眷还住在夏各庄。丧心病狂的敌人抓去了他们的妻子，押在“一四一八”特务队，扬言要残杀她们为梁某“祭灵”。曹荣久闻讯后，心急如焚。为救刘、陈的家属，他不顾一切地从中周旋，并叫自己的妻子出面，联络翻译官和日本宪兵队长之妻，从中说和，才使她们脱险。1944 年初，敌人将我十四分区联络科长白涛（后叛变）的母亲及妻子从北平抓来，关押在平谷宪兵队做人质，以威逼白涛降敌。曹荣久设法买通了金翻译及监狱看守，趁夜间下大雨将白涛家人救出，从南城根水沟洞逃出敌人魔掌。

1944 年 1 月，曹荣久被敌人调到伪警第一分所当所员，在东高村南边随日寇监督民工挖壕沟。他明里是“监工”，暗中却是民工的保护者。只要见日本鬼子一来，他马上佯装大声呵斥、怒骂，以提醒民工们注意。他对民工们说：“日本人不打勤的，也不打懒的，只打不长眼的。”暗示民工们既要怠工，又不能吃眼前亏。他多次掩护民工们免遭皮肉之苦。一次，因为大旺务村来的民工少，又大都是孩子，鬼子队长火冒三丈，执意要将带队的贾玉活埋。曹荣久苦苦求情也无济于事，贾玉还是被活埋了。为了救人，曹荣久豁出去了，鬼子埋完人前脚刚走，他马上命令民工“赶快扒人！”民工们扒出了贾玉，将他救活。这件事在东高村、大旺务一带广

为流传。

党和人民对曹荣久同志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十四分区地委书记李子光同志没有忘记“曹巡官”，他亲自写了一个条子交给曹荣久，叫他去找当时的县长季宁同志。条子上写道：“季宁同志，曹荣久在抗战中救过我方刘文生同志，请予以安排。——子光。”一张字条，给了这位在旧军警中混了半辈子的老兵多少温暖和慰藉！当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当一些不明真情的人还不理解这位“伪巡官”的时候，曹荣久心里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但是，党和群众是不会委屈他的。季宁同志见到条子后，很快就给曹荣久同志安排了工作。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何其多，乃至“文化大革命”，从没有人来找这位“伪警官”的麻烦。

【作者简介】燕龙生，湖北郧阳人。现任平谷县政协副秘书长。

（平谷县政协供稿）

十渡抗日小学及根据地教育建设

董　华

十渡作为平西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我党领导下，蓄积革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斗争，其间威武壮烈的斗争事迹，已记入史册。但是，关于我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建设，尚缺乏挖掘整理。为此，笔者访问了十渡抗小第一任教师隗和声老人。今依老人所述，整理成文。

十渡抗日小学的建立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开始遭受巨大的民族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国民党中央军望风南逃，土匪顽伪势力应劫而生，大片国土兵连祸结。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生民百姓心存一念，在于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和八路军。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十渡地区开进两支八路军部队，番号“冀西”，一支叫先遣支队，司令部驻在十渡村；一支叫挺进支队，司令部驻在十渡村西三里的西庄。在十渡的这支八路军队伍，还有一个地方工作团，成员大多是投身革命队伍的青年学生，团长名叫王拔。这些热血青年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到处书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到各村成立抗日救国动员会，建立救亡室，组织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荒僻的山村，到处可以看到抗日情绪的增长。在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以后，工作团办起



第一所抗日小学校，校址设在十渡隗和田东屋（后被鬼子“扫荡”烧毁）。开始时，仅十几个学生，工作团成员自任教师。学生来源于贫雇农家庭，所用课桌是八仙桌和炕桌，课本是八路军油印的麻纸课本。

此时，在“房山县高”读过小学五年级的隗和声，正因事变滞留家中。他受到抗日感召，深感不打走日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怀着为抗日救国出力量的愿望，经十渡村抗日救国动员会主任晋尚贵介绍，担任了“十渡抗日小学”第一任正式教师。这年是 1938 年 10 月，他 19 岁。

“十渡抗日小学”，或许就是我区第一所抗日学校，甚或北平地区较早的抗日学校。

抗日民主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尽管在战争年代，我党对教育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从专区到乡村，“教育”是政府工作中民、财、实、教四大部门之一，县有教育科，区有教育助理，村有教育委员会，各校之间又有中心片教师。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除专职干部外，其他部门干部下乡，也都要到学校过问教育工作，一方面帮助学校解决问题，帮不识乐谱的教师教唱新的抗日歌曲，一方面要求学校做好该部门任务的宣传。这样，学校就成为农村抗日宣传阵地，师生成为中心工作的开路先锋。

1939 年春，在西庄村的龙王庙建立了“平西抗日小学分校”。同年秋，房良联合县政府由堂上村迁移到十渡，又在十渡建起“抗日高小”，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和政治教员。由于有这样的领导形式，所以，县区干部下乡回机关汇报工作时，都要把教育工作列为汇报内容。1943 年至 1949 年间，隗和声任十渡片中心教师，他每星期都要集中全片教师，辅导教师进修，传达上级文件，又布置检查各校工作。

抗日师资的培养与提高

抗日民主政府很重视师资的培养。抗战期间，十渡属于我平西根据地 11 分区。据隗和声回忆，自他 1938 年任教到建国前 11 年中，他每年至少一次，多则三次，参加由专区或县政府举办的集训班。集训时间短则三星期，长则一个月。1939 年春，他在涞水县悟空寺参加房涞涿联合办事处举办的“青壮年知识分子训练班”，集训三个星期。办事处主任王维（即县长）亲自给学员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指导理论学习。部队首长给上军事课。同年冬，在十渡的马安村举办的师训班，提出对学生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倡导教学民主。

1942 年，平西根据地经过 1940 年和 1941 年日寇两次残酷“扫荡”之后，敌人又在山外挖下封锁沟，修筑炮楼，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根据地军民。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平西专署，又在宛平县的黄塔村举办了由全专区教师参加的秋季“反法西斯整风大会”。房山二区（张坊片上以里各村）参加者有隗介三、白璧、汤继武、张来新等十余人。他们自带被褥和干粮，由十渡集中，爬山越岭，通过宝水村的最高山硝灰岭，直走 12 个小时，才到宛平的黄塔村。会议期间，一天两顿玉米楂粥，不能吃饱（按人数下粮，吃完为止），伙房烧柴靠学员下课上山去砍，吃菜到数里之外去背。会议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24 字为中心内容，通过个人检查、小组讨论、典型发言、大会辩论等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整风。大会还请来“挺进剧社”的作曲家夏何等几位同志，给学员讲授乐理和怎样编剧、如何导演等文艺知识。为期一个月的大会，使参加者无不感到：生活虽然艰苦，学习十分紧张。通过整风，及时挽救了一部分动摇分子，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也提高了学员的业务能力。抗日民主政府对抗日师资的培养，推动了革命进程。

教育方针、原则及教学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抗日"。1939年邓华司令员率队驻扎十渡，曾将这18个大字书写在十渡龙山上，直至"文革"动乱，才被"造反派"毁掉。那时根据地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只要能为抗日做一点事的，都尽力去做。抗小师生，更是如此。教育工作要求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学习文化与学习抗日本领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做合一。为适应战争需要，不论初小还是高小师生，都遵循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教师对学生的要求是：培养小主人，不要小奴隶，提倡教学民主，官兵一致，官教兵，兵教官，教学相长。以班为单位，建立队委会，设大队长一人，负责班级全面工作，下设学习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社会服务委员，小干部由教师提名，同学举手通过。

课程设置：语文、算术（包括珠算）、军体、文艺。不论什么课，都是抗日内容。如小学第一册语文的第一课："人"；第二课"我是中国人"；第三课"中国人打日本"，第四课"打日本救中国"。三、四年级的语文以应用文为主，如怎样开"通行证"，怎样写慰问信等。算术课初年级是算战利品；高年级珠算学习算减租减息，征收公粮。计算统一累进税等。学生没有正规课文，靠抄老师的样本。教师和高年级同学帮助低年级抄。大部分教材是由教师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内容编写，或从报刊上选摘（当时有《教育阵地月刊》、《挺进日报》、《察哈尔日报》等），还有教师自己编写的顺口溜、快板、小歌剧、旧曲调填新词等，既是文化课本，又是宣传材料。学生爱学爱唱，群众爱听，就起到学习文化教育群众的双重作用。1939年在根据地开展普及文化运动，为了解放妇女，号召青壮年妇女剪发、放足、上识字班，女孩子上学，学校就编写这方面教材。针对个别妇女家长认为女孩上学

没有用，不肯让女孩上学，还偷偷给女孩缠足的现象，隗和声就用民歌“二十四糊涂”的曲调，编写新词教唱：

人家的女儿走路快又稳哪，我走起路来真痛苦哇！妈妈娘儿好糊涂，哎哎哟，我也要放大足呀！ 人家的女儿能写又会算呀，我的两眼黑大糊！妈妈娘儿好糊涂哇，哎哎哟，我也要去念书呀……

为达到普及文化的目的，学生有整日班、半日班，随到随教，还允许带小弟弟妹妹上学。小先生送字到家，巡回教学，形式多样，学生放学后，还利用中午、晚上、星期日时间，去做大量宣传和社会服务工作，组织秧歌队、霸王鞭队、街头活报剧组。此外，轮流义务传送书信和文件（当时没有邮政，一般文件和公私信件，封面上写“沿村转送”，特急的插上鸡毛，就能连续送到收件人手中），站岗放哨查路条。1942 年，日寇经过连续两年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以后，改用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改造懒汉二流子，小学生组成“调头队”，早晨起床号响 起，他们就到各户去检查，发现有睡懒觉的人，就托他的头，催他起床去生产。不听规劝的，就用黑板报、山头广播去批评，对推动大生产运动起到一定作用。

教师工作及生活待遇

抗日民主政府大力开展工作，根据地建设不断巩固发展。伴随根据地建设，教育工作也稳定向前发展。但是，在战争时期，教师的工作是极其艰苦的，生活待遇也十分菲薄。他们由旧知识分子很快向新知识分子转变，其中原因除却有爱国的民族气节，也包含对党忠诚的信念。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避艰苦，服从调动，是根据地教师的特征。

1940 年暑假后，政府调隗和声去六渡建校，当时他才刚 20

岁，缺乏独立生活经验，自己不会做饭，夜里不敢一人睡觉，但接到调令，还是愉快地服从了。不会做饭就求大一些的女同学帮忙，夜里害怕就用桌凳堵住屋门，趁睡不着觉就备课，编写宣传材料。这样终于克服了困难。

1945年日本投降，根据地人民更加看到希望，十渡学校的学生也猛增到80多名。学生多，教员少，四个年级分占两部教室，每天六课时，全是直接讲授时间。因学生搭垒的泥台木板桌凳挤满教室，就根本没有教师座位。口渴了喝凉水。政府忙于解放战争，支援前线，不能增派教师，这四个年级就由隗和声跑教。白天教80余名学生，晚上还到村剧团去当导演、编剧，给演员抄写台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除去教学和社会工作，他还要在星期日召集本片教师开会，会后还给四名老教师（卧龙史凤鸣、马安刘显斌、西河杨万禄、六渡蔡永明）讲算术课，判作业，留作业，给本片其他教师判大楷作业（要求每人每星期写六篇大楷作业）。这种工作状况，隗和声独立支撑了很长时间。

从1938年至1945年，隗和声先后在十渡、西庄、前后石门、平峪、八渡、六渡、西关上等九个村任教。他的学生大的，只比他小四、五岁。他教的学生后来大部分都参军参政和在村里当干部，有的随军南下，至今在外。如十渡村的齐彦广，现已在济南离休，他1985年探家看望隗和声时说："我是受您的影响，走到革命路上来的。上学时您让我当歌咏队长，教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参军后我就一直搞文艺工作。"为革命队伍输送人才，是根据地教师的最大慰藉。

从1939年十渡建立革命政权到建国之前，教师的生活待遇是每月37斤半小米，作为教师的生活包干费。战争年代最困难时期，教师根本见不到肉和油，甚至连食盐都买不到。37斤半小米，饭量大的根本不够吃。隗和声老人讲到一个靳金章，他是部队精简人员，1942年在东村教书，1949年当房山二区教育助理员。到区

报到时，区公所做了3斤米的饭（为全体干部做的），他一顿就给吃光。还有个张来新，在宝儿水村任教，实在吃不饱饭，就向学生要死老鼠，用火烧了吃，1942年黄塔整风，还批评他不顾群众影响，让他写检查。那时没有人喊苦叫累，更谈不上闹待遇问题。根据地教师，追随革命脚步，与我们党协力同心，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作者简介】董华，房山区文化馆干部，《房山报》副刊编辑。

（房山区政协供稿）

抗战教学的片断回忆

吴郁周

敌伪清乡学校遭殃

抗日战争时期，平谷县仅有70多所小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破坏，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平谷县教育事业更加凋零。那时，学校被毁、教师被杀的事屡屡发生，加之战乱和贫困，学生失学辍学者不计其数。在敌人的大“扫荡”中，许多学校遭殃。如1941年6月，东高村小学被敌人包围，抗日干部张祖光同志壮烈牺牲，教师也同时被捕；王辛庄教员陈继昂也在清乡中惨遭日本鬼子杀害。1942年春季南宅小学教员侯元凤，在敌人清乡时，被鬼子用刺刀挑死在街上；城关马神庙小学教员刘印侯，因参加救国会被敌人逮捕杀害……诸多惨剧的发生，使教育界人心惶惶，胆小的教师都不敢上学校了，又加上敌人三天两头的下乡抢粮，学生也不敢到校。在长城沿线的北部山区，敌人制造无人区，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大规模驱赶群众，集家并村，挖壕封锁，断绝山区的通路，进行疯狂“扫荡”和血腥屠杀，学校就更难坚持。

奴化教育失败告终

1943年是抗日最艰苦的年月。日本鬼子为了实现永久霸占中

国的梦想，大肆推行奴化教育。敌人使出了各种手段，但都遭到可耻的失败。例如，夏各庄日本守备队长野吕想把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集中到夏各庄入学，推行奴化教育，将炮楼下几户逃亡在外人家的房子改为教室，强迫各村保长找回各村原有的教师到据点来“集训”，务于当年3月15日前到夏各庄伪警察分驻所报到。结果，只有7名教师在维持会住了两天。一个新民会的“科长”对大家讲了一次话，不外是鼓吹“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然后由“校长”领7位教师去了学校。学校共有300多男女生，均系强迫而来，又多是一二年级的娃娃，由平谷日语学校送来两本日语课本，可教师都不会教，鬼子野吕亲到各教室“督察”过一回，也没办法。又因多数学生没有桌凳，学校逐渐垮台。后来鬼子派维持会把王都庄、贤王庄、张各庄、杨各庄、安固等原来小学桌凳都拉到夏各庄学校，二次通知各村学生上学。可家长都不愿孩子去上这种“学校”，学生也设法躲避，加上鬼子伪军不断讨伐、抢粮，任凭保甲长挨户督促，上学的学生仍是寥寥无几。在这同时，平谷各据点如胡庄、南独乐河、东高村的敌人也都办了类似的“学校”。尽管敌人挖空心思，使尽手段，这些所谓的“学校”都是苟延残喘，有名无实。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根据地不断扩大，敌人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小，他们苦心经营的这些“学校”也就相继垮台。

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平谷推行的奴化教育完全是一场徒劳，而我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解放区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抗日政府集训教师

1944年，平三蓟联合县政府为发展我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举办第一期小学教师训练班，由各区民政助理通知各村教师。6月1日前到太后村集中。尽管当时环境尚未完全好转，敌我斗争仍很



残酷，平谷城南仍有11名教师积极报名参加受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十几名学员由公安队从太后村送到顺义王各庄平三蓟联合县政府的宿营地，教育科长徐进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时的训练班不到30人，顺义三河仍有教师陆续报到。一个星期后正式开了课。学习科目有《新民主主义论》及社会发展史等。每天上午讲课，下午讨论，没有课本，全靠学员记笔记。每天根据敌情，随县政府机关游击行动，沿着白河东岸找村宿营。从6月20日到8月25日，共学习两个月，最后在驻马庄举行结业仪式。结业后，学员各回区里分配工作。全体学员要以组为单位进行鉴定。大家本着对同志关心负责的态度，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徐进科长在学习班毕业总结大会报告中，向全体学员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一要做好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二要组织儿童团，发动儿童配合抗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三要根据季节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成人干校或夜校，办起农民扫盲班或识字班，采取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的办法，大力开展乡村文化教育，彻底粉碎敌伪奴化教育，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群众宣传我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要使学校成为宣传抗日的阵地。

敌情好转小学复课

1944年6月的熊儿寨战斗，使敌人受到严重的打击。之后，平谷各敌据点纷纷撤回城里。被敌人破坏的各村小学，凡有条件的都已复课，多数村成立了儿童团，到处能听到儿童团的抗日歌声。这些在日寇蹂躏下长大的孩子们，渴望学习，向往着光明。他们只要听到谁家住有下乡干部，或是哪条街住伤病员，便一群一群地找上门去，请同志教唱抗日歌曲，教识字。一天晚上，季宁县长住在杨家会，被一群孩子缠住，要求季县长教歌。警卫员因为怕影响县长的工作，往外赶孩子们。季县长知道后，急忙阻拦了警卫员并亲自接待了孩子们。他问孩子们有什么要求，倾听他们

的意见，又找了教育科，仅隔一天教育科就向杨家会派去了教师，办了学。为了尽快发展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凡是由平三蓟联合县政府训练班回来的教师，尽先分配到各山区小学。我就是在那时分配到井峪当教师的。井峪地处山区，是个只有100户人家的穷村，民国24年成立过小学堂，后因没有教育经费，开不了教师的工资，学校被迫停 办。自从抗日战争开始，这里一直是我方根据地，群众对敌斗争坚决，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高。很多在此工作的干部和部队的伤病员，帮助村里建立了炕头组、识字班，民兵里也开展了学习文化的活动，儿童团更是活跃。因此，虽然环境困难，但我开展教育工作的有利条件还是很多的。我决心在这里好好干，为抗战教育事业做出成绩。

支书动员学校开课

我是9月25日到井峪的，天气还不太凉，区里发给我一双鞋、一双袜子和10月份的粮票、菜金，并告诉我，下月发棉衣。当时的工作人员没有工资，享受供给制待遇。我住在老教委孙英家里。次日见了支部书记王英文同志，他看了我的介绍信，表示热烈欢迎。当天晚上，开了支委会，决定在旧校址举行开学典礼。井峪原来的学校在庙门外，有三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屋里熏得漆黑，当时是民兵值班的地方。由于教室太小，我向村支部提出建议，把校址改在大庙里，把佛殿改为教室。因为村里的好房子全被鬼子烧光了，实在没有可做教室的地方。党支部同意了我的意见，当天就动员民兵搬走佛像，又在佛殿里垒一些砖台当桌子，搭上木板当座位，两天后教室就准备好了，10月1日正式开学。可是到校学生人数很少，根据全村学龄儿童统计，还不足20%。我想，群众都盼望着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开学第一天又不到校呢？我用一天的时间走访了十多家群众，知道了其中的原因。一位萧老大娘对我说："我的孩子没做上衣服，可孩子到学校要拜圣人，拜老师，

光着身子怎么行？还是过几天再去吧。”几户学生家长都这么说。当时由于敌人的摧残，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连破旧衣服都穿不上。我亲眼见到很多孩子都是赤身露体，只在腰里围一块破布，已是深秋，有的孩子还是一丝不挂。我找到支书王英文汇报了这个情况。王英文马上通知召开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说：“我们井峪过去开不了学，是因为穷，请不来教师；今天共产党为我们穷人求解放，抗日政府给我们派来了老师，教我们穷孩子读书识字，大伙儿都要积极参加！”经支书的动员，到10月3日小学生增到47名。

儿童念书妇女识字

井峪村有17位外地军属和本村一些十七八岁的姑娘也都要求学文化，于是，村里组织了一个妇女识字班，共有24个人，每天上午学两小时。我当时的课时安排是：早7点至9点幼儿上学，9点至11点妇女识字班上课，下午半天都是小学儿童课程。当时没有课本，完全是自编教材。先学写数目字和自己的名字，然后根据村中对敌斗争和生产活动编写教材。因为是初学，所以尽量找些笔画简便的语句，如：“日本来了，民兵上山”；“小工一天三斤米……”由简入繁，由易到难，再后来就抄写标语口号。学习方法是每人一本练习簿，教师先写出字，教会笔顺后，学生抄在本上回去练习。儿童班有数学课。妇女班有要求晚上学珠算的，我也答应了，不过要在每晚9点作业判完以后，每次学习时间不超40分钟。我记得有一位十二团的家属，同学都叫她白大姐，29岁，还带一个两周岁的娃娃，学习特别积极，上课从不迟到，自己练习也非常用功，成为妇女班最优秀的学员。她原是文盲，经过一年的学习，后来随军走了，仍然坚持自学。[illegible]2年，我收到她写来的一封信，说了很多感激老师的话。她已在秦皇岛市一个工厂当了会计。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在井峪识字班的学习生活。

灵活机动坚持教学

1945 年春季，敌人垂死挣扎。一天，峪口敌人出来抢粮，西边发现敌情，我就领着学生，带着黑板和学习用具，越过北山，选了一块树林平地，挂起黑板来上课。到中午，有民兵报告说敌人仍在杏园一带活动，我们不能回村。午后，村干部领着我们到挂甲峪吃一顿饭，是村里特意为我们安排的。村党支部很关心学校。由于敌人的封锁，学习用品十分困难，村党支部向上级申请，把公家寄存在井峪的文具供学校使用，粉笔、铅笔、作业本都得到解决。儿童团自动组织割绿肥 1000 多斤交给村里，以表示大家心意。这事得到村支部的表扬，还评选了几位模范儿童团员。

这年夏天，井峪村坚壁抗日物资的山洞进了雨水，同学们自觉奋力抢救，把一捆一捆的纸晾在山坡上，晒干后又收管起来，放到没有水的山洞里去。把掉下来的碎纸拣起来订成本子用。有一次，专署一位领导来查看学校自编教材和学生的学习成绩，还找了两个优秀学生谈话。这两个学生都是赤臂光足的儿童，他们的作业本，都是废纸订的。这位领导了解到这些很受感动，赞扬同学们艰苦奋斗的学习精神。季宁县长还在大会上表扬过井峪的学生。1945 年 3 月，我县印出新编的小学课本，发放到全县各小学，我们也得到了油印的国语和数学课本。

（平谷县政协供稿）

流传在永定河畔的歌谣

张玉泉

笔者于1992年冬至1993年春在永定河畔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之余，搜集整理一批至今还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歌谣。这些歌谣反映了永定河畔的劳苦大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切身感受。本文撷取几首日伪统治时期的歌谣，并对其历史背景做一简要的介绍。

1. 七七事变的当年旧历八月十二日，日寇侵占了窑上，国民党地方政权解体，同年十月五日，五间坊村陈东来等人组织地方武装（当地称“老便”）进行抗日活动。1943年春，我地下工作者郝永庆等人深入窑上地区，在青少年中教唱的《探清水词调》，反映了人民痛恨日伪反动派和拯救中华的决心。

民国26年华北起狼烟，
卢沟桥的炮声响连天。
天不怨，地不怨，
只怨“九·一八”这一天。
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
宣统回奉天，
汉奸做了官。
加上无数的苛税与杂捐，
高丽人到处开“白面馆”，
强迫百姓种大烟，

中国要灭亡，我们怎么办？

2. 1943年，日本鬼子妄图把八路军阻挡在山里边。他们四处抓民伕，强迫老百姓去挖壕沟。窑上地区有近千人被赶到周口店地段挖壕。无论年老年少，也无论体弱多病，在工地上除常常受冻挨饿和拳打脚踢外，还遭受酷刑。当时流传的歌谣是：

日本鬼子真糟糕，
为挡八路挖战壕。
挖战壕不要紧，
为啥累弯我的腰？
你挖土，我来挑，
挖出一条毁民壕。

3. 抗日战争时期，苦难深重的永定河畔的人民在苦海中挣扎。他们日夜盼望共产党来到永定河畔，领导他们翻身求解放：

永定河水归大海，
穷人盼望亲人来。
千只绵羊靠头羊，
穷哥们靠着共产党。

4. 1943年春，共产党派来地下工作队，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1944年前后，党先后在这个地区建立党组织，发展一批批党员。这一年，正是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残酷镇压人民的一年。为了巧妙灵活地打击敌人，壮大和发展革命势力，永定河畔的人民在联合县长李景森和六区区委书记张晋龄的领导下，白天坚持生产，黑夜挖地道。下边的歌，反映了他们紧张的战斗生活，歌中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战斗生产，战斗生产，
永定河畔的人民越打越勇敢。
生产，就拿锄头，
战斗，就拿枪杆。

白天在田野生产，
黑夜在地下苦干。
你在村东挖，
我在村西铲。
为了早日接通地道，
你挖我运，
你追我赶。
为了打垮侵略者，
要想少流血，
就要多出汗。

（房山区政协供稿）

国民党军队在房良地区的抗战

张东升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向驻守在北平西南部卢沟桥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队奋起还击，抗日战争爆发了。7月28日到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良乡城与卢沟桥近在咫尺，战端一开，满城震惊。为了援助中国守军抗战，良乡和房山人民自愿聚集抗战物资，派代表送往抗日前线。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未到达卢沟桥。

7月26日，卢沟桥战争虽未结束，但战局已十分清楚。眼见平津攻陷，日军便派出小股部队，沿平汉线向南，作试探性的进攻。头前是坦克车，车后是紧紧尾随的士兵，边走边观察动静，一直进到良乡东关及苏村、梅花庄一带。

卢沟桥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像潮水一样退了下来。良乡、房山平原和山区交界的边缘一带，到处是国民党的败兵。卫立煌部在宛平抓髻山与日军激战后，有一部分沿大房山梁南撤。孙殿英部在东郊和日军接火后，也贴山边撤下来，到了丁家洼、牛口峪一带。驻守北平的29军将士，退至四郊，有的化整为零，化装成老百姓，和日军展开零星战斗，尤以西部的战斗较为激烈。

约8月15日，日军尾随29军吉星文团来到良乡。该团在卢沟桥抗战中十分英勇，退到郊区后，仍坚持抵抗。8月17日夜，从琉璃河方向悄悄过来数十名国民党官兵，来到良乡城下，城内日

军防守松懈，只有个别站岗的士兵在城头站岗。这几十官兵从良乡城东南角摸上城，杀死敌哨兵，又冲进敌营，用大砍刀杀死日军几十人。第二日，日军在良乡城内疯狂报复，杀死无辜百姓十数人。

8月20日，日寇从良乡出发，经阎村、吴庄、南坊、北坊，直扑坨里，一举占领高线大楼。当时，地里庄稼还是一片碧绿，不少正在吐穗扬苞。日寇怕在庄稼地里有埋伏，一路上，用坦克车在前边开道，车后用长绳系上粗大的木头，先将两侧未成熟的庄稼拉倒。遇有坑坑洼洼，就用青秆庄稼垫道。公路两侧大片庄稼被轧毁成一片烂泥。

这时，从南边开来了前来增援的孙连仲的26路军。26路军共三个师，沿大石河布成一条松散的防线。当时，汛期刚过，大石河水流湍急。26路军扼守大石河，八十亩地、南观一带布防的是池峰城的31师。沿大石河布防的，除了孙连仲的26路军外，还有不愿撤退的29军部分官兵。这些国民党军队的中下级官兵，怀着誓死报国的决心，黑夜越过河去袭击日军。驻守饶乐府的一个团，组织起一支敢死队，叫“登峰队”，每人四颗手榴弹，一把盒子枪，一把大砍刀，深夜过河去开古庄“摸”日本兵，回来按人耳朵和马耳朵计数。一天黑夜，“登峰队”又去“摸”开古庄的日军，先是把日军包围，紧接着，日军增援部队从外边又把他们包围，双方互射，死伤数百人。

由于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始终不敢轻进。8月21日，日军在开古庄土坡上炮轰房山城，城内百姓大部逃亡。日军炮弹将监狱大门炸开，犯人乘乱逃走。即便这样，日军也没有越过大石河。从8月19日至9月15日，国民党军队在大石河防线和日军相持20余日。最后，日军用飞机轰炸中国守军阵地，并用坦克掩护士兵进攻。中国军队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开始全线溃退。坚守在南观、八十亩地一带的池峰城部牺牲逾千。许多将士

在敌机狂轰滥炸下仍坚守不退，直到血染疆场。在瓜地坚守的一个团，撤退时留下一个班作掩护，最后和日军拚了刺刀，杀死日军十几人，这个班战士也全部阵亡。羊耳峪北大梁凤凰山一带，日军十数架飞机轮番投弹，致使中国军队伤亡累累，日军也有不少伤亡。撤到定府辛庄的是29军一个连，9月14日进入该村。当夜，全村百姓帮助挖战壕，送弹药，配合这一连人打退日军三次进攻。该连配有一门平射炮，曾一炮摧毁日军一辆坦克。后来在日军轰炸下，全连官兵全部殉难。另外，在其他地方，中国军队也有不少伤亡。如在丁家洼筒八坡，连长和机枪手都牺牲了……至此，中国军队在大石河西南岸的防线崩溃了。9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房山县城。9月16日，日军侵占房山城。同日琉璃河也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房山县城后，仍继续尾追中国军队的败兵，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又有不少中国士兵在败逃中丧生。

国民党军队在房、良地区的抗战，是卢沟桥抗战的继续，同样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蓄谋已久，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而国民党方面只是仓促应战。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虽然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但并没有抵抗日寇的决心和准备，甚至有部分高级将领置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许多将士浴血奋战，但终因无指挥无接济而失败。然而，国民党军队一些爱国将士高度的爱国热情，喋血疆场的勇毅精神，以及奋勇抗战的英雄行为，同样应载入史册，流传千古。

【作者简介】张东升，房山区委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房山区政协供稿）

纸糊的北平城 铁打的赵家台

陈 雷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向我卢沟桥侵犯。7月29日，日本侵略者踏进了北平城，我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日本侵略者踏进北平城后，随即又向平郊农村进犯。9月2日日本侵略者进犯门头沟的赵家台村。当地的游击队和群众英勇抵抗竟日，打退了敌人7日7夜的炮火猛攻，大长了平西游击队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从此留下两句歌谣："纸糊的北平城，铁打的赵家台。"

赵家台村今属门头沟区的潭柘寺乡，在著名古刹潭柘寺西约15里处。1937年以前全村只有9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这个村村里村外的山坡上，树木葱茏，风景秀丽，村民善良纯朴。村四周的山坡梯田遍布着各种果树。旧社会村民都经营果树，耕种山坡梯田。村附近中蕴藏着丰富的叶蜡石，村中有个手工操做的石笔厂，所以村民只要肯于劳动，就不愁温饱。

村子偏僻，村民较殷实，因此，在旧社会经常遭到土匪的骚扰抢掠。村民为了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石笔厂的生产，在1937年前由村中孙天纯等人主持购置了枪支，建立了自卫团。当时共凑集和购置汉阳造、套筒等步枪22支和一些土枪土炮。

1937年日本到门头沟的前夕，石门营警察分所人员把本所的

枪支埋藏后逃走，该所李凤仪逃到赵家台村，告知村里埋枪地址，村中自卫团到石门营把枪刨走，有步枪10余支，带回村中。

日本来前村中挖好有各户互通的地道，并直通村外。8月底日本侵略军30多人、汉奸（原土匪）百余人，向距该村8里许通往山区的峰口庵进犯。当时山区原九区吕清海的自卫团早已守卫在峰口庵，赵家台自卫团也派出部分团员到峰口庵守卫，进犯的敌人被击退。次日敌人又由潭柘寺方向向白岩沟直奔赵家台来了。敌人在村外打死监视敌人的岗哨村民孙玉峰，尸首被自卫团抢回村。村民见到尸首激起了报仇的怒火，一致表示：国仇家恨誓死要报。敌人向村内进攻，村中自卫团大部分经过地道出村守住了村外的制高点南山梁。9月2日开始，敌人集中大批的日军和土匪刘桂堂的汉奸队1300多人，包围了村子的东西北三面。日军占领了村外的东山梁，用6门小炮，3挺轻机枪，土匪除步枪外还有6挺轻机枪，向村中射击。白天敌人有3架飞机在空中用机枪扫射。村中自卫团除占据南山梁制高点外，村民用土枪土炮和敌人交锋，抵抗了敌人7日7夜的攻打后，因众寡悬殊，弹药用尽，孤战无援，全村村民扶老携幼由地道退出，到南山梁集中由自卫团掩护，经过房山等县逃往河北省的保定等处。

敌人以伤亡300多人的代价攻占村子后，进行了报复性的残酷烧杀，打死村中不能逃出的老病残等4人，伤16人，村中705间房被烧毁。

“铁打的赵家台”，是抗日战争史中光辉的一页。

【作者简介】陈雷，门头沟区图书馆退休职工，门头沟区政协文史办公室撰稿员。

（门头沟区政协供稿）

联庄自卫守采育

史柳坡

大兴县采育是平南有名的大镇。为了联防自卫，早在1929年附近53村就联合起来，成立了保卫团，也叫联庄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采育人民，把保卫团改成抗日民团，有团员3000多人，每人都有红袖标，上书“联庄自卫”四个字。团员都有武器，既有长矛、大刀，也有火枪、大抬杆和各种杂牌枪。他们平时务农，遇有土匪打家劫舍时，就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他们还与八路军冀中第五军分区司令部取得联系，得到大力支持，司令员朱占魁曾派人指导工作。

民团总部设在长子营的良善坡大寺里，总指挥是梁希奇，北山东营人，小学教员，能说会写，有号召力，也有组织才干；副总指挥是梁希庆，河津营人，负责组织训练。各村设团佐1至3人，负责本村具体工作。他们人熟地熟，可以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尤其是利用青纱帐，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有一次，伪警察局长带领警察特务几十人，到凤河营收缴枪支，那里的民团事先埋伏在半路上，一顿排枪击毙伪局长，其他人望风而逃。还有一次，驻扎在通县马驹桥的日伪军出来讨伐，还没进村，就被民团打跑了，还缴获了一匹枣红马，成了梁总指挥的坐骑。

民团的势力越发展越大，威震四方，成了日伪军的眼中钉。

1938年，伪大兴县政府下令收缴民间枪械，民团抗令不交。梁希奇说："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如果我们把枪交了，赤手空拳，就没有战斗力了，敌人来打我们，只能俯首贴耳；如果不交，他们就会以此定罪，来收拾我们。所以，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

为了防范敌人，民团破坏了从青云店通往采育的公路，在小王场村南，把公路拦腰截断，挖了一条3米多宽、2米多深的大沟，阻断了一切车辆的通行，并在附近埋伏了民团战士，昼夜监视着敌人的动向。

敌人果然出动了。1939年3月22日，驻在南苑的100多名日伪军全副武装分乘五辆汽车，气势汹汹地经过青云店，向采育方向开来。汽车开到小王场村南的深沟前边，再也开不过去了。有的日军跳下车，有的伪军想进村抓些农民把沟填平。就在他们慌乱中，埋伏的民团一阵枪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有的趴在车厢里，有的胡乱打枪，汽车调转车头，向东北方向的车固营逃去。还没进村，就被那里的民团打坏了一辆。民团趁敌人下车时，又打死了十几个敌人，剩下的连人带车一溜烟地逃回南苑去了。

民团战士围上那辆被打坏的汽车，一顿斧劈锤砸后，架上柴禾，倒上汽油，连同那些敌人的死尸一起点燃，熊熊大火解了大家的心头之恨。

战斗中有两名民团战士英勇牺牲。

在欢庆胜利的大会上，总指挥梁希奇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我们打胜的原因是人心齐，事先有防备，但我们的武器落后，枪支少，打仗也没经验。如果预料到敌人开车来，我们挖几个陷阱，让他们人仰车翻，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副总指挥梁希庆提醒大家："狗急了会跳墙的。敌人吃了败仗，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会来报复我们的，一定要做好迎接更大战斗的准备。"

时隔两个月，到了5月26日那天，敌人果然反扑了。日军的长谷川旅几百人荷枪实弹，分乘十几辆汽车，还架着小炮，从南

苑到了青云店，然后分四路围攻采育。其中主力从东辛屯奔大小回城，沿凤河两岸向东推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各村民团的奋力抵抗，敌人连连受挫。他们仗着武器好，弹药充足，先以小炮试探火力；进村后，不管有无抵抗，都是机枪扫射，在此掩护下，部队缓慢地向前推进。民团分散作战，流动出击，避开主力部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日本兵进了霍州营，团民梁凤奎隐藏在半截土墙后面，用枪瞄准敌人，等日本兵走近后，扣动板机，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吓得后面的敌人赶紧卧倒，他却趁势躲避到另一处了。沁水营的团民张义全，百发百中，从不放空枪。有个日本兵已经发现了他，刚要举枪向他瞄准，他愤恨地骂了一句："去你的吧！"一枪正打在那个日本兵的前额上。日本兵向后一仰，就再没有起来。留民营有 4 棵大抬杆，枪管有两米长，能装几公斤火药和犁铧片子，响声像打雷，能炸一片，杀伤力很大，适于近战。那时候，村子周围都有深沟高壕坡，开几个栅栏门。日本兵从村南凤河过来，接近村壕口时，大抬杆一放，炸得敌人浑身是伤，鬼哭狼嚎，当场就撂倒了几个，日本兵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新式武器，赶紧退回去了。靳七营村西头有个高土坡，凤河就从坡前折向南流。在土坡上，民团架上大抬杆和火枪，由民团团佐郭瑞林、蒋克宽、蒋克题指挥着 30 多个团民坚守阵地。宋文奎肩背褡裢，往来穿梭，运送弹药。敌人几次冲锋，损失惨重，都没有占领这个高坡。后来 敌人采用背后包抄的办法，团民才果断地撤离了。日军进到潞城营村口时，先往壕围子里边扔了一颗手雷，正巧落在一个团民脚跟前，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艺儿，拾起这个铁疙瘩就扔到壕围子外边，没等落地，手雷就在空中爆炸了。日军还以为这是民团的武器呢，吓得没敢进村。

1940 年，指挥采育下路民团抗日的主要是凤河营的阎墨缘。有一次，敌人占领大皮营后，分南、中、北三路进攻凤河营。阎墨缘得到消息，立即组织并掩护老百姓沿凤河河槽从西向东撤离。

凤河南岸是村庄，北岸有个高土岗，日军攻占了高土岗后，架上机枪，向下扫射老百姓。阎墨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掩护群众，他奋不顾身，从南岸滚下河坡，又爬上北岸，拔出手枪，瞄准敌人的机枪射手，正准备射击时，不料，被敌人发现，身中数弹而阵亡。民团战士闻此噩耗，个个义愤填膺，奋勇杀敌，要为团长报仇。最后，敌人虽然攻占了凤河营，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光死尸就拉了三辆汽车。

敌人最终虽然占领了采育镇，但民团给予日军的打击是沉重的，民团战士是不会屈服的。

（大兴县政协供稿）

游击十一团团长阎墨缘

史柳坡

阎墨缘，字维翰，1901年生于地主家庭，大兴县凤河营人。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抗日战争爆发，他组织自卫团。1939年，被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任命为游击十一团团长、游击第三路总指挥。1940年5月15日与日寇激战中阵亡，时年39岁。

弃教从戎　初战告捷

阎墨缘毕业于黄村京兆二中，曾到安次县桐柏村教书二年，后参加直鲁联军任文牍教官，在河南信阳驻防。一年后又回乡办学，任凤河营阎氏私立完全小学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1932年3月日本侵略者公然建立伪满洲国，民族危亡日益严重。阎墨缘常与教师议论国事，每每拍案而叹曰："国土沦丧，救亡者谁?"又说："国破则家亡，奇耻大辱，人所不堪。"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炮轰卢沟桥，相继占领团河，攻陷南苑。他义愤填膺，喟然长叹，告诫学生："刻骨铭记，矢志救亡。"并多次表示："我阎某誓死不当亡国奴!"他在报上看到19路军在上海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消息，便拍手称快。不久他在采育结识了29军一位连长，听这位连长详细讲述了爱国官兵在喜峰口与日寇厮杀的战斗经过，他为之感奋，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华民族

图存有望，真乃英雄豪杰也！”

他在亲朋邻里和师生中，广泛宣传抗战救国大义，并结合我国历代朝政之兴衰，大讲反抗异族侵略的光荣传统，歌颂岳飞、文天祥、洪秀全等民族英雄，怒斥汉奸卖国贼，号召家乡人民团结自立，惩罚倭寇。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为了抗日，保卫家乡，他弃教从戎，奔走呼号，组织建立了自卫团，大家选他为团长。自卫团购置了枪支，挖壕修围，盖更楼，昼夜值勤，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此后，凤河营一带各村几乎都相继建立了自卫性的武装组织，但人力分散，枪支很少，各村之间也缺乏联系。为了集中力量，便于联合作战，他又联络从凤河营到采育的20几个村子，组成了联庄会，各村一致公推阎墨缘为联庄会长。联庄为总队，大村为一中队，小村为一小队，阎墨缘为总队长。

1938年日寇在各大城镇安营扎寨，修筑碉堡、据点，并逐渐向广大农村发展，同时组织和训练伪军、伪警察和特务分子。到了秋天，日伪军到采育一带收缴各村农民自卫武器。先由伪警察局警特人员，从采育出发，到凤河营一带收缴农民自卫武器。

阎墨缘闻讯后，召集总队、中队和小队队长商议，决定统一指挥，互相接应，共同抗敌。他命令凤河营以北六村自卫团为北路集结于半壁店，到采育正东施家坟堵截。安次县的大马房和小马房的自卫团为南路集结于沙窝营，防堵南窜之敌。其余各队为中路，集结于大皮营，准备正面迎敌。

当伪警察局长带领部分警特人员刚接近沙窝营时，就被掩蔽在沙岗子后面的自卫团发现，在队长田子真指挥下，一阵排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伪警察局长中弹落马丧命。日伪军闻风丧胆，北路和中路也乘势追击，敌人狼狈不堪，抱头鼠窜，溃退而逃。

打出旗号 公开抗日

这场阻击战，打得漂亮，大快人心。但阎墨缘考虑到：日伪军决不甘心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的。现在虽有人有枪，但素无训练，就连自己也缺乏战斗经验，一旦大股敌人来进犯，就很不好应付，应当尽快寻求抗日的正规部队的帮助。当时，他早已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看中的对象了，就在沙窝营之战以后不久，经阎家一位亲戚介绍，一位名叫王魁伯的到了他家。在便饭之后王魁伯兴奋地谈到：永定河畔，大清河南北，都有八路军联合民众，共同抗日。还说陕北有个延安，共产党中央在那里指挥全国抗战。并谈到要抗日，必须联合起来，孤军奋战，难免吃亏。阎墨缘听了，顿开茅塞，极为振奋。二人说得情投意合，阎墨缘当即请求王魁伯给自己引线搭桥，自己愿意接受八路军领导，并表示："我投身抗战，即使倾家荡产，也誓死不悔。"

不久，王魁伯带领阎墨缘到永清县司家巷子会见了一位名叫司玉科的八路军联络员，并由司玉科带他到八路军驻地，让阎墨缘亲自观看八路军训练情况，同时还学唱了《叫老乡》歌。

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对阎墨缘也很重视，亲自派他的秘书李裕如与阎墨缘联系。后来，阎墨缘又派秦凤来等几个人在永清县河西营会见朱占魁。因为阎墨缘有领导能力，在地方威信很高，又积极要求抗日，第五军分区就把他树为一面旗帜，并任命阎墨缘为游击十一团团长，后又任命为游击第三路总指挥。

游击十一团以阎墨缘为团长，萧化南为参谋长，孙耕野为特派员，三人组成团部。李裕如从军分区给阎团长带来刘延杰和李德海两名警卫人员。团部就设在阎墨缘家里，他们共商军事，训练部队，研究战略战术，同时还经常编写油印小报，印发传单，宣传抗日，在凤河两岸影响越来越大。

奋勇杀敌 誓死不屈

1940年春，驻南苑日军派汉奸到采育活动，以访友为名，用高官厚禄等手段，企图分化瓦解十一团，后被团部识破。因阎缺乏对敌斗争经验，未采取果断措施，被汉奸到南苑和通州向日军告密。

3月22日，驻南苑日军进犯采育，遭到采育抗日民团的伏击，溃逃了。

5月10日，日军长谷川旅从南苑和通州乘汽车集结于青云店，沿凤河进攻采育，受到抗日民团阻击，以惨重的代价占领了采育。

第二天拂晓，日伪军沿凤河进攻凤河营，由于叛徒投敌，大皮营的自卫团不战自退，致使日军长驱直入。7时，日军先头部队打到康营。阎墨缘正在家吃早饭，听到报告后，立即布防，并率兵来到凤河营西口，准备伏击敌人。狡猾的日伪军分南、北、中三路蜂拥而至，西口激战后，阎墨缘见寡不敌众，沿壕向南，在西南角打了一阵后，又折向东，准备与村东南三里的沙窝店的游击十二团取得联系。到了村东口，见老百姓男女老幼正沿村北凤河由西向东跑，凤河北岸的吴山子沙岗上日寇架着机枪，正向村中疯狂地扫射着。

为掩护群众撤退，阎墨缘带着身边警卫刘延杰和李德海等几个人进了村东口，以凤河南岸的一座庙宇为掩体，与敌寇对射起来。但几支长短枪怎么也压不住机枪。阎墨缘走出庙门，猫腰沿北河坡向上爬，准备出其不意击毙敌机枪射手。不料被日军发现了，机枪掉转枪口，直向他射来。他身负重伤，仍扣动扳机，向前爬行了几步，高呼“打倒日本鬼子！”他身中数弹，满腔热血洒在凤河的土地上。

日伪军把他的头割下来，带到南苑悬首示众，放火烧了阎墨

缘的房屋，还悬赏缉拿他的妻儿。阎妻长期逃亡在外，儿子在1939年参加了八路军。

阎墨缘英勇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气节，至今家乡人民引以为荣，人民永远怀念他。

（大兴县政协供稿）

我所知道的“黄村车站事件”

李树德

我叫李树德，今年83岁，是大兴县芦城乡西芦城村人。从7岁到12岁上，先后在东芦城、黄村镇念了6年私塾。之后，在家务农。

七七事变前，为保卫村里乡亲们的安全，一村三五条枪凑在一块，也给我挂了个团长的名。事变时各村又凑了点枪，伪县长又让各村按50亩地买一棵枪，凑了上百棵枪。当时比咱条件好的全走了，大伙推荐我和东街赵殿臣管这码事。赵任团长，我任团副。等下了委任状后，赵提出不会使枪，我俩又换个过儿。团部设在西芦城，安了电话，上下联络也方便。还常设岗卡，定有联络信号。

1940年5月下旬的一天，宛平县庞各庄三区伪保卫团长刘锡汉和卫兵王振德，在黄村车站格杀3名日军。事后，日军寻衅报复，我被黄村日军伍长沙山率人殴打，险些被打死。这件事儿使我身心遭到极大的伤害，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黄村车站事件

“黄村车站事件”发生的当天，当事人之一赵凤来（字仪廷，伪宛平县第三区自卫团区团长）乘乱逃出黄村车站。傍黑天他钻进车站西边儿的庄稼地里，一直奔西北跑到东芦城东南的小孙庄

子南口。在村口放哨的团丁孙廷瑞发现有人，举枪喊“口令！”赵凤来赶紧说：“别误会，我是赵仪廷！”孙廷瑞有时随我到庞各庄总团部开会，认识赵仪廷。这时赵仪廷惊魂未定，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孙廷瑞告诉他，这是小孙庄子，是十五分团的防地。赵仪廷一听忙说：“十五分团不是李树德的团长吗？你赶快把我给送到他家去。”于是孙廷瑞又找人把赵仪廷送到我家。

据赵仪廷讲，黄村车站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天，驻黄村车站的日军小伍长沙山，通知赵仪廷到车站开会，不许带人带枪。但赵却带上了分团长刘锡汉、卫兵王振德及郭凤祥、康凤祥。走之前，刘锡汉几次往裤袋里掖小手枪，都被赵仪廷劝止了。几个人都没带枪。

赵仪廷、刘锡汉等5人来到日军驻地后，就被拦在一进门的卫兵室外，蹲在门侧。赵仪廷有50多岁，年龄较大，有点儿谢顶。这时，有一日本兵手拿一把印有“红膏药”的小白折扇，来来回回地敲打赵仪廷的秃脑门儿，嬉弄耍笑。刘锡汉等看在眼里，怒在心头，脸色大变。赵仪廷怕出乱子，一个劲儿地使眼色，示意刘锡汉等沉住气，不要乱动。刘锡汉联想到自己曾为八路军筹集抗战物资，日军可能已经察觉到自己“私通八路”，心想与其束手被擒，不如先下手为强。说时迟，那时快，刘锡汉心一横，一个箭步闯进日军卫兵室，一伸手摘下墙上的“三八”枪，一拔枪栓，正好有顶门子，哗啦一声子弹又上了膛。日军一见刘锡汉闯进卫兵室，一下子慌了神儿，蜂拥而上，想夺回刘锡汉手中的三八枪。刘锡汉把枪一顺，眨眼间枪声大作，先击毙了那手拿纸扇的日本兵。刘锡汉拉开枪栓，啪的一声，弹壳弹出来，这才发现枪里只有一颗子弹。这时冲上来两个日本兵，一个拚命同刘夺枪，另一个被王振德绊倒扭打在一起。刘锡汉瞥见墙上挂着刺刀，顺势扔掉枪，从墙上拔出一把刺刀，双手一托，把那夺枪的日本兵捅了个透心凉；他拔出刀来，一转身，又劈了与王振德厮打的日本兵

的头。这时又一伙日本兵冲进卫兵室。刘锡汉、王振德寡不敌众，终于被日本兵擒获。刘锡汉、王振德被日本兵用铅丝背剪双手，穿透锁骨，惨遭毒打狗咬，遍体鳞伤，随后押往南苑伪大兴监狱。后来听说在押往南苑的途中，刘、王二人咬断了自己的舌头，没给敌人留下一字口供。

当赵仪廷说完整个事件的过程时，我们家里的把饭也给他做得了，让他吃完饭再说。赵仪廷心急火燎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吃饭！我哪儿吃得下去呀！你赶快想办法把我送到县里去。"那时候伪宛平县政府在长辛店，离我们这儿还小 30 里地呢。赵仪廷一口饭没吃，只喝了几口水，便急着要走。我也担心日本兵发觉，便趁着黑夜派两个人把赵仪廷护送到长辛店伪宛平县政府。后来听说他见到了伪县长韩贵全（韩与日军驻丰台镇宪兵队长在日本时是同学），把事件发生过程又叙述一遍。韩贵全听完后说："这事不应该啊，怎么出这事儿呢？"赵仪廷说："这事儿已经发生了，您看我怎么办好？"韩贵全对赵仪廷说："这事儿先由我顶着，您老先黑（隐藏）起来，别露面。要一露面让日本人抓到了，可就不好办了。"后来伪宛平县第三区自卫团区团长就换了新人。

出事的第二天，我没在家，赶着马车进城到菜市口卖菜去了。傍晚间，就看见那些卖报的举着报纸高喊："瞧报来，瞧报！宛平县第三区自卫团大队长枪杀日本皇军 3 名！"我一听，这事儿我知道哇！这事闹大了，日本鬼子绝不能善罢甘休哇！

凶吉难卜的庞各庄会议

黄村车站格杀日军事件过后，大约是第三天，伪宛平县政府给第三区各自卫分团下了份通知。通知大意说，该分团长发生不良事故，各分团不要乱动，要注意保存实力。我们自卫团家里吃、家里住，白天抽空干点活儿，晚上还要守护村子。这让我们保存实力，村里就没法呆了。那时候我们村西边儿有三道大沟，过了

沟不远就是永定河大堤，旁边有个小村叫三间房。那附近四面是树丛、草地、大苇塘，一眼望不到边儿。于是我把自卫团拉到这儿，躲了好几天。这样，时间长了也不是个办法，吃喝不好解决，人心也不稳哪！这时候区里又召集开了个会，说区团长赵仪廷跑了，换新人了。这事儿虽然说还没完，大家也不要怕，别散。究竟这事怎么了结，大家心里谁也没有底。

大约一个星期后，驻南苑镇的日军涩古部队通知，要我们伪宛平县第三区所属自卫团16个分团团长，到庞各庄去开会。通知还说不许带枪，不许带卫兵。我接着通知，心想，看这样子要把我们一网打尽哪！凶多吉少，不可不防。

日本军驻防南苑镇的是涩古部队，驻防丰台镇的是田岛部队。涩古部队管辖着大兴、宛平县地界，听说廊坊地界也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涩古通知开会，不去不行，去了再说。这天早晌儿我穿着军装，骑着车，顺平开路就奔南下去了。刚走到天宫院南边儿，就看见4辆军用卡车开过去了，上面坐着好几十个日本兵。我看见涩古坐在汽车楼子（驾驶室）里，上边架着机枪、小炮。我一看这来者不善，心想先到总团跟大伙儿合计一下怎么应付。

我们总团部设在庞各庄西庙内。我到那儿一看，各分团长都到了。谁都知道这会不是好会，谁也不敢不来。这时候新接任区团长的贾秀山回来了。他告诉大伙儿，涩古带来的4辆卡车停在庞各庄街里路西的钱粮行九成宫门前，门外边用麻袋堆成的掩体，架着机枪；门里边设了一个临时卫兵室，院里、房子上都有日本兵把守着，戒备森严。涩古一下车就问，人是不是都到齐了。贾秀山回答说："人还没到齐，我再去看看。"赶快跑回来给大伙儿报信，商量对策。贾秀山说让大伙儿出个主意，他也没好办法。都这地步了，谁也没什么好法子呀。这会儿庞各庄镇长崔永平一直陪大伙坐着，说各位团长有什么事儿要准备的，他随时去办。后来我接茬说："今儿个这会与往常可不一样。杀了3个日本人，他

们可不会善罢甘休，咱们得往坏里打算。这区团长跑了，通知开会不让带枪，我看这事完不了。依我说，他不让带枪，我们也要把枪带上，以防万一。让崔镇长给咱们一人准备一身大褂儿，枪盘在腰带上，也露不出来。一旦要出事儿，就豁出去跟小日本拚了。”也有人担心，涩古通知说不让带枪，你要带枪，他要是一翻脸，咱们全完了，区里边儿的自卫团也保不住。西大营分团长贾子芬说：“这人怎么死不是死呀，要死得英雄。像人家（刘锡汉、王振德）一样。大丈夫为国捐躯，死了认了。”天宫院的分团长郭凤岭说：“咱们就按李树德说的准备，都把枪掖上。一人一身大褂儿，带上一条子弹就得。到这会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各位也别介意。真的要动起手来，咱们这些人得分分工。我手头儿不行（打不准），就管打屋里的吧。打起来，我先把涩古撂了。”贾子芬说：“树德，你手头儿准，这房上的可都归你了。我打门口的卫兵，我包了。咱们干完了得冲出去呀。”就这么着合计好了，我们这 16 个人就奔九成宫开会去了。

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怕什么呢？怕我们这 16 个人到了门口，卫兵检查。这身上可都掖着枪哪！没想到卫兵没查，我们顺顺当当地进去了。等我们进了九成宫客厅，往四外一看，日本兵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客厅内气氛很紧张，那真是一触即发。我们沉住气，谁也不说话。我心想反正今儿个是豁出去了！出乎意料地是，涩古没发火。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这是个误会，“谁也破坏不了中日亲善”，“为着大东亚战争还要合作”，什么“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等等讲了一通儿。这时他又提起刘、王二位，说他们被弄到南苑，在路上就嚼断了舌头。这件事与你们没关系，你们不要这么做，也不要多想。我听他这么一说，劲儿不大，今儿个打不起来了。这会儿最担心的是哪位兄弟枪露出来、走了火，那漏子就大了。正说着，伪县长韩贵全带宛平县宪兵队长等 3 人赶到会场，又说合了一会儿，涩古就坐车走了。等日本人走了，伪

县长韩贵全又“训导”大家，以后办事要慎重，别看日本人嘴里说“中日亲善”，这事完不了，以后可千万别再捅漏子了。那天总算没出事。

沙山恼羞成怒，寻衅报复

黄村车站3名日本士兵被杀一事，在北平城内外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宛平、大兴县地区，老百姓到处都在传说。这真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驻守黄村车站的小伍长沙山，受到上司的严厉训斥，恼羞成怒，窝着一肚子火。

6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应邀带人去康庄子康成明家喝喜酒。这时，传来总团命令，说东南土匪出动了，各分团要加强防范。我立即在村东南去黄村的老道口放卡设防，告诉东芦城伪自卫团副团长秦培成，不管是谁，口令不对就开枪。谁知道日本伍长沙山趁黑夜带人来了。这边喊口令，答不上来就开枪了。沙山等退回去了。没想到沙山又二次带人，从村北狼堡道口进了村。我在村北庙那儿也设了卡子，发现有人，派一班张广荣去看看。我随后也跟过去，刚好碰上沙山迎着我走过来。沙山说："团长，辛苦了！"我就陪着沙山一伙儿在村里转。来到我的分团部，我请沙山到屋里休息一下，沙山不去，却对我说："你的，跟我东边去地干活，那边地说话。"我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走就走呗。来到东芦城赵万增家东边，沙山站住了，对我说："你的手枪拿来，我的看看。"我那时挎的是一支二把盒子枪，摘下来就给沙山看。沙山哪是看枪啊，随手就把枪交给了身边儿的日本兵。我一看就急了，跟沙山要枪。沙山不给。这时又往东走到了街中间儿，就听见沙山对日本兵叽哩咕噜地说了些什么，日本话，我也听不懂。沙山突然转过身来，伸手揪住我肩上的枪背带，想摔倒我，没成；又抡起胳臂给我一个大嘴巴，没想到我个儿高，他这巴掌打在我肩膀上。沙山见两下子没治了我，又抬脚用皮鞋踹我，边踹边“八

嘎、八嘎”地骂。我一下子这火儿就上来了，你太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啦！我见沙山还不松手，就一伸腿，右手拢住他的上身，一使劲，一个背挎就把他摞出去1丈多远。沙山趴在地上半天没起来。我站那儿也没动窝儿，枪还在日本兵手里哪！这会儿沙山从地上爬起来，又叽哩哇啦地一通日本话，只见那30多个日本兵，把我围在当间儿，一齐把枪托调过来砸我。我赤手空拳，左冲右闯，也没冲出去。枪托像雨点儿般地砸在我的头上、身上，渐渐地我连招架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栽在地上，人事不知地昏死过去。那伙强盗们把我的手枪扔下，扬长而去。

日本兵走了以后，自卫团的弟兄们找了一块门板把我搭回家。我们家的人以为我被打死了，围着我哭。第二天天亮，派人到南苑接来赵志元大夫。赵志元家是河北南宫一带的，曾任29军武术教官。他一看我的伤势，直皱眉头，伤太重。他先给我洗伤口，又上好药。这时我一直人事不知，还昏睡着。赵大夫让家里人给我喂药，挺过今儿个去，明儿个就有救。第二天他又来了，对着我耳朵说：“树德，我来了，你知道不知道？”他掰开我眼皮看，我说不出话来，模模糊糊觉着有个人影，也不知道是谁。赵大夫说，还得吃药，好好养着。第三天，我就醒过来了。赵大夫来了，问我认得不。我说认得，是赵老师。他说，好，我收你个徒弟吧，我保你命，死不了。后来听家里人说，那几天我尽说胡话，喊着要枪，“我的手枪哪去了？”“给我枪！”我家里人把子弹退出来，把手枪放在我手上，我才平静下来。

在我被日本兵打趴炕之后的两三天，不知是从黄村车站还是南苑来的日本兵，来到东芦城，把秦德修弄到村公所打个半死，还灌凉水，抬回家几天就死了。

我在家养伤，一直躺了4个月。日本兵把我打伤的消息也惊动了县里边。这期间，自卫团区团长也几次来家看我，告诉我：“这事儿县长知道啦。县长说，李树德的命要想办法保住，花多少

钱都不要紧，钱归他付。”在大夫和家里人的精心照看下，我的伤势才慢慢地好起来。

在我伤好了以后，一天，丰台日本宪兵队长和伪宛平县长，请我到日本宪兵司令部。见到司令官，司令官说：“不行的（指沙山）。”说着拿起电话，叫沙山马上到。也就十几分钟工夫，沙山就到了。一见面沙山就向我敬礼，还给我点了一棵烟，然后司令骂了他一通儿，又叫别人打了他一顿嘴巴，才叫他走啦。我心说，别糊弄我，这纯粹是“刘备摔孩子，笼络人心”。

后来我通过关系，离开了家乡，来到河北省束鹿县混伪事，也算是走者为上吧！

回想往事，我出于乡情、义气，抱着“好汉护三村”的信条，当了自卫团。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还给他们做事儿，真是有失人格，丧失了民族气节。日本人宣传“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华北乃华北人民之华北”，“宛平乃宛平人民之宛平”，鼓吹“自治”，建立傀儡政权。说什么“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亲善、中日提携”。谁跟谁亲善？实质上他们是侵略中国，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我惨遭日本兵的毒打凌辱，险些丧命，饱尝了“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辛酸，这亡国奴的滋味儿可不好受啊！

【作者简介】 李树德，生于1910年，北京市大兴县芦城乡西芦城人。七七事变前当村自卫团团长。1940年9月到河北省束鹿县当伪警察，后提为一等警官。1943年任伪宛平县后辛庄乡自卫团团长。1946年任国民党宛平县榆垡镇镇长兼自卫团团长。1948年10月在庞各庄战斗中，被我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俘虏，经审查后发盘缠费回乡至今。

张春燕、李丙鑫整理

（大兴县政协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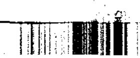
黄村车站事件中的刘锡汉

刘伟光

我父亲刘锡汉系大兴县（当时属宛平县三区）定福庄村人，生于1918年农历九月九日。毕业于北京中华中学。高中毕业之际正是日军占领了北平及华北大部时期，他受乡亲们推举担任了宛平县第三区自卫团队长，驻地即为现在的大兴县庞各庄镇，人和枪200有余。父亲公开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实际从事给解放区冀中11军分区（司令员是原七机部部长刘秉彦）运送补给和枪支弹药的工作。经他组织运送的枪，上百支的就有三批，还运送过军需品多次，大部分都是经由夏赞廷（冀中11军分区参事，已故）等人联系完成的。据夏赞廷及我母亲讲，为了配合打击日军，我父亲最少有三次同11军分区联络员一起到分区驻地开会研究抗日工作；夜间在定福庄我家房顶上联络研究问题的次数也不少。父亲经常带部分队伍去野外练兵，那是他的亲信。每次他都给大家讲抗日救国的形势，要求大家练好本领，报效国家，以待时机，杀尽日本侵略军。

1940年5月发生的黄村车站事件，据说，终因寡不敌众，我父重伤被捕，咬断舌头，被送往丰台，活活烧死——“点了天灯”。同时被抓的王振德也被处死。

事件发生在1940年5月25日（或26日），第二天，日军汽车数辆、数百人包抄定福庄我家。因我全家20余口早已闻讯转移



至野外，日军未抓到人。以后连续三天到处搜捕我和我母亲，悬赏数目很大。我和母亲一直在野外躲藏了十几日，后辗转来到北平市内，才免遭杀害。

据我所知，这件事的真正起因是：被我父亲追杀过的土匪们向日本鬼子告发说，我父亲实际是给八路军11军分区干事的。土匪们是了解一些实情的。日本人听信土匪的告发，认为我父亲确是他们的敌人。事发那天，日本人已经动手打了人（赵仪廷），我父亲等便抢过日本人的枪，向在场的日本鬼子扫射，当场杀死日军3人（据说其中1人为军官）。父亲知道，如果自己"私通八路"的身份暴露，那是必死无疑，所以先下手为强，杀他几个日本鬼子，何尝不是英雄本色！父亲等的行动壮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小日本的威风！据夏赞廷讲，事件发生后，《冀中导报》（解放区报纸）立刻作了长篇报道，称他二人为"抗日英雄"。夏赞廷到解放区（11军分区）看到了描写此事的剧本，真人真事，连人物名字都没改。他说，他坐在刘秉彦司令员旁边看了这个话剧的演出，司令员称，这个剧对解放区军民产生了很大鼓舞。

（本文据刘伟光先生致大兴县政协文史办的信改写）

（大兴县政协供稿）

密云人民反抗日寇斗争片断

杨春青

1933年4月，日寇侵占了密云县城。密云人民不堪屈辱，奋起反抗。下面记述我亲见的几件事。

痛打日军哨兵

日本侵略军占领密云县城后，在各城门布有岗哨，哨兵手持三八大盖步枪，枪口上装一把明亮的刺刀。中国人进出城门，开始是随便鞠个躬就能过去，以后姿势要求越来越严，必须面对鬼子兵，站在三步以内，脱帽鞠九十度躬，稍有怠慢，轻者拳打脚踢，用枪托子砸；重者用刺刀刺伤或挑死。东西南三门都发生过日军刺死过往行人的惨案。

密云县城南一带，如宁村、提辖庄、河南寨等村是武术之乡，人们喜欢习练刀枪棍棒，又有武术教师胡本恒的教练，各村都成立了少林会。就在南门日本哨兵打人最凶的日子里，一天上午9时左右，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戴了一顶旧草帽走到日本哨兵前，点点头就要进城。日本哨兵像往常一样，提起枪托照这小伙子打去。小伙子一蹲身，一个扫蹚腿，哨兵便像一个草捆倒在地上，正要挣扎着爬起时，小伙子突然用碗大的河光石砸在哨兵后心上，哨兵应声倒地。等驻南门里火神庙的日本警卫班发觉时，小伙子早已无影无踪了。到日本投降后，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宁村人。

在南门砸了鬼子哨兵后的第三天，东门又发生了打日本哨兵的事件。正午时分，来了一名30岁左右的人，也是戴一顶旧草帽，一身蓝布裤褂，左手提一个破旧的荆条篮子，篮子里一个旧铁盒，还用破旧的毛巾盖着。他走近日军哨兵时，立刻摘下帽子鞠躬，正准备走时，日本岗哨用左手提着提篮，问："这是什么？"答："治庄稼虫子的。""我的看看！"哨兵一边说，一边往前凑，这个小伙子很沉着地把篮子放在地上，从篮里端出一个长形旧铁盒，日本哨兵睁大眼睛要看是什么的时候，小伙子猛一抬手，把铁盒里的沙子和土扬在鬼子脸上。哨兵的眼睛被沙子迷住，正在揉眼时，小伙子手疾眼快，把枪夺在手中，用枪托子狠狠击鬼子的头部，哨兵倒在地下。进城的老百姓无不心中暗暗称快。等东门岗班发觉时，小伙子早已蹿到不足百米的高粱地里，无影无踪了。

这两件事发生后，日本兵在各门都变成双岗，不准过往行人接近岗哨，如遇可疑情况，一名日军检查，一名作好射击准备。

摔跤场上

密云县原县衙西有一块场地，场地旁是一条过人街道。经常有几十名鬼子在场地上练习摔跤。鬼子轮班摔跤，摔得满身泥土。有的摔跤比较熟练的就自觉了不起，看见过路的中国人就要比试。所以不会摔跤的中国人都躲着这块场地走，若躲不及，被鬼子拉住，只有让鬼子摔倒或摔伤，群众对此十分气愤。

一天，从场地边的路上走来一个中国大汉，身高一米八，膀阔腰圆，四方大脸，络腮胡子，光头。他住密云娘娘庙附近，自幼习武，力气过人，拳脚利索，擅长摔跤，名字叫刘永和。他刚走到鬼子的摔跤场旁，有个摔跤术最好的鬼子兵走过来对刘说："你的试试看。"说着就两手用力抓住刘的双臂，刘永和若无其事，轻轻把两臂向上一翻，很轻巧地把鬼子两个上臂给抓住，两手一使劲，鬼子慌忙往回缩手，连连说："你的大大的，我的小小的，

我的不行。”刘见鬼子兵连连告饶，把两手慢慢松开，笑了笑，转身向南走了。从此，鬼子兵摔跤练习，不再和中国人比试，中国人可以顺利通过摔跤场旁的道路了。

“有花姑娘”

日军进县城以前，密云城的人就知道日本兵野兽一般，经常是见妇女就强奸，因而年轻妇女大多领着孩子逃到城外的山村去投亲靠友了。

日军进县城以后，经常向在街上走路的男人要“花姑娘”。一天中午，一个小矮子士兵歪戴着帽子，身穿旧草绿军服，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把刺刀，在西街由东向西走。迎面碰见本城一名30来岁的男子。日本兵拦住问：“你的花姑娘的有？”这人向他身后一指，说：“那边的有。”当鬼子兵转头向后方看时，这人趁势向他左脸狠狠打去，把他打得向右后方退了好几步，等他站稳，这人已经朝胡同向南跑去。日本兵拔出刺刀就追，还不停地骂：“八格牙鲁！”

一张国耻地图

我家曾保存过一张民国初年印制的《中华国耻地图》，宽1.2米，高0.8米。此图记载了自清代以来，清朝到民国年间中国与外国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侯、割地赔款的数字等。这张地图贴在我家北房西间的阁扇上，用于教育家人永远不忘国耻。

中国军队驻密云县城时，住在我家的是东北军107师的所属部队，一位长官指着国耻地图对我父亲说：“如果全国人民都不忘国耻，我们的国家就有前途了。”古北口长城抗战失败后，该部队撤到怀柔县。

几天后，日本军队的一个白胡子军官住在我家，他胸前挂着一双金链子，放在右上兜里。听翻译（高丽国人）金子胜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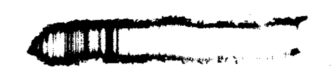
有 70 多岁了，是联队长，军衔是大佐。这个老鬼子看见这张《中华国耻地图》，立刻瞪起双眼，向我吼道："小孩！这图，你家的？"我一看，才知道家里大人逃难到城外山村，忘了带这张地图。我那年 15 岁，和一位 70 岁的亲戚在家看门。我猛然想到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承认是自家的，我和这名亲戚都会被杀掉，只好推说是前些时候，中国军队在我家居住时挂的，临走时没有摘走。我怕他们回来找这张图，所以没有摘下来。这个老鬼子说："这个图，中国不能有！"说着，他用手杖将这张图划掉在地上，他手下的人上去几把就将国耻地图撕碎了。

地图虽然被撕碎了，地图的内容还清楚地记在中国人的心里。

【作者简介】杨春青，退休教师，曾任密云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

王敬魁整理

（密云县政协供稿）



投奔八路军

赵润东

1944年，正是日伪在平郊残酷统治时期，以张德祥为团长的伪保安团盘据于房山县城。这是一股十分猖獗的反革命地方武装，其中不少人是汉奸、特务、地痞流氓和恶霸地主。他们把镇压的重点地区放在房山西南一带。白天出来骚扰百姓，抓丁抓伕，强迫各村送粮送款，稍有怠慢，不是骂就是打，夜晚撤回驻地饮酒作乐。伪团部长期派遣探子和情报人员化装成普通老百姓混入游击区，窥探我政府工作人员和八路军的行踪，发现情况，就倾巢出动，分几路包抄、绑架、拷打、枪杀、活埋我革命干部。

1944年秋后的一天，房山伪保安团六中队由队长马德福带领，从房山城内出发，沿山路向西南进发，搜查我政府工作人员和八路军的行踪。一路上气势汹汹，先来到石门村，又转向长沟镇来到四分所。其时已到中午，马德福等人饥肠辘辘，于是命令伪甲长让南良各庄做饭招待。当地百姓深受伪保安团之害，谁也不愿做饭，所以就故意拖延时间，与敌人周旋。马德福一看早过了正午，连送饭人的影子也不见，他气得眼一瞪，手一挥，带着队伍就要走。村干部见马德福真的动了肝火，恐怕百姓遭殃，连拉带扯地让他们留下，并在长沟四分所安排了午饭。这些人走了几十里路，又饿又累，饥不择食，见了酒饭，不管三七二十一，围上去就狼吞虎咽往嘴里填。一阵“扫荡”之后，伪军都醉了，有

的东倒西歪，成了一堆烂泥，有的强撑身子骂骂咧咧，吵闹不休。

早有弃暗投明愿望的伪保安团的排长孔宪臣、士兵赵凯、号兵孔宪福、商景玉等人见时机已到，带上武器开始行动，刚要离去，有人出来阻拦。孔宪臣手疾眼快，端起机枪就要扫射，屋内立刻鸦雀无声，伪保安团员个个吓得呆若木鸡，谁也不敢动弹。孔宪臣朝 3 个同伴说了声："走！"赵凯趁势抄起孔的手枪，连衣服都没穿就朝外走去。当其他人清醒过来以后，孔宪臣等 4 人早已走到村北的一处坟地里。队长马德福得知情况气得浑身发颤，独身去追。他追上 4 人便大声斥喝，企图阻止住 4 人前往。

这时，赵凯举起手枪对准马德福大声喝道："别动！你动我就毙了你！你的手枪呢？"耀武扬威的马德福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魂飞丧胆，一动不敢动。赵凯一步跨上去，下了马德福的二把匣子。然后喝道："听着，背过身去，向前走 10 步！"此时的马德福威风扫地，乖乖地转过身向前走去。

赵凯、孔宪臣等 4 人乘机带着 2 支手枪、3 支大枪、4 颗手榴弹及几百发子弹朝平西抗日根据地奔去。

过了一段时间，马德福又气急败坏地带着队伍追赶上来。当他们追到西甘池村东时，赵凯等趴在对面的小山坡上，朝着追上来的伪军"叭—叭—叭"就是 3 枪。听到枪声，伪军乱作一团，有的抱头鼠窜，有的趴在地上不敢动弹，马德福吓得心惊肉跳，连路都走不动了。伪军不敢再追了。

孔宪臣、赵凯等人来到根据地，见了领导头一句话就说："我们是投奔八路军的，还带来了枪支子弹。"平西抗日根据地第七区区长马剑书和政委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讲了许多抗日的道理，欢迎他们留下来参加革命队伍。后来，他们被接到当时的县政府圣水峪村（上方山），受到热情款待。为了给他们接风，组织上派人专门给他们宰了只羊，做了顿丰盛的饭菜。当他们看到根据地的同志吃的是青谷米饭，喝的是清水汤，生

活十分艰苦时，心情十分激动。快到中午时，县政府的领导又来看望他们，再次征求意见。他们看到根据地的生活艰苦，又提出愿意回家。领导尊重他们的意愿，还派专人将他们送到天开村才分手。

（房山区政协供稿）

战斗在日寇虎口下的反战同盟

关续文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平西部石景山地区的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铁厂（今首都钢铁公司）沦入敌手。日军要奴役华人，掠夺我国矿铁资源，就必须在该地区建立起一个“绥靖”环境，既要防止抗日军民的反抗，又要防止日本人中间反战进步势力的成长。于是便在石景山地带建立起36村的爱护会，实行保甲联防制度。同时，派驻了国光部队（后为中岛部队）、日人警察署、景门（石景山、门头沟）地区宪兵队、伪宛平县警察分署与警察队；在石景山制铁所内设置保安系、取缔系与西大楼便衣队等，总计多达千人以上。日寇对石景山地区实行了野蛮的法西斯统治，这引起了日本人当中一些尚有良知与正义感的人们的不满。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头目们，对于这些胸怀正义的人们丝毫也不放过。为了防止他们倒戈，除日本警察署、宪兵队对日本人严加管理外，日本驻华使馆也秘密派出驻庞村大庙的工作队，对日本军、警、宪、特及生产工员进行双重再监视。此外，还在石景山地带设立“靖国神社”、“日本留民会”、“国防妇女会”以及修建“忠魂塔”纪念死亡日人等，进行一系列的精神麻醉与组织上的管理统治。更有甚者，还设立俱乐部及随军娼妓，对日军官兵进行“慰安”。但是，日寇侵华的暴戾势力并没有把正义善良的人们吓倒。在石景山地带出现了日本人的“反战同盟”组织，他们身居虎穴，却无

所畏惧。笔者曾两次为首钢撰写《厂史》与《党史》。在采访过程中，不时听到在日寇极端恐怖的统治下，日本职员中的反战活动，或是对华人所受的迫害寄予同情心的事例。由于是秘密活动，至今鲜为人知。

华人营救日人甲裴

1943年秋，中国的抗日战场，已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日寇在石景山制铁所对华人的奴役与掠夺，也从鼎盛走向下坡。此际，日本职员远离国土与亲人，思乡之情日甚一日；同时在战争中屡受挫败而反战心理与日俱增。就在这一背景下，在石景山金顶街日人独身寮里，发生了一件令人翘指的事情。

劳务系有个日人职员甲裴，大个儿，华语说得还好，为人处事寡言和善，不仅不打骂华工，还多方周济他们。华工们亲切称他“大骆驼”。他则多方面接近华人，寻找知音。

1942年工头王德山因赌博输掉了自属的30多人工资跑掉了。人们无奈推举了李士杰为头目。在困境中，他们得到了甲裴在派活、记工与配粮等多方面的帮助，并且从外包工转为募集工，享受到里工、住宿、工资与配粮等较好的待遇。为了报答甲裴，李士杰特地为他到市里定作特号鞋子。俟后，李、甲二人思想感情相投，成为吃喝不分，无话不说的知己朋友。

一天，甲裴与李士杰在北辛安饭馆吃过饭后，回到金顶街日人独身寮，天南海北地闲谈起来。当甲裴谈到其原籍的国民生活困难时脸色阴沉，似乎在心底里压着一个数斤重的铅球。沉默片刻，他将房门掩好，又看看窗外无人，便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李的，我只对你说，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是错误的那！最终总要垮台，你们中国人还是太君！我们里边人有的迫害华人凶恶，有的人善良。我们有一位日人长官，反正后参加了八路军，组织了‘反战同盟’，他的名字叫冈野尽。我参加了这个同盟，还证明的

给!”说着甲裴打开木柜里的一只手提箱，拿出一张《反战同盟盟员证书》给李看。

李士杰一看，此件约有32开本书的大小，上有铅印表格，日文字以及书写着甲裴的名字，不禁伸出拇指赞道:“你有政治卓见，良心也大大好！可是一个人的力量太孤单了!”甲裴继续说:“我们制铁所内就有十多人。”

“你跟我说不要紧，我会给你绝对保密，但是千万别向别人说了。”李士杰严肃地叮嘱说。

时隔不久，甲裴在宣传反正、发展反战盟员中暴露了身份，日军当局发出了逮捕甲裴的通令。石景山制铁所的东西门，增加了军、警、宪、特人数，加强警卫与搜查。甲裴所住的独身寮房间与工作的劳务系办公桌也被抄了。

在石景山麓土木系办公室，华人测量工崔振林听到日人川成同系内其他日人低语道:“你知道甲裴吗?他是反战同盟盟员，现在宪兵队、警察署在全石景山戒严逮捕他哪!”

这天晚上，崔振林回到他住的那间临时工棚里。入夜，秋风萧瑟，寒意难眠，忽然有人敲门，他起来开门一看，原来是他熟悉的白振东叔叔。

白振东说:“振林，中国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日本人中也有好人和坏人。我带来的一个叫甲裴的，就是日本人中的好人。现在日本宪兵、警察署与取缔系正在逮他。在你这儿躲一天我就带走!”

崔振林想起白天川成说的话，心中知底，急忙回答说:“行!行!”白旋即将甲裴引进屋来，藏在这间工棚内。

白振东临走时又叮嘱说:“白天，你千万把门锁好，给他两个窝头，弄点水喝就行了。”

军警宪特在石景山梳头发似地一遍又一遍搜查。几次，他们的咔咔走路的皮鞋声从崔振林的门前踏过，把他紧张得不知所措。

但是他们连想都没想到，甲裴竟藏在这难避风雨的工棚内。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白振东又来到崔振林家，对小崔说："振林，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把甲裴带走！"又对甲裴说："我已安排好人了，带你过河到解放区去！"崔振林把白振东和甲裴送出门，只见夜幕中还有两个人接应他们，那两人影带着甲裴穿过山下村，蹚过永定河水，向山里走去。

白振东，1925年在天津裕元纺纱厂同傅茂公（即彭真同志）搞工运，结为盟兄弟，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因工运暴露了身份，同王长林同志一起（至于王长林活动笔者后面再表）来到石景山制铁所从事工运。崔振林现年64岁，在石景山区委工作，已离休，自幼家贫，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结识了在中国大陆银行工作的党一民（中共地下党员）。党一民设法救济他并且介绍他在东四宣抚短期小学读书，介绍他每天到一家饭铺吃饭，替他付饭钱。小崔在上课之暇，经常给一位女级任教师即班主任秘密地用铅笔盒传递情报，成了我党的一名小通讯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陆银行停业，学校也停课了。党一民把崔振林和他的父亲崔广禄介绍到石景山龙烟炼铁厂做工。1941年崔氏父子在石景山炼铁厂东邻北辛安镇的天福楼吃饭，巧遇白振东。白观察多时，然后问："你们父子贵姓？"答：姓崔。又问："你们在此吃饭，那魔王的魔字一刀劈成两半儿可知道吗？"崔广禄按党一民指示的暗语答："麻鬼！"白说："你认识党一民吗？""怎么不认识，他是我家的大恩人呀！"白兴冲冲地说："我可找到你们了！"此后，崔振林给白振东在飞岛组找到了木工的工作，一起从事工运活动。

这是一段插话。再说白振东送走甲裴，约过数日，同崔振林提起此事说："甲裴是反战同盟盟员，他策应我党在劳务系为我们抗日活动做了不少工作。"白还说："我们对日寇的斗争并不孤立，在炼铁系等处还有日本人同情我们！"

“两院汉”为华人抱打不平

在炼铁系的镐车房，有一个名叫田间的日人工员。他身材魁梧，会些武功。他对华工举止和善；对欺压华人的日人却嫉恶如仇。他愿意同中国工人交朋友，送给他们一些衣物，自己却穿得很破。一天，他同镐车房的华人何文等人说：“你别看日军张牙舞爪，今后你们还是太君。”他还说：“我钱的大大有，你们缺钱花可以拿去！”

一天，何文问：“制铁系长打了苦力，你的对系长三宾（耳光）给，他是你的上级不怕？”

田间答：“我的不怕。在日本国内人家给我起了个绰号叫‘两院汉’，意思是说，我好打抱不平。不是进法院，就是被打伤住进医院。”说着，解开衣襟，露出胸膛让何看。何文看了还真是满身疤痕。

没过几天，田间听到铁道系系长老本田打了中国人。他气冲冲地找到老本田问：“你为什么打华人！”

“他磨洋、磨洋的不干活！”

“你要教育他嘛！”田间分辩说。

老本田身为系长，年老持重，颇有资格，对他的话不屑一顾，说：“你管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我系的工作不需你管！”

“我非要管不可！”那田间早已义愤填膺，上手就打。老本田招架不住就跑。

田间边追边骂：“你系长算个屁，我田间有天皇赐给的黄马褂儿。”只把本田从小西门追到山下村，最后，老本田跑不动了，才停了下来，承认了错误，方罢。

还有一次，田间发现在邻厂久保田铁工所（今首钢铸造厂）一日人打了中国人，他也追去揍他一顿。

中国人见田间如此热心保护华工，推想他是反战同盟盟员，至

少也是具有正义感的人。

佐藤捣毁“爱护会”

在石景山东麓的滨湖村，住着一个大个儿、连毛胡子的日本宪兵曹长，他的名字叫佐藤。

一天，佐藤要修缮住所，制铁所劳务系派去“民生土建公司”的负责人王长林领着几名工人来到其住所干活。修缮房屋之余，王长林结识了佐藤。王长林于1926年在天津同彭真同志一起搞工运，因暴露了身份而来石景山制铁所，以组建“民生土建公司”负责人为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见佐藤身为景门地区宪兵队驻石景山办公室头目，却是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便策划接近他。经过做工作两人竟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1943年的初秋，石景山制铁所扩建已全面展开，包工柜的席窝棚拥挤不堪且嘈杂脏乱，卫生条件坏到了极点，终于酿成了一场“虎疫”。据《石景山制铁所月报》载：逃亡人数有5600人之多，影响了制铁所扩建进度。日使馆因战争需要急索钢铁，对此极为不满。王长林分析了这种形势，一天来到了佐藤家中，对佐藤说：“最近我有难言之苦啊。我的‘民生土建公司’苦力的少了。从外地招来，石景山地带‘爱护会’敲诈勒索，说这个的是八路军，那个的是中央军，他们的‘元宝队’为要贿赂横生枝节。一批批苦力都跑了！我快成了光杆工头，皇军的战争索铁也困难的哪！”

“真有此事？”

“谁会骗你！”

佐藤听后，思忖许久，然后穿上制服，并用电话唤来两位宪兵后对王长林说：“走，我们到爱护会去！”

到了北辛安“爱护会”，破门而入。只见屋内酒气灼人，一些爪牙正在那里赌博。

佐藤见此，气愤已极，高声斥责道："你们会长哪里去了？什么的胡作非为，通通地开路！"

话落，让两个宪兵拳打脚踢，工作人员吓得屁滚尿流，抱着头一个个地溜走了。霎那间，桌柜掀翻，档案撒落一地。门外，挂着的"石景山工业地带爱护会"的牌子也被砸毁在地。

"爱护会"被摧毁后，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便大胆地进入了这个地区。

时隔不久，王长林又来到佐藤家中，说："我要到农村去招募工人，但是沿途军、警、宪、特等盘查，很难把壮年苦力招来，可否借两个宪兵袖章？数日定还！"

佐藤听了不假思索地说："你的拿去！用后还回就行了。"

这天深夜，我党派来的两名地工人员，戴着王长林借来的两个袖章，化装成日本宪兵，来到西郊飞机场，混入机场后，躲过看守警卫，点燃了两架飞机，然后扬长而去。

大三浦袒护我地下情报员

日本人大三浦，曾任景门地区宪兵大佐。1944 年退役后，来到石景山久保田铁工所宣抚系任系长。该系的中国人，有石景山地区新民会教官卢文连（参加过抗日活动）派入的肖印才（住石景山区麻峪村），还有张义厚、张守才。大三浦领导宣抚系，只到琅山作过一次"麦收已过，应到制铁所上班"的讲话，却接连不断地到河西属于解放区的村子如栗园庄、上安、桥户营、曹各庄去。并且同村长说："你们有事情找我联系，办公需要笔墨纸张可找我要。"此外，还有防卫队队员日人木田，也到过外 13 村作过此种交往。

1945 年春，家住石景山黑石头村的李才（今该村居委会主任）在门头沟走窑，结识了焦若愚同志领导下的昌宛县八区教育科王科长。王科长与大三浦交往甚密，便给李才开了介绍信，要

他直接找大三浦安排工作。大三浦就把他安排在宣抚系工作。李才被我党派入宣抚系后，每月至少有三天到门头沟香儿密李老太太家送情报，汇报敌人配署、武器、番号与战斗力等。情况紧张时每天一次。

未逾月，取缔系的华人队长马振峰得到情报说，李才是受八路军的派遣来搜集情报的，决定逮捕他。马振峰率领四名取缔系特务，来到久保田铁工所的宣抚系捕李才。我党地下关系肖印才接待说："李才是我系的工作人员，哪里是八路军情报员。"马振峰碰了壁，只好离去。

第二天中午，马振峰等趁中午李才在贾家饭铺吃饭的机会，捕到他。经搜身，发现身上带着一张边区吃派饭的票证（票面粮12两及菜金），特务们见此如获至宝，说："这小子是八路军的探子证实无疑。"便把李捆绑到取缔系去了。此事惊动了肖印才。他急忙报告给大三浦，说："李才被取缔系逮走了，说他是八路军情报员！"

大三浦听后，暴跳如雷，说："什么是八路军？那是我的人！"便带人到南厂取缔系去向日籍负责人洛关要人，洛关不给，大三浦举手打了洛关一记耳光，然后隔着窗户对禁闭着的李才安慰说："你的不怕！"然后气冲冲地出了门，到石景山腰找中岛部队的队长去了。

洛关见事不妙，便让马振峰押着李到中岛部队请赏表功。当他们押着五花大绑的李才推推搡搡来到了石景山登山道上时，迎面遇到了中岛与大三浦。

中岛问："逮捕的是什么人，给我放了！"

马振峰说："不能放，他是八路军情报员。"

"你什么的瞎说，他是大三浦工作人员！"说着，从腰间掏出了手枪补充说："不放，枪毙的给！"

取缔系这伙人，碰了一鼻子灰，在大三浦面前竟无计可施，只

好将李才就地释放。

李才获释，来到西山斋堂的桑峪村，将被捕的事汇报给昌宛县教育科的李科长。组织上研究后，让他回到大三浦那里继续工作。组织上考虑，大三浦这回给抗过去了，以后，特务们便不再敢找他的茬了。就这样，李才在大三浦处作情报工作一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

山川携枪赴解放区投诚

1945 年春，日寇在东亚战场上屡败，日人反战同盟领导人冈野尽不断传书，或将宣传品送到石景山地区，作日人工作，希图反正。

久保田铁工所华人警备队长杜文敏（我地下关系）接到中共石景山区工委书记杜广信同志转来的反战同盟的劝降书后，借夜间巡逻警卫的工作之便，将其粘贴在所长木川正男的家门上，内容是：

日本民众：

大日本帝国侵华极其错误，并且给日中两国人民带来苦痛。凡有良知的日人，应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奋起反正。

冈野尽

1945 年 6 月×日

次日清晨，木川看到后，以为八路军已潜入自家门前，不觉毛发悚然。

以上之举在石景山地区产生了强烈震慑。日人警卫员山川，具有进步思想，中国话也说得满好。他看了《劝降书》后，便在华人工员中寻找知己。得知杜文敏与我党有联系，便请他给我八区游击队长傅长江写了介绍信，准备投奔我解放区。他携带四支步枪，一支手枪，由李守奉（华人警备员，我党地下关系）星夜兼

程送到三家店，然后交给傅长江派来的交通员。他们绕过敌人的碉堡、路卡，到达解放区。事后，李守奉与其父母皆因此被敌人处死。

1945年8月14日夜11时，石景山地区所有日人守在收音机旁，听着日本天皇发布的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他们听后潸然泪下。唯有日人山下泰然自若，并与妻子交谈彻夜。次日山下夫妇背着孩子奔走卢沟桥瞻仰宛平城垣，然后投奔我平西游击队去了。他的爱人回了日本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人在北平市城内看到了山下，他高兴地说已改了中国名字，并有相当不错的工作。

（石景山区政协供稿）

香山难民收容所见闻

闻翠华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的枪声在卢沟桥打响之后，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在北平西直门通往香山的公路上轰隆隆地驶过；翅膀画着太阳旗的飞机低空掠着；一队端着上有刺刀的三八步枪的日本士兵，也开进了香山脚下。他们疯狂地残害无辜百姓，我的叔辈庆爹就是躲难在碧云寺山坡，被日本士兵打死的。还有零星衣冠不整的日本士兵窜入小巷民宅寻找“花姑娘”。这一切使香山附近的村民们惊恐万状，携儿带女地逃进了熊希龄先生在香山慈幼院创办的临时难民收容所。

我家住在峰峪村，母亲携着我的姐姐、弟弟和年仅8岁的我，一家四口逃进了慈幼院难民收容所。当时的学校因时局动荡已经停办，我们便住进了腾空的教室。教室内铺着草席，我们带些被单、衣物栖身。第二天妈妈领我们打饭吃，看见十多个教室都住满了难民，就连南侧的操场也住满了人。估量总有千余人。

难民所准备了很稠的小米粥，有时是大米粥，一日两餐，每顿还发上一块咸菜，得以温饱。

我们进入难民所的第二天夜里，枪声骤起，响得格外厉害。听说是我们的29军在伏击日军后向山上撤退。山下的日军猝不及防盲目还击，子弹的呼啸声从难民收容所的上空掠过，照明弹此起彼落，探照灯的光柱也在天际交织摆动。难民们初次见到这些都

很惊奇。我们姐妹兄弟三人紧紧偎在妈妈的怀里；有的难民想逃出去另辟安全之所，难民所出现混乱。就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教室门开了。一位身穿黑色制服，胖脸、微须，慈眉善目的老人，在两名校警的护卫下，手持灯笼，出现在难民面前。人们低语着："熊希龄院长来看咱们了！"

熊院长以慈祥的目光注视着室内受难的人们，以祥婉自若的语气说："老乡们，父老们，大妈们，兄弟姐妹们，外面战事吃紧，我郑重嘱咐你们在这里千千万万不要乱，更不要向外乱跑。各人要在各人的地方。"他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斩钉截铁地说下去："乡亲们！不要怕，只要有我熊希龄在，一定保住你们的安全。日本兵即使闯进来，我可以同他们交涉。待时局安定些，我会通知你们出去！"说完熊先生从我们的房间走出去，又到旁的房间安慰难民去了。

熊先生的一席话，壮大了我们母女四人的胆子，看看周旁的人也安定下来。他们低声地交谈着："熊先生说得对呀！倘若乱闯出去，非造成伤亡不可。"有的人还竖起大拇指称赞说："他真是个好人！"

我们就这样在避难所里整整呆了半个多月。当外面时局平定之后，才安全返回家中。听说，熊先生那次把香山难民安排好后，又取道上海，从事救亡工作去了。

【作者简介】闻翠华，原首钢医院助产士，已退休。

关续文整理

（石景山区政协供稿）

伶仃瘦骨却铮铮

王凤梧

马先生，名士信，房山县（区）饶乐府村人。识者为敬其人，不呼名而称其字：诚之。私下，有人为其取绰号“瘦马”。先生本来单薄，又常年长袍广袖，则愈衬其瘦。先生在房山很受人尊重。

据我粗知，先生先饱读诗书，而后毕业于“卢沟桥师范”，新知、旧学皆颇丰厚。

马氏大族，贫富颇殊，先生属于贫者。先生常把读书喻为“寒窗”、“冷板凳”，颇有讥富尊贫之意。

先生曾为（七七事变前数年）房山县一区区董（即区长），后为教育科督学。日寇占领华北，弃官为民。村人尊其品学，聘为饶乐府村小学校教师。薪俸微薄（也因物价频涨），订为月薪谷粱6斗（每斗12斤），即每天2斤多高粱或谷子。

先生尊奉陶渊明，尤其称颂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他自己却安于“六斗谷粱”的薪俸。

国民党南逃，其《复兴课本》被日伪政权废除；而日本军国主义奴化中国人的“课本”尚未编成，我们饶乐府村小学的这40多名学子，便读起了五经四书。40多名学生参差不齐，高者读《论语》，低者读《百家姓》、《三字经》。先生虽不无封建思想，却不迷信。大概是崇尚“唯有读书高”甚至“读书救国”思想所致，他对《三字经》中的“负薪”、“挂角”、“囊萤”、“映雪”的故事

津津乐道；大概也像尊崇陶渊明一样的尊崇范仲淹，对范公的“画粥”读书的安贫精神尤为敬仰。

先生教五经四书，却无“私塾”冬烘夫子的作风。先生博学，又常即兴讲到自己爱好处，常常不知日之将落。

有一同学好睡，常常在课上伏桌而鼾。先生执籐鞭疾趋，猛击其头，命我们打开《论语》找到某章，范读：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听似已经心灰，如再睡，先生则再斥、再打、再叹。先生说：“这叫‘诲人不倦’。”

饶乐府村虽小，却多读书人。科举制时，有举人一，秀才数人；学堂制时，中学生、师范生更不乏人；贫寒而不移其志如先生者，却绝无仅有。先生长年灰色布袍，白袜青鞋，寒冬则灰袍外加一棉袍，更多一顶礼帽毛围脖……

先生居南后街，前后院，本族数户，先生则居后院北屋三间。门前老槐一树，夏日邻里乘凉，亦可见弈棋者，可闻人声鸟声，而冬寒秋苦，则门可罗雀。

正街（也叫大街）路北为关帝庙，其东配殿三间为教室，其一间为教师办公室。自家至学校，先生要走半里许的一个“L”字。乡人多敬先生，每遇必有简短寒暄、问候，而只闻其唯唯，却很少见其抬头。

一家住一外村中年女人。女人多姿色，常临门前。一年之后，她既憾且奇：“每天见他往返四次，没见他抬过一次头……”马先生常教育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那时候，写字（毛笔书法）是每天的必修课——大字、小楷。大字全临摹柳公权，小楷则摹刘春霖。我的大字用尽心力总平平常常。先生摇头慨叹：“‘肉’多则软则笨！”先生似不长于书法，很少用毛笔写字。偶然写之，似不甚美，然而却遒劲、苍老，力透纸背。乡村小学校的“先生”常被村民请占卜、看风水、写春联，而马先生对此类事一概拒之门外……

日本兵占领房山城设日人县长桥本，又设华人县长名项镇安。为永远占领中国，日人的口号是“中日提携”、“中日友好”、“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共荣圈”……为奴化中国。有汉奸缪斌者，根据《大学》的“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演绎建立“新民会”。县里建立了这一汉奸组织，卖国求荣之辈趋之若鹜。马先生对此辈视而切齿，避而远之……

村中有小铺经营油茶糖醋，兼卖烧酒花生米。日则正经生意，夜则聚赌酗酒，男女混杂，嘻笑唱骂……

先生忽然击案长歌若哭——《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先生即兴给我们讲起了唐诗、宋词。我们朦胧中感受艺术，却哪里知道先生对不知爱国之同胞是何等悲凄、愤怒啊！

中央军南逃，弃械颇多。平日肖小不良之徒，拾械聚众，啸集山林，昼伏夜出，打家劫舍，抢男霸女。美其名曰“抗日救国军”，并顺序称为一路、二路……二路司令白秀亭，先生之学生也。以为，一朝有权有势，理应荫庇亲近。派一副官长骑良马持大红金字请帖，请马先生以“恩师”之尊去“司令部”养尊处优。先生命来人复命：既为抗日救国，又何劫掠乡里？我能与土匪学生而同为土匪乎?！先生之血泪与撕碎之红柬落地斑斑……

伪县长项镇安亦未忘“师生情谊”，命人牵马莅校，请马先生去县衙以颐养天年……先生指西（县城）而骂：你既为汉奸，又思污及他人，何无耻之甚耶?！先生拂袖而起，来人败兴而返……

民国27年大年之夜，依“拜年”乡俗，我携弟凤桐及同学一二，造先生之府叩拜。乡里起“五更”者虽悲国难，但为取吉利，仍灯火点点、爆竹声声。至先生窗下，不见灯光，不闻人声，似非节日。我轻敲窗棂，叫：“老师，我们拜年来了！”先生斥曰：“国破家亡，还要拜年！”我们内疚且羞惭，轻轻而退。

日寇削弱中国人，伎俩颇多。饶乐府村东有良田广阔，名“四顷八”，为村民生活所系。县政府役民伕数万，占四顷八之大部修一飞机场——其实只是割尽青苗，不许再耕种。全场数百亩，无一地上建筑物，只“荒场”也。场西坎上有齐家坟（地），坟地中有巨槐，高可数丈。日人在树尖上悬一红白相间条旗，作为导引飞机标志。数年之久，无一飞机降落。

四顷八所余不多土地，多种花生。村人有“拾”花生习惯。即：主人刨收，难免失落万一，老、小复刨复收亦可得些许。四顷八距村太远，老、少不可及。每当朔风骤起之后，浮土吹去便有点点花生露出。

马先生为国为民忧愤交加，区区六斗谷难养数口之家，每天课余，仍长袍、礼帽、围巾，携竹篮出村东去。四顷八上多一伶仃剪影忽直忽弯者，即先生在拾花生也——一片荒场愈加荒凉！携回些许花生炒熟，舀得几碗开水烧开，全家亦啖亦饮，即一日之晚餐也。

先生饥且忧愤，民国 30 年春与世长辞，享年仅五十有三。

先生死后，我曾在坟前默誓：必为先生立一丰碑！然而 48 年既逝，我亦虚度六十有二。一石未树，惭愧奚似?!

口碑亦即丰碑，我只著文存照。

我以七绝结束此文：

拒马河声易水声，房山爱国多英雄。
斥奸斥敌音容在，伶仃瘦骨却铮铮。

【作者简介】 王凤梧，原房山区文联主席，离休干部。

（房山区政协供稿）

程砚秋先生在青龙桥

夏长贵

我是青龙桥的老户人家，日伪时期百业萧条，为了养家餬口，我便买了一辆马车，以拉脚为生。当时程砚秋先生住在青龙桥，有时需要进城里西四牌楼报子胡同老宅拉个东西什么的，都用我的车，所以有缘份与程先生接触。

程先生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以唱悲剧出名。我在程家花园亲耳听他唱过《荒山泪》，云遮月的嗓子，字正腔圆，唱得就是好。

程先生是满族正黄旗人，旗人指名为姓，最初他的名字叫程麟，就以程字为姓了。先生一共哥儿四个，他是个“老疙瘩”，青龙桥的父老乡亲们都称他“程四爷”，有人干脆称他“四爷”。

程先生是在1943年来青龙桥住的，买下了青龙桥刘振辉家的一座小型四合院：北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两间，南房四间（半坡房）及一间过道“巽字门”。程先生一人住在北房，有时夫人果素瑛也来陪他小住。如果他的儿子和徒弟等人来这里看望他，就分别住在东西配房，老管家范兰亭夫妇住在南房。

这座四合院当时属青龙桥西街穿堂门3号。现在南房及过道“巽字门”还保留着旧貌，北房及东西配房已翻修成红砖洋瓦房。解放初期，程先生将这座四合院交给了国家。

程先生为何搬到青龙桥住？与日伪汉奸的压迫有关系。程先生是个很有民族气节的人，对为富不仁、为虎作伥的人嫉恶如仇。

有一次京剧界组织“义演献机”运动，在日伪势力的压迫下，别人都不敢不演，有人还出面劝他看在同行的面儿上，请求他演出，免得敬酒不吃吃罚酒。程先生表示：“献机义演的事，我程某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这下惹恼了日伪汉奸特务。一次程先生应上海剧院的邀请演营业戏，演出完毕，剧团从上海回到北平。程先生刚一出前门火车站，就上来几个便衣特务找茬，还动手打人。程先生从小学过武术，三下五除二就把几个特务打翻在地，抽空子跑回家。日伪特务吃了亏，屡次找程家的麻烦。常言说“惹不起还躲不起”，就这样，程先生决心蓄须辍演，来青龙桥务农隐居。

程先生来青龙桥务农，一点儿不带假的，他买了百望山下的一块山坡地，雇人耕种，他自己也身穿黑色布衣布鞋，腰系搭布，眼戴墨镜，下地锄草耪地，有时还带着大儿子启元、二儿子景元一起劳动，教育儿子要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为了种好庄稼，程先生还买了一辆大马车及耕犁等农具。其他农户没钱买马车，便向程先生借马车使用，程先生总是有求必应。

程先生来青龙桥住的第一个春节，曾在街门贴出一副春联：

蓄须事耕耘　杜门谢来往

殷勤语行人　早作退步想

这副对联是程先生自书自撰的，字写的是魏碑张猛龙，很受乡亲们的赞赏。至如今，青龙桥的书法家刘汉春先生还时常赞美这副对联写得好呢。

穿堂门 3 号前面，原是一处大空场，平时鸡刨狗挠的，又脏又乱。为了解决村里人推碾子磨面的困难，程先生就把这块空场买了下来，盖了一座碾房，本村人来磨面，分文不取；外村人来磨面，只收工本费，不求赚钱盈利。

这座碾房，后来程先生送给了管家范兰亭。如今碾子已不存，碾房还在。

程先生常常走访当地父老，了解风土人情，以及百姓生活情况。那时当地只有一个农村小学，附近温泉、太舟坞、槐树居的农村子弟都来这里上学，毕业后无中学可上，只得回家务农。程先生为了使这些学生继续深造，决心办一所农村中学。中学就建在元代古庙功德寺遗址上。一切开销费用都是程先生自己掏的腰包，程先生自任董事长。他的老管家范兰亭负责做饭看门。考虑到山北温泉等村的农家子弟上学路途遥远，又在董四墓买下一座金家花园，修缮后作为学生宿舍。

学校的名字叫“颐和中学”。学校只办了几期就因故停办了。以后，学校交公，金家花园变成了程家花园。此后，程先生间或在青龙桥穿堂门 3 号、董四墓程家花园两地居住。

程先生每次从城里到青龙桥来，轿车一到青龙桥大街东头（今颐和园北宫门前），程先生就下车步行。有一次，我不解地问：“四爷，青龙桥大街这么长，您为什么要走着回家呢？”他回答：“街上尽是父老乡亲，见面都和我打招呼，我坐在车上大不敬，下车是表示尊敬父老乡亲。这也是中国的古风嘛！”

一年冬季的一天，程先生坐着汽车走到现在 67 中这个地方，见一位要饭的老太太倒在地上，脑门子磕破了直流血。程先生叫停了车，下去将老太太扶起并将她送回家。程先生见她家冷屋子凉炕，还有两个孩子在炕上哭喊，便掏出 10 块银元交给老太太说：“你先买两袋洋面，治好病，再用剩下的钱做个小买卖吧！”说完了，程先生就出门坐车回家了。

一年的冬天，青龙桥大庙前施粥，程先生路过这里，见打粥的人，每人只给一碗，就建议每人给两碗。管打粥的人说：“政府就给这么多米，给两碗不够！”程先生说：“不够我给添！”第二天，从城里运来一大车米交给了粥厂。

程先生在青龙桥还施粥、膏药和青老玉米。

程家花园的房子，每年雨季到来前，要勾抹一次。一次程先

生通过给他家当佣人的陈学文请来道公府的穆六等十几个瓦匠和小工作活。每天中午，程先生都叫范兰亭给弄一大桶绿豆汤，撒上二斤白糖，给工人喝。有一天太阳很热，程先生见瓦匠在房上晒得顺脖子流汗，就叫穆六他们下来休息，穆六说："活茬儿赶早不赶晚。"程先生说："凉快时再干！"穆六说："凉快时就天黑了。"程先生说："天黑了就收工回家！"结果硬是叫工人下来休息了。

一天穆六他们勾抹完房，与程先生在一起聊天，程先生问起他们干一天活挣多少钱，穆六说："一天挣一块钱。"程先生说："我每天发给你们每人一块三毛钱，怎么变成一块啦？"程先生这才知道陈学文从中上欺下骗，坑了每人每天三毛钱。程先生很气愤，表示欠工人的钱，他一定给补上。后来程先生找来陈学文说："你生活不够，可以跟我说，这样吃工人的黑心钱不好。"之后，给了陈学文3个月的工资，将他辞退了。

程先生在青龙桥，还交了一位武友，名叫焦文玉，是西郊著名的武术家。一天早晨，焦文玉在后院练习剑术，程先生隔着矮墙看见了，叫了一声"好"，焦文玉停住剑，一看是程四爷，便热情地请他进门小谈，于是两人交了朋友。为此，程先生向焦文玉学了一趟"钟馗剑"，并叫自己的二儿子景元当了焦文玉的徒弟。据说，程先生演《霸王别姬》练的那趟剑，就是以"钟馗剑"改编成的。

程先生在青龙桥和董四墓居住时，干的好事不少。我不是捧人家，要说程四爷在青龙桥，就是叫得响。

【作者简介】夏长贵，青龙桥老户，回民，解放后务农，多以赶大车为业。现退休在家。曾被评为市民族宗教先进工作者。

严宽整理

（海淀区政协供稿）

后　　记

《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是我会继《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一书之后，又一本反映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北平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状况的口述史料专辑。

我们是本着追求史料确凿的精神来编辑这本书的，因之历时两年方才面世。

需要说明的是，书题中的“北京郊区”，是指现在的北京郊区，而不是当时的北平郊区。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郊区的范围远不如今天这么大。本书所涉及的一些县，如平谷、昌平、密云、延庆、房山等，当时并不在北平郊区的范围之内，它们或属于河北省，或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分别隶属于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和伪华北自治政府。但是，考虑到这些县现在都在北京市的行政区划内，而兄弟省市政协的同行又不大可能到这里来收集史料，我们若不做这件事，这部分史料即有可能湮没掉。为此，我们在确定这本书的地域范围时，当然就把这几个县和地区包罗进来，并用了“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这样一个书名。这是其一。

其二是时限问题。本书的时限范围定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到 1945 年日军投降止。但是，由于 1933 年的长城抗战，也是北京地区与抗日斗争有关的一件大事，所以延庆、密云等县的史料，便

上溯到了1933年长城抗战前后。

第三个要说明的问题是，北京郊区地域广阔，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内容十分丰富，光是日军暴行和人民反抗，就可以分别出版单行本。因篇幅有限，不可能全部囊入。本书所选取的只是一些较为典型的材料，因此，挂一漏万、畸轻畸重多所难免，例如，关于日伪政权统治方面的史料就显得比较单薄，令人遗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西、平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打击日军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因这部分内容不作为本书的重点，故也比较薄弱。幸有张大中同志撰写的《爱国情深战斗不息》(代序)，从某种意义上讲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由于作者视点较高，又有生动感人的亲身经历，所以这篇“代序”对于读者全面认识北京广大郊区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概貌，特别是认识几大抗日根据地的概貌，是会有帮助的。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力图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北京郊区人民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全书分为血证、苦役、统治、掠夺、奴化、毒化、反抗七个部分。这七个部分不仅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在我北平城以外广大地区实施暴行、强掠华工，以及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甚至进行鸦片毒害的种种罪行；而且真实地反映出从爱国官兵到手无寸铁的群众、从中国共产党人到武装起来的农民，以热血和生命反抗侵略、保卫家园那英勇而壮丽的历史画卷。我们期望这些资料不仅为研究日伪时期北平及其周边地区的状况填补空白，也能起到激发爱国心，增强人民历史责任感的教育作用。

为了永久的和平，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侵略者所施于我们的耻辱！

这本专辑是我会与郊区县政协合作的结晶，丰台区、海淀区、石景山区、房山区、门头沟区、通县、平谷县、昌平县、密云县、怀柔县、延庆县、顺义县等区县政协负责文史工作的同志付出了

大量的心血。有的区县地处山区，为了查清一件事，这些同志往往要奔波一整天。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崇高的敬业精神，使我们万分感动。本书的珍贵照片也均为他们收集提供。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年1月